

劫後長懷



十年動亂紀事

[illegible]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席捲中華神州大地的那場浩劫，雖已過去二十多個春秋，但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之重，給歷經這場浩劫的人們造成的心靈創傷之深，則難以隨歲月的流逝而抹去與癒合。

本書作者穆欣先生，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過，與製造十年浩劫的一些當事人共過事。他以自己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的事實和身受八年牢獄之苦的史實，對「文革」進行了全面、客觀、真實的追述。

全書四十餘萬字，分十七個章節，以翔實的史料、生動的事例，揭示了「文革」期間，鮮為人知的林林總總。現已年近八旬的穆老，在書中還對某些反映「文革」的作品，為嘩眾取寵而不惜歪曲事實、混淆視聽的描寫，給予了中肯的批評和糾正。

ISBN 962-7176-29-X



9 789627 176299

published & printed in H.K.

¥158.00

穆欣



趙從長說

——十年動亂紀事



和平圖書·新天出版社

書名

劫後長憶——十年動亂記事

作者

穆欣

責任編輯

凱華 董海敏

裝幀設計

司徒綺雲

出版

新天出版社

印刷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七十一號永安集團大廈一五〇二室
開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香港九龍葵涌華星街八號華達工業中心A座八樓十五室
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

規格

大32開(138 x 210mm)

國際書號

ISBN 962-7176-29-X

NHCG-010-P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楔子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 一、密室策劃，姚文元點火
- 二、學術界的震驚和憤懣
- 三、逐步升級的政治陰謀

第二章 動亂前夕的較量

- 一、《二月提綱》的制定
- 二、《座談會紀要》的出籠
- 三、毛澤東在上海的三次談話

四、彭真召集的一次會議

五、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六、一場不易被覺察的論戰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起草前後

一、在上海起草《通知》紀事

二、毛澤東對《通知》草稿的重要修改

第四章 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二、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奪權

三、康生炮製的『第一張大字報』

四、『紅衛兵』的誕生

第五章 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

一、在迷惘和惶悚中跟著走

二、在工作組存廢問題上的爭鬥

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

四、圍繞工交座談會的論爭

第六章 黑雲壓城城欲摧

- 一、『改朝換代』的『奪權』風暴
- 二、『大鬧懷仁堂』的風波

第七章 狼煙四起，勢頭不善

- 一、武漢『七·二〇事件』
- 二、外交部奪權前後
- 三、『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 四、毛澤東批准採取斷然措施

第八章 鴟梟鳴衡軌，豺狼當路衢

- 一、兩個陰謀家的勾心鬥角
- 二、蛇蠍一樣的女人
- 三、林彪——一個十足的偽君子

第九章 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 一、康生，製造假案、冤案、錯案的罪魁禍首

- 二、康生說：『反對林楓同反對劉少奇的鬥爭是分不開的』
- 三、大牆裡面的『逼、供、信』
- 四、毛澤東批示出獄治病，『監護』仍未解除
- 五、飽受折磨，含恨而逝

第十章 憂心悄悄，愠於群小

- 一、保護了一大批人
- 二、蔑視林、江一夥的明槍暗箭
- 三、挫敗江青鎮壓『聯動』的陰謀
- 四、江青『放火』，周恩來『滅火』
- 五、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第十一章 暴內陵外，心狠手辣

- 一、美麗的釣魚台成了『全面內戰』的指揮台
- 二、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所在
- 三、挑動派性混戰的『總後台』
- 四、七任『辦事組長』的下場
- 五、她在『後院』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第十二章 深文周納，無法無天

- 一、在動亂中辦報
- 二、紅學家李某的羅織誣陷
- 三、『內部諷刺畫』引來的災禍
- 四、《夏菊花發言》的風波
- 五、《李慧娘》冤案始末

第十三章 禍亂相繼，在劫難逃

- 一、短暫的『發配』
- 二、兩次被綁架
- 三、『繡樓』囚室遐思
- 四、原來又捅了毛家灣的馬蜂窩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沉冤八年

- 一、法西斯式的『審查』
- 二、秦城監獄六八一三號『犯人』
- 三、明目張膽的『逼、供、信』

第十五章 株連三族，家破人亡

- 一、張卉中含恨而逝
- 二、杜保同九死一生
- 三、子女的劫難
- 四、父母驚恐、悲憂而歿

第十六章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一、偽證製造者的自供——一個造反派小嘍羅的筆記本
- 二、何來『批林、批孔、批穆』——看報社頭頭編造的『姚文元語錄』

第十七章 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又撞打頭風

- 一、指鹿為馬的『專案組』
- 二、人從獄中來，『官司』還未了
- 三、『專案』追到醫院，新的一輪折磨
- 四、『四人幫』垮了，幽靈仍在作祟
- 五、拚搏四年半，終獲徹底平反

跋

楔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國大地上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颶風。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國人民經歷了整整十年的全面內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大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地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這些論點既違背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與中國的實際不符。他對當時中國的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關於『文革』產生的根源，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曾對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說：『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百四十六頁。）

從後來的事實看，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迫於形勢所作的自我批評是非常勉強的，到九月間的八屆十中全會，他又退了回去，重提階級鬥爭，而且提得更高。他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以後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有意推動全黨向『左』轉的轉折點。他在這次會議上，用階級鬥爭的理論統一全黨的思想，隨即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全面展開政治批判。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又在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四清』運動，並且制定了《二十三条》，其指導思想仍是階級鬥爭，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這次會議展示了毛澤東欲發動一場自上而下、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的決心。

這個時候，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認識及他對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認為中國城鄉基層單位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勞動人民手中；知識分子隊伍基本上屬於資產階級範疇，他們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科技、文化、藝術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出現了『官僚主義』及『走資派』，甚至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已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現實危險。因此，他毅然決然地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通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則拉開了這場持續十年的全面內亂的序幕。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密室策劃，姚文元點火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海瑞罷官》這齣戲，是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在一九六〇年寫作的。這位史學家在那時『破門而出』寫這齣戲，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其間，人們談到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應該提倡說真話、敢講話。有一天，毛澤東在看了湘劇海瑞戲《生死牌》之後，找來了《明

史·海瑞傳》。看後，他向大家推薦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看的奏摺裡，惹惱了皇帝，被關進監牢。一天，老獄卒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一問，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澤東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應該提倡他那種剛直不阿的精神。他建議找一位研究歷史的人寫寫这方面的文章。

胡喬木從上海開完會回到北京後，就向吳晗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當時幹部不敢講真話而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的敢為精神，建議他給《人民日報》撰寫談論海瑞的文章。因為吳晗對海瑞這個著名的明代清官本來就很有感情，特別讚賞他敢講真話、犯顏直諫的精神，因此很快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並用劉勉之的筆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接著，吳晗又寫了《論海瑞》一文。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績，對他作了充分肯定的歷史評價，他認為「封建時代的海瑞，還是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這篇文章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寫的，當時，他根本不可能預料到廬山會議上會發生錯誤批判彭德懷的事。廬山會議之後，他把這篇文章送給了參加廬山會議的胡喬木看。胡喬木根據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彭德懷的事情，就在《論海瑞》一文的結尾處加了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話，用以劃清海瑞與彭德懷的界限，特別說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本不是什麼海瑞」。於是，《論海瑞》一文便在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此後不久，北京京劇團著名演員馬連良約請吳晗就海瑞的事跡寫一齣戲。由於朋友們的勸說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儘管吳晗不懂戲，也從來沒有寫過戲，他還是答應了。寫海瑞的戲，難度很大，前後

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江青的要求遭到兩部部長們的冷落，毛澤東也沒有同意。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問題有關。毛澤東也沒有接受和重視。到一九六五年初，在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的不滿和疑心加劇後，終於批准了江青批判《海瑞罷官》的意見。江青通過上海市委副書記張春橋物色了素有「棍子」之稱的姚文元寫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此文章並沒有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同意和認可，卻點名批判了吳晗。吳晗的劇本是於一九六〇年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而寫成的，而姚文元的文章卻蠻橫無理地把該劇中所寫的海瑞「退田」、「平冤獄」等事生搬硬套地同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批判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從而使問題具有了特別嚴重的性質。

姚文元在文章中寫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颺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案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一「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

在這裡，姚文元通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實際上提出了在黨內，尤其在黨中央領導層內某些

爭論的重大問題。姚文元武斷地說：『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緊接著，毛澤東批准發表姚文元這篇文章，並示意全國報刊轉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拉開了史無前例的『文革』的帷幕。

關於江青、姚文元夥同炮製這篇文章及其出籠的經過，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康生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曾講了某些有關情況。他說：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市委執行主席指示，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我很晚才看。一九六四年，我同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向黨進攻是一回事。去年九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席根據長期的考慮，認為吳晗是為資產階級復辟準備輿論的。在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主席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答：『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評。』十二月二十一日，主席同陳伯達、關鋒等講，『戚本禹的文章（按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今年二月八日，去主席那裡（在武漢），八日到十日、三天內，主席曾先後兩次問彭真：『能否講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按：毛澤東還說，『要害是罷官』的發明權屬康生。當時康生還不敢承認。這次會上他才以發明人自居）。這次主席還說，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批判要聯繫廬山會議，可以廣泛一些。學術批判要繼續搞。

今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主席在上海談過三次話。第一、二次談話時說：『為什麼批判《海瑞罷官》就不能聯繫廬山會議？吳晗的文章，不是他自己已經提出來聯繫會議嘛！還有人說，「主席不叫聯繫」，這就奇怪了，我不是講廬山會議罷了官了嗎？』主席又說，上海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時不敢告訴中宣部。中宣部是『閻王殿』，告訴他們就不叫發表了。三十日，主席說，姚文元關於海瑞修吳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無名的，他修水利還不如張居正。海瑞的《平黎策》要好好批判。他還畫了地圖，很反動的，要加以批判。

其後，江青又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此事作了專門發言：『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匯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他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歷史學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

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年（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也談了：「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這篇文章就這樣發表，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載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光明日報》的編輯人員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又聽到社會上的強烈反應，有人建議轉載。以前，我報經常轉載各地報刊發表的某些文章，都是由編輯部自己決定的，可是這篇文章與眾不同，點名批評的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之一和著名學者。在此之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曾經有過關於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宣部同意，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準的規定；特別規定包括吳晗在內的幾位學術界知名人士不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光明日報》，作為一張全國性的報紙，一直遵照這些規定行事，不能貿然轉載。當我們就此事向中央宣傳部請示時，遲遲沒有得到答覆。十一月十九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在召集北京各報刊負責人研究文藝評論問題的會上，有人提出可否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主持會議的人答覆說：『過去中央規定對吳晗不批

判，現在中央報刊是否刊載，要請示中央。」這是因為：當時中央宣傳部對於這篇意外出現的文章感到震驚，所以對它採取慎重態度，是完全應該的。因此，在一段時間內，除上海外，全國各報都沒有轉載。十一月下旬，軍委總參謀長羅瑞卿（他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路過上海的時候，江青問他：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沒有轉載，《解放軍報》為什麼也不轉載？羅瑞卿就打電話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通知轉載。《解放軍報》即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全文轉載，並且加了點「政治實質」的按語，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報》也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根據彭真二十八日的指示寫了按語，強調『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

在《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後，我們又請示了中宣部。中宣部有關人員答覆說，彭真考慮，如果北京各報同時轉載，震動太大，決定《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遲一天，即十一月三十日轉載，但可以先寫好轉載用的編輯部按語送去看看。當晚，中宣部在退回經過審改的《編者按》清樣時，又通知說：《光明日報》可以再推晚一天，到十二月一日見報。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時在根據周恩來、彭真意見寫成並經他們修改過的按語中說：『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報》是將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五版之『學術討論』版，以此表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態度。十一月三十日夜裡，中宣部

有關人員又打電話來說：《光明日報》轉載姚文，應再推遲一天。

這樣，《光明日報》於十二月二日見報，同時發表了《編者按》：本報今天轉載了《文匯報》十一月十日發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研究歷史事件等重大原則問題，值得大家重視。《海瑞罷官》是吳晗同志的一齣京戲，曾經出了書，也在舞台上演出過。本報也曾發表過吳晗同志寫的《〈海瑞罷官〉序》和其他稱讚這齣戲的文章。幾年來，學術界和文藝界對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有關歷史人物的評價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繼承等問題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毛主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我們認為，既然《海瑞罷官》這齣戲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既然人們對這齣戲和上述有關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就應該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開展充分的討論，以便分清是非，堅持真理，克服錯誤。為此，我們準備就這齣戲以及其他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希望大家各抒己見，展開爭鳴。

北京各報紙開始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已是在此文發表的第十九天。所以遲遲沒有轉載，事非偶然。這篇文章發表以前，除毛澤東之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別人更不用說了。即便是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對它的突然出現也深感震驚，因為就在這年的上半年，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對於學術批判問題已有過前述的幾點規定。這次上海的做法顯然是違背了那些規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曾召集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北京日報》總編輯范瑾專門開會研究過轉載問題，因不清楚姚文的來由和底細，決定先向《文匯報》了解有關情況再看。但因張春橋嚴令對北京及中央

封鎖消息，《文匯報》堅不透底，北京市委和《人民日報》去問，也無所獲。鄧拓即請示正在外地的彭真，彭說暫不轉載，待他回京後再說。彭真於十一月下旬返京後決定：中央報刊是否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還要考慮一下再說。他要北京市委書記處討論轉載的問題，並說吳晗的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的文章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書記處研究後認為，不同意姚文第四部分從政治上批判吳晗的觀點；如果必須轉載此文，則加上編者按語以表明自己的態度。因此，《北京日報》在轉載時，根據彭真意見在按語中強調了『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稍後，彭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的一次會議上說：《解放軍報》的按語說吳晗《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就使人家不敢講話了。《北京日報》的按語不那麼兇。最後《人民日報》搞了個按語，是總理和我、（吳）冷西定的稿。現在我主張放，全面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裡的話都倒出來，講透講夠，然後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我們的認識。在放的同時，各種問題扯得越寬越好。至於政治問題嘛，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

在這次會上，康生卻生拉硬扯地把吳晗研究海瑞所發表的文章和劇本與廬山會議聯繫起來，一口咬定，吳晗從本質上是極端仇視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是拚命地為早已被黨撤了職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張目的。在此期間，江青也多次在毛澤東面前，在她的幾個打手面前宣揚說：『彭真拚命保護吳晗』，『彭真對吳晗的看法是一貫的』。這期間，彭真多次向毛澤東說：『據調查，吳晗與彭德懷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也沒有其他直接聯繫。吳晗不是政治問題。』因此，對於批判《海瑞罷官》，彭真始終主張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強調應通過『百家爭鳴』，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

原則達到辨明是非。然而，彭真卻沒有料到，姚文元用批判《海瑞罷官》所點起的這場政治大火不久就燒到他和北京市委的身上。

二、學術界的震驚和憤懣

姚文元這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宛若投向社會的一顆重磅炸彈，在北京、上海以及全國文藝界學術界造成巨大的震動，引起強烈的反應。絕大多數人都對『對吳晗的批評感到有些突然』，人們都預感到一場行將來臨的政治風暴。這是因為，連續多年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正在全面泛濫開來，中共中央從六十年代初開始糾正這種錯誤傾向，直到這時，『「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上的指導思想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因受『階級鬥爭為綱』影響，人們往往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鬥爭日益激化的意識形態領域，已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而在人們心目中的姚文元，則是一根專靠『批判』別人起家的『棍子』（江青卻誇他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人們感到這篇文章如此盛氣凌人，粗暴武斷，可能『來頭不小』。元史學家翁獨健說：『姚文元的文章一出來，我們一些人都感到嚇一跳。不知《文匯報》這次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有無其他「內情」。』中國人民大學的馬奇教授說：『如果不是中央同意發表這篇文章，那麼就值得考慮。』

刊載姚文元這篇文章的《文匯報》送到吳晗家裡，吳晗先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此文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有不少是斷章取義，有些蠻不講理。他本想不去和這種小人計較，但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見姚文元竟把『退田』、『平冤獄』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無中生有，栽贓陷害，血口噴人，亂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感到十分憤慨。同時，他感到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之手，他的心情沉重起來。因為自己對黨忠心耿耿，遭此誣陷，也實在想不通。後來在他見到《光明日報》記者的時候，情緒激動地說：『這種風氣不好，怎麼隨便找個靶子就亂打！』他說：『我寫海瑞，是有根據的。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談歷史？』吳晗異常氣憤地說：『姚文元說我寫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平冤獄是為了替反革命分子翻案。這還了得！如果有人再讚揚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豈不是要被說成是號召人民向共產黨起義了嗎？』吳晗看了姚的這篇文章，儘管當時覺得它『有來頭』，但是到底是什麼來頭，他摸不清楚，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情勢嚴重的程度。所以他在談話結束的時候說：『這種批評文章我是不理的。不過我覺得這種風氣不好，對開展學術討論不利。』

當時為姚文元文章叫好的，固亦不乏其人，但是，許多人讀了姚的文章，都和吳晗本人一樣感到極大的憤慨和不安。據《光明日報》記者聽到的初步反映，絕大多數對它都是不滿意，不贊成的。首先不滿文章的粗暴武斷，認為它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不但不利於學術發展，政治上更十分有害。科學家周培源說：『吳晗是進步的歷史學家，哪裡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北京大學副校長、

歷史學家翦伯贊說：『思想批評要聯繫個人歷史，要看他是什麼樣人。吳晗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要有個「一分為二」。一個人寫文章，難道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他並公開申明：『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又說：『姚文元的文章亂來一通，不使人害怕嗎？是夠嚇人的。學術批評不是為了一棍子打死人，讓別人翻不過身來。』『把別人放在絕對錯誤的地位，認為別人都是資產階級。假若一個人是這樣想，這樣做，那末我敢說這種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文學家趙景深說：『姚文元前半段都在理，但後面一段提出的幾個問題，使人感到汗毛凜凜。』史學家柴德賡說：姚文元的文章『有些以聲勢取勝，前後不接氣，後邊的高度，有點突然，令人「嚇一跳」！』考古學家夏鼐對此憤懣不平，寫了一首《贈吳晗》的詩，抒發他對姚文的不滿和對吳晗的同情：『史學文才兩絕疇，十年京兆擅風流。無端試筆清官戲，紗帽丟成禿頭。』因為在政治上不摸底，當時對於姚文的內容，不少人還是從學術的角度評價。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耿淡如說：『文章的前三部分是很有說服力。文章的最後一部分寫得似乎兇了些，要把劇中海瑞的「退田」與一九六一年要求公社退田聯繫起來，恐怕吳晗主觀上決無此意。』

這種看法很有代表性。史學家楊寬說：『姚文中說：「要退田嗎？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這幾個問號，使原來不敢寫文章的老先生更不敢寫了。』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說：『姚文的後半段分量就太重了，好像硬拉去與一九六一年結合似的。』（他因演過《海瑞上疏》的劇目：最後也和吳晗一樣，被迫害得含冤而死，家破人亡！）。當時一般認為，《海瑞罷官》是有缺點的，但不能說它是『毒草』，可以批評，可以討論。

學術討論應該平心靜氣，以理服人。然而姚文元卻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批判，而且態度粗暴，強詞奪理。這種做法，極不利於百家爭鳴，不利於學術研究的繁榮和發展。史學家譚其驤說：『政治與業務不能這樣合起來看。政治是政治，藝術是藝術。』馬奇教授說：姚文『已經超越了學術討論的範圍，變成了政治問題。』美學家宗白華說：『姚文元的文章寫得過火，說得刻薄，不符合黨的政策。我看不能這樣來批評。把什麼東西都判「死刑」，還有誰敢寫東西！』人們紛紛給予自奉為『無產階級代表』的姚文元以有力的駁斥。姚文發表不久，僅《文匯報》就收到三千多件讀者來信來稿為吳晗抱不平，對姚文元的惡棍作風表示極端不滿。但《文匯報》當時已被江青、張春橋控制，這些來信來稿都無法發表。讀者的正義呼聲不但得不到伸張，反而成為各自的罪狀，日後遭到了江青一夥的迫害。

人們對於姚文元的文風特別反感，認為這種文風勢必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北京大學黃子卿教授說：『海瑞是四百年前的人，不能以馬列主義標準來衡量他。照這位姚先生的文章看，除了馬列主義者以外，歷史上的人物沒有一個好人，都要全盤否定。這樣恐怕也過分了。』翁獨健說：『這樣一搞，會把學術界搞亂了，以後誰還敢說話，誰還敢寫文章？』柴德賡說：『學術討論應該實事求是。大家剛剛從顧慮重重中擺脫出來，這樣一來，有些人會害怕的。』翻譯家羅稷南說：『作個文藝批評家容易。可以東也不是，西也不是，到處批評人家不是；但自己也應拿出東西來，不能依靠政治標語口號。』又說：『這樣的討論只能引出一批拍馬屁和好出風頭的人。』

儘管姚文來勢兇猛，『聲勢奪人』，使許多人感到震驚，但不少人還是仗義執言，明確站在吳晗一邊，斥責姚文元無理。翁獨健教授說：『姚文元給吳晗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結論，這是莫須有的

罪名，和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理由一樣。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獄，退出同現實類比，請問你是什麼用心？你故意這樣套，是不是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經濟史專家李平心憤慨地說：『現在問題很難說，很可能今天沒有問題的人，明天就有了大問題。吳晗哪裡會打著紅旗反紅旗呢？現在反正就是一頂帽子戴上去。』遼寧大學歷史系教師楊士孝更是怒氣填胸地說：『如果姚文元的文章能夠成立，我姓楊的把腦袋拿下來！如果他的觀點對，那麼我國歷史學界將完全陷入僵局、混亂。』他質問說：『姚文元分析吳晗讓我們學習什麼？分析的結果，吳晗起碼是思想反革命？我看這是在扣帽子，這是姚文元對吳晗的侮辱和中傷，這是討論問題的態度嗎？姚文元寫這篇文章，目的是否定吳晗，我看最後被否定的不是吳晗，而是姚文元！』

歷史的辯証法是無情的。事情發展的結果總是與違反歷史規律的陰謀家的願望相反，吳晗的政治冤案終於得到徹底昭雪；而姚文元則和他的後台江青、張春橋一起，就從這篇文章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開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被告席，被正義的寶劍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三、逐步升級的政治陰謀

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以後，開始就此問題展開討論。當時文化革命五人

小組和中央宣傳部的意見，強調對《海瑞罷官》的評價屬於學術問題，要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特別指出「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地方也要批判」。

在《光明日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的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姚溱召集首都各報刊負責人開會，由吳冷西傳達彭真關於在報刊上就此問題進行討論的意見。他說：姚文元的文章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學術問題，一是政治問題，兩個問題都可以討論，估計政治問題的討論不可能發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學術問題上討論。通過這次討論，要在學術界造成貫徹「二百」方針的空氣，要貫徹自由討論的方針。在討論中，批評吳晗的文章可以發，批評姚文元的也可以發。他還說，堅持擺事實、講道理的方針，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罵街。現在學術界比較緊張，如果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是有人會寫文章的。當天會議結束後，筆者一回到光明日報社就將會議精神向編委作了傳達。編委會討論時，大家都贊成這個方針，並即根據文革五人小組指示的精神制訂出本報開展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計劃。第二天（十二月四日），我又在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碰頭會上，傳達了十二月三日的會議精神和編委會據此制訂的討論計劃，要求在版面上體現；著重搞學術討論；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其後，在「文革」中，造反派竟將此作為筆者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加以批判）。當時除了首先刊載姚文元這篇文章的上海《文匯報》、以及《解放日報》等極少數報刊外，其他報紙大都照此精神辦理。

以下引錄《光明日報》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計劃的主要內容，有助於讀者了解當時的有關情況：

一、這次就《海瑞罷官》和有關重要問題開展討論，實際上所涉及到的問題是：如何對待歷史人物、歷史劇和封建道德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封建道德問題），這是一場兩種歷史觀、文藝觀和道德觀的辯論，要把這場辯論著重放在學術思想鬥爭的範圍內。這些問題，在中國思想界存在著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証，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這些方面，吳晗的一些著作有代表性，但是其中的許多觀點，並不是吳晗所獨有的。因此，這次討論在學術界、文藝界帶有普遍意義。

二、為了使這次討論達到分清是非、端正觀點、繁榮學術這一應有的效果，必須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來進行。通過這次討論，進一步開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既要開展批評，也允許反批評。開展革命的戰鬥的批評，文章要有一定的數量，但更要講求質量，力求做到把戰鬥性和科學性結合起來，還要講究策略。自始至終要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以科學分析服人，以理服人，力戒隨便戴帽子，更要防止謾罵。

在發表反批評文章方面也要做的得當，應有選擇、有控制和有準備（作者的代表性和文章質量有選擇，文章所涉及的問題範圍和文章數量有控制，發表了就要準備駁倒）。

三、這次討論的問題重點，擬放在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用什麼樣的觀點研究歷史的問題上。今後討論的步驟大致是：從《海瑞罷官》討論入手，適時地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用什麼觀點研究歷史的問題，以及如何對待封建道德的問題上，最後歸結到歷史觀的問題上。但在實際工作中也要視具體情況而有靈活性，幾個問題的討論，必要時可適當穿插。

四、這裡提出的選題只是指出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具體約稿時題目可以定得小一些，這樣文章容易寫得短，道理也容易講得透。同時，各專業部、各記者站還須抓緊收集內部情況的工作，及時反映學術界、文藝界人士的思想動向。

五、初步選題計劃如下：

(一) 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略）

(二) 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略）

(三) 關於封建道德的批判繼承問題（略）

這個時候，《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鄧拓以筆名向陽生寫的《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從學術角度對《海瑞罷官》進行批判；周揚主持撰寫的、署名為方求的文章《〈海〉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則以『清官』問題為內容，並不將《海瑞罷官》作為尖銳的政治問題予以批判，而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來批判；李琪以李東石為筆名發表了一篇《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的文章，文中圍繞歷史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從學術上對《海瑞罷官》進行探討。鄧拓的文章在對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不同意見的同時，他鼓勵吳晗能夠撰寫文章，參加討論：『吳晗同志有什麼意見，我也希望他繼續寫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見面，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有的文章對姚文元文章中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的錯誤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張春橋和江青繼續在上海組織人馬撰寫文章，加強政治批判。很快，他們在《文匯報》發表了一

系列反駁文章。其中批評『方求這篇文章關於「清官」問題的觀點是很錯誤的』，又強烈指責向陽生的文章『企圖把對吳晗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所謂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同志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關鋒進行談話的時候，談了不少問題，也說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二十二日，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談話時，又重複了這些話。他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這時，彭真再次說明，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天，彭真在上海同上海市委的有關人員談話時指出，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為二』，吳晗問題要作學術問題討論。在談到吳晗時，他又一次強調吳晗在各歷史時期都是左派。

彭真從上海回到北京，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了文教、報刊、北京市委和部隊有關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先由胡繩傳達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的談話。他說，毛澤東那次談話內容很廣泛，主題是提倡讀馬、恩、列著作，著重談了哲學問題（流傳的談話紀要有題目就寫為《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也談到了對《海瑞罷官》和翦伯贊史學觀點的批判；隨後著重討論了圍繞《海瑞罷官》展開的學術批判和大學文科教學改革問題。

接著，彭真說，現在思想界正開展一場大爭論，應該如何搞，需要談一談。他說，這個批判現在剛剛開始。我同康生、楊成武同志去見主席，這次爭論的情況我們匯報一下，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

資產階級的進攻不亞於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有的大反覆，有的從未收斂。有幾個學者，他們有一九五七年的經驗，不公開明白地搞，用各種形式表現（戲劇、電影等），利用各種會議，小範圍的活動。主席說，宣傳會議講話已經說了，就是要放。彭真說：政治結論可以放後一些。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時，《北京日報》按語不那麼兇。點了幾個人的名。有的人已撤職。《解放軍報》的按語講《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是對的；但是這樣一講，就使人不敢講話了。談到在報紙上點名的問題，他說：過去曾經規定對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吳晗、茅盾幾個人不點名。對郭老不點名、范老不點名，有的就保護不了了。吳晗已經被點名了，看來翦伯贊不能不點了。他又說，現在問題是要展開，把各種不同的觀點放出來。把思想戰線——教育思想、學術思想好好搞一下。過去沒有顧得上搞這個，這次要下苦功。主席批評我們懶，我們的同志總要學些知識才行。這場爭論，要扯多寬就扯多寬，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繼續說：『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講，你《解放日報》、《文匯報》自己也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也應該清理清理。（周揚插話：『《解放日報》推薦《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語的。』對於他們的錯誤，中央報紙也可以批評。』

陸定一在發言中首先指出，當前的討論實際上是一次大爭論，爭論的重點以歸納在思想範疇內比較好。但可以列出一大堆問題來，如道德繼承、形象思維等等，不但歷史、哲學，包括教育學、美學等等。他認為，對古人究竟應該如何評價的問題，蘇聯沒有解決，我們也沒有解決。蘇聯開始完全否定，後又肯定。『歷史主義』提法不對，應該是歷史唯物主義。他還認為，討論需要材料，翻譯和出

版古典書籍的工作，如『二十四史』標點工作，不能停下來。批判歸批判，資料歸資料。陸定一還說，在方法上，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一批到政治問題，討論就展不開。開頭可以不點名，以後再點名。這樣有利於思想的展開。題目可以不限於一個，這個問題引出另一個問題，經過討論也教育了大家。討論到一定時候，要有結論式的文章。主席說，『合二而一』的討論沒有結論性文章，『資產階級法權』也沒有結論。陸定一在說到『結論文章』時指出，不要急，『水到渠成』（一月四日，他在中央宣傳部舉行的會議上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當前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題目多得很，對古人的評價，歷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一個題目一個題目的來，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

康生也發了言。他說，吳晗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是『自我批准』、『自我開脫』（因為吳晗從《海瑞罷官》發表的時間上駁斥和否定了與六十年代初發生的『單幹風』、『翻案風』有關的說法）。他一口咬定說：『現在他（指吳晗）自己扯出來了，它的要害是「罷官」』。（如前文所述，康生一九六四年就向毛澤東講過：《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有關。這完全是康生根據自己的臆斷捏造出來的。）

有的書在寫到這次會議的時候，還提到了康生曾在會上指責胡繩的傳達說：『剛才在傳達毛主席指示時，遺漏了一句最重要的話，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應該說，這是誤傳誤記。筆者查閱了參加此會時的記錄，胡繩當時原原本本地傳達了主席的這句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按：指翦伯贊）。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

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當彭真聽到這裡時還說了一句『過去講過不點翦伯贊的名。』

確實，這段話一度在整理紀要時被『遺漏』過；但並不是在這次會議傳達所用的紀要中。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那次談話，由當時在場的田家英、胡繩和關鋒一起在杭州整理了一份紀要。胡繩說：田家英認為，《海瑞罷官》不過是主席附帶提到的，和其他附帶提到的許多話都不必記入講話紀要裡。胡繩表示同意。結果在談話紀要中沒有出現所謂『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內容。關鋒是紀要的執筆者，當時他並沒有說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辦了。寫完紀要後的一天，關鋒向田家英、胡繩提出了疑議，問『不寫上這幾句話行嗎？』，但因田和胡的堅持，他也就不再說什麼。胡繩在回憶當時整理紀要前後經過時曾說：『在這件事情上，應該說，家英和我確實是缺乏政治敏感。我們沒有想到，關於《海瑞罷官》的幾句話雖然是附帶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視，而且後來這篇講話的真正「要害」恰恰是被我們刪去的這句話。而主席原來講的主題以後反而沒有人提了。家英參加過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對彭德懷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藉《海瑞罷官》來進一步譴責彭德懷同志，也不同意把吳晗同志的劇本《海瑞罷官》和彭德懷同志牽連到一起，這恐怕是他的真實想法。』結果，回到北京後，關鋒非要把那段刪去的話補寫進紀要不可，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寫進了紀要。後來關鋒將這件事向康生告了密，這事也就因此而成了田家英和胡繩的一條罪狀（後來田家英被迫害含恨而死，和這件事有關）。這天胡繩在會上是根據已經寫

進了這段話的紀要傳達的，當時田家英和關鋒也參加了這次會。

在會上發言或曾插話的還有田家英、周揚、許立群等，他們各抒己見，當時尚無針鋒相對的交鋒。當彭真談到對郭沫若、范文瀾不要點名時，陸定一插話說：『開頭不點名好，政治問題往後一些。』康生贊同說：『開頭不點名好，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在討論結束時，彭真說：這個批判，現在剛剛開始。思想鬥爭是長期的，不是幾篇文章就能解決。解決所有制問題不要那麼長，思想鬥爭包括學術觀點問題要一百年、二百年……現在要『放』，展開這場討論。展開越寬越好，是什麼問題就講什麼問題。可以不斷吸收討論中正確的論點，時間放長些，逐步修改（陸定一插話：不要像日丹諾夫那樣，到處作報告，以為解決問題了）。在討論中不要戴帽子，要真正擺事實、講道理。政治問題以後再說，現在先搞學術問題。我們要讀些書。某大學兩位教授有三句話：共產黨『有術無學』，而他們是『有學無術』，民主人士是真空管：『無學無術』。這話是反動的，但我們確實要讀些書。

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單從這天到會人數眾多就可以看出。筆者從當時的記錄本上查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全體成員：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以及康生、周揚、吳冷西，還有林楓、張子意、許立群、姚溱、林默涵、胡繩、田家英、鄭天翔、陸平、李琪、范瑾、宋碩、陳浚、胡克實、郭影秋、蔣南翔、李曼村、蕭望東、華楠、戚本禹、關鋒、王力（這個名單有可能不全）。

在此以前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吳晗在《北京日報》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轉載）。吳晗首先對學術批評和討論表示歡迎，他說，希望『通過這次

的批評、討論，對過去長時期沒有解決的若干問題，各方面都各抒己見，展開百家爭鳴，分清是非，端正立場，從而導致問題的解決，取得一致的意見，提高學術水平，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另外，他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兩年中研究海瑞的情況開列了一個時間表，說明研究海瑞並非影射廬山會議。文章就有關《海瑞罷官》中涉及的若干學術問題進行了說明和解釋，在某些問題上吳晗還違心地承認了錯誤。文章中還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據理力爭，並用肯定的語言申述自己「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黨的教育、培養、關懷下，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

如果《海瑞罷官》的討論是一場學術討論，吳晗的自我批評自然是應該受到歡迎的。因為他的態度謙虛誠懇，文章也是擺事實講道理的。這篇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給報社寫信，表示贊同。而江青一夥對於吳晗這篇自我批評的文章全面否定，並且胡編亂造，硬要把它和廬山會議掛鉤。江青、康生一夥說：「這篇文章是假檢討、真反攻。他為了辯解同「單幹風」「翻案風」無關，提出了《海瑞罷官》是在《論海瑞》一文的基礎上寫的。而《論海瑞》是根據廬山會議精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吳晗將《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報》急忙發表，卻不加按語，實際上是對吳晗的支持。這是彭真同志從上海打電話催著要這樣發的，還要《人民日報》轉載。」同時，他們指責《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轉載了吳晗所謂的《自我批評》，加了一個編者按語。這個按語沒有一句話揭露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的實質，這是彭真同志決定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他們把學術討論繼續引向政治鬥爭的軌道。江青一夥從此對吳晗發動了一場聲勢更大、調門更高的圍剿，吳晗再作自我批評也都無濟

於事。

從上海發動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正在不斷地升級。在此以前著重批判的『退田』已經變為『罷官』。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思彤（即王若水）的《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一文，文中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此後對吳晗的批判調門越來越高，火力越來越強。攻擊吳晗的要害由『罷官』上升為『罵皇帝』。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由姚文元控制的寫作班子『羅思鼎』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竟說吳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極關重要的藥方便是罵皇帝』。在北京，戚本禹遙相呼應，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本質》，而關鋒、林傑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也相繼出籠。從三月起，他們又把矛頭直接對準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將批判對象的範圍擴大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和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廖沫沙。隨著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上刊登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之後，戚本禹又在北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階級立場》一文。他在文章中無中生有地對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進行栽贓誣陷，造謠說『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他經常利用自己的職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行和宣傳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還說『他是資產階級右派方面一個搖羽毛扇的人物』。

現在，鄧拓的冤案早已徹底平反。一九七九年，在經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北京市委《關於『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的平反決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誣蔑鄧拓（原北京市委書

記兼北京市委黨刊《前線》主編）、吳晗（原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三同志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

從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來看，關於如何評價《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學術討論，而是一場策劃好了的政治陰謀。按照江青、張春橋的精心策劃，開始雖曾有過些許學術批判的色彩，很快就完全成為劍拔弩張的政治批判。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只是一場更大政治風暴的前奏。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開始，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彭真。江青當時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吳晗挖出後就是一大堆啊！』事實正是這樣，他們要先打倒北京市委，繼而搞亂全中國，再將矛頭指向『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經過不長的時間，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就已逐步把矛頭指向彭真和劉少奇。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完整的戰略部署。

對這一點，林彪和張春橋在不久後都曾當眾供認他們的圖謀。張春橋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次講話中說：『因為批《海瑞罷官》，就要帶到吳晗，提出吳晗就要提到鄧拓。把鄧拓提出來，三家村就揭出來了』。林彪則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說：『毛主席又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指，直指修正主義集團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他們正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實現著策劃的部署，使中國陷入了空前的災禍。

第二章

動亂前夕的較量

一、《二月提綱》的制定

一九六六年初，由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點燃的這場批判，迅猛發展到文藝界、史學界、哲學界，形成意識形態領域廣泛的批判運動。

『對吳晗同志《海瑞罷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開的關於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已使思想界活躍起來了，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我們要有領導地、認真地、積極地和慎重地搞好這場鬥

爭。』這是一九六六年初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對於當時學術批判形勢的估計。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組為了討論由批判《海瑞罷官》引起的問題，設法對運動中的極左思潮與粗暴做法加以約束，彭真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五人小組的第一次會議（這個小組是於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同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小組由組長彭真（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副組長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和康生（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周揚（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吳冷西（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組成。照康生的說法，因為毛澤東不滿中宣部、文化部的工作，北京市對抗自己的路線，叫成立三人小組；後來，毛澤東聽取他『《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匯報時，當即叫他和吳冷西也參加，即形成了『五人』小組。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姚溱，《紅旗》雜誌副總編輯胡繩、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處書記鄭天翔。

但彭真仍然想把本來就是學術問題的爭論限制在學術爭論上。他在這時召開會議，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扼制。

在這次會上，他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對於學術討論，他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鄭天翔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他還提

出，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當前開展的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確實需要很好的引導。他認為，一個重要問題是對我們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的活動，要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陸定一發言表示贊同彭真的意見，他還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提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

五人小組會議決定：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組成，許立群同志為主任，胡繩同志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會議結束時，彭真作了全面發言。他特別強調：在這場討論和鬥爭中，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一要謹慎，二要層層把關。凡是點名的，都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決不能自行其是。並且指定許立群、姚溱根據會議討論情況整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二月四日，《提綱》草畢，經彭真修改後打印出來，分送所有的與會者。這個《提綱》講了六個問題，最主要的是《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與《方針》。它指出，學術討論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並且指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

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的批准。』《二月提綱》還提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從長期表現來看），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些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並且特別指出『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因受當時形勢的影響，《二月提綱》難免也帶有一些『左』的提法。但是它的基本指導思想則是針對當時那些『左』的主要傾向和主要觀點，是想將日益升溫的大批判儘量加以限制，以避免發展成嚴重的政治鬥爭，避免發生更大的社會動亂，其基本內容是正確的。所以這個提綱下達以後，學術批判的氣氛上升，政治批判受到抑制。

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彭真帶著許立群，代表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經討論，劉少奇、鄧小平都表示同意。

二月八日，五人小組全體成員前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的指導思想和其中的許多提法與毛澤東當時的想法是不相同的。這天向毛澤東匯報的時候，他問了一些問題，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亦沒有說不同意發表，但實際上毛澤東對《二月提綱》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同意的。

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這個提綱。十一日晚彭真以中共中央名義草擬了將《二月提綱》批轉全黨的批文：『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將這個提綱發給你們，望照此執行。這個提綱的內容，應當向黨內主管學術討論工作的同志，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同志傳達並組織討論。在討論時，應當把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宣傳會議講話作為學習文

件。』

但是，這個《二月提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康生和江青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同毛澤東決心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相左的。事後，康生扯謊、賴賬，硬說這個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是許立群和姚溱同志，根據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見，在釣魚台關起門來製造的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誰也不許進去，誰也不讓知道，連對同住了一個樓裡的所謂五人小組成員康生……也嚴密封鎖，不透露一點消息。』康生對他自己圈閱過的中央轉發《二月提綱》批語也賴賬說：『我在看電影，彭真的秘書交來文件傳閱，我不滿意，叫我的秘書代畫了一個圈，仍看我的電影。現在應該說這是對黨不負責任。』說到二月八日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以及由中央批發的過程，康生更是出奇地歪曲。他說：『當時主席有困難，以為常委會通過了《二月提綱》。但是很明顯，主席不贊成這個提綱。就這樣，未經主席同意，他們又搞批語，偽稱主席同意，叫中央批發全黨。他這樣盜竊主席名義，濫用職權，把修正主義提綱發到全黨去。這不只是思想問題，是有意的偽造，弄虛作假……』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和陳伯達主持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他又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這個《通知》中大放厥詞地寫道：『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

全黨。」

就是這樣，康生自己『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歪曲了事實的真相，誣陷了彭真，卻把自己洗刷得乾乾淨淨。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時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混淆階級界限，是非不分，當時我沒有明確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講話中又說：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麼忙，一忙那麼忙，二月三日急於搞一個五人小組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顯然，由於《二月提綱》這件事，毛澤東進一步加深了對彭真的不滿，最後導致以中央名義下令將五人小組和這個提綱撤銷。

《二月提綱》的事所以釀成一場巨大的風波，固然是因為它的內容與毛澤東當時決心要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入手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相悖，可是康生從中作祟，推波助瀾，極力挑撥，則使問題變得愈加複雜化了。

由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及其特設的學術批判辦公室本來是想有所作為，輔助中央開展好已經啟動的學術討論，但因毛澤東的干預，《左》傾思潮的泛濫，使其工作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最後不得不提出『由各報刊主編負責』的決定。康生於五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幸災樂禍地說：『彭真整整半年以來同毛主席對抗，我知道這時候要爆發了。』——這個結局正是康生所期盼的，也主要是他以『極不正當的手段』一手造成的。

二、《座談會紀要》的出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北京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起草《二月提綱》的同時，江青於二月二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炮製《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同北京的會議唱對台戲。

這年的一月二十一日，江青從上海到蘇州找林彪，要求他支持她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以打倒『文藝黑線』。江青此舉，是因她組織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發表後，受到全國上下多方面的抵制，使她深感『我們沒有什麼權，說話沒有人聽，我要借用林總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她要借助軍隊的威力衝破阻力，將這場政治批判運動迅速推向全國。這時的林彪也正需要利用江青『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所以，二人一拍即合。

一月底，林彪老婆葉群從蘇州打電話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傳達林彪一月二十二日的講話，說：『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劉志堅接過這個電話，就把林彪的『指示』告訴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對於江青這個刁鑽陰鷲、權慾薰心的女人，蕭華和劉志堅同樣感到憎惡討厭，他們商

定：即由總政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劉志堅帶領總政文化部部长謝鐘忠，副部长陳亞丁和宣傳部部长李曼村前去上海。行前蕭華曾和他們『約法三章』：一、部隊文藝工作的方向是對頭的；二、只帶耳朵——聽；三、江青如果提出問題，與事實出入大，暫不要與她爭長論短，回到北京後再交總政黨委討論。

二月二日上午，劉志堅一行飛抵上海。從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同他們開座談會，其間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戲，交談和座談了多次。江青提出：在文藝方面『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建國十七年來，他們一直在專我們的政』，『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現在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她還說：『現在的論戰，還只是前哨戰，決戰的時機尚未到來。』座談會結束後，劉志堅等寫了一個擬向總政黨委匯報的記述江青歷次談話精神的《座談會紀要》，並印送給江青、林彪。這個『座談會』主要是由江青陸續向劉志堅談了一些意見，再由劉志堅逐次向其他人傳達；江青和大家一起座談的次數很少，所以這份三千多字的《座談會紀要》，實際上只是江青『一人談』的『紀要』。

劉志堅一行於二月二十二日離開上海，途經濟南，向正在那裡的林彪匯報有關情況，於二十三日回到北京。然而江青看了《紀要》後，認為這個材料『根本不行，完全歪曲了她的本意』。她於二月二十三日叫人打電話給劉志堅，說她已經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這個《紀要》。劉志堅和蕭華商談後，第二天就讓剛剛回到北京的陳亞丁再飛上海，參加修改。

《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後一共修改了八遍。最後的定稿與原件相比，已經面目全非。修改過程中『貢獻最大』的是陳伯達。他提出的修改意見是：首先要講清楚『文藝黑線』

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黨搞王明路線、搞右傾機會主義的繼續。這條黑線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同時要用重彩濃墨寫一段這幾年文藝方面的成績，就是江青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這麼多樣板戲，這都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藝術瑰寶。只有這樣改，『破』什麼『立』什麼才會鮮明、清楚。由於陳伯達的意見正中江青下懷，他便得意地、親自執筆寫下了江青為之喝彩的一段：

要破除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因此，決不能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當成我們無產階級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指導方針。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系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

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陳伯達所寫的這一段話恰恰暴露出了這位『理論家』的『品位』是何等低下！原來，在三十年代發生『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爭論之時，陳伯達曾積極參加論戰，並寫過兩篇文章：《哲學的國防動員》、《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那時他用明白無誤的堅定語句講過：『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而今卻筆頭一轉，又說『那時左翼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由此不難看出，他根本不是一個立場堅定、堅持真理的無產階級理論家，而是一個看風轉舵、隨機應變的資產階級政客。

毛澤東本人對《紀要》作過三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共改了十一處；第二次修改十處；第三次修改四處。他看得很仔細，連標點符號、錯別字都不放過。毛澤東給《紀要》標題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字樣，這為當時除擔任毛澤東秘書外沒有其他任何職務的江青增添了『光彩』，也為這份《紀要》的權威性增加了一定份量。毛澤東也認可十幾年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的論點，同時還加寫了：『除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有些左翼工作者，特別是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

魯迅，他提出了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系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

三月十四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改出的稿子增加到了萬多字，又有比較多的內容改動和補充。三月十七日，毛澤東批示：

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三月十九日，江青寫信給林彪，說明《紀要》修改經過，轉述毛澤東三月十七日的批示，送去《紀要》『請批』。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寫信給賀龍等中央軍委負責人：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的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告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月三十日，中央軍委將《紀要》報送中央。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將《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批發全黨。批語寫得很長，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文學藝術領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的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線』；追溯毛澤東親自領導文藝戰線歷次鬥爭的過程之後說，這個《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

江青夥同林彪炮製的這個《紀要》完全抹殺建國以來文藝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誣蔑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紀要》的發出，明顯是對《二月提綱》的否定，反映了毛澤東對文化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嚴重估計和他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決心。這個《紀要》提出的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領導人的，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紀要》的炮製標誌著林彪和江青勾結起來利用『文化大革命』進行篡黨奪權活動的開始。

《紀要》當時只在黨內下達，沒有公開發表，實際上已在黨內外廣泛張揚。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軍報》根據《紀要》的主要內容，發表了長篇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五月，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狂熱氣氛中，繼在十七日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後，又於二十九日公開發表了這個《紀要》。和林彪寫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因為當時賀龍等許多老帥均被揪鬥，所以此信發表時刪去信前所有老帥的名字而改為『常委諸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陳伯達直接控制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長篇社論，在大肆抨擊《二月提綱》的同時，肉麻地吹捧這個《紀要》是如何如何地了得。前者社論的題目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文件》，後者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紅旗》社論毫不掩飾地說：『一九六六年二月，是一個不平常的二月，是我國無產階級兩個階級激烈鬥爭的二月。這時，在我們黨內出現了兩個根本對立的文件。一個是彭真的《匯報提綱》，一

個是《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隨後，社論就以潑婦罵街的腔調，對這兩個確實『對立』的文件作了是非完全顛倒地對比評述：

《二月提綱》是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支持下，從二月二日到七日，在北京精心炮製出來的。這個提綱，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綱領，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座談會紀要》、是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從二月三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反覆研究，又經過毛主席三次審閱修改而寫成的。這個紀要，是同《匯報提綱》針鋒相對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文件，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

這篇社論還說：『兩個文件是從兩個代表不同階級的司令部裡發出來的兩種號令』，《座談會紀要》『是無產階級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動大反擊的一面紅旗』。《人民日報》社論也毫不示弱地說：江青同『《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發出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發動了猛攻。』

事實確是這樣。不可小看這個《座談會紀要》的破壞能量。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引發的這場批判，至一九六六年初，已發展到文藝界、史學界、哲學界，形成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廣泛的批判運動。《座談會紀要》出籠，火上加油，並使這場鬥爭從意識形態領域完全轉入政治領域。從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更使全國文藝界大難臨頭，呈現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淒慘局面，成為這場動亂的重災區。

三、毛澤東在上海的三次談話

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發《二月提綱》後，學術批判氣氛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張春橋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不動聲色地束縛了我們的手腳，硬把運動拉向右轉，弄得很多文章不能發表。姚文元、關鋒寫好了的講『要害』的文章都壓下了』。他看出：『這一定與彭真有關。』（按：這是張春橋這一年五月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話）但是，《二月提綱》是經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向毛主席匯報後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張春橋一夥雖然惱火，又不敢輕易動作，便於三月初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摸底』。

楊永直到達北京後，先後同許立群、胡繩談了話。三月十一日晚，許立群向彭真匯報請示如何回答楊提出的一些問題。許說，楊永直問他：『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彭真答：『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許說，楊永直又問他：『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彭真反譏道：『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游過泳沒有？』許又說，楊永直還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彭又答：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當晚許立群將彭真的答覆打電話告訴楊永直。

張春橋派楊永直摸了底後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的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他們通過江青，把這次到北京摸底的情況（其後稱作『電話事件』）報告了毛澤東。以後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他們當時

的心態：『所謂學閥，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壓人……』

在此期間，毛澤東叫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幫助江青修改與《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座談會紀要》，並親自對《紀要》審閱修改了三遍，於三月十七日批示發出，分明是對《二月提綱》的否定，表明了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決心。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如何進一步開展批判的問題。他在講話中說：要用五年到十年的工夫，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養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有些共產黨員也反共，搞的是修正主義。他們培養的人也要搞修正主義。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全國只有十五個省市參加批判吳晗，還有十四個省市也要行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不要指望那些老教授，我們要培養自己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

三月二十八日，康生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陪同宮本顯治率領的日本共產黨代表

團從北京飛往上海，毛澤東在上海曾兩次會見日共代表團。從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毛澤東同康生談過三次話，第一次談話時趙毅敏在座，第三次是同康生、江青、魏文伯、趙毅敏、張春橋一起談的。毛澤東的這三次談話均明確表示，《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如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還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同時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按：他們共同化名『吳南星』）。二人撰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在聽取了康生所匯報的、關於彭真派人打電話到上海詢問姚文元文章是怎麼回事，怎麼沒有向宣傳部打招呼的情況後，很生氣地說：『為什麼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告訴中宣部？要向彭真打招呼？十中全會不是講過麼？中央在十中全會不是有指示麼？中央不是決定以後各地成立反修小組？吳晗寫過那麼多談論海瑞的文章，北京各報發表那麼多宣揚鬼戲文章，為什麼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難道作階級鬥爭還要告訴中宣部、北京市、彭真麼？十中全會作出的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都不算數了？』他又說：『什麼叫學閥？包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是學閥。不讀書，不看報，又沒什麼學問，又包庇壞人，包庇吳晗、翦伯贊學閥的人，就是大黨閥。他們是閻王，姚文元是小鬼，人家怕同你們聯繫。現在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打倒黨閥，解放左派。他還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問魏文伯）你們為什麼不傳達？中央出修正主義，

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現在有些人怕孫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孫悟空方面，怕字當頭，就非垮台不可。我們要站在孫悟空方面，要保護左派。』『解放後我們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包下來，當時是對的，但革命越深入他們越反抗。我們面臨著文化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這場文化革命，反對修正主義。』他叫康生告訴彭真，要就『電話事件』打電話向上海道歉。

當時劉少奇正出國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諸國。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即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的二次談話。四月二日，周恩來報告已經從上海回到杭州的毛澤東，準備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

四、彭真召集的一次會議

就在開始批判《海瑞罷官》前後，黨內接連發生了多起有關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的嚴重政治事件。先是經過林彪發難並一手策劃，在軍隊中製造了對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澤東聽信了林彪、葉群的誣告，表示了對羅瑞卿的不信任。羅瑞卿受到錯誤的批判，被隔離審查；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因一些無中生有的罪名被調離；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受到誣陷，並被停止工作。這些事件同報刊上聲勢浩大的政治批判相呼應，在黨內外引起強烈的震動，造成到處都

有『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

這個時候，毛澤東批評彭真、《二月提綱》和中宣部的談話很快地又在中央的最高層和北京市委傳播開來。這些談話宛若十二級台風震撼著大地，使得原已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越發膨漲起來，整個局勢急轉直下。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張春橋首先發難，拿出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公開攻擊《二月提綱》；四月二日、五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分別發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關鋒等人批《海瑞罷官》『要害』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和《〈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對《海瑞罷官》的學術批判已發展為對吳晗的政治討伐。各報這時普遍刊登的根據吳晗著作摘編而成的《吳晗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長篇資料，以《人民日報》名義發表的《編者按》說，對吳晗的批判『首先應當抓住要害，從政治上批判他站在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邊，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接著拋出的另一份題作《請看吳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的長篇資料，進而追查吳晗的『反動歷史』，說『原來他是站在親蔣、崇美、反共立場的人』，要求『進一步揭露、批判吳晗同志的反動的立場和思想』。這個時候，在康生、陳伯達和江青一夥操縱下，中宣部已被撇在一邊，《二月提綱》實際上已被停止執行。

四月三日，彭真召開北京市委常委會，傳達、討論毛澤東在上海的三次談話。四月五日，彭真根

據毛澤東三次談話精神，又在家裡召集中央和北京市負責宣傳、新聞工作的十多個人開會，研究繼續開展學術批判問題。這次會議也通知我去參加。我按通知來到中共北京市委大樓對面台基廠五號彭真家裡。這天到會的有：吳冷西、許立群、林默涵、姚溱、胡繩、范若愚、王力、王揖、陳浚、關鋒、李琪、范瑾、宋碩、張文林、王林。

彭真首先講話：我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四清搞得可以，學術批判沒有抓緊。文學藝術學是一條很重要的戰線，我們兒女都受他們的影響。『匈牙利事件』的指揮者是『裴多菲俱樂部』。這條戰線的陣地你不佔領，人家要佔領。主席一直在抓，全黨抓的少，目前只有十五個省、市報紙搞學術批判。又說：本來我認為還可以放出一些東西來，主張繼續『放』，讓各種不同意見都充分地放出來。學術界放毒多年，放出了許多。吳晗問題出來後，總想再放出來些。現在看新的觀點不容易放出來了。『放』的時期過去了，已經放得夠了。現在要分頭把過去各方面放的尖端的東西清理一下。不清理中間狀態的，要清理資產階級的尖端。把多少年資產階級尖端的、成家的，每個方面都收集起來。把這些尖端的錯誤東西摘上『內容提要』印出來。有個提要，不一定完全準確。要指出裡頭有什麼問題，鋒芒對著誰的。同時，還要清理左派的東西。左派是革命的，有時發表一些錯誤意見，是難免的。小平同志講，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百分之八十正確就夠了。斯大林還三七開呢。不要把次要的東西當作主要的。鄧拓政治上擁護總路線，但思想上相當烏煙瘴氣。他在一月五日開始檢討，不是個別的問題。

那時候，江青一夥的鋒芒正對準鄧拓，意在以鄧拓為突破口衝擊彭真。毛澤東在談話中也點了鄧

拓的名。彭真畢竟是久經風霜的政治家，面對十二級台風的侵襲，依然沉著冷靜。鄧拓聞訊找他問詢時，彭真曾勸慰鄧拓說：『事情並沒有最後下結論。我還要再向毛主席解釋，希望他能調查研究，改變他的看法。』這裡，彭真仍把鄧拓列入左派，對他在思想上嚴厲批評，意在使他免受政治傷害，極力給予保護（他也極力保護正在陷入困境的《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

彭真接下去說：『多少年來寫了許多文章，總會有錯誤的。釣魚台寫反修文章，還寫六七稿，修改十幾遍呢。』

他說：『中間狀態的東西搞起來太費力氣。只要把資產階級的尖端批判了，中間的就好辦了。情況清楚了，才能出方針。兩極一清，隊伍就帶起來了。』『清理資產階級人物要研究歷史。進行人物調查、作品調查，分清敵我。左派也要調查了解。搞清楚誰是敵人，誰是我們的人。批評一個人，要把他所有的文章都看了，批判才能打中要害，使他心服口服，易於接受。』彭真最後說：『主席這次提醒注意教育、學術、出版問題，非常重要。學術、教育、出版革命究竟革了多少？值得研究。教育問題與學術問題是不可分的。大學裡有些助教是共產黨員，但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他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還未和黑格爾分家。文藝問題的鬥爭時間還長。這一條戰線的革命，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在根據地學了，進城後沒有搞，需要一次系統的革命。軍隊是我們的，政權是我們的，他們不敢公開反對。農村搞過那麼多次革命運動，還要進行四清。這條戰線的鬥爭不好搞，要下功夫，全國能動員起來搞這個事情的都來搞，鬥爭要有個聲勢。有主力部隊，有地方武裝，有游擊隊。在這個戰線上展開人民戰爭。把主席言論作為武器武裝我們的頭腦。把全國各級隊伍都搞起來，

都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修正主義就不好搞了。工農兵也可以談學術問題，知識分子壟斷理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工農兵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可以掌握學術。批判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大的學術文章，還有一個是小的工農兵寫的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偏重提高；《北京日報》、《前線》雜誌可以面向基層，面向工農兵。可以有個分工，有的普及，有的提高。幾個報刊可以相互聯繫，相互支持。」

隨後，胡繩、許立群、林默涵、吳冷西相繼發言。他們同意彭真所講意見，放手開展學術批判。其後彭真又說：「要放手發動革命知識分子，放手發動工農兵群眾，大張旗鼓地搞這條戰線上的革命（學術、文藝、教育、新聞、出版）。放手，大張旗鼓，雖然一定要出一些事情，會出點毛病的，打得不很準，打過頭一點，也沒有什麼。集中打殲滅戰，燒著誰算誰。不要受任何束縛。當然，要打這一仗，先要弄清情況。情況明，決心就大。作品、人物，兩極都要弄清楚。弄清一個解決一個，一個一個仗打；這個仗要打好多年的。」

當時，自己對有些情況雖曾風聞，但尚不知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杭州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有關學術批判的講話和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談話的詳細內容。可能由於到會的多數人都已知道毛澤東歷次談話的內容，彭真沒在會上傳達毛澤東這些談話。因此，我對彭真所講這番話的背景還不甚了了。但是當我聽了彭真的講話和胡繩、立群、默涵、冷西等的發言後，再觀察會場上的嚴肅氣氛，深深感到鬥爭的性質已從意識形態領域轉入政治領域。同時感到兩軍對壘，劍拔弩張，鬥爭熱度正在急驟升高，形勢是嚴峻的。

近年看到有些記述這次會議的書上說：『參加會的十七名高級幹部紛紛表態，一致同意彭真的意見。』這樣寫是不確切的。因為到會的王力和關鋒，他們是不會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見的。他們在會上沒有發言，但是很快按照自己的觀點，把這天開會的情況寫了一份材料交給新成立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其後在《五·一六通知》同時發出的、由康生主持炮製的那份《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中，完全顛倒黑白，把這次會議寫成了這樣：『四月五日，彭真同志召集十幾個人開會，他在會上說：他在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農村工廠四清、國際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後分子，唯獨在學術方面是落後分子。他說，這是因為上學遲，知道的情況少。他還說，他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出幾個吳晗來，結果是幻想。他還提出要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著誰就是誰。又說，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時候了。』

五、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正在悄悄走來。階級鬥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神州大地，撞擊著每一個人的心靈。首當其衝的知識分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開了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羅織周納、陷人入罪的惡劣先例。這種刀筆吏式的批判迅速波及到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江青一夥張開的垂天大網，正將無數中國傑出的

文化精英驅進文字獄的陷阱。以往，每當毛澤東談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都把郭沫若當作一個應予保護的標兵，多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曾經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贊四個人不准批。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這次談話又說：『郭老、范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在毛澤東的眼裡，郭沫若不僅不應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重點，而且還因其特殊影響而應繼續給予切實的保護。

可是，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郭沫若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眼看幾隻虎視眈眈豺狼正在陷害忠良，使科學界許多知名的專家學者禍從天降，無端遭到殘暴的凌辱迫害，然而自己卻愛莫能助，不免痛楚徹骨，寢食難安。特別是對田漢、翦伯贊的嚴酷批判，使他震驚，也感到憤懣。這兩個人，一個是戲劇界的班頭，一個是史學界的權威，又都是他非常了解、長期並肩戰鬥、患難與共的老朋友。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了批判田漢《謝瑤環》的長篇文章，文章無限上綱，大張撻伐，他不無慨感地說：像田漢那樣『為民請命』是要倒霉的，甚至會有殺身之禍。現在不少人在造我的謠，我也會像田漢那樣受到批判的。當他聽說已故畫家傅抱石的家被抄，其書畫被洗劫一空時，悲憤不已，悄悄對秘書說：無論如何也要幫助解決抱石家的困難，拿不出錢，就把我的書籍字畫賣掉。然而，郭沫若自己的處境也十分嚴峻。江青、夥從不把郭沫若放在眼裡，只是礙於毛澤東，對他暫還『高抬貴手』。雖然這時還不曾有任何批判文章點他的名，但他已經受到江青一夥的詆毀誣陷，他已預感到『在劫難逃』，災禍隨時可能降臨。這些日子，郭沫若心頭一直被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壓抑折磨著，如芒在背，惴惴不寧：時常憂心如焚，『坐立不安』，陷入莫可名狀的憂憤和苦痛之中。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正當這

場由江青一手策劃的『鬥爭』從意識形態領域轉入政治性撻伐、錯誤的批判洶湧展開的時候，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信，提出『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的要求。他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

這年四月十四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沫若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後，做了即席發言。他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在發言中，他進行了自我檢討：『我確實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而且我還是文聯的主席。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實在慚愧，特別是很慚愧，各位不至於慚愧。我自己作為一個黨員，又是一個什麼家，眼淚要朝肚子裡流。總之一句話，我們不僅沒有為工農兵服務，而是倒轉來工農兵在文史哲方面為我們服務了。我們應該向工農兵感謝，拜工農兵為老師，因為他們把主席思想學好了，用活了。』最後他表示：『我雖然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我的意思就是這樣的，現在應該向工農兵好好地學習，假使有可能的話，再好好地為工農兵服務。』

在郭沫若發表這篇講話的當天，我離開北京前去上海參加『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會議。在會議期間，康生談起了郭老的這篇發言（康生和郭沫若同是第三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說，先由《光

《明日報》徵得郭老同意並審定後全文發表，再由《人民日報》刊載。我聽後，當時心裡想，康生和陳伯達是剛從杭州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後來到上海的，應該說，毛澤東先已看過郭老的這篇發言，所以，決定發表此文未必全是康生的主意。這樣，於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經郭老審定的這篇發言；五月五日，《人民日報》又全文刊載這篇發言，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後來有人評論此事說：『作為專門負責向中央政治局轉達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指示的要員，康生無疑最能得風氣之先。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澤東對郭沫若的態度。有意味的是，發言首先刊登在《光明日報》。當時這是一家由各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這就暗示了郭的特殊身份。這種精細而巧妙的安排頗能顯示某種獨到的領導藝術。此舉既為郭沫若提供一個解脫的機會，也有借助作者的聲望以擴大行將到來的一「文革」聲勢的妙用。』（見馮錫剛：《詩人郭沫若在「文革」中》，《紅岩春秋》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郭沫若這篇發言宛若爆裂了一顆巨型炸彈，在國內，特別是在文化學術界和廣大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的震撼。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響。蘇聯、東歐許多報刊就此說東道西，西方國家輿論更曾藉此掀起一陣強烈的反華反共鼓噪。這年六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了有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參加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七月四日，郭沫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會議上作了題為《亞非作家團結反帝的歷史使命》的長篇發言。發言的第四部分介紹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最後一部分談自己四月十四日在人大常委會上的發言。郭沫若說，石西民的報告『使我深受感奮，我便即席發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評，表達我衷心的感受』。他特別就『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全部燒掉』這句話作了解釋，作為對西方國家反應的回擊，他說：『這種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為文化革命的勝利慶幸，另

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為知識分子的應有的責任感。我檢討了自己，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升華，完全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

雖然郭沫若的『辭呈』誰也不會『批准』，他的著作人們也都不肯燒掉，但是郭沫若的擔心並非『杞憂』。衝擊、打倒郭沫若原是江青和康生、陳伯達蓄意已久的陰謀，他們並不只是要打倒一個郭沫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正如他們先從吳晗打開缺口，進而打倒彭真一樣，他們是將郭沫若和周恩來綁在一起鞭笞的。所以，儘管毛澤東多次指示『郭老不能批判』；『文革』伊始由周恩來擬定並經毛澤東批准『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中，宋慶齡之後第二名就是郭沫若，由於江青一夥的煽動唆使，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還是採取造謠誣蔑手段，給他捏造種種莫須有罪名，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那張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廣播不久，有的高等學校就貼出『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其後各種騷擾誣陷和暗中傳播的流言蜚語紛至沓來，使他難得片刻安寧。

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報》，經常為這家報紙撰寫文章。他的許多重要學術論文，都是首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我到光明日報社工作後，常有向他請教的機會。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除在大會場合還能見見面外，平時就很難見到他。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閉幕式上。大約由於精神壓力，飽受驚恐折磨，這時的他特顯蒼老疲憊。

在這次會議之前，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紀念毛澤東的《文藝講話》發表二十五周

年的萬人大會。郭沫若雖然出席了大會，卻受到不應該有的冷落。他原是中國文藝界的班頭，卻在此次大會上被剝奪了發言的資格。這次大會從頭到尾全由中央文革小組一手包辦；江青主持，陳伯達致開幕詞，戚本禹作了冗長的題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的報告。陳伯達和戚本禹的發言，不但繼續『造神』運動，把《講話》吹得不著邊際，還聲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藝旗手』的寶座。陳伯達『特別提到』『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戚本禹則把江青吹成『文化界戰線上的戰士』，說她『率領文化革命的先鋒戰士，向剝削階級的老爺們盤踞的藝術舞台發起了進攻』。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及全國報刊重新發表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可是信中極其重要的一句話『郭沫若在歷史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在發表前，竟被江青故意刪去。毛澤東的這封信的手跡，建國初期曾經公開發表，廣為流傳。此刻刪去這句眾所周知的話，意在告訴公眾：郭沫若不配享有這個歷史評價。他們這時採取如此卑劣的手法，其目的是要暗示郭沫若『有問題』，煽動造反派向郭沫若衝擊。他們的卑鄙行徑不僅使郭老深感難堪，更加劇了他內心的恐懼和不安。

在六月五日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文藝講話》討論會閉幕式上，郭沫若仍然受到冷落。在那天的會場上，亞非作家常設局秘書長森納那亞克以及凱爾、西園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台第一排，而實際領導這次討論會的東道主、中國文聯主席並代表討論會在會上致閉幕詞的郭沫若，卻被安排在主席台後排就座。由他代表參加討論會的『同學』致閉幕詞，其次序排列在最後。那天會議又是由搗鬼有術、

正飛黃騰達的『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組長』戚本禹作『長篇講話』，而寰宇馳名、舉世尊敬的文學泰斗郭沫若在致閉幕詞時，還得說一聲『戚本禹同志為我們作了富於啟發性的報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謝』。『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人無名。』屈原賦《卜居》的精湛描繪，何等切合此時此刻的情景？郭沫若是精通屈原賦的專家，他在《屈原賦今譯》中，曾把這四句翻譯為：『人世糊塗，青紅皂白一概不分……青銅的編鐘毀了，大家不願聽，要把土燒的鉢子打得震耳心。壞人當道，是非黑白顛倒，好人背時，有力無處報效……』此時此刻的郭沫若，會有何等深沉感慨和悲憤！

《閉幕詞》的題目是《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年逾古稀的郭沫若說：『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學生，但是對於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學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學們對於我要不斷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夠跟得上同學們的步伐不斷前進。』這時江青正在爬向權力的頂峰，飛揚拔扈，氣焰薰天。郭沫若對於這個自封的『文藝旗手』本來異常憎恨，但在這種場合，還是強自壓抑著內心的怒火，在講話時朗誦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詩，違心地表示願把這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郭沫若曾說他一生『最厭惡最憎恨的就是虛偽造作』，同時承認自己『有時不幸沾染了這種惡習』。不難想像，此時此刻他的心裡該會多麼痛苦！

縱然這樣，心毒手狠的江青對郭沫若依舊窮追不捨，毫不留情。其後，江青不顧毛澤東的指令和周恩來的勸阻，曾和張春橋連續闖進前海西街十八號郭沫若的家裡，逼他寫『檢討』，寫『批宰相』的文章，都被他堅決頂回去：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體育館近兩萬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悍然點了郭沫若的名；江青還曾多次到北大組織大批判組搜集、摘錄郭沫若著作並大量

印發，企圖在報紙上公開批判；後因毛澤東發覺才被制止。

郭沫若在十年動亂中飽受驚恐煎熬和憂憤折磨，還接連失去兩個兒子：當兵的兒子郭民英不堪重病折磨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農業大學讀書的郭世英遭造反派酷刑殘害而含冤離開人世。郭沫若主要依靠周恩來竭力保護，才得以在沒完沒了的誹謗、凌辱、驚恐、悲愴和病痛折磨中，闖過這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所幸他親眼看到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徹底滅亡。得知徹底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郭沫若懷著無比欣喜的激情，揮毫寫出了國人爭相傳誦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的詩詞，歡呼這一勝利。

六、一場不易被覺察的論戰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之間，圍繞著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曾經有過一場為一般讀者不易覺察但其性質極其重要的論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本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研究如何貫徹執行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的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突出政治』是林彪在一九六四年提出來的。那一年，由葉劍英倡導的全軍大比武，群眾性練兵興起不久，林彪就以所謂『突出政治』為由將其壓下去，而代之以片面強調脫離實際的所謂『人的思想革命化』。他說：『要把軍訓工作搞好，但不能丟掉政

治思想工作』，『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強調『軍事訓練、生產等如果和政治工作發生了矛盾，要給政治思想工作讓路』；軍訓、生產等『不宜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他要求把政治置於『大於一切』、『高於一切』、『先於一切』的地位。又說：『突出政治不是一項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違反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

林彪的這種提法，表面上強調了政治——主要指階級鬥爭的作用，但實際是人為地把政治的作用突出到不適當的地位，違反了客觀規律。因此，這一論調一出籠，即遭到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等高級將領的反對。羅瑞卿說：『不要犯單純軍事觀點和單純技術觀點的錯誤，另一方面必須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實到軍事訓練和其他各項工作之中，使各項工作都過得硬，不搞空頭政治。他堅持軍事和政治的辯證統一，提倡以正確的學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

對於林彪在部隊中過分強調『突出政治』、忽視軍事訓練的提法和做法，周恩來也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一九六五年初，周恩來到部隊視察時，曾給部隊寫了這樣的題詞：『從實、從嚴、從難訓練部隊。』並明確表示：『我的提法與你們的國防部長有區別。』鄧小平也反對林彪那樣鼓吹個人崇拜，無限拔高毛澤東思想及在部隊開展大學毛澤東著作運動的做法。一九六五年八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學習毛澤東著作時說，要實行自願原則，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形成社會強制。他還針對林彪提倡的『老三篇要天天讀』說：『年年都學那幾篇，作用也不大。』

但是，林彪『突出政治』的主張，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在對蘭州軍區黨委報告的批示中寫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在『突出政治』的問題上，羅瑞卿就曾為此引起林彪的極端仇視，並且成為他們誣告陷害羅瑞卿的一條『罪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第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第二，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第三，領導幹部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第四，大膽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第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這五項原則經毛澤東批准，由中央軍委決定把它作為一九六六年全軍的工作方針。

一九六五年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強調，要為繼續突出政治、堅決執行五項原則而鬥爭，把是否『突出政治』提到是否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高度。會議提出要走『突出政治』的道路，認為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們的社會就會停滯，就會倒退，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次會議前後，林彪、康生利用廣大人民群眾崇敬領袖的感情，竭力神化毛澤東。會議的政治報告著重引述了林彪的一些言論：『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要求做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

當時林彪已篡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權，《解放軍報》也時常在他的控制之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閉幕不久，二月三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永遠突出政治》社論。此後，二月九日至四月五日又發表了『再論突出政治』至『七論突出政治』的社論，題目是：《提倡一個公字》、《最重要最根本的備戰》、《政治統帥軍事、政治統帥一切》、《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提倡唯物論，抓好活思想》、《關鍵在於領導》。這些文章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的成果』等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唯心主義觀點，並把政治與軍事、與業務絕對對立起來，要求堅決執行林彪提出的繼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即『處處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時時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從四月六日到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也接連發表了三篇突出政治的社論。題目是：《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統帥業務》、《突出政治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這些社論，一方面反映了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論點：『突出不突出政治，是一個方向問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的社會是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是讓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它與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和《解放軍報》有重大不同的是，鮮明地強調了政治與業務及其他的統一性，強調『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緊密結合』。『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通過一定的業務來實現』。要求必須注意把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政治和業務統一起來。這些論點，尤其在社論《政治統帥業務》中作了深刻的闡述，如『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與業務密切結合。這是因為，如果政治不同業務相結合，那末，政治就會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實現。在

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的政治就失去了統帥的作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就會佔領業務的陣地……那種以為強調突出政治，就可以放鬆業務、不抓生產的看法，顯然是一種誤解。『必須了解，政治和業務這一對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決定業務的方向和性質。政治又要同業務相結合，通過一定的業務來實現。我們必須注意把業務和政治結合起來。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政治和業務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以紅帶專，又紅又專。這就是政治和業務的正確關係。』

《人民日報》的這些特殊論點，是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提出的，也反映了周恩來的見解。這些論點是正確的，但是為時不久，《人民日報》的社論就受到批判，竟被扣上『反對突出政治』的帽子，被指責為『二元論』。

這次論戰只是初步交鋒，在當時情況下自然不可能澄清是非，解決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及至『文化大革命』一來，林彪這種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絕對化地『突出政治』的謬論，衝垮了黨的一切工作和黨組織本身，造成了空前的動亂，尤給國家的經濟、文化建設造成嚴重損害。周恩來和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堅持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批准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提出業餘鬧革命，整頓勞動紀律，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學生不得到工廠串連；林彪、江青一夥卻以『革命』壓生產，誣蔑把政治落實到業務上是『唯生產力論』。他們聲嘶力竭地鼓吹『停產鬧革命』，破壞生產，中斷交通，在青年工人中煽起『多幹不如少幹，少幹不如不幹，不幹不如搗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中央召開的工交企業座談會上，林彪赤膊上陣，攻擊周恩來主持制定

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條》，叫嚷『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上的文化大革命。』這次會議，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使得這場論戰達到高峰。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起草前後

一、在上海起草《通知》紀事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到十二日，由鄧小平主持，在北京舉行了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康生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上海與他的三次談話。彭真在發言中不能不作一些檢討，並且明確表示：擁護毛主席對我的批評。我需要認真地反省自己，直到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同志們的意見。但是我要申明，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也沒有反對過毛主席。至於《二月提綱》的問題，應該由我來承擔責任。上面下面都沒有責任。我只是想突出一下毛主席多

年來強調的『放』的方針，讓大家多了解各方面的意見，不存在反黨的問題。會議對彭真進行了批評，康生系統地批評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的『嚴重錯誤』。陳伯達則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彭真的『嚴重錯誤』。他系統地『揭發』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個時期的『錯誤』，進而說明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開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講到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時，他說，黨的最大威脅來自混進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來自鄧拓、吳晗、廖沫沙一類的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是為國際上帝、修、反推波助瀾的最危險分子。最後，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經中央審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名單是：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劉志堅，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吳冷西、陳亞丁、尹達、張春橋（按：這是當時根據印件過錄到筆記本上的）。

四月十二日，陳伯達將寫好的撤銷《二月提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草稿，送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審閱。十四日，毛澤東在開始對《通知》草稿進行修改時，加了一句：『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張春橋從上海打來電話說，江青叫我和關鋒明天一起到上海去，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已經給我們準備好了飛機票。當時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尚未下達，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名單也未宣佈。張春橋只說要我們去上海是要研究學術批判問題。他

還說，行前可去問問康生和陳伯達有沒有什麼事情。

接完張春橋的電話，我就同關鋒聯繫，並即乘車前往他的住處，同他一起先去《文匯報》辦事處拿了機票，又到釣魚台去找了康生、陳伯達，想從他們那裡了解一些較詳細的情況。

到達釣魚台康生住的八號樓時，陳伯達也在那裡，但他沒說什麼：康生只告訴我們中央決定要起草一份有關文化革命的文件，批判五人小組那份《二月提綱》。他說，你們趕快去吧，以後和上海要常來常往。他把已經印出來的陳伯達主持起草的《通知》交給我們說，你們仔細看一下，到上海後把主要內容告訴江青。《通知》草稿較長，看一兩遍難以記住，所以我們問可否帶一份走？康生搖搖頭說，不能帶，你們要學會用腦子記東西，怕記不住，可以每段摘記個題目和大意。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有十段，結果我就每段摘記幾個字，少的兩個，多的十來個字。當時我感到氣氛有點神秘，似乎不大正常，但也來不及細想。以後知道，《通知》草稿印出後已給彭真看過，為什麼還要這樣嚴格保密，仍令人費解（康生到上海後主持起草的《大事記》中寫有：『彭真同志背著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給北京市委的同志傳閱，這是違背黨的紀律的』）。（關於《通知》初稿起草情況，據王力講：『政治局會議（按：本來是中央書記處會議）是由鄧小平主持的，康生傳達，決定起草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文件。要我起草。我就起草了：「中央以前的幾月幾日轉發的這個提綱現予撤銷。」只一句話。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都同意了。送主席，主席不高興，說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實質問題。要陳伯達負責重新起草，最初沒有起草小組。陳伯達找了我，由他主持，我協助，搞了《五一六通知》初稿。在北京，鄧小平、彭真、總理都提過修改意見。在釣魚台開的修改會議，彭真還

去參加。這是在四月初，當時除了指出《二月提綱》在理論上不妥外，沒有後來「黑體字」上的那些內容。康生要加上「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彭真在座。彭真說：「那好吧，說就說夠吧！」

——《『文革』第一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我和關鋒乘飛機到達上海，《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蓀等幾位負責人來接機，並設宴招待我們。飯後即送我們到錦江飯店北樓住下，看來一切都是已安排好的。

我和關鋒剛在錦江北樓住定，戚本禹就像魔術師玩耍大變活人的戲法一樣，突然從隔壁房間冒了出來。據說，江青先叫他到蘇州辦理什麼事情，到這裡不久。隨後他把關鋒拉到隔壁房間密談一陣，就同關鋒前去江青住處。一會兒，他和關鋒回來，又拉上我一起前去見江青和張春橋。見面後，江青便談到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事，還說陳伯達、康生和劉志堅等也將馬上到上海參與《通知》的修改工作。接著，她氣憤地聲討《二月提綱》、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的「錯誤」，指出必須給予堅決批判。江青談到彭真的時候特別激動，「咬牙切齒」地說：上次彭真路過上海，她曾要求彭真將來不要整姚文元和戚本禹，可他就是不表態，真是豈有此理！類似攻擊彭真的這些話，以後在起草小組開會時她又重複過幾次。

劉志堅曾經談到當時的情形說：四月十四日，周恩來把他叫到釣魚台八號樓，對他說，中央確定他和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同去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修改。劉志堅和陳亞丁於四月十六日乘飛機到達上海。

這天，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全體成員都到達上海，開始了工作。就在這天，《北京日報》以三

個版的篇幅，在《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通欄大標題下，發表了一批材料和批判文章，並發表了《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這一批判，是經毛澤東在上海點名批評了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後被迫進行的。康生等從北京帶來這天的《北京日報》，江青一夥當即攻擊報紙上的編者按語和這批材料，特別攻擊報紙『包庇鄧拓』，說鄧拓本是『三家村』的『村長』，是個頭頭，『編者按』卻不提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而吳晗、廖沫沙是早已被揭露了的，因此才不得不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又說，照《編者按》看，好像吳晗是主帥，廖沫沙是主將，鄧拓似乎是個小卒，只是稀里湖塗的犯了錯誤，不過是思想認識問題。他們一口咬定，《北京日報》的此舉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因而當場決定馬上通知各報：一律不要轉載《北京日報》的這篇東西。當時由康生主持編寫的《大事記》的說法是：『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內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體規定，並且由他最後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見報的。』

根據他們的決定，我打電話給《光明日報》編輯部，通知他們：不要轉載《北京日報》這批材料和編者按語，但沒講是什麼原因。當時報社已經發排，正準備轉載。吳冷西也打電話通知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當時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在其回憶錄裡寫道：『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用三版篇幅刊登《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人民日報》立即發排，準備轉載「表態」。誰知接到通知不得轉載。為什麼？不清楚。』（《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中央人

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總社因事先沒有得到通知，當天廣播了《北京日報》的按語，當晚新華總社通知撤銷……

四月十九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一）《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佈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此後，北京各報相繼對《北京日報》發表的這批材料和《編者按》發起了曠日持久的批判。

讓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到上海開會是毛澤東決定的。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他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伯達、康生到上海後，很快即去杭州參加會議，起草小組的事情暫由江青主持。從這時起，江青就在這個小組裡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張春橋上竄下跳，開始充當江青的『狗頭軍師』。本來，陳伯達是文件起草小組組長，但他一開始就是傀儡，這個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不僅在陳伯達和康生離開上海前往杭州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時，江青掌管整個小組的事，即使陳伯達在場時，也由江青一人操縱。後來在陳伯達當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後，情況依然如此。

江青在這個小組裡面頗指氣使，盛氣凌人，只是對康生還客氣一點。在起草小組工作開始不久後，江青在一次開會時說她擔心『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沒有保障』，當時還表現出憂心忡忡的神態。劉志堅是總政治部副主任，聽她這麼說，就打電話將此事告訴了總參謀部。總參謀部立即通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採取措施，加強毛澤東的安全保障，並要劉志堅向周恩來和中央軍委領導報告有關毛澤東的安全保障問題。第二天，劉志堅決定去杭州，將許世友所作的安全部署報告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

為了趕上當天中午上海去杭州的那趟火車，也為了避免干擾江青的午間休息，臨行前他沒有打電話告訴江青，只請別人代為轉告。不料開會時，江青發現劉志堅不在，就在會場上大發雷霆，說『劉志堅到哪裡去了？一到關鍵時刻他就跑掉了。這個人靠不住！』第二天中午，當劉志堅從杭州趕回上海時，江青對他數落不已。以後回到北京，劉志堅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江青仍常對他百般刁難，還多次誹謗說：『劉志堅這個人靠不住，一到關鍵時刻就跑掉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把劉志堅拋了出去，煽動群眾揪鬥他，還喋喋不休地說他『靠不住』。

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逗留期間，雖然天天開會，但並不算緊張。最主要的工作是毛澤東對於文件草稿每增改一次，就開一次會議，有什麼意見，即向毛澤東報告。

江青和林彪一樣，都有一些怪毛病。林彪怕水、怕光、怕風，從不出門。他怕水怕到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只要看見水或聽到水聲就會鬧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饅頭泡濕了吃，代替喝水。江青則是怕光、怕風、怕聲音。人們遷就她的這些毛病，不論她走到那裡，都想法使她的住所保持恆溫；夏季她怕冷氣，天再熱也得把空調關掉；開會她怕聲響，別人發言都須低聲細語，但她從不忌諱自己對人疾言厲色、高聲咆哮……其實，她說怕這怕那，全是假的。表面看上去，她一年四季藥不離口，似乎比林黛玉還弱不禁風。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她熱衷於跳舞，連續跳三四個小時也不覺累；她酷愛看電影，尤其外國片，通宵看幾部片子，也無倦意。在上海開會期間，江青說要『教育』大家，每晚要看由她挑選出來的、認為要『批判』的影片。

江青和康生同是山東省諸城縣人。在這個起草小組裡，張春橋、關鋒、戚本禹也都是山東人，所

以初時有人背後說過『山東幫』一類的話。由於歷史關係的緣故，初時江青對康生顯得頗尊重，遇事常向他討教，開口閉口『康老』，我從未見她對誰這樣彬彬有禮過。正如她在一次會上聲明的：『這個老，那個老，我一概不承認，我只承認一個康老。』那時康生也不怎麼抬舉江青，別人對她都稱『江青同志』，他卻是直呼『江青』其名。這次在上海，江青經常會心血來潮、突發地在紙條上寫上一個或幾個人的名字拿給康生看。康生總是看一眼就說：『這人是壞傢伙！』或說『都不是好東西！』有時還要同她耳語一陣。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康生對她寫的哪一個人說過一句好話。其後，隨著江青的政治地位直線飛升和其手中的權勢越來越大，兩人之間的關係也起了很大變化，直到完全顛倒過來，康生成了江青的附庸。只要江青懷疑哪個人是壞人，康生就連夜查找檔案，充分發揮他那種慣於捕風捉影、羅織罪名、陷害好人的特異功能。

康生原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參與了制定《二月提綱》的全部過程，當時，他並未提出過什麼不同意見。但當聞知毛澤東不滿意這個提綱、對它提出批評的時候，他就馬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翻臉不認賬，聲言他是反對這個提綱的。他不但否認自己參與制定並曾同意這個提綱，還編造說他在《二月提綱》問題上與彭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康生利用他和陳伯達主持起草《五、六通知》的機會，極力洗刷自己。《通知》草稿完全歪曲事實真相，硬說『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他還在《通知》草稿裏特別加上了《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這句話，以示其反對立場的堅決。此外，他特意提出並且親手炮製了一份《從一九六五年九月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作為這個《通知》的附件。康生當面交代執筆起草的人說：『錯誤不能人人有份！』他以扯謊、賴賬、造謠、誣陷等卑劣手段，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功勞歸於自己，將錯誤推給別人。他嫌《通知》草稿歪曲《二月提綱》的話還不足夠，又在《大事記》裡編造許多進一步為他開脫的謊言。同時，康生又將他所參與過的一些事情加以扭曲，誇大他自己的作用，把自己打扮成時時刻刻都對毛澤東無限忠誠的『正面人物』，標榜自己在發動這場文化革命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二、毛澤東對《通知》草稿的重要修改

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停留了半個月。因為《通知》草稿早已在北京寫出，並印送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審閱，所以，起草小組對於這個草稿只是著重在文詞方面作了一些推敲潤色，或就某些內容作點補充。

從四月十四日到十八日，毛澤東對《通知》草稿進行了多次修改，用尖銳的詞句增添了許多重要內容，使得這個文件的火藥味更加濃烈。毛澤東當時的一些基本思想，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集中地體現在他對這個文件的多次修改和大段的補充中。經過他修改後的《通知》，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表達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

政策，成為發動這場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儘管作為一個綱領來看，它還不夠完善具體，有的地方語意含混，不夠明確。表面上看，這個文件處處以彭真為對立面，實際上，它的矛頭是指向中央第一線的全體領導人。凡是經由毛澤東修改、增添的地方，在有些印件中都用黑體字突顯出來。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上通過了這個《通知》的草稿，決定提交將於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同康生、陳伯達談道：『你們寫了《通知》，我逐次的增加，加油加醋。稿子新增加的一段（點彭真的名）很有必要，否則發下去，人家會問是誰？加這一段很好，不點名就是無頭告示……』

毛澤東的修改稿，有的是在杭州修改後派人送到上海的，有些是由秘書徐業夫用電話傳達到上海來的。根據筆者當時未必完整的記載，幾次修改的情況是：

四月十四日，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九段和文件結尾部分以及文件開頭部分的一句話。第九段增加兩處，一處說『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門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另一處是：『他們（指五人小組）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文件開頭部分增添的一句是：『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文件結尾倒數的第二、三段，幾乎全是毛澤東添加的：『（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

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後面的這段，尤其是說『混進』來的『資產階級人物』有的還未識破，有的仍在信用，被培養為『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句話，不僅使人震驚，同時引起種種猜想。就連康生也說：『林總（指林彪）叫這一段是驚心動魄的一段。』——不過起初人們還猜不到劉少奇身上。

稍遲一些，這年六月，毛澤東在同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談話中曾談到：『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意是誰，是伯恩斯、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毛澤東這段話，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他的心情和願望。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修改的是第一段和第三、四段中的三處。第一段增添的是批評《二月提綱》『（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門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

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三段增添的是引用毛澤東說的強調思想戰線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和『放』：『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思想。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接著寫道，『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第四段增添的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四月十八日增添的是第六段的開頭和第七段的一句話。第六段開頭增加的是：『毛主席經常說，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在第七段中毛澤東添加的原話比較簡單：『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後經過康生和陳伯達「加油加醋」，結果這句話變成了完全用黑體字排出的這樣的長句：『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其中的『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話暴露出這兩個『理論權威』以『大學問家』自詡的心態，這句話以後成為『大批判中』不分對象被胡亂指責為『走資派』的口頭禪、套話。

《通知》最末一段，是毛澤東於四月十七日添加的：『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指《二月提綱》），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關於這一點，聯繫《通知》的名稱，康生五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言時說：『《通知》可以議一下。可以說原《提綱》是對的，《通知》是不對的。順便解釋一下：這麼重要的一個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達考慮過。少奇同志和陳總都考慮過。問主席，主席講還是叫《通知》。』

這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又經他本人多次修改後定稿的《通知》集中地反映了一九六二年以來他和中央一線領導發生的明顯分歧，以及他對當時黨和國家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他認為，國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已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由於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無論城鄉都有相當大

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更嚴重的是黨的領導層出現了修正主義。在他看來，一批老幹部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會主義階段要反對資產階級、要在農村實行集體化時，他們就不贊成了；他們已經變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都有他們的代理人。他為自己所提出的路線、方針受到重重阻礙、無法推行，而對劉少奇等處於一線的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不信任日益加重。當他把這些情況同他總結的蘇聯共產黨內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教訓聯結起來時，對黨和國家的前途表示了更深的憂慮，擔心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決心發動群眾，進行一場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二十二日下午的講話中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靈魂很廣泛。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裡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止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二十四日，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反覆審改的《通知》修改稿。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毛澤東又講了兩次話，他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他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攻到底。並說：階級鬥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灰塵不掃不走』，『階級鬥爭，不鬥不倒』。人們深切感到，彭真的被

打倒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已是無可挽回的了。

四月二十九日，周恩來、葉劍英從杭州北返經過上海的時候，曾特地到錦江飯店看望起草小組的全體成員。他們和大家親切談話，還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吃了頓飯，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通知》草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基本通過後，起草文件工作告一段落。到四月三十日為止，起草小組成員大部分都已離滬返京，而江青、張春橋仍留在上海。

第四章

戰鼓聲未齊，烏鴛已相賀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一九六六年四月底，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結束，除江青、張春橋以外，其他成員均從上海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定於五月四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決定文化革命起草小組成員列席會議，所有成員都住到釣魚台國賓館。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始至終劍拔弩張，是在極其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進行的。這時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會議雖由劉少

奇主持，但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匯報。整個會議的基調，是照毛澤東四月間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定下的調子開的。會議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會上最使人驚駭的發言，則是康生傳達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林彪那篇被人們稱作『政變經』的殺氣騰騰的講話。

這次會議開頭，五日至七日先開了三天『介紹情況的座談會』。名為『座談』，與會者卻都『坐』而不『談』，只聽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講話。康生一個人在會上講了兩個上午，詳細地傳達了毛澤東自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來，有關『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幾次談話內容，一上來就給會議定下了基調；陳伯達單刀直入地『揭發』了彭真的『問題』；而張春橋著重地講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出籠的情況。這三個人的講話都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使與會者震驚。

在林彪的講話中，他竭力鼓吹個人崇拜，神化毛澤東是『二十世紀的天才』，宣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還當著全體與會者慷慨激昂、信誓旦旦地說：『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可是為時不久，林彪就自食其言，親自策劃搶班奪權、預謀殺害毛澤東，自我暴露了『野心家』、『大壞蛋』的本相，落得折戟沉沙的可恥下場。

林彪在會上還結合攻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大談古今中外的政變經。他說：『最近

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說話的用語粗鄙，如像什麼「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搗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接著就對彭、羅、陸、楊惡毒誣陷，破口大罵，有些髒話簡直不堪入耳。

而在他講話後兩天的五月二十日，當人們進入會場時，竟看到每個席位上都放有林彪五月十四日親筆寫的一份《證明》的複印件：『我證明（一）葉群在與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林立果）、豆豆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陸定一的夫人）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林彪，一九六六、五、十四』。這個《證明》，使所有與會者驚愕。在莊嚴的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居然出現如此不倫不類的東西，真是咄咄怪事！

這次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的批判，並且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停止、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職務。本來，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是臆造出來的，說他們要發動政變，更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予以誣陷。但在極不正常的緊張氣氛下，會議沒有進行認真討論就接受了《五·一六通知》，會上的發言也都『一面倒』。這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趨於狂熱；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已發展到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兩句話成為林彪、江青手中的法器；毛澤東的言論『句句是真理』，他的意見縱然有人感到不妥也難以抵制。一些人在大會上或小組會上違心的或不違心的發言，大都或多或少地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實際上，林彪、康生們不允許受批判者作任何解釋，也不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發表意見。在林彪發言的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彭真在大會上作檢討時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裡通外國等罪惡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至於我同羅瑞卿、同陸定一有沒有反黨的聯繫，請中央審查。』康生卻不由分辯地說，他這是反對《五·一六通知》，因為『《通知》中說：「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段話是毛主席特別添加進去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內容。林總昨天特別發揮了主席這個思想。你怎麼回答呢？你尖銳地同黨，同主席，同林總對立。』林彪這時陰陽怪氣地插話說：『其實是做夢也沒有忘掉。』彭真不過只講了五分鐘的話，而康生的反駁和斥責卻長得多。林彪著力攻擊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揭露林彪、葉群一事，林彪所寫證明葉群『是處女』的複印件，就是特地在陸定一作檢討這天放到每個與會者的桌面上的。其實陸定一在會上的檢討很簡單，說他早在這年四月十八日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寫過信，聲明他並不知道嚴慰冰有寫匿名信的事。

陸定一的發言一完，林彪就氣呼呼地說：『天天在想變天，天天在想變天！』林彪和康生還粗暴地打斷朱德在大會上的講話。當朱德講到根據中央指示學習三十本馬克思、列寧著作情況時，林彪蠻橫地扯著嗓子喊著：『你就是不讀毛主席的書！』康生則以不屑一顧的神態，充滿了譏諷的口吻說：『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些書你能看得懂麼？』他想使朱老總當眾出醜。殊不知，恰

恰表明了康生這個狗頭軍師的淺薄。

當時，因為自己深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中毒也深，加上對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的分歧不甚了了，所以對毛澤東的決策、指示並無懷疑。儘管如此，對會場上出現的『一窩蜂』、『一面倒』的現象還是感到驚愕。有些人剛在這次大會上『言過其實』地嚴厲批判了彭真，沒過幾天，他自己就在另外的場合受到別人對他更加『言過其實』的嚴厲指責。這種現象使自己迷惘不已。當時有個頭腦比較清醒的青年工人遇羅克（年僅二十三歲的北京人民機器廠的學徒工，因撰寫《出身論》駁斥血統論而被江青一夥處決了），曾對『文化大革命』中這種一窩蜂的現象表示不滿。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記裡寫道：『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到處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而今翻看這位被『文化大革命』吞噬掉的年輕人的議論，再對照殘存的當時自己筆記冊上所記錄的一些發言內容，當年會場上那種極不正常的緊張氣氛，仍歷歷在目，依然使我感慨萬千。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了原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而設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小組很快發展成一個不受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約束的特殊機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揮機構。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就是利用這個小組的名義，來實現『打倒一切』，煽動『全面內戰』的目的的。

在會議結束前，江青、康生違背黨內歷來的紀律，已將會議的信息散佈到社會上去。報紙上展開

了對北京市委猛烈尖銳的批判。

五月八日，《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統一部署、審定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何明）。何明是關鋒的筆名。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他以這個筆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雜文《框框乎？指導原則乎？》，毛澤東看後曾批示過『好文章』，對這個筆名留有印象。因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討論《二月提綱》時，選出幾篇認為傾向不好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關鋒過去以『何明』為筆名發表的雜文。當毛澤東批評彭真和《二月提綱》時，提到何明的文章時說了『何明的文章我看過，文章不壞』的這句話，所以，這次關鋒故意署上這個筆名，是故意報復彭真的。高炬的文章則是《解放軍報》編輯部寫的，臨時用了這個筆名，乃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意思。有的書上說這是『江青的筆名』，或說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寫的』，都不確實，江青當時還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兩篇文章經陳伯達審定後，發表之前還經當時華北局派到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組組長（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部長）黃志剛轉送李雪峰看過。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對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決定了的事情，他們又有什麼別的意見可以表示呢？

這兩篇文章都是針對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對『三家村』批判一事的。文章雖都不長，但是口氣很大，調門很高，出言不遜，盛氣凌人。他們都把主要矛頭指向當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以便進一步把火引向彭真。文章明攻『三家村』，暗射北京市委。

高炬的文章說：『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

會主義分子的、個頭目。他們把《前線》、《北京日報》以及《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何明的文章誣蔑《前線》、《北京日報》是『宣揚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說他們是搞了『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叫嚷說：『我們必須擦亮眼睛，辨別真偽，千萬不要上當。』文章把主要矛頭針對鄧拓，聲稱：『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是他們一夥的一個頭頭。可是，編者按卻不提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對讀者的欺騙。』

同一天，《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刊登了林傑等人摘編並由報社加按語的《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一文；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林傑的題為《揭發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一文。

這個時候，在林彪、江青、康生張開的垂天大網中，鄧拓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個殉難者。在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通知》的當天，即五月十六日，全國報紙同時刊載《紅旗》雜誌發表的戚本禹《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文。文中戚本禹故弄玄虛地說：『鄧拓是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他是資產階級右派方面一個搖羽毛扇的人物』。鄧拓對此，痛憤萬分，以死抗爭，於五月十八日凌晨含冤而死。他在遺書中披肝瀝膽，沉痛地向黨訣別：『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

這樣……我的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第二個殉難者是田家英。田家英擔任毛澤東的秘書長達十八年，曾經長期和江青、陳伯達作過鬥爭，被他們視為眼中釘。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和王力、戚本禹來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組宣佈：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代表中央宣佈你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當即進行了文件的點交工作，安子文、王力進行到五點多離開，戚本禹繼續點交到天黑才離開。當天午夜，戚本禹打電話給田家英，逼他去秘書室簽字。田家英氣憤地掛斷電話，對夫人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又說：『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第二天上午，田家英以自殺相抗，含恨而去……

『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已經燃燒起來，正向全國各地蔓延。在這次會議以前，『文化批判』雖然已在全國掀起熱潮，但主要還限於意識形態領域，並且主要是在報刊上進行批判（也有些單位召開批判會）。

這次會議以後，這場『革命』已從意識形態領域推向社會，由一開始以文字的形式批判變成了狂熱的行動。五月的最後一周，北京連續出現三樁震撼中外的事件：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奪權；『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籠並公諸全世界；『紅衛兵』在動亂中誕生。在此以後，這場『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二、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奪權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第一個被奪權的是人民日報社，中共中央派去的工作組組長是陳伯達。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這天，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有關領導研究，決定由陳伯達率臨時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當日經周恩來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迅速獲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劉少奇起草，劉、周、鄧為此聯名向毛澤東請示：『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掌握每天報紙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國最早派出的工作組。

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的事，是陳伯達，康生和江青一夥蓄謀已久，陰謀策劃促成的。他們執意要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乃是他們控制輿論、在全國篡黨奪權的開端。當時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已有很大發展。他們利用了毛澤東在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這段時間對《人民日報》——實際上是對中央第一線領導的不滿，給此報設置陷阱：遇事撇開《人民日報》，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別的報上發表，重大決策對報社封鎖。因為這樣，人民日報社一度對政治動向不摸底，對中央領導意圖不清楚，處境十分艱難。

毛澤東在上海審定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全不知情。這篇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人民日報》長時間保持沉默，二十天後，根據中央第一線的領導的指示，才

在第五版『學術研究』欄裡轉載。這事使毛澤東很生氣，他對中央第一線領導不滿意，對《人民日報》也不滿意。他說：『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小冊子，看他們怎麼辦？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不登。後頭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見《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進行了比較嚴厲的批評。那天下午，毛澤東召開一個小會，到會的有劉少奇和周恩來，彭真、康生、陳伯達和吳冷西列席。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批評吳冷西說，《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他又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後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前進。』

吳冷西從會議廳出來，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自己要好好檢討。總理對他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泠飯店，吳冷西對彭真談了這事。彭真也說：『主席的批評不

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當時，吳冷西感到，這兩位領導人的話可以說是安慰他，但他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第一百五十一至百五十二頁）。

從這時候開始，人們看到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以往的一向慣例是，其他報紙轉載《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文章。這時顛倒過來了，在種種壓力迫使下，《人民日報》轉載別的報紙的社論和文章。經毛澤東審改過的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一文就是這樣。當時給『運動』定調子的文章，都是由《解放軍報》先登，再被《人民日報》轉載。

對於這種怪現象，從《人民日報》創刊之始就在這裡工作的李莊（其時任副總編輯，後又任總編輯）是這樣記述的：當時『為了擺脫險惡處境，《人民日報》抓緊利用一切機會「自贖」。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用三版篇幅刊登揭露《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人民日報》立即發排，準備轉載「表態」。誰知接到通知不得轉載。為什麼？不清楚。於是繼續在原有批判軌道上作功夫：增加篇幅，提高調門，多搞標語口號，「大造革命聲勢」。但是聽不到任何肯定之詞。寫了參加戰鬥的社論送審，一概沒有下文。相反，透露由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精神的《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家大報的社論於十八日發表，《人民日報》趕忙在十九日轉載；另一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收錄了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論是經過毛澤東審定的，在當時是頭等重要文章，也作為《解放軍報》社論在五月四日發表，《人民日報》趕快在五月五日轉載，由於作了刪節，釀成大禍。以後高炬的《向反黨反社會

主義黑線開火》、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實質》等等在當時給「運動」定調子的文章，都是別的報刊先登，《人民日報》轉載。政治動向不摸底，領導意圖不清楚，全社工作人員都明白自己被拋到一邊，中央黨報不在王府井大街了。」（《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第二百六十六至二百六十七頁）。

就在工作組前往《人民日報》奪權之前不久，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於五月十日同時發表了姚文元寫的另一篇殺氣騰騰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這是通過轟擊鄧拓、吳晗、廖沫沙而轟擊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一顆重磅炸彈。這天下午，刊載此文的一批《文匯報》空運到北京來，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同時強令北京所有報紙在第二天全文轉載。

當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進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設立和它的成員名單還未公開宣佈。五月十日下午，當刊載姚文元這篇文章的《文匯報》尚在空中運來京途中，即由新華社通知首都所有報紙、期刊的負責人到民族文化宮禮堂開會，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傳達強令各報刊轉載姚文的「中央通知」。以後被人稱作「狗頭軍師」的張春橋為人刁鑽陰鷲，這次是他躋身「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第一次公開露面，引人注目。有人描繪說，這天「張春橋身著淺灰色中山裝、長長的接地的褲子，志得意滿，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人們到齊後，張春橋就在台板上板起面孔宣佈：

一、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所有的報紙明天都要轉載，不准少一個字、錯一個標點。少了個字，錯了個標點，都由那個單位的黨委負責。《人民日

報》轉載《解放軍報》社論，把內容作了重要的刪節，不准刪。除了北京的報刊，新華社今天也通知全國的報刊，注意不要刪節。

二、《人民日報》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軍報》社論，把刪去的地方用黑體字排出來，做自我批評。《中國青年報》也刪了，今天重新登了，沒用黑體字，要再登一次，也應該進行自我批評。

張春橋在這裡說的《解放軍報》社論，就是前面引錄李莊文中所說的該報五月四日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篇社論，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北京開幕這天發表的。其中收錄了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論，還經毛澤東審定過，在當時是極為重要的文章。社論裡說：『當前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大論戰，絕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是什麼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大是大非的鬥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又長期的鬥爭……這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這篇社論當天經新華社播發全國報紙轉載。《人民日報》編輯部事先不知道這篇社論的底細，更不曉得是經過毛澤東審定的，五月五日轉載的時候，只將稍嫌重複的地方刪去五百多字（只是些套話和反覆講過的眾所周知的形勢分析之類，並不像張春橋說的『把內容作了重要刪節』），不料卻捅了『馬蜂窩』，闖了一場大禍。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就把《人民日報》有關負責人召到釣魚台，由康生主持會議，『嚴厲指責、追究此事』，說什麼『《人民日報》出此大錯並非偶然，同報社領導人長

期處於中間狀態有關』。他在會上查原因、追動機，『大有把《人民日報》一口吞下之勢』。這些負責人回到報社，『認錯再認錯，檢查再檢查，就是通不過』，報社已將有關的人員調動了工作，他們還是不依，還要報社公開登報檢討，使報社的職工感到極大壓力。如今張春橋又在這裡聲色俱厲地要求『《人民日報》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軍報》社論，把刪去的地方用黑體字排出來，做自我批評』，正是本著康生、陳伯達的旨意。多虧了毛澤東考慮《人民日報》在國內特別是國際上的影響，決定該報不必登報檢討。才使報社的職工如釋重負，《人民日報》免於公開『出醜』。

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後，陳伯達即與康生等商定工作組名單，指定我也隨陳伯達前去（我只去了一周多些時間，因為後來釣魚台的事十分繁忙起來，還得照管《光明日報》的事，就不去了）。這個工作組成員共八名，由陳伯達任組長，組員有我和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錢抵千，《解放軍報》的尚力科、朱悅鵬，《紅旗》雜誌的楊丁以及尚未選定的上海二人（其後由張春橋從上海派來的是魯瑛、邵以華）。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陳伯達在釣魚台八號樓召集工作組成員開會。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一部分成員也參加了會議，但只陳伯達一個人講話。陳伯達在會上講了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的原由，進而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滔滔不絕地大談『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陳伯達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要從意識形態領域裡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把資產階級奪去的輿論陣地奪回來，『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要奪權，『就要打倒阻擋奪權的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陳伯達在講話中鼓吹要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牛鬼蛇神』，徹底打倒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把所謂『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掃地。他主張徹底破除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後來，陳伯達談到了關於當天下午將要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宣佈中央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的決定和工作組即進駐《人民日報》的消息。接著，他又談了辦報的事。他說：『辦報要抓旗幟，這旗幟就是社論。』這天陳伯達講得很多，會議時間拖得很長。會議結束時，他決定第二天要發表一篇旗幟鮮明的社論。他要錢抵千等人起草。最後確定立即把他的這番講話整理出來，作為社論的內容。當晚改定，第二天見報。

當天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局及北京各主要報紙負責人開會。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部分成員到會。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宣佈：經毛主席批准，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當場宣佈了工作組成員名單）。並宣佈從這晚開始，《人民日報》由工作組領導。隨後鄧小平解釋了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的原由。他說，最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民日報》宣傳跟不上中央的步調，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先由《解放軍報》報道。外電說，現在是軍隊的報紙領導中央的報紙，這是極不正常的情況。他在批評了《人民日報》後，鼓勵吳冷西振作起來，好好抓工作。最後，他要求首都各新聞單位都支持工作組把《人民日報》辦好，有好的稿件，要無條件地支援給《人民日報》。鄧小平說，中央工作組的任務是領導《人民日報》的宣傳工作，工作組要把報紙宣傳管好。

鄧小平講話結束後，康生接著喧賓奪主、喋喋不休地講了近一個鐘頭。除了關於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關於階級鬥爭方面的問題外，又一次對《人民日報》大張撻伐，繼續嚴厲追問『解放軍報』社論是何居心？把會場的氣氛攪得異常緊張，全場鴉雀無聲，大家無奈地聽著他肆無忌彈的『訓斥』。

陳伯達在會上一句話沒說。會議在五時左右結束後，他即刻帶領工作組前往人民日報社，並完全無視鄧小平數小時前勉勵報社負責人辦好報紙的話，立即奪了吳冷西和編委會的權。用他後來洋洋自得地自我吹噓的話來說：『我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

這就是以中央名義派出的第一個工作組，這就是《人民日報》在全國第一個被奪權的經過。對於人民日報社來說，無疑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擊。如有的人所說的：『對《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一記沉重的悶棍。』

這天晚上，陳伯達帶領王力、關鋒前往人民日報社上班，我也同車前去。（當晚劉志堅通知《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胡癡前往人民日報社，以後中央決定唐平鑄代理《人民日報》總編輯。）到達報社後，陳伯達讓我專門就版面編排問題，根據他的安排與報社夜班編輯部聯繫，而他自己和王力、關鋒以及其他一些人關起門來，修改錢抵千等人根據陳伯達上午在釣魚台講話紀錄整理的社論稿。社論初稿的題目原是《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陳伯達審定時改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並且規定：社論標題要通欄，字要用楷體，這篇社論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標題。從此，《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打、砸、搶的口號，《破四舊》浪潮席捲全中國。人們說，這篇由陳伯達親自主持撰寫和親筆修改定稿的社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動員令，也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

的宣言書。後來，陳伯達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被告席上供認說：『社論是我搞的，並且是我出的主意，竟沒有送請中央審查，罪惡是很大的。』

陳伯達到人民日報社奪權的事件並未公佈，但是凡屬細心的讀者都能看到，從六月一日開始，《人民日報》已經完全改觀，連報名下面的拼音字也取消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只是陳伯達在《人民日報》奪權後拋出的第一顆煽動全國動亂的炸彈。從此，《人民日報》即以每天一篇社論的形式向全國鼓動造反。六月二日，和北大那張大字報及評論員文章一起發表的社論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三日至五日又相繼發表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連續五天發了六篇殺氣騰騰的社論，把中央還未公開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講話的基本內容捅向全國，煽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陳伯達一到人民日報社就當眾宣佈：從現在起，由工作組領導《人民日報》，報社領導不得插手，各部門立即進行調整，推選新的部門負責人報工作組批准。由此徹底改變了《人民日報》的面貌，將它拖進『文化大革命』的軌道。『最高指示』首先在這裡發表，重要信息經過這裡發佈，新鮮道理經過這裡解釋。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少數社論還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以示特別重要。看來，毛澤東對陳伯達到人民日報社搞的這個『小小的政變』是滿意的。自一九六七年始，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於一月初相繼奪權。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談到這兩個報紙奪權的時候，曾經說：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六月一日《人民日報》奪

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人民日報》另起爐灶，但要奪權……

這年稍遲一些時候，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談話時，曾又一次講到《人民日報》奪權問題。大意是：我們整個教育系統都是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大多數報紙，包括《人民日報》，都是資產階級掌握的。名為黨員，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講了多少年，說報紙不行，要他們改。他們不聽，他們可不搞『個人迷信』了。去年六月一日，我才奪了《人民日報》的權……

本來，經毛澤東批准的報告裡說：派工作組『到報館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鄧小平宣佈中央這一決定時曾明確指出：工作組的任務是領導《人民日報》的宣傳工作。可是，陳伯達的心特別大，手也格外的長，他不僅在《人民日報》奪了權，還『乘勝前進』，不失時機地插手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企圖一手包攬中央一級的輿論陣地。於是他規定：每天晚上，新華社、中央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必須到人民日報社開碰頭會，『統一宣傳口徑』，其他各報也都照此精神向《人民日報》『對表』。為了控制這三大『喉舌』的運動，他還批准向總政治部要了二十名軍隊幹部，以記者名義分往各大新聞單位活動，他本人由此儼然成了『輿論總管』。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陳伯達這個『輿論總管』很快就被姚文元所取代。這個在中國影響最大的黨中央機關報的大權最後終於落在江青一夥手裡，就連陳伯達一手把持的《紅旗》雜誌也被姚文元『接管』了去。這大概是陳伯達所始料不及的。這夥野心家們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在這裡也作了充分醜惡的表演。

三、康生炮製的『第一張大字報』

在《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出籠的同一天：毛澤東批示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宋一秀、夏劍秀、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個人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這張大字報是康生一手策劃、經過他老婆曹軼歐具體串連而炮製出來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緊張的進行中，康生背著黨中央，以中共中央理論小組名義派出一個調查組，以『調查文化大革命情況』為名，由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曹軼歐帶領前往北京大學。康生在這個『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出動前，『指示』他們說：『從北大點火，往上搞！』這個『調查組』到了北大，既不向校黨委『調查』，也不參加校黨委的會議，只是一味地在系裡秘密串連。曹軼歐背著北大黨委，把一些人叫到她所住的西頤賓館，煽動他們起來『造反』，『揭開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蓋子』。最後從北大哲學系挑選了七個人，著手起草這張造反的大字報。

就在『調查組』到北大這一天，五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到北大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了華北局的指示，強調各級領導要堅守崗位，加強對運動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積極投入鬥爭。校長陸平也在會議上說：『北大不宜貼大字報，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這些本來都是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曹軼歐卻誣蔑他們的講話是『捂蓋子』，要從這裡打開缺口。經過她的啟發、暗示和策劃，將大字報的矛頭直接指向宋碩、陸平、彭佩雲，並把北大黨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他們兩易其稿，

於五月二十四日修改定稿。這夥人完全無視北大黨委積極領導師生開展運動的事實，在大字報中質問：全國已經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指責北大黨委說：『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裡去』，『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鬥爭形式。』『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最後還煽動師生要『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聶元梓搶在第二天北大黨委召開全校批判『三家村』大會前夕，拋出了這張大字報。大字報一貼出，立即圍上來許多師生觀看。三個小時以後，就有大量反擊聶元梓之流的大字報糊滿了這張大字報周圍的所有牆壁。僅僅半天，全校師生就自發地貼出了一千五百多張大字報。當天晚上，聶元梓在北大哲學系召開『聲討會』，不少師生擁到會場門口，指名道姓讓聶元梓出來辯論。他們憤怒地高聲呼喊：『我們要找聶元梓算老賬！』結果，會場被眾人衝散了，聶元梓在同夥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

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當天午夜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等教育部的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八條規定』，特別強調大字報應當嚴格遵守『內外有別』

的規定；傳達了周恩來的四點補充指示。周恩來特別指出，作為黨和國家的紀律，就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嚴肅批評了聶元梓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

康生得知了周恩來對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態度後，惟恐揭穿了他的陰謀勾當，急急忙忙讓曹軼歐要來大字報的底稿，背著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隱瞞他精心策劃這張大字報的陰謀活動，欺騙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六月一日中午看到這張大字報底稿後，寫下了這樣的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很有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康生得訊就把這張大字報送交中央廣播電台。

六月一日晚上七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突然在新聞聯播節目中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北大師生感到非常意外。廣大師生不知內情，憤憤不平。有些師生高聲喊道：『不要盲從！』『在三個小時之內把中央廣播電台的氣焰壓下去！』校園裡立刻又貼出了許多大字報，陳伯達聽到有人說：『北大的秩序很亂！』決定要親自去看看。王力、關鋒勸他不要去，留在《人民日報》坐鎮，由他們去看。他們去北大看了情況回到人民日報社，向陳伯達宣稱北大形勢好得很：『哪有什麼亂，完全是一派革命大好形勢。』他們連夜炮製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同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一起在六月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這篇評論員文章，公然提出了北京大學的黨組織『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的荒謬觀點。顯然，這篇文章為後來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製造了根據。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這張大字報的舉動不僅使北大師生感到意外，也使許多中央領導人感到驚

愕不已。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聽到電台廣播，就急匆匆地詢問周恩來：『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周恩來回答：『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劉少奇事先同樣不知道。聽到廣播，王光美去問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看到過中央關於審批廣播那張大字報的傳閱文件嗎？』聽到否定的回答後，王光美對秘書說：『這麼大的事，少奇同志說他不知道，他說中央開會沒有說過。』（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這張大字報的出籠，對於毛澤東以外的中央常委和其他中央領導，是又一次的『突然襲擊』。這就不禁令人聯想起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出籠時的情景。這次康生又是施展陰謀，『偷偷地幹活』。今天回過頭來看，就不再會感到奇怪，因為康生和江青、張春橋本來就是一丘之貉啊！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廣播，立刻激起了廣大聽眾的關切。許多人給電台打電話質問。電台連夜把聽眾質問的情況加以整理，寫成《簡報》報給康生。康生批道：『這就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宋碩、陸平、彭佩雲等等的陰謀欺騙，使廣大群眾在長期被蒙蔽、被欺騙的狀態中清醒過來……』

六月二日，康生從幕後跳到幕前，以一個『凱旋者』姿態來到北大。他洋洋自得地向圍攔來的師生吹噓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據曹軼歐對人說：這張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克明找聶元梓署名，她先是拒絕了，後來才同意。因為聶元梓是哲學系的總支書記，所以她的名字寫在前面。由此，她撈到了不少政治資本，在這場動亂中一躍成為首都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一度大出風頭。）這時『調查組』有人向康生反映：大字報貼出後，因聶元梓在政治上

和生活上問題很多，名聲很臭，北大師生強烈反對，後悔不該讓她帶這個頭。康生不以為然，惡狠狠的地嚷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有利於自己的政治需要，是非、好壞完全都是可以顛倒的！

出足風頭的聶元梓對康生感恩戴德，忙寫了一封感謝信吹捧康生，發誓『要為康生同志爭氣』。他們就是如此狼狽為奸地進行反革命勾結的。

六月二日下午和三日晚，陳伯達兩次到北大看大字報。他對北大廣大師生不畏高壓、對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及時支持校黨委的正義行動極端仇視。在他看完大字報回到人民日報社後，立即筆桿一搖，又炮製了一篇題為《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於六月五日見報。這篇社論大翻北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案，把北大貫徹中央指示、糾正社教運動錯誤的『國際飯店會議』打成『一九六五年發生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並將攻擊矛頭指向了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總書記。它使全國億萬維護中國穩定、不願起來向所謂『走資派』造反的群眾被扣上了『保皇派』、『保皇黨』的帽子，使無數無辜的領導和群眾受到了迫害和摧殘，同時也造成了群眾之間的嚴重對立和分裂。

六月三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了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六月四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公佈這些決定時，發表了題為《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的社論。社論中聲稱：『前北京市委的領導，貫穿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前北京市委的一些重要負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修正主義者。』

在這篇社論的煽動下，各地青年學生一哄而上，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以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許多混亂不堪的現象。

實際上，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開了一個肆意顛倒是非、踐踏社會主義法制，利用『四大』進行誣陷和人身迫害的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具有優秀傳統的北大蒙受了極大的歷史恥辱。而康生一夥卻把北大的『造反經驗』作為『樣板』向全國推廣，他們派聶元梓到上海煽風點火，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造反奪權，還組織全國二百一十二萬多人到北大『串連』、『取經』，剎時，北大的『經驗』傳到各地，全國大亂，使中華神州大地面臨著一場空前的災禍。

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這張大字報的合法傳播所導致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成了日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要武器，成為進行造謠、誣蔑的重要手段，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張大字報被稱為是繼《五·一六通知》宣告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個重要事件。從此，一場長達十年的大動亂在全中國迅速蔓延。正如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專為這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而寫的社論《偉大的戰略措施》所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在廣播電台和報紙上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直接發出的戰鬥號令』，『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從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四、『紅衛兵』的誕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北京發生的另一影響深遠的事件是『紅衛兵』的誕生。在毛澤東支持下，紅衛兵組織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一場震撼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一代天真、單純的青少年無意中被『文化大革命』推上了政治舞台。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使『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

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是由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部分高年級學生在五月二十九日組合而成的。這群最大不過十九歲，最小只有十三歲的少年，在對形勢進行『充分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應趁全中國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他們願作『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決定組織紅衛兵，並且商定了《紅衛兵誓詞》：『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消息迅速傳開，六、七月間，在北京普遍陷於混亂的大中學校裡，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組織。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先後發表《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堅決『造反』。他們說：『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修正主義！』七月二十八日，他們寫信給毛澤東，並經江青將他們這兩張大字報一起轉送給毛澤東。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這天，毛澤東覆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同時指出：『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

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毛澤東將他這封覆信和紅衛兵的「兩論」印發全會，表示了他對紅衛兵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八月三日看到這個文件，立即將毛澤東的覆信公諸於眾。此後，各地青年學生紛紛起來響應，各種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像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檢閱來自北京和全中國各地的紅衛兵。清晨五時，毛澤東身穿綠軍裝，從天安門城樓下走過金水橋，同參加大會的紅衛兵小將握手，向他們揮手致意，還把來自各地的紅衛兵代表邀請到天安門城樓一起檢閱遊行隊伍。檢閱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宋彬彬將一個紅衛兵的袖章戴在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澤東欣然接受。這一舉動向紅衛兵表明：「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毛澤東還讓剛滿十八歲的清華附中紅衛兵最早的組織者卜大華站在他和周恩來中間合影。毛澤東穿軍裝，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他在檢閱前突然決定改穿軍裝，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只得將自己的軍裝送去。儘管不十分合身，毛澤東還是高興地穿上了。新華社報道：「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主席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紅衛兵效法毛澤東，爭相穿著軍裝，把他視為紅衛兵的統帥。這次有百萬紅衛兵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是一次毛澤東運用他個人威信直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大會，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了重要作用，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到處造反，導致中國的混亂。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支持紅衛兵？其後他在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去年批判吳晗的文章，許多人不去看，不那麼管。這次文化大革命，前幾個月，一，二，三，四，五月，用那麼多文章，中央又

發了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麼大注意。還是大字報、紅衛兵這麼一衝，引起了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他正是要讓幼稚、單純、忠誠、敢造反的紅衛兵衝鋒陷陣，使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衝開『阻力』，在全國深入地開展下去，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在林彪和江青一夥煽動起來的、所謂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狂熱情緒影響下，各地大批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衝向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衝向社會。對他們認定的所謂『封、資、修』的事物進行大肆破壞，成千上萬的人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受到批鬥、抄家、遊街；許多長期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愛國民主人士、原工商業者和歸國僑胞也首當其衝地受到了種種的迫害。

在這次會上，林彪作了破壞性極大、極壞的『破四舊』的講話。他說：『這次是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在他『打倒』、『打垮』、『大破』等口號的煽動下，北京三十萬紅衛兵湧上街頭，張貼傳單和大字報，組織集會和演說，開始了所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新華社、《人民日報》隨即發表消息和社論，對紅衛兵的行動給予高度評價。《人民日報》於二十三日發表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為北京市紅衛兵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紅旗》雜誌也發表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而在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臂戴北京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袖章，向全世界宣佈：紅衛兵『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改變著我國整個社會的面貌。』林彪高度讚揚紅衛

兵『殺向社會』的行動，使這一行動向新的深度和廣度推進。破『四舊』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進而波及到廣大農村。

破『四舊』先從街道、店鋪、城市設施『改名』開始。八月二十四日，北京紅衛兵組織了四十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又將長安街改名『東方紅大街』、東交民巷改名『反帝路』、協和醫院改名『反帝醫院』。繼則掃蕩一切紅衛兵認為不合『無產階級口味』的事物，他們對『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髮型，『牛仔褲』、『牛仔衫』等各式衣裙也不放過，他們聲稱：『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結果紅衛兵滿街跑著剪長髮、剪長辮子、剪小褲腳管、燒戲裝和道具，進而發展到毀文物、抄家、抓人、打人、殺人，解散民主黨派、鬥爭民主人士。

這種亂剪、亂燒、亂抄、亂打的行為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秩序，造成了人心惶惶的恐怖氣氛，導致了難以估量的惡果。北京原有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文物古跡，八、九月間就被破壞了四千九百二十二處；八月十八日以後的一個月內，全市被抄家的十一萬四千多戶，抄走黃金十萬零五千一百兩，現金五千五百多萬元；白銀三十四萬多兩，文物和玉器六十一萬多件。不少紅衛兵將金銀首飾竊為己有。在毛澤東第二、三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遊行隊伍路經的天安門廣場上曾發現黃金，在天安門城樓上也發現紅衛兵失落的金磚。在此期間，北京市趕走『牛鬼蛇神』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八人。

最駭人聽聞的是紅衛兵亂殺人。據北京市公安局不完全的統計，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四十天中，全市被打死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人。受其影響，大興縣有的幹部挑動民兵，從八月二十七

日至九月一日五天當中，全縣『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被打殺死的就有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年齡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造成這種慘劇的原因，自然和江青一夥造成的動亂局面分不開，而在當時身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公開宣佈砸爛公檢法、帶頭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就在一次會議上煽動人們武鬥：『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其後，謝富治在陝西、湖北、甘肅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獄？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謝富治講話的傳達，造成了執法人員思想的極其混亂，不敢放手治安，紅衛兵也把公安部長的話當作尚方寶劍，隨意捕殺無辜。有人乘機造謠說：『這事公社知道，縣裡知道，市裡知道，連周總理都支持。』這樣，亂打、亂殺的現象就在大興全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迅速蔓延開來，從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從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消滅幾十個，發展到亂殺家屬和有一般問題的人，進而對全家的斬盡殺絕……

紅衛兵的亂抄、亂打、亂殺的行為迅速地蔓延著，在北京和其他各大城市，許多知名學者、作家、藝術家、社會人士均無法逃脫他們的殘酷迫害。

在北京，八月二十二日，著名作家老舍和藝術家白雲生等三十三人，被破『四舊』燒戲裝的紅衛兵揪到了孔廟，全部被剃成『陰陽頭』，掛上黑牌子。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傷勢嚴重，後又被拖回北京市文聯、派出所，一直被這夥喪失理智的紅衛兵圍鬥、毒打到深夜，凌晨才被放回家。老舍不堪凌辱，二十四日就失蹤了，二十五日清晨，在德勝門豁口外太平湖的後湖發現他的屍體。

在武漢，著名哲學家李達於八月二十四日含冤負屈而逝。他因抵制林彪鼓吹的『頂峰論』，在六月三日，便成了湖北省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的示眾者。七月下旬，在毛澤東召開的一次小型會上，有人曾問，李達可否批判？毛澤東不無感慨地回答：有錯誤可以批判，不要把他整死了。實際上，其時李達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在被迫害致死前，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求救的信：『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及至毛澤東的批示傳達到武漢大學時，李達已離開了人世。

在上海，九月三日凌晨，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連續被紅衛兵折磨四天三夜之後，夫妻雙雙憤然自縊身死……

當時不斷有反映城鄉亂打、亂殺情況的報告送到中央文革小組，其中還有一些含冤屈死的老幹部的血淚遺書。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看到後，對於無辜群眾慘遭殘殺的案件和一些老幹部因受迫害含恨而死的不幸結局，不僅無動於衷，反而幸災樂禍。對於他們久欲置於死地的『仇人』的殞滅，他們捧笑稱快，惡語詆毀。他們之所以這樣，因為他們是陰謀家，野心家，只有在天下大亂中，他們才能

在『亂中奪權』。

毛澤東是不贊成亂打、亂殺的。八月一日，他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覆信的時候，一面表示熱情地鼓勵和支持，一面向他們規勸說：『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之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這些話，表明他並不贊成紅衛兵運動中的種種狂暴、極端行為，想對此有所約束，加以引導。但是由於『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想法，又不便於下令制止他所不贊成的某些行動，不願給這些狂熱的『小將』潑冷水。江青、康生、謝富治等就利用這一點繼續火上加油，給紅衛兵鼓勁叫好，還以專政機關庇護這類暴行。八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中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角落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鬼，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同時，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二日批准，轉發了公安部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

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的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制止，加上江青一夥的煽動、教唆，一部分紅衛兵完全喪失理智，變成打、砸、搶、殺的惡魔，為人民群眾所唾棄。

雖然絕大多數紅衛兵是懷著保衛黨中央、保衛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情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但盲目性很大，很容易受到林彪、江青這幫陰謀家以及紅衛兵極少數野心分子和投機分子所蒙騙、利用、愚弄。捲入這場動亂的許多年幼無知的青少年，他們癡心地追隨、擁護一些人，瘋狂地憎恨、打倒一些人，全是盲目的。他們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狂熱程度，就是對那些把他們煽動起來『造反』的小頭頭，也都五體投地的盲從。他們不僅對所崇拜的『最高指示』奉若神明，對那一些小頭頭的『最低指示』也無不堅決執行。對於他們所衛護的人知之不多，而對他們所反對的人也往往完全無知。由於他們的無知，結果鬧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來。在北京就發生過這樣的事：一八九三年出生的著名哲學家 and 邏輯學家、著名新聞工作者潘梓年，這年已經七十三歲。他是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有一幫紅衛兵闖進科學院要『打倒他』。有人問一個北大的紅衛兵：『你要打倒潘梓年，你知不知道他的歷史？你見過他是什麼樣子麼？』這位『革命小將』信口開河、脫口而出說：『沒見過也知道。潘梓年是個女的，頭上梳兩條小辮。』可見他根本不知道他們要打倒的對象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爺爺』，更不了解他畢生獻身中國革命事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卻盲目地喊叫『砸爛他的狗頭』，『把他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又如那時曾經風風火火、不可一世的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在外地造謠撞騙博得了一些

盲目追隨的崇拜者。筆者曾看到這樣一段記述：在一次廣州市紅衛兵的大辯論中，一名中學生紅衛兵斥責一位大學生：「你算什麼『革命小將』，人家聶元『辛』（他不認識「梓」字，唸半邊）才是『革命小將』呢！」他和同學們日夜兼程到北京一心想「瞻仰」聶元『辛』的『青春風采』，然而當他們看到生於一九二一年已是半老徐娘的聶元梓，不禁驚叫起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組織各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開始了紅衛兵的全國性大串連。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加上中共中央關於免費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規定，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的大串連走向高潮。這是造成社會大動亂的一個嚴重步驟。北京成為全國性串連的集散中心。來京串連者感染了北京的狂熱氣氛，又分散衝向各地開始『四下點火』的『長



“文革”初期，穆欣為來京串連學生簽名。趙剛

征」。他們把打倒一切，毀滅一切的野火燒向了全國。從中共各省市委到基層組織，沒有一個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黨的組織不受到『炮轟』和『火燒』。『打倒』、『砸爛』儼然已成了他們的『職業』。

紅衛兵亂抄、亂打、亂搶、亂殺的行為引起人民普遍的強烈不滿。紅衛兵組織本身，由於觀點不同和利益的爭奪，逐漸發生了某些分化與改組，甚至打出各種旗號進行激烈的派性鬥爭，一些人成了派性的犧牲品。當初捲入紅衛兵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信賴，出於防止『黨變修』的良好願望。後來通過自己的實踐，逐漸了解這場運動的殘酷性和盲目性，有些紅衛兵從『左派』的狂熱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日益清醒過來。其中一部分人開始認識到，任意反對和衝擊黨政領導機關是錯誤的，決定要同這種破壞行為作堅決的鬥爭。有的由於淪為『革命對象』的子女的思考，或因自身被打擊和迫害而對運動改持反對態度。一九六六年底，有的紅衛兵公開貼出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和康生的大字報。他們的覺醒和行動受到了殘酷鎮壓。但也有極少數野心分子和投機分子成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工具和殉葬品。

第五章

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

一、在迷惘和惶悚中跟著走

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我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初住進釣魚台國賓館，到一九六七年八月，我在那裡總共住了十五個月。這年八月底，因為冒犯了江青：她責令我停止工作一個月；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江青責令我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和『接受群眾批評』，從此不再讓我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文件也給停發了。不久，於二月底，又叫我回釣魚台，但被『發配』到《人民日報》『管版面』（實際沒有『管』）。在那段日子內，只有當文革小組有對外的集體活動時，

才通知我前往參加。八月初旬，江青再次責令我回報社『參加運動』。就這樣，我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工作的時間實際上不滿七個月，可是江青一夥給我的『酬報』卻是近八年的冤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相當於中國人民八年抗日戰爭的時間，這是一段『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的經歷！在許多問題上，我經常是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猶如『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尚書·君牙》）。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批准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內容為：『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達了文件，即：『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四大區的小組成員以後確定為：華北：郭影秋。東北：鄭季翹。西北：楊植霖。西南：劉文珍）。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閉幕後，中央就經常開會研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初期，會議通常由劉少奇（或由鄧小平）主持，曾被稱為常委會、常委擴大會、碰頭會或辦公會，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均由周恩來主持，稱為常委碰頭會，後改稱中央文革碰頭會。在這次黨的大會開幕式上，劉少奇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那時中央常委的會議，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只有組長、副組長可以列席，但我和戚本禹都被

指定去作記錄，還須在會後整理出需送給毛澤東的報告文稿。當時，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力不勝任』，同時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由會議的主持人親自向毛澤東作匯報不是更好嗎？但想到，既然這樣決定了，我也只好勉為其難，與戚本禹輪流執筆。那時，自己對於黨內上層領導之間早已存在的爭論不知端倪，更不清楚矛盾已經發展到那樣尖銳的地步。不久，寫報告一事就停止了，但疑團卻留在了我心裡：難道中央一線和毛澤東之間不協調？他們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有分歧？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就發生了對工作組存廢問題的爭論。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積極分子大會上，新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雪峰和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都講了話。周和鄧都提到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

散會後，我回到釣魚台，天已遲暮。康生見到我的時候說，北京師範大學有些學生對北京新市委不信任（北京市委是中央於六月初決定新改組的），他們準備聯絡全市各院校師生開會辯論，請中央文革小組主持會議；有一批學生已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接待站，要求他答覆。七點半，康生說他自己必須參加中央的一個會，因此他把中央文革小組對此事的意見告訴了我，要我代表小組到接待站與這批學生見面。現查當時學生印發的記錄，我是根據康生的要求和說法講了這樣的一番話：

『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講些問題。師大給李雪峰同志貼了一些大字報，李雪峰同志是革命的，中央對北京新市委是信任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毛主席去了，劉主席、周總理、鄧總書記在會上講了話，都表示支持新市委……前幾天我們到北師大去過，師大師

生的革命熱情給我們的印象是很深的。北師大中文系四年級七同學印了傳單散發到各校，表示對新市委不信任，要求各校師生到工人體育場辯論，要中央文革小組主持會議。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對這種做法是不贊成的，不參加的。師大同學回去轉告大家：如果召開這樣的會，應該由北京新市委召開；另外，向各學校散發傳單是不好的，可以用大字報、寫信傳達。」

在學生問起當天人民大會堂的會議時，我還講了這樣幾句話：『中央兩位副主席、一位總書記都表示支持新市委，我們一個普通黨員、團員還能說什麼呢？北京新市委是正確的。為什麼要反對呢？你們可以想一想。』

在我的頭腦裡，既有康生所講的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指示，還有中央常委六月三日決定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八條規定》，所以我講這些話是合適的。但是，這番話很不合『造反派』的胃口，他們在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通訊社』辦的《東方紅報》上大造輿論，並捏造說：『晚上，穆欣派人去了師大，叫喊：『今天兩個副主席和一個總書記都講了話，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他把『炮打李雪峰』說成是『反黨』『反革命逆流』。這次對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殺了』。

七月三十日，當時在接待站主事的許明送來了我在師大講話的記錄稿，她要我修改定稿以便登在接待站編印的《簡報》上。我改定後即刻送交給了康生，可是他把記錄壓了下來，既沒說我講的有什麼不妥，也沒講為什麼不再上《簡報》。顯然，對於這次講話所涉及的事，在康生頭腦裡已經有了變化。接著，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隨著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問世，康生馬上見風轉舵，帶頭鼓噪，起勁地往劉少奇頭上潑污水。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列席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使大多數與會者感到駭然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因為它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開會的前一天，毛澤東已叫人通知在大連的林彪到會，林彪即乘專機回京。這張大字報印件在大會上剛一散發，氣氛頓時變得十分緊張。接著，在小組討論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都爭相發言，猛烈、惡毒地攻擊劉少奇。其間，謝富治對鄧小平也進行了批判、攻擊。

因我也列席了這次大會，所以一看到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內容時，心中即刻感到迷惘不安，故在小組會上我只聽不發言。這天會後，我和關鋒同車從人民大會堂回釣魚台。途中他大談劉少奇的『錯誤』，滔滔不絕。後來突然轉變口氣神秘兮兮地對我說：『還有一個比劉少奇更危險的人物！』他見我沒有應聲，就接著說：『就是你應該很熟悉的鄧小平！』他見我搖頭，又說：『過去你在第二野戰軍工作，當然熟悉，應當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路線的言行』。我回答說，我雖曾在二野工作過，但從未直接與他接觸過。『沒有見過面，也會聽說過。』『聽說的全是讚揚他最忠於黨，最忠於毛主席！』……話不投機半句多，雙方沉默了片刻。車很快到了釣魚台，我倆下車後不歡而散。

把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端出來，是林彪、江青們的既定方針，也是他們戰略部署中的重要一步。我剛回到釣魚台，戚本禹就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他已就鄧小平『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寫了『書面發言』，並要我『應該多揭發他！』我說，就只是和戚一起在常委會做記錄時和在文革小組會上聽到過鄧說過的那些話，知道的一點不比他多。戚本禹口氣開始蠻橫起來，他說：『那不行！你是老幹部，應該比我知道的多；你在二野工作過，應當知道的更多！』這時，我將在車上向關鋒說的話重複了一

遍。誰知，他不僅不愛聽，還和我爭執起來……結果我和戚本禹也鬧了個不歡而散。戚本禹前腳走，關鋒後腳就到，顯然是來當戚本禹的說客。關鋒重複了車上他要我揭發鄧小平的那些話，我也用同樣的回答表明了態度。

儘管我說的是實話，可是他們硬是不信。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晉綏解放區工作，當時負責開闢和堅持晉綏抗日根據地的是賀龍和關向應率領的八路軍第一二〇師，而鄧小平和劉伯承坐鎮晉冀魯豫邊區；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我在陳賡部隊工作較長時間。陳賡部隊（第四縱隊——第四兵團）雖屬晉冀魯豫野戰軍（其後是第二野戰軍）建制，歸劉、鄧指揮，但自解放戰爭伊始，由於陳賡部隊所處的太岳地區戰略地位特別重要，中共中央即決定這支部隊在執行任務方面受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以後這支部隊長期單獨行動，只是在進軍中原的後期，淮海戰役前後，方與劉鄧大軍主力匯合。這時，在一些會議上我見過劉伯承和鄧小平，還聽過他們的講話。雖無直接接觸，但是鄧小平的智勇兼備和他對革命的忠誠，我是深有感受的，在部隊裡也是有口皆碑的。陳賡生前就曾多次對我說過：『等有了時間，我要寫一篇介紹小平同志事跡的文章』（遺憾的是，陳賡於一九六一年猝然病逝，這一夙願未能實現）。關於這一點，就連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在全會小組會上唯一指名攻擊鄧小平的謝富治也無法否認。在當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謝發言攻擊劉少奇、鄧小平時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他們過去作了許多工作）。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謝富治所說的『這種影響』不正是證實了連他們也不能不肯定鄧小平在軍內、黨內的地位和實力！

和關、戚爭吵後，我很快看到了一份刊登著戚本禹指責鄧小平『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書面發言』的《簡報》。對照在常委匯報會上的記錄，戚本禹所『揭發』的就是鄧小平在會上所作的主張派工作組、『文化大革命』應當有領導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進行的有關發言，以及他對當時運動中發生的亂打亂鬥現象的批評。這些本來就是正確的意見，只是因為毛澤東說『錯了』，不少人就一哄而起跟著指責，而戚本禹以『書面發言』的形式公開指責鄧小平的講話是在『阻礙』、『破壞』運動。也就『照貓畫虎』，寫了內容大致相仿的『書面發言』送交到全會簡報組。應該說，當時我寫這個『書面發言』並非違心而是認真的、自願的。因為自己置身中央文革小組，深受那時極左思潮的『薰陶』，又見到毛澤東那張大字報中的嚴厲批評，所以我的思想迷失方向，確實以為劉少奇、鄧小平在派工作組這些事情上有『問題』，沒認識到是把他們的正確意見看成錯誤的，沒有認識到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

中央全會的《簡報》很快出版了。當我剛剛收到這份印有我的『書面發言』的《簡報》時，陳伯達也拿著一份來找我。他和關鋒、戚本禹如出一轍，認為我應對鄧小平作更『深刻的揭發』。他『開導』我，要我『打破顧慮，大膽揭發』。出於無奈，我說了這樣幾句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就是叫我給一個炊事員、飼養員寫證明，我對所寫的東西都要負責。小平同志是總書記，我豈能信口開河，不負責任地胡說？』陳伯達見我仍不『開竅』，最後只得悻悻地說：『你這個人哪，人如其面！』稍後幾天，小組成員在釣魚台十六樓開會，會上康生當著大家的面說：『穆欣不能作戰！』其實，類似的話江青也多次對我講過，她總嫌我在許多問題跟不上他們的步伐。看來，此時此刻，我在

他們這幫人的心目中已是個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一員。

當時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也不是沒有來由的。一九四三年，當整風運動進入『搶救』階段時，我親眼目睹了『逼、供、信』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而且也親身體會到『逼、供、信』的極大危害。昔日的教訓，時刻銘記在我的心頭。所以，後來每逢遇到這種類同情況時，凡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絕不信口亂說。

七月中下旬，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後，經常親自主持會議聽取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研討有關運動的政策及部署。每次開會，除有中央的有關人員到會外，大都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列席。令人感觸頗深的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到會的中央領導人一次比一次少。當時，雖然自己所受個人崇拜思想的影響很深，對毛澤東衷心崇敬，但對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同樣崇敬，所以，每當他們中有人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揪鬥、被打倒時，我既有萬箭攢心之痛，也有實在難以理解之苦。在那些迷惘的日子裡，我親眼見到過，有時毛澤東聽到一些有關某個領導的『三反言行』的『匯報』時，雖也會氣惱地說：『叫他辦三件事！』（意即關起來，每天只做『吃喝、拉撒、睡』這三件事。）可是，不一會兒，他就會改口說：『運動後期再說吧！』再說，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時也曾說過：『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人家犯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毛澤東的態度並非要搞否定一切。又如當林彪、康生在社會上散佈謠言，誣蔑賀龍搞『二月兵變』和煽起『打倒賀龍』的邪火時，毛澤東曾兩次找賀龍談話。第一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他

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賀龍，勸賀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對賀龍的這三條評價，早在一九三八年春，毛澤東對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的官兵和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都曾明確的宣講過）；第二次，九月十九日，他再次找賀龍談道：『問題解決了，沒事了……』話間，他還風趣地說：『我當你的保皇派！』三個月後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還特地請賀龍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並親切地和賀龍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給予慰勉。遺憾的是，運動一開始就失控了，毛澤東的關切並無效果，賀龍終於被迫害致死。

在對劉少奇的態度上，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應該說，毛澤東還是留有餘地的。雖然他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對劉少奇嚴厲指責，但他仍作為黨內問題看待。一天晚上，毛澤東得知北京大學有人傳抄貼出了他的那張《炮打》大字報，馬上派陳伯達去勸說同學自行揭掉。其時已值深夜，陳伯達神情緊張地要我陪同他去處理。我陪陳伯達深夜到達北大後，經陳的一番說明和勸告，絕大多數同學表現得十分通情達理，當場就把那張大字報扯下拿去銷毀了。應該承認：當時陳伯達的態度是認真的。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文革運動初期的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仍能看到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參加。

正如鄧小平後來分析所說的：『毛澤東同志確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

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百零一頁。）

從毛澤東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態度也略見一斑。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的事發生後，因受張春橋等誣陷性匯報的影響，他曾震怒發火，於二月十八日對有關的老師和副總理進行了嚴厲批評，並令周恩來召開政治局生活會，批評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但是他並不同意江青、林彪一夥要將他們打倒的意圖。他主張批評之後，還要團結他們。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澤東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家裡來聚談，開了團結會。當天夜裡，周恩來擬定了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北京慶祝活動名單，並經毛澤東批准，這些領導人也出席了『五·一』的慶祝活動。

同時，毛澤東對於那些狂熱的造反派的極端過火行動是不贊成的。『文革』初期，蒯大富找人畫了一幅誣蔑、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彩色漫畫《百醜圖》，並印製散發。畫面上是一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轎子的都是老一代領導人；有的人雙手沾滿了鮮血，有的人口裡叼著一把刀。廣大群眾，凡是看到這張漫畫的人，無不憤慨萬分，紛紛指責泡製此畫的罪魁禍首。一天，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在見毛澤東時，將《百醜圖》交給他看後，毛澤東神情嚴肅而憤怒地說：『胡來，這是醜化共產黨的！』毛澤東轉過身來即刻叫人打電話給陳伯達，說：『告訴他，這個《百醜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相比之下，林彪對中央的老一代領導人的態度卻迥然不同。每逢談到『有問題』的人時，他都會用陰陽怪氣的腔調插話：『這個人我知道，壞透了！』似乎不論對哪方面的負責人，他都無所不曉，只要有人一說他們的『不是』，他就會拋出幾頂足以置人於死地的大帽子。與他才接觸時，我對他的這種政治『敏銳』曾有過『佩服』之感，可是日子久了，細心琢磨覺得，他給人家扣的帽子無非是：『這是個反動透頂的『國民黨』！』『這是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或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每次這樣，既無新意，也無事實，漸漸地，我終於發覺，林彪根本不清楚被迫害者的根底，而是出於『打倒一切』、篡黨奪權的目的，在信口開河，恣意迫害。『國民黨』、『反革命』、『反共分子』、『大壞蛋』是林彪最得意、使用得最得心應手的大帽子和棍子。他說彭真是『有些人表面上是共產黨員，實際上是國民黨員。彭真在東北也是這樣。』當『青海事件』發生時，他說：『趙永夫（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這個傢伙，他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是隱藏在黨內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這件事是和王昭（青海省委書記）有關係的，王昭和羅瑞卿的關係很密切，和彭真、劉瀾濤是有關係的，是個壞蛋！』在『大壞蛋』的黑棍下，王昭被活活整死。他攻擊陸定一、周揚等中宣部的領導人時，又不陰不陽地說：『他們不想革命，也不讓別人革命；他們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反共分子；名義上是革命者，實際上是反革命分子。』同樣，他把一系列帽子壓在賀龍的頭上，什麼：『賀龍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個封建地主野心家，混進黨內撈資本。』『賀龍是大土匪出身』……

面對這種形勢，自己不願隨波逐流，可是總不開口，也要受到指責。八月初旬，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不久後的一天，江青通知小組全體成員到中南海懷仁堂開會，但沒有說明開會的內容。到了那

裡，人們才曉得是要對胡喬木開刀，批判他『反對毛主席』。當時，我覺得，雖然我同胡喬木單獨來往不多，但根據本人對他的了解和他平時的所作所為，無論如何也同『反毛主席』聯繫不起來。胡喬木早從青年時代起長期擔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秘書，曾經為黨中央起草各類文件，給黨報和新華社寫過無數評論，毛澤東的某些重要著作都由他親自整理加工，傾注了他的不少心血；前後二十多年，對黨作出卓越貢獻；至於喬木對毛澤東的崇敬，是黨內有目共睹的事實。建國後，他曾長期主管新聞宣傳方面的工作，在兼任新華社社長期間，他對編採人員嚴格要求，盡心培訓；『手把著手地教』，使許多新聞人員受益不淺。我本人在調北京工作後，曾在各種會議上聽他闡述黨的方針政策，還曾多次直接向他請教；在撰寫一些重要文章時也得到過他的熱情、細心的指導，我一向尊敬他。現在，江青等人大罵胡喬木反對毛澤東、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是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這是我思想上怎麼也無法接受的。當江青和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以及其追隨者聲色俱厲地指責、批判他時，我只好默不作聲。當晚，在我們深夜回到釣魚台後，江青就責問我為什麼不發言？我只好說『不了解，沒話講』。江青卻武斷地說：『我就不信你對他的「錯誤」一點都不知道。』在她的壓力下，我突然記起一些大字報和紅衛兵小報對胡的『揭發』，於是回答說：『也曾聽到過一點，可能你全都知道。如他當新聞總署署長時，照搬了不少蘇聯新聞理論；當年右派分子儲安平去《光明日報》做總編輯是喬木推薦的，他曾親自拜訪儲……』不料，她沒等我講完，便眼睛斜視、唾沫四濺地尖聲說：『這些還要你講！為什麼今天會上你不發言，你得給我寫個「書面檢討！」』在以後的日子裡，諸如此類的事情接踵而來。

儘管我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主觀上還是儘力『緊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間

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江青等人攻擊陸定一和中央宣傳部時，在小組會上，我按會議定的調子，對陸定一和中宣部作了『大批判』式的發言；在八月的中央全會上，在毛澤東的大字報發下來後，儘管本人對劉、鄧並無了解，但還是寫了那篇學習《炮打司令部》的『書面發言』；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部署，和姚文元一起，在中央文教系統的小組會上，作過批評某些人的發言；在這以前的五月間，我負責的《光明日報》發表了關鋒以『何明』筆名寫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偽》，以配合同日《解放軍報》發表的高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一文，從而開始了對《北京日報》，實際上是對北京市委進行批判。除此外，由於長期的錯誤輿論導向，在我主管的《光明日報》上，曾發表過不少錯誤文章。『文革』初期，在極左思潮驅動下，我所寫的《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一文，片面武斷地否定反映人民愛國要求的『國防文學』口號，抹煞了它的積極意義，造成嚴重後果；對周揚和其他一些人『無限上綱』，亂扣帽子，這是非常錯誤的。一九七五年夏天，在我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我主動找周揚詳談了上述撰文的过程和自己的內咎心情。當時周揚表示諒解，還熱情地幫助我解決工作問題，這就使自己更加感到歉疚。

二、在工作組存廢問題上的爭鬥

『文革』最初期，黨內高層領導圍繞著工作組的存廢問題發生了爭論。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

『革』中鬥爭的第一個回合。這場爭論，實質上是一場圍繞『文革』目的和方法的爭論。當時，集中表現在對『亂』的不同看法，即，是要『天下大亂』還是要有領導、有限制、有秩序地開展運動。毛澤東是主張『亂』的。他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從武漢給江青的信中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八月二十三日，他又在工作會議上說：『主要問題是各地對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持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一九六七年夏季，他在地視察時說：『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

陰謀在『亂中奪權』的林彪更是唯恐天下不亂，他與江青一夥勾結，到處製造社會動亂。例如，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八日，林彪來到釣魚台，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公然宣稱，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為此，他還別出心裁創造了『亂子觀』，說什麼『亂子有兩重性，這是毛主席早就講過，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不要只看壞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壞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轉化。總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亂子，我們的軍隊很鞏固，我們的生產上升，一些學生、青年他們鬧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麼亂子，是不可能出大亂子的。這就是我們對亂子這個問題的看法，這就是我們的亂子觀。』

由於當時黨中央的多數人及黨的各級領導人，是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狀態下，被動地捲進這場『革命』的，所以他們對這場運動的目的、方法都沒思想準備，更無法理解和聽從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和縱容的那些狂暴、極端的言行。他們主張保持各級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主張對於已經

普遍出現的混亂局面能夠予以控制，對於正在泛濫開來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狂暴的行動能有一定的約束。鑑於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都由黨組織派出工作組加強領導，因此，派工作組被認為既是維持黨的領導和社會秩序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也符合黨的集體領導的制度。更何況，『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事先也請示了毛澤東，徵得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當初對派工作組不但沒有表示任何異議，而且陳伯達還被任命為全國第一個工作組——中央派往人民日報社臨時工作組組長。可是，事隔不久，這一舉動卻被毛澤東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指責為『鎮壓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成了有人明目張膽驅趕劉少奇下台的直接導火線。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這個事件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當他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取得『勝利』時，他曾恬不知恥地說：『我是第一個工作組組長，又第一個提出撤銷工作組！』一語恰好道破了他正是一個出爾反爾、投機取巧的政客。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中央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的同時，也決定派河北省委書記張承先去北京大學。新華社於六月三日向全國作了報道。此後，北京和全國各地區陸續派工作組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以克服有關單位正在急驟蔓延的無政府狀態和日趨嚴重的混亂局面。

進駐學校的工作組受到了大多數師生的歡迎，也遭到少數造反派的反對。由於『文革』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第一線領導與毛澤東對運動的指導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必然性。江青和陳伯達、康生一時乘機煽動，竭力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眾在如何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分成了兩派。在毛澤東得知有不歡迎、甚至趕工作組的事後，於六月九日，他在杭州突然對前

去匯報運動進展情況的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他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看來，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態度有了改變，但那時，實際上，需派的單位都已經進駐了工作組。

六月二十日前後，北京高等院校校驅趕工作組的風波達到了高潮。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一些人趁工作組集中開會的時機，在校園內設立所謂的鬥鬼台，他們四處抓人，狠批亂鬥。當日，全校有四十多名黨團幹部、教師、學生，被揪出戴上了高帽子，臉上被塗墨汁，被罰跪，踢打，甚至有的女性還受到了流氓般的污辱。工作組聞訊，立即趕到現場加以制止。當晚，工作組長張承先向全校作了廣播講話。他說：避開工作組亂批亂鬥的作法是有害於革命行動的。今天發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他號召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壞人的當，並宣佈了幾項規定，其中一項是要求以後批鬥人要經工作組批准等。事後，工作組把這一事件的發生和處理經過寫成簡報上報中央。二十日，劉少奇將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事件的簡報轉發全國，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不少地方黨委確實參照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辦法，使亂批亂鬥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可是，江青等人卻顛倒黑白，將轉發簡報這件事誣蔑成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事件。

六月二十日，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地質學院都發生了『六·二〇』事件。這天，已進駐北師大的工作組長孫友余（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對造反派頭頭譚厚蘭、高樹奎等人所貼的『彭真搞二月兵變』的大字報進行了批評，指出大字報的內容是『造謠』，是『挑撥』。康生抓住這一問題大做文章，

假借孫友余『替彭真辯護』而煽動不明真相的師生對他揪鬥、驅趕。與此同時，北京地質學院黨委常委李某和一些師生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指責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並打出了『奪回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權』的口號。在當時，由黨委常委站出來公開指責工作組，是十分罕見的現象。該校的造反派當天舉行了支持李某等的示威遊行，可是，大多數師生並不贊成。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陶魯笏和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指示工作組『要沉著頂住』。六月二十一日，何長工等地質部、中央工交政治部負責人前往地質學院向師生講話，批評少數人鬧事、圍攻工作組的現象，指出工作組是革命的。於是，地質學院擁護黨委和工作組的一派師生舉行了遊行。他們的這一舉動卻被對立的造反派稱作『六·二一反撲』。

在同一天，清華大學也發生了反對工作組的事件。這天，工程化學系二十歲的學生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寫下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其實，蒯大富在前幾天就狂叫要趕走工作組。當時，薄一波（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工交黨委第一書記和國家經委主任）在六月十九日去清華大學耐心勸導蒯大富，而蒯大富不僅不聽勸告，反而與薄一波進行辯論。二十一日，在這一天參加清華工作組的王光美明確指出：蒯大富要奪權。薄一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

對於北大的『六·一八事件』，當時在外地的毛澤東看到中央轉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後，卻認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態度

的變化，陳伯達和康生、江青等是清楚的。到此時此刻，中央文革小組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之間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加深了。

就在六月二十日：「知道毛澤東對工作組態度改變的時候，陳伯達秉承江青的旨意，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會上提出了一個書面建議，其中寫道：『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在適當的時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文化革命運動。』『在最必要的時候，可以由上級派工作組。』他主張撤出派到各學校和各單位的工作組。」

在工作組存廢去留的問題上，大多數與會者都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這次會上沒有討論陳伯達提出的建議，但鄧小平對陳提出了批評。

這天深夜，陳伯達氣急敗壞地回到釣魚台，先在自己的住房裡哭了一通，之後，牢騷滿腹地對小組成員說：『這個小組長不能幹了。今天晚上，鄧小平同志主持會議，我在會上寫了一個條子，提出取消工作組。他對我的意見根本不理，把字條往旁邊一扔，不在會上討論。我這個組長還怎麼當？我非辭職不可』。說到這裡，他將氣撒到和他同時出席會議的副組長劉志堅的身上，他以十分不滿的口吻指責劉說：『他是副組長，卻不支持我！』

以後的一連多天，陳伯達見人就大發牢騷。當時我們在釣魚台工作十分緊張，大部分人每天要工作十八個小時以上，很少休息，幾乎沒有睡眠的時間。我在那裡分管辦公室的工作，更是忙亂異常。那時，筆者和陳伯達一起住在十五樓，他住二層，我在樓下。平時只要沒有會議，陳伯達比誰都睡得早。一天午夜，因他被這事『氣』得睡不著覺，下樓來到我的臥室。他一進來，就一屁股坐在沙發上，

接著嘟嘟囔囔、牢騷連篇，他對鄧小平的批評不滿，感到委屈，他說非辭職不可，還說他想到天津去『休息、休息』，因為那裡有他的『朋友』；他又大『罵』周揚，罵周揚不該這時住在那裡（筆者按：當時周揚因病在天津治療），『害』得他不好去……諸如此類的話，他反來覆去地說了半夜。這位平常一本正經的『夫子』此刻向我講這些不著邊際的話，明顯是無聊的發泄，自然無須我『勸說』，所以只好擱下手頭的工作，洗耳恭聽。不過，當望著他那憂心忡忡、煞有介事的神色，心裡不禁閃現出一種輕蔑的感覺：這同某些人『撻挑子（躺倒不幹）』又有什麼兩樣！

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好幾天。以後平靜了一陣子，但不意味著這樁事情的完結。七月九日，因為在北京召開有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八十名代表參加、歷時十三天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閉幕，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祝賀大會成功，並與劉少奇等領導人會見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事先，周總理親自打電話來說，請陳伯達參加會見，並邀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因為新華社將要趁此機會公開報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的事。我把總理的來電及時轉告了陳伯達，他沒有表示異議。

這次宴會的場面熱烈：很晚結束。當我們驅車回到釣魚台已近午夜。這時正是報館緊張工作的時刻。想到已多日沒回報社，我就馬上又驅車去了報社。不料剛進報社大門、踏上樓梯時，就有人從樓上跑下來氣喘喘地告訴我說：釣魚台來電話，說有要緊的事情，叫你馬上回去！

回到釣魚台，午夜已過。我還真以為有什麼緊急的事要辦，便逕往陳伯達住處。誰知，他見了我卻不急不慢、瓮聲瓮氣地對我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說我不同意公開報道我是中央文革小組組

長。」

我簡直難以相信，火急火燎催我回來竟是為了這件事！陳伯達房間裡明明有直通周總理的電話機，他完全可以拿起話筒與總理通話；如果他本人不想說，既然這樣著急，隔壁住有兩位秘書，樓下還有關鋒這個「大」秘書，為什麼不就近叫他們幫忙，卻老遠地把我從報社催回來？既然他不同意公開小組長的身份，當初得知總理的電話為何不說？剛才在宴會廳見到總理又為何不言？何況這時宴會的消息應是早由新華社發出，由廣播電台廣播過了，這叫總理怎麼辦？望著房內的那部紅色電話機，聯想起他近日的那些牢騷，我意識到，他是故意給總理出難題，他想通過總理向中央施加壓力，同時大概也是想以此來檢驗我的態度。想到這裡，我就對他說：『已經這麼晚了，有關今晚會見、宴會的新聞，早都廣播過了。全世界都正盯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時再把你的意見告訴總理，他該怎麼辦？如果讓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發出「修改稿」加以「更正」，明天全世界的報紙都會把這件事作為「頭條新聞」，還會加上種種揣測和對我們的誹謗！總理太辛苦了，可能已經休息，還是別再打擾他了吧！』

陳伯達聽我這樣講，滿臉不高興。他見我不願打這個電話，沉默了好大一會兒，一臉烏雲地說：『好吧，你們都不願意打，也就算了。』——他講『你們』，我不清楚是否在我之前已叫別人打這個電話而遭到勸阻或拒絕過。

事後，據陳伯達的秘書說，那夜，在我剛走開以後，陳伯達就給總理打了電話。總理自然不會同意他的意見。在第二天見報的這次會見和宴會新聞中，都提到了陳伯達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身份出席的。同時報道了周恩來在宴會講話中所說的一段話：『我和康

生、陳伯達、陶鑄三同志一起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向亞非作家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同時，還代表全中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向亞非作家們，致以革命的戰鬥的敬禮。」

為達到自己的意見被採納的目的，陳伯達先以『撻挑子』相威脅，但沒有奏效。雖然他在中央的會議上遭到強烈反對，但他不認輸，因為他已摸清了毛澤東的『底』。一計不成，再施一計。在七月十三、十九、二十二日的中央會議上，他又連續三次對派工作組提出非議，要求全部撤銷。由於當時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組，陳伯達的意見再次被否決。

會上，劉少奇表示，他仍持原來『不撤』的觀點，他建議再看一看。同時，他說：『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

早在這年的五、六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後，他仍滯留南方了解情況、閱讀資料、分析形勢。其間，他先去了長沙、韶山，後來又去了武漢。在此期間，他密切注視著『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遙控指揮，構思對這場運動全局的設想。直到七月十六日，他在武漢暢游長江、十八日回京的消息在報紙上公佈後，全國人民才知道他的『秘密』行蹤。毛澤東於七月八日在武漢寫給江青的那封信，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其中談到他對整個『文革』的戰略設想。可以這樣說，這封信是研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盤思路的重要文件。

毛澤東回到北京當天，就讓中央文革小組給他送去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四校『文革』運動的簡報，同時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第二天，他在聽取了劉少奇的匯報後，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他對前一階段的運動表示不滿，認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接著他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北京是一片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批評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會於六月三日制定的『八條規定』，說：『「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

從七月二十二日起，毛澤東四次派陳伯達、康生、江青前往北京大學『調查』。這班人，來到北大校園，召集萬人大會，表態支持造反派，反對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

有人說，毛澤東回京後偏聽偏信江青的匯報，才決定撤銷工作組（有的書上寫道：毛澤東『回京的當天即聽取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問題的匯報』），這個說法不確實。因為，江青直到七月二十日才從上海抵北京的，比毛澤東還晚兩天回到北京。

其實，如前所述，早在六月初旬，毛澤東就已改變了對派工作組的態度。在促成毛澤東迅速決定撤銷工作組的問題上，中央文革小組方面，陳伯達起了比較大的作用。當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有恃無恐地為此而『孤軍奮戰』的時候，所指望的就是等毛澤東回京救援。

毛澤東回京不久，便住進了釣魚台的第十二號樓。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成員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會，於二十四日下午召開，各中央局書記也參加了會議。會

議討論準備提交中共八屆第十一次中央全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草稿。這天是毛澤東第一次與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見面。當時，他穿著一身陳舊的白色睡衣，坐在樓下大廳等候大家。與會者中初次見毛澤東的人，未免怯場，大多繞到他背後去就座。凡屬初次見面或不很熟悉的，毛澤東都回頭望著問詢姓名。看來這天他比較高興，會場裡氣氛也比較熱烈。他在談話中給中央文革小組鼓勁，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等人到齊，毛澤東一口氣說了下面的這些話：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所有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變派工作組的做法，由學校革命師生及中間狀態的一些人組織學校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壞事。學校文化大革命無非是鬥和改，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我們能鬥能改嗎？如翦伯贊寫了那麼多書，你還沒有讀，怎麼鬥怎麼改？學校的事『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你也不行，我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鬥要改都要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工作組能否改成為聯絡員，改成顧問權力太大了，或者叫觀察員。現在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工作組阻礙革命，也有不阻礙革命的。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麼怕人到中央，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也可以派人。那樣怕能行嗎？所以西安、南京報館被圍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麼怕？你們這些人呀，你們不革

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的地方不准圍報館，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國務院，為什麼這麼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又是無名小將，說不清。為什麼這樣？你們不出面我就出面。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麼多反革命？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那怎麼行？都不下去，天天忙於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比較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來（康生插話：南京搞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辯論新華日報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辯論江蘇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辯論的結果江蘇省委還是革命的，第三次辯論匡亞明是否戴高帽子遊街）。在學校革命的是多數，不革命的是少數。匡亞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遊街，辯論的結果自然就清楚了。

毛澤東接著又說：全會開會期間，到會的同志要去北大、廣播學院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裡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傾的話。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去了會被學生包圍，要他們包圍，你和他們幾個人談話就會被包圍起來。廣播學院被打一百多人，我們這個時代就有這個好處，左派挨右派打，鍛鍊左派。派工作組六個月不行，一年也不行，還是那裡人行。一是鬥，二是改，鬥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過來不行，要首先刪繁就簡，錯誤的、重複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任重插話：砍掉三分之二，學習主席語錄）。政治教材、中央指示、報紙社論是群眾的指南，不能當作教條。打人的問題，通知上沒寫也不行，這是方向，是指南，趕快把方針定下來，改過來，要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和左派，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就是右派參加也不要緊，

有幾個可以當反面教員，右派也不要集中起來。北京市委不要那麼多人，多了他們就要『革命』，打電話，出報表，發號施令。現在部長很多人都有秘書，統統砍掉，我在前委的時候有個秘書叫項北，以後撤退的時候就沒有秘書了。有個人收發文件就夠了（康生插話：主席談了四件事，一是改組北京市委，照辦了。二是改組中宣部，也照辦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也照辦了。四是有一些部改為科，沒有辦）。是啊，部長管事的可以不改，稱部長、司長、局長、科長，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話：北大進行四次大辯論『六·一八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有流氓。有的說不是，工作組有錯誤。北大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銷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職務），有的工作組阻礙運動，包括張承先在內。

毛澤東還說：有些人設想，一不上課，二管飯吃，三要鬧事，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撤出來後，有些要復辟，復辟也不要緊。我們有的部長就那樣可靠嗎？有些部、報館是誰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後還傾向保現成的，有的工作組就是阻礙運動，如清華、北大。不要隨便捕人，什麼叫現行反革命？文件要寫上。行兇殺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寫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的不能抓。有人寫『擁護黨中央、打倒毛澤東』，你抓他幹什麼？他還擁護黨中央嘛！歷史反革命留下來，樹立個對立面，表現不好再鬥嘛！不要捕人，叫他們放嘛！貼幾張大字報，貼條反動標語怕什麼？

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又一次在釣魚台十二樓召集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開會。他指出，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路線錯誤，並下令撤銷工作組。他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

有了毛澤東的號令，文革小組的人馬立即四出煽風點火。

就在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江青和陳伯達、康生第三次到北京大學（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都去了），在東操場召開萬人辯論大會，揪鬥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他們站在反對工作組的立場上，把對北大工作組的態度問題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康生在講話中說：『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別聽那一套，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他這種混淆視聽、造謠惑眾的手段確實曾使『革命師生豁然開朗』，『明白』了『原來那些聲稱「黨中央派來一、毛主席派來一」的工作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搗鬼！』七月二十六日，江青和陳伯達、康生在北京大學萬人大會上又提出：撤銷工作組，罷張承先的官。陳伯達說：『在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問題上，爭論這麼激烈不是偶然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們贊成許多同志的意見，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我們第一個建議是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第二個建議是在你們這裡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

七月二十七日，江青和陳伯達、康生帶領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又到北京師範大學煽風點火。雖然這裡的工作組組長孫友余因抵制他們的造謠誣蔑，已被撤職，但他們對孫的餘恨未消。江青誣蔑工作組的『鬥爭的矛頭不是對準黑幫分子，對準地、富、反、壞、右，而是對著革命的師生』，指責孫友余『在同學中造成分裂』，『工作組是石頭，阻擋你們前進的道路』，『你們同學要求撤銷工作組，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康生更是火上澆油、惡言惡語地

說：『孫友余這個組長沒有把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駐上一個營的部隊，這是千真萬確的……彭真大黑幫要去北大、人大準備政變，要奪取政權，孫友余卻說是造謠！你們看孫友余是什麼立場！同學們，你們想一想，這樣替彭真黑幫辯護，應該不應該罷他的官呢……』

七月二十七日，根據毛澤東在二十五日下令撤銷工作組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親自作了修改。二十八日，即以中共北京市委名義公佈這個《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決定》說：『在工作組撤銷之後，大專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當時在造反派中流行『踢開黨委鬧革命』、『踢開工作組鬧革命』的口號，這個『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決定》事實上完全肯定了這些口號。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在大會上宣讀了北京市委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都在大會上講了話。鄧小平說：『必須說明，在黨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現在市委根據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撤銷工作組。』『有同志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周恩來講話時也說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最後講話的是劉少奇。

『文革』期間，毛澤東經常住在人民大會堂西南角的一一八室，即主席台後面的右側。這天會議中間，我偶然地走到主席台後面，看見毛澤東正坐在一一八室門外椅子上諦聽前台的講話。我見他跟我打招呼，就問他怎麼不到前台？因為我想，人們都殷切盼望見到他。他微笑著搖搖頭。當我回到前台時，一些曾在後台見過毛澤東的人都在猜測他是否會出來？這時劉少奇正在講話。他說：『我也是在黨中央工作的人員之一。黨中央（包括我在內）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學校革命的同學、革命的老師、革命的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我現在要講一句老實話，包括我在內，我們現在只能向你們學習，只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幫助你們，我們不了解情況。』他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用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需要，中央決定撤退工作組。』其後，他還講到：『在運動中間要保護少數，保護那些意見不同、而佔少數的人……不只是錯誤的意見是少數，有的時候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自己有這個親身經驗，有些意見我提得並不錯，講得並不錯，結果是少數。毛主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有過這種情形……』

想必劉少奇講的有些話使毛澤東感到了不快。在劉少奇講話的結束話音未消，還未來得及拿起桌上的講稿走開的時候，毛澤東突然疾步從後台走出來。疾步行走帶出來的風，把劉少奇的講稿扇到地毯上。劉少奇正彎腰去撿拾，毛澤東已到舞台的前沿向眾人招手（他沒有講話），全場響起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這種情景，給人們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會後，北京及中國其他地區都迅速撤銷了工作組。工作組雖都撤銷了，但工作組的問題並沒有完，曾在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卻長時間地為此受批判。

八月一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向全會所作的關於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的報告中，對派工作組的事承擔了責任。他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要由我負。』但在他作報告時，毛澤東多次打斷他的講話，嚴厲地批評派工作組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陳伯達趁機搖唇鼓舌。其間，毛澤東又插話說：『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壞作用。一般說，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時再次嚴厲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路線錯誤』、『是一種白色恐怖，這種白色恐怖是中央發動的』。他還在插話中聲色俱厲地指斥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還嘲諷地指責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八月七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於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使與會者大都感到駭然。該大字報還附有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為：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有的書上說：『這張大字報是毛澤東八月五日寫的，寫在六月二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書「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作了謄清。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了標題，並把「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改為「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在「左」字的前後加上引號。在鉛印件上，毛澤東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寫得好啊」改為「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裡，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改為「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加「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加「壓制不同意見，」。』實際情況正是這樣。

在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中，提出中央另外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心中有數，是指劉少奇等中央第一線負責人。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鬥爭對象不斷升級，現在終於直接點明了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鋒芒所向。這張大字報標誌著毛澤東對黨中央狀況估計錯誤，標誌著階級鬥爭『左』傾理論、個人專斷作風急驟發展，標誌著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的決裂。

這張大字報發表後，江青和康生等一夥即乘機攻擊劉少奇，而謝富治向鄧小平發難。因為出席全會的多數人對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一時搞不通，因此沒有表態。實際上，不少人對它有看法，鑑於當

時緊張的氣氛不敢輕易發表意見。

陳伯達從來不肯放棄任何一次可以向毛澤東表忠心的大好機會。當他看到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後，除在會議中斥責劉少奇外，還極其迅速地寫出了一張嘩眾取寵的《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在這篇大字報中，他竭盡溜鬚拍馬之能事，吹捧說，是『毛主席把黨的領導從最近一兩個月的錯誤路線引回到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上來，這是黨的偉大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我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同時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我們這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不能使我們新中國在世界上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模範國家。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掃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在我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讓毛澤東思想能夠為最廣泛的群眾所掌握，因而變成更宏偉的力量……』

因為林彪已得到通知從大連回到了北京，所以在八月七日也看到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毫不含糊，即刻表態，對工作組一事大肆鞭撻。他說：

『派工作組本身是方向路線性錯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這些人是政治扒手，這些工作組當權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他們與所在單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勾勾搭搭，採取聯合行動，製造種種事件。對這些必須進行堅決鬥爭，對其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要徹底批判。有些雖然撤了工作組，但其錯誤並未加以徹底批判，甚至由於某些人的陰謀，根本未加批判。』『是不是黑幫分子，要聽聽那些受害者的控訴，要看本單位群眾的罵聲，由那裡群眾決定。派工作組及工作組所執行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必須批判，一切流毒必須徹底肅清。』

應該說，到此為止，陳伯達已經在這場搏鬥中獲得了『勝利』，他應見好就收。可是，他卻得意忘形，在全會上異常驕橫地說：『我們這些人是旁觀者，旁觀者清。感到工作組進去，不必要的地方太多了。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背後工作組起作用，它在那裡坐山觀虎鬥……這實際上不是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在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陳伯達的話咄咄逼人，公然指責劉少奇：『我們很多同志當了官，做什麼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毛澤東插話：神聖不可侵犯，做官當老爺慣了）。這個問題的確存在，我碰到過很多場合。他說的就算，旁人說的不算。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是要發生修正主義的。』在這次全會的一次小組會上，江青也喋喋不休、怒氣衝衝地指責劉少奇等中央的一些領導不把中央文革小組放在眼裡。



1967年6月9日，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毛澤東《文藝講話》討論會閉幕式。穆欣最後一次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身份在主席台就座，不久即遭江青一夥迫害，投入監牢（前排左起：江青、森納那亞克、周恩來、康生、蕭華、葉群、汪東興、穆欣、西園寺公一）（本圖係局部，主席台的左側半邊）

這場批判工作組的『大合唱』暫時結束了，但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推行者、執行者劉少奇，開始遭受長時間的批判。陳伯達和江青、康生一夥對劉少奇的迫害也更加激烈，直到將劉少奇徹底整死。

但是，歷史終於無情地否定了陳伯達。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在中共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中特別指出：

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指導運動，是我黨多年來解決基層問題的一種做法，不存在一條由劉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歷史終於主持正義，為當年工作組的問題作了公正的結論。

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雖經一九六六年五月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月間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兩次發動——兩次會議都是在十分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進行的。針對會議期間所反映的思想情況，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時說：

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廣大的

學生和革命的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的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個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是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實行，還要靠我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群眾路線，還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依靠，一種是不依靠；一種是實行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的公開的決定，並且這次有組織上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定以及公報的實行。全會於八月八日通過了《十六條》等決定標誌著在黨內完成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程序。但從中央到各級黨委，許多負責人仍持保留態度。對此，毛澤東十分不滿。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兩個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說：『上次會議，我說，會議的決定，有些人不一定執行。果然好多同志還不理解。』『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而林彪補充說：『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剛才說了中間有一些頂牛，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說的，「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一直到這次會議以前，我看還是這樣的情況……』

毛澤東的這種不滿情緒，即使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在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所作的講話中也不難看出。他曾經回顧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經過。大意是：

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不鬥爭，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我們就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看出一些問題。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間，為什麼說我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呢？說的不是客氣話，說的是真話。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鬥了高（崗）、饒（漱石），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你們也是知道的，但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也進行了一些準備。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吳晗發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罷官》），在北京寫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她們搞的，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文章寫好後交給我。她（江青）說：只許我看，不能給周恩來、康生看，不然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也要看。劉、鄧、彭（真）、陸（定一）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後，全國轉載了，北京不轉載。那時我在上海，我說把文章印成小冊子，各省翻印發行，就是北京不翻印發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還不行，還得改組。當發表改組市委時，我們增加了衛戍師……現在紅衛兵幫助我們，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裡拿著棍子、刀到處亂搞、打人、殺人，殺死了人，殺傷了人。這些人多數是高幹子弟。所以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決了羅（瑞卿），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廣播了，八月，紅衛兵出現，發動了群眾。去年聶元梓寫的一張大字報，當時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這張大字報，打

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廣播這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就滿天飛了。清華、北大附中寫了兩個材料，我看了，『八·一』（建軍節）我寫信給這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紅衛兵大搞起來。接著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我寫了一張二百多字的大字報。當時從中央到地方，一些負責人反對學生運動，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搞白色恐怖，這樣才揭發了劉、鄧的問題……

毛澤東還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毫無辦法。《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我去年就聲明《人民日報》我不看，講了好幾次就是不聽。看來我這一套在中國不靈了……』

為了能夠真正貫徹全會的決定，毛澤東直接同廣大群眾見面，親自進行聲勢浩大的發動，促進紅衛兵的勃興，推動『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廣泛深入的發展。

這在林彪於八月八日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所講的話中可以得到反映。林彪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運動開始蓬蓬勃勃，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佔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這段話充分表明了，當時毛澤東為扭轉劉少奇所造成的局面，決定通過《十六條》，這是經過相當艱巨的努力的。

八月十日晚七點十五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了前來慶賀全會勝利閉幕的群眾。他向大家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新華社在報道當時的盛況寫道：『毛主席在群眾熱烈歡呼聲中，走上接待站的講台。我們偉大的領袖滿面笑容，一面看著擺在接待站周圍的賀信、喜報和決心書，一面向匯聚在接待站周圍的人們親切招手致意……多少

顆火熱的心在激烈跳動，多少雙眼睛閃著感動的淚花，多少雙手一齊向毛主席伸了過來……毛主席向周圍歡呼的群眾問好。他說：「同志們好！同志們好！」毛主席離開後，前來賀喜和送交決心書的人們，還是激動得不願走。許多站在後面的人擁到前面，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緊握……」

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報紙上報道了當時的盛況：這天清晨五點鐘，天剛破曉，毛澤東身著人民解放軍軍服，精神煥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來到百萬群眾中間，從北京大學的師生開始，他親切地和廣大師生見面，然後才登上天安門。這天，一千五百名被推選出來的各地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大會並和毛澤東一起檢閱游行隊伍。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在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四十名師生代表，和他們一一握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臂章。毛澤東欣然默認了『紅司令』這一紅衛兵總司令的稱號。毛澤東在上午整整六個多小時中，始終和百萬革命群眾在一起。他一直精神煥發地站在那裡，不停地向群眾揮手致意，只是偶而到大廳裡略作休息。每當他從大廳出來在城樓上出現，天安門廣場海洋一樣的人群裡面，立刻響起暴風雨般的熱烈掌聲。望著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毛澤東高興地向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上午十一時許，游行隊伍全部離開了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又在天安門城樓上分批會見了全體紅衛兵代表，並與他們合影留念。紅衛兵則把各式各樣的袖章獻給他。天安門城樓上的活動使觀禮台上的數萬名紅衛兵等得急不可待。他們面向城樓，傾斜著身子，不斷揮動著手中的語錄本，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當毛澤東

帶頭在天安門城樓上由東向西，又由西向東，不停地揮動著手中的軍帽，向觀禮台上的群眾致意時，觀禮台上沸騰了。連綿不斷地『毛主席萬歲！』的呼叫聲淹沒一切，響徹雲霄。

從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大中學校師生，總計共達一千一百多萬人次，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的大串連走向高潮。與此同時，學校師生在對待工作組、校領導等問題上的分歧日益突出，學生因此而分裂成對立的派別，派別鬥爭不斷升級。這種派性鬥爭與當時尚能維持工作的各級領導抑制動亂的努力，形成錯綜複雜的局面。而抑制動亂的努力，被指斥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到聲勢猛烈的批判。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中公開提出的。《紅旗》雜誌在以《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為題的社論中先說道『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接著說：『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十六條》，才能在正確路線指導下進行社會上的、學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門的鬥、批、改，才能明確鬥什麼，批什麼，改什麼，才能明確依靠誰來鬥，誰來批，誰來改，才能勝利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門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中主義。』

在這篇社論中提出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口號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概念推出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已不能正常工作，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但江青即刻把攻擊的矛頭又轉向周恩來。因為毛澤東經常閱讀各種小報，江青也不斷送材料給他，使他形成了一個概念：劉少奇的『錯誤路線』還沒有批倒，當時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他在九月間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是從八月三日九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

這時，江青就開始把打擊矛頭指向周恩來。九月底，中央文革小組派出張春橋、王任重、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社召開大專院校紅衛兵座談會，參加者有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等北京高校紅衛兵的代表人物。在由張春橋主持的這次會議上，這些紅衛兵頭頭的發言在一致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認為他在『和稀泥』搞『折中主義』等。張春橋回到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匯報時，就沒有讓周恩來參加。江青聽了匯報說：總理就是和稀泥、折中主義。他們決定，一方面把記錄送給毛澤東，另一方面寫一篇《紅旗》雜誌的國慶社論（江青主張在社論中一定要寫上批判『和稀泥』、『折中主義』的話，但定稿時，口氣已經改得比較緩和）。

國慶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並交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參加審定和討論，最後由陳伯達拍板定稿。社論初稿並沒有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是寫了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

路線』。國慶節的林彪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起草的，初稿提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毛澤東原已同意定稿，但陶鑄覺得『反革命』的提法太重，經他和王任重、王力向毛澤東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經毛澤東同意後，當天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就是這樣講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進行。』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大廳裡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時，張春橋又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要改回來。毛澤東說：可以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旗》雜誌社論第十三期的出版因此延誤，這篇社論直至十月三日晚上才通過電台與人民見面。

這篇社論事先沒有給周恩來看，有關人員討論、推敲這個口號的提法時他也沒有在場。當他看了這篇社論後，周恩來曾明確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據王力講，周恩來曾對他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我要去問主席。』他找了毛澤東，事後又對王力說：『我去問過了主席，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 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王力說：『總理以後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的主張駁掉是不可能的。』（《「文革」第一年》）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由於江青找茬兒，停止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一個來月，臨近國慶的

時候才給予恢復工作。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江青對我的態度似乎要比往常溫和一些。十月一日，我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被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晚上，看焰火的時候，我和其他幾個人還到天安門城樓大廳裡參與了同毛澤東的談話。時間大約九點來鐘，林彪、陳伯達、康生等都已離去。我們一行數人進入大廳，走到廳的後部。這裡用屏風隔成一個寬敞的長方形的廳堂，環繞北面及其兩側，整齊地擺著長列沙發，這是每逢節日集會毛澤東在會間休息和會見賓客的地方。當我們走進來的時候，毛澤東正坐在大廳東北角的單人沙發上抽煙。一同進來的張春橋、王力、關鋒坐到他左側靠東的長沙發上，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和我在他右側靠北的沙發上落座。

這天毛澤東興致很高，對在座的每個人都問詢了一些話，還問了我和《光明日報》的情況。他勉勵我要常回報社看看，要把報紙辦好。在談論運動的發展情況時，在座的大都認為，實際上中央和地方上許多領導人還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澤東也就運動發展的形勢講了不少的話。他認為運動的阻力不小，應當徹底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看來他對這種狀況不很滿意，有點著急。但他表示要不顧一切，硬搞下去。甚至說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這樣的話。我聽了感到吃驚。不過，類似這樣的話，他在這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裡就曾說過：『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此刻又這樣講，進一步表明了他誓把『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

談話中間，周恩來走進來，《人民日報》攝影記者呂相友和另一位攝影記者也跟了進來。江青立刻站起來說：『請總理跟我們一塊照個相吧！』毛澤東的談話就此停下來，和大家一起走到前廳，朝

外排成一行。那時正是姚文元風頭十足、紅得發紫的時候，江青已把對於他的稱呼由『金棍子』改為我們的『重炮手』，特意把姚文元拉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中間站著。照完相，周恩來先陪毛澤東離開天安門城樓，我們回到釣魚台時已是深夜。

國慶節過後不久，十月八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旨的工作會議，繼續克服來自各級領導的阻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被分別編進各個小組。這次會議原定開三天，後來一延再延，結果開了一十天，直到十月二十八日閉幕。陳伯達於十月十六日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大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嚴厲斥責這是反對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對紅衛兵的破壞行動不僅不批評，反而竭力吹捧，將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擔心和防範誣蔑為『怕群眾』、『怕革命』，甚至是『鎮壓群眾』和『反對革命』。林彪則在會上大肆鼓吹『革命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公然否定黨對運動的領導。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被迫在全體會議上作了自我檢討。鄧小平在發言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和我兩人的司令部。』

有關劉少奇、鄧小平於十月二十三日的檢討，事先都曾送給毛澤東審閱，並得到了他的首肯。毛澤東在劉少奇檢討的初稿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他還建議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徵求意見。對鄧小平的檢討稿，他除表示同意外，還建議再加一些積極振奮的話。他在鄧小平的檢討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一行「補過

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澤東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時。」十月二十四日晚，毛澤東在聽取匯報後講話。他說（大意）：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犯錯誤，允許人家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劉、鄧錯誤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個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經驗。一張大字報（筆者按：指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誰也沒料到，連我自己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同紅衛兵講清楚。工廠、農村還是分期分批。你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這次會議是我建議開的。時間這樣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搞好，誰會打倒你們？

在毛澤東講話的時候，康生曾插話說「八大政治報告是階級鬥爭熄滅論」時，毛澤東說，報告我們看了，這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全體會上的講話中，又說到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分二路，我同恩來、任弼時在陝北，劉少奇、朱德在華北，還比較集中。進城後就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分一線、二線，就更分散了。現在看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

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他接著說：『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裡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又說：『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了。』『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同時，他對運動中被指責犯了『錯誤』的各級領導幹部，表示了理解和寬容，希望他們認真檢討，早日過關。他說：『文化革命運動時間還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現在十月，五個月不到，所以，同志們不那麼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學生）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還說：『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雖然再次指責劉、鄧的中央一線，但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時間倉促，

來勢很猛，他自己也未曾料到。他明確地說，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鄧小平。他認為劉、鄧和許多幹部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通過對他們的批判及調整中央領導結構，『文革』的目的已初步達到。所以在講話中說：『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劉、鄧作了使他比較滿意的檢討，他覺得很好。因此，對於劉、鄧及其他一些人的『錯誤』，採取了寬容理解的態度。當場明確表示：『我是不需要打倒你們，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談到對於運動的設想，他似乎有了要較快了結的意思。但又表示『文化大革命』還要再搞下去：『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毛澤東上面的這些講話表現出了他既準備適時結束這場運動，而又對這場運動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心中無數的複雜心態。

可是，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檢討的評價以及他要適時結束這場運動的設想，首先遭到了江青的反對。她反問：『哪裡很好？』『很不好』。並說：『徵求了林總的意見，他也反對。』陳伯達在講話中叫囂：『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反覆』。林彪在這天的講話中，反覆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是劉、鄧發起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他還極力煽動群眾：『我們不搞、不進攻他們，是不行的。我們不給他們打擊，他們就要給我們打擊。』這樣，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目標，就被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了。

陳伯達和林彪的這兩個講話大量印發全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樣一來，運動就無法了結，

不能收場。結果，這場動亂持續的時間不是五個月，也不是五年，而是持續了整整十年。

這次會議結束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便在中國掀起。此後，種種越軌的不法行為都可以不受約束，對那些不法行為的任何干預，都會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社會迅速陷於動亂之中。十月初，中央轉發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從此『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廣泛流行，無政府主義的狂潮如破堤洪水，四處泛濫。各地黨政領導機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除野戰部隊外，都先後停止了活動，廣大黨員的組織生活也逐漸停止。

四、圍繞工交座談會的論爭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後，北京發起的紅衛兵運動迅速將『文革』推向社會的各方面，開始嚴重影響國家的工農業生產。

這年十一至十二月間，在國務院召開工交座談會前後，針對工礦企業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圍繞『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問題，黨內上層爆發了一場相當激烈的爭論。這是中央和地方一些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為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危及工交企業而進行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抗爭。

『文革』開始後，作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就始終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抓住兩件事：一是設法將

『革命』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二是全力保護生產少受干擾和損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反映周恩來、陶鑄等領導思想的社論《抓革命，促生產》，並在各工礦企業、機關廣泛張貼和討論。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當時周恩來最關注的問題是整個工農業生產的正常秩序怎樣才能不被這場『革命』所打亂。

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即《工業六條》）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即《農村五條》）兩個文件，經毛澤東批准於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文件要求『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業務指揮機構』，停止串連，堅守崗位（並且規定學生不要進入工礦企業），保證本單位革命和生產的正常進行。以後又經毛澤東批准，周恩來和協助他管理工交戰線的陶鑄、李富春等對工交企業的運動一直堅持兩條：一是不能停產鬧革命，工礦、農村不許大串連；二是工廠不搞跨行業組織。

十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召開的，以排除來自各級領導幹部對於『文化大革命』種種『阻力』為目的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仍繼續抓住生產問題不放鬆。十一月九日，他又親自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在重申生產建設不能停滯、中斷的同時，還據理駁斥了那種只講『抓革命』而根本不講抓生產業務的錯誤論點。次日，根據周恩來意見定稿的這篇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公開宣佈：『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裡面，在一切科學研究和設計部門裡面，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

因為，『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工業生產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只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這是常識範圍的事情，誰都會懂得的。』

這些《通知》、《規定》和社論，對於日趨混亂的局勢起到了某種抑制作用，有利於維持經濟建設的正常發展。然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卻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製造了工交戰線上的動亂。十一月十日凌晨，以上海棉紡廠保衛幹事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製造了『安亭事件』。他們在安亭車站臥軌攔截了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快列車，致使滬寧線中斷三十一小時三十四分。十一月十三日，派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背著周恩來、陶鑄和華東局、上海市委，私自簽字承認與《十六條》及中央工作會議的一系列規定完全背道而馳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五條要求，在工交戰線開了可以成立跨行業造反組織和衝擊生產的先例。張春橋當天還在上海工人座談會上別出心裁地說：『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十六日，王力、戚本禹對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發表了煽動性的講話。戚本禹幸災樂禍地說：『上海市工人要成立團體，不讓他們成立……轟起來了，鬧起來了，解決了。』『工廠搞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勢所趨，這是不能阻擋，任何人也不能阻擋……』王力竟然煽動大家批判由周恩來親自定稿的《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就在這前後，陳伯達主持在中央文革小組草擬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即《十二條》），認為『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寫有『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

學生到工廠串連』等條款。《十二條》實質上就是要取消和對抗周恩來對工交戰線進行『文化大革命』所制訂的種種規定和限制。

這個時候，工交戰線如何進行『文革』的問題已經成為國務院和地方工交系統的一些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鬥爭的焦點。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和協助他抓生產的陶鑄、李富春領導下，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初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原定開五天，後延長至二十多天）。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的五個部和七個市及各大區有關負責人。會議的討論是圍繞著中央文革小組那個《十二條》展開的。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周恩來到會上與大家見面並作了長篇講話。他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工作會議後的幾個月時間證明，領導幹部中絕大多數都沒有『想通』，『想通』是極個別的，這種情緒一直影響到這次座談會。他將當時的形勢概括為『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四句話（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曾用這四句話表達對運動的看法），要大家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善於因勢利導。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他這一段震撼人心的話語給與會者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還指示：組織國務院業務組管理經濟工作，抓工交企業的生產品，工交戰線搞『文革』必須充分考慮自身特點，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

在討論中，與會者對『文革』危及工交企業憂心忡忡，對工交企業同學校、機關要一樣地開展『文革』表示了異議。他們一致提出：第一，對工交系統要有正確估計。他們認為，『工業戰線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形勢還是大好的，對於這一點，在《十二條》裡要有明確估價。』工交企業搞『文化大革命』要與其他行業區別對待。第二，工廠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鋪開，只能分批分

期進行。在工廠裡搞大民主，將會對生產造成難以預料的損失。第三，一定要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大家一致認為，建國十七年以來，工交系統的各級黨委還是好的。《十二條》不提黨委對『文革』的領導，很難理解。第四，工廠中不要建立群眾組織，建立群眾組織會出現兩派對立的現象，其結果不是打架就是停產。對於建立全市性工人聯合造反組織不要鬆口。第五，不能准許學生到工廠串連，學生進工廠串連會搞亂工廠。第六，一定要搞好生產，對於『鬧革命』不能放手。

會議期間，在陶鑄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體組織有關部門草擬了一個與《十二條》針鋒相對的文件：《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即《十五條》）。其基本內容是：『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分批分期，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連，堅持八小時生產。』

周恩來在事後談到這次會議的情況時，他說：會議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十二條》，『基本上是全盤否定』，『批判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他回憶了當他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會時的情況：『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哄堂而起，說到最後都站起來』，『圍著我，說明大家抵觸情緒不小。』周恩來評價說：『他們這種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觀上的思想動態』。當林彪問他，會上『有幾個通的』？周恩來回答說：『我所接觸的那些部長，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很不理解。』（事實正是這樣，其後余秋里、谷牧等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說：『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們並不如主席那麼站得高，看得遠嘛！』『一時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確。』）

在陳伯達的心目中，《十二條》是不容侵犯的聖旨。所以當他看到余秋里、谷牧組織草擬的《十

五條》時，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打電話叫谷牧到他那裡去。一見面，陳就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衝衝地強迫谷牧當面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一段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歷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谷牧讀完，陳伯達就對修改了《十二條》的這件事大發雷霆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雖經谷牧再三解釋：《十五條》『不過就是結合工交系統實際，加上那麼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陳伯達仍不依不饒地說了許多蠻橫無理的話。谷牧的這次辯解為此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圍攻他栽下了禍根。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來、陶鑄、谷牧等向毛澤東匯報了工交座談會的情況。毛澤東作了指示（大意）：《十五條》不行，可以另寫，然後再拿到底下去。工交企業的『文革』可以分批分期搞，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但是要支持工人群眾聯合組織。在此以後，會議討論了由陳伯達修改《十二條》後而形成的《工業十條》。

十二月四——六日，由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的匯報，討論通過《工業十條》。

谷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先將工交座談會的意見歸納成《匯報提綱》並在會前印發。他的匯報，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系統地提出了為保證工交企業正常運行的一系列意見和建議。在匯報中，他提到

首先要消除領導幹部對企業搞『文革』的抵觸情緒，指出工交系統的『文革』要充分看到三個特點：一是工交系統基本上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二是工交系統的幹部和職工隊伍基本上是好隊伍；三是工業生產的連續性決定了生產不能中斷。針對《工業十條》，他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從全國來看，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第二，對工礦企業規章制度的破與立，要接受歷史教訓，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第三，群眾起來鬧革命，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想把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臨時工、合同工想改為正式工，前幾年精減下去的人員要求回廠，這涉及到體制，請中央統一考慮。谷牧建議，要認真宣傳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辦事，鼓勵幹部堅持原則，決不能讓工廠裡的黨的組織工作中斷。谷牧請求中央批准，進一步落實各級領導機構中負責抓生產的班子，把各個主管部門從上到下的生產關係儘快地建立起來。

谷牧的講話剛完，陳伯達就氣勢洶洶地站起來指責谷牧事先沒有同他商量，是對他搞『突然襲擊』。這時，周恩來馬上嚴肅地對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徵求意見。』陳伯達這才閉住嘴巴。

儘管這樣，谷牧的匯報和根據工交座談會形成的《十五條》還是在會上遭到了三天的猛烈批判。如同林彪在會上所說的：『這場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批判幹部的運動。』首先跳出來發言的是江青。她不顧事實地說：工交系統的問題，比文教系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她還瞪著眼、

板著臉指責工交系統的領導人『毫無階級感情，給工人戴上幾百斤重的石頭，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義那一套玩藝兒』。隨之，張春橋指著谷牧訓斥道：『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王力、陳伯達的發言更是露骨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王力說：關於工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們文革小組沒有抓緊，過去運動開展的情況是兩起兩落，現在第三次起來，又在那裡拚命地要把它壓下去，就是這樣一個局勢。九月上旬，用『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來壓，我們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張壓；後來又產生《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為的就是講生產，罵得很厲害，批得很兇。這是陶鑄同志支持的，這個精神就是堵，就是壓！所有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支持工人搞革命！工交座談會的這個《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過去對學校提出許多限制，現在又拿這一套來對付工人。還有什麼《工業六條》、《農村五條》，還適用不適用？如果這些都適用，就走到壓制群眾運動、壓制革命的道路上去！

會上，康生則擺出了『理論權威』自命不凡的架勢，把《十五條》提到理論高度進行批判。他首先提出工交系統要批『唯生產力論』，宣稱：『工交系統多年來搞了許多修正主義的東西。』他指責『國務院主管生產的同志，多年來只抓生產，不抓革命，已經成了職業病。不問政治，不看路線，單純抓生產，這本身就是修正主義的東西』（從此，批判『唯生產力論』的烈火在中國各地熊熊燃起）。康生還把列寧的《論俄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一文歪曲為批『唯生產力論』的經典，提出：『把劉少奇鼓吹中國經濟落後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叫做『生產力論』吧，這樣可以把他同老修正主義掛起鉤來。』這就把批『唯生產力論』變成了打倒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政治口號。此後，

康生與林彪、江青一夥拿著批判唯生產力論這根大棍，到處整人，破壞生產，把國民經濟推向到崩潰的邊緣。

在十二月六日的會議上，陶鑄也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突然襲擊。他的被攻擊完全是事出有因的。首先，自從陶鑄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後，他得罪了狂妄不可一世的『第一夫人』江青。一次，因為江青讓陶鑄去中國科學院社哲學會科學部表態，支持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造反派，遭到了陶鑄的當場拒絕而老羞成怒，無理糾纏，惹得性格耿直的陶鑄拍了桌子。這使這位從未遇到過有人敢與她對立的『女皇』，氣得當眾眼淚鼻涕地出了醜。那時，由於陶鑄事多繁忙，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往往不能終場。從此，江青懷恨在心，處處找他的茬。對此，江青不但在會上當面對他挑釁，還在他離去以後指責誹謗。至於陳伯達對陶鑄，同樣是恨之入骨。在『文革』開始後，他認為陶鑄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唱對台戲，如在工作組問題上，在『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上。尤其在處理『安亭事件』的過程中，陶鑄態度鮮明地支持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堅決反對張春橋擅自簽字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的五條要求。當然，還有些是端不到桌面上的內心忌妒，他不甘心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被排在陶的後面。所以，在『安亭事件』上，陳伯達夥同江青以惡人先告狀的伎倆，搶在陶鑄向毛澤東匯報此事之前，先向毛澤東奏了一本，說陶鑄支持上海市委鎮壓工人造反派。結果毛澤東對張春橋的做法大加贊同，還針對陳丕顯和陶鑄批評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這樣，王力也起勁地反對陶鑄就不難理解了。

所以，在六日的這天會上，王力再次攻擊『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嚴厲指責『抓革命、促生

產』的口號是『不許革命』。

陶鑄為保護周恩來和其他同志，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毅然承擔了『堵』、『壓』工廠、農村開展『文革』的『主要責任』。後來，他在被迫所作的『檢查』中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工業六條》、《農業五條》還是結合四清來搞，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陶鑄還談到他主張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不贊成工人離廠串連，同意《匯報提綱》的某些觀點。這都由於『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陶鑄還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中央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各省的抵觸情緒還很大，思想還不通，在許多方面還有懷疑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這次會議一完，江青就叫戚本禹整理陶鑄的『材料』，羅織罪名，說陶鑄『壓革命』、『保皇』、『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等等。此後，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和陳伯達就把陶鑄『打倒』了，好不容易拔去了心頭第一大『患』。

林彪主持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六月的會上發表長篇的總結講話（毛澤東有時到會場來聽聽發言，但沒有講話）。以往，林彪本人一般不參加經常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而是派葉群來參加後回去向他匯報。他從來不抓實際工作，但愛發表一通政治性的空話。這個解決『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會，他卻破例地參加了，並親自抓，表現得十分起勁。為了這次會議的總結發言，事先他還曾叫人為他搜集有關工廠方面的材料。在講話中，他一上來就徹底否定工交座談會和谷牧的《匯報提綱》。他說：『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昨天的會把工交會議原來的一套

完全打亂了，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要『把那個《匯報提綱》裡面三大特點的頭兩點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上的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單單落在生產上，如果我們完全從生產收穫的多少來論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是大錯特錯的！』他甚至毫不掩飾地批駁周恩來的發言，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進入到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我認為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剎』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個革命席捲全國每一個領域：滲透每一個領域。林彪還大唱『革命』和『生產』關係的『經』，說『革命』是至高無上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實際上是他那一套『突出政治』高調的翻版）。人們認為，作為當時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在會上講出的這番話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為了壓住周恩來、陶鑄等代表的正確意見，林彪不啻是江青一夥請來的一位『尊神』。

在林彪主持的這次會上，周恩來很少說話，直至十二月六日下午，林彪作了總結發言之後，他才講了一番話。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在會上發言，雖然沒有公開點周恩來的名，但他們所舉的事例全是針對由他（也包括陶鑄等人）親自過問和積極支持下所做的一些工作。周恩來自然十分清楚這些『革命派』的險惡用心，但為了顧全大局，他不得不暫時組織一次必要的『退卻』，以保住從國務院到各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生產的骨幹力量。看到谷牧《匯報提綱》在會上遭到圍攻，周恩來說：《匯報提綱》是我讓他們寫的，其中，當然是反映了一些客觀上的思想動態。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

彎來，所以在這個文件中，又出現了這方面的觀點。他指出：大家要下決心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包括前面犯過『錯誤』的人，要負起責任來；既不要誠惶誠恐，也不能掉以輕心，而是要兢兢業業、毫不鬆懈地抓好生產。（事後谷牧說：『總理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為我們開脫責任。』）

事實正是這樣。周恩來內心裡並不希望這些被林彪、江青一夥指責犯了『錯誤』的人真正『轉過彎來』。他最關心的事：就是經濟工作能夠維持正常運轉，盡可能地避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和破壞。早在調派余秋里、谷牧到國務院協助抓工業時，周恩來就向他們吐露內心的憂慮和期望：『你們可得幫我把好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即《工業十條》），並於十二月九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工業十條》的主要內容有：『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周討論生產問題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革命串連，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餘時間進行革命串連……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連。』其中雖然強調了『堅持八小時工作制』、『保證產品質量』、『堅持文鬥，不要武鬥』等條文，但是在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立群眾組織，實行『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狂潮下，這個規定實際上是有名無實、一紙空文。

林彪、江青一夥深知《工業十條》的通過將使工礦企業中的動亂加劇，他們把這看作一次重大的勝利。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第十五期《紅旗》雜誌在其社論《奪取新勝利》中說道：『目前形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廣大的革命工人群眾起來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學生同工人群眾相結合，出現了新的開端』；《人民日報》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說：『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國工礦企業中興起。』

《工業十條》下達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如同瘟疫迅速蔓延到中國的工礦企業，造成生產停頓，企業單位關門，國民經濟受到史無前例的損失。

第六章

黑雲壓城城欲摧

一、『改朝換代』的『奪權』風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這篇社論特別強調要使這場運動在全國形成全面階級鬥爭的規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從機關裡、學校裡和文化各界

裡，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讓毛澤東思想去佔領一切陣地。如果運動停留在機關、學校和文化各界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經過半年多『文革』的折騰，已在全國範圍造成混亂。在連續的『炮轟』、『火燒』圍攻下，各級黨組織都已陷入癱瘓狀態。元旦社論的發表，無疑將這場動亂推向更為激烈的階段，即所謂『全面奪權』的新階段。這場鬥爭首先從上海打開了缺口。這就是被稱為『一月奪權』的上海風暴。

上海奪權，從奪取輿論機關開始。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動下，一月四日，上海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奪權；一月五日，解放日報社『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奪權。兩報各自發表了《告讀者書》，公開站到『革命造反派』這一邊。一月五日，《文匯報》還發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十一個造反組織聯合發出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以下簡稱《告全市人民書》）。

毛澤東在一月八日晚上召開會議，專門談論上海兩報奪權問題。他說：《文匯報》現在由左派奪了權，四日造反。《解放日報》五日也造了反。這個大方向是對的。《文匯報》奪權後，三期報都看了，選登了紅衛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選登。《文匯報》五日發表的《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台可以廣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以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許多報，依我看，封了好。但報總是要出的，問題是由什麼人來出。《文匯報》、《解放日報》改版好，這兩張報一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他強調：『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兩個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告全市人民書》是少

有的好文章，講的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毛澤東還說：『我們要與各種人，左、中、右都要發生聯繫。一個單位統統搞得那麼乾淨，我向來就不贊成。不主張他們都罷官。留在工作崗位上，讓群眾監督。又說，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產，這是一場階級鬥爭。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成了中國全面奪權的動員令。一月九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同時加上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當場寫成、並經他審批的按語：

編者按：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月九日，上海兩報又發表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群眾團體聯合發出的《緊急通知》。毛澤東又決定由《人民日報》轉載，並於一月十一日由中共中央向這些群眾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認為這個《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還說：『你們實行了無產

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這類文件的署名向來只有三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而這封賀電的署名卻增加了中央文革小組。增加這個署名是毛澤東提出的。他先前就曾經講過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書記處一類的話，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確規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現在，這麼一來，中央領導的一個機構可以同中央並列，這意味著，它就可以向各級黨委下達指示了。從此，開創了中央文件有四個署名的先例。這不僅令人難以理解，而且後患無窮。」

被張春橋稱作『一月革命』的上海奪權，是他勾結江青和姚文元充分準備、精心策劃而成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江青就指使聶元梓等利用『大串連』的機會去上海煽動青年學生，炮轟上海市委；張春橋利用解決『安亭事件』的機會，把『工總司』扶植成為反對上海市委、搞亂上海的主要力量，並把『工總司』的頭頭王洪文等人收羅進自己的反革命集團；他們接受了原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徐景賢等人率領的『造反』人馬，並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一度成為傳達貫徹張春橋、姚文元命令的辦事機構）；十二月，在張春橋的指揮下打垮了上海市『工總司』最大的對立面組織——工人赤衛隊；接著，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五日，上海的兩大報紙被造反派奪權，從此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變成了造反派的喇叭筒。

一月四日這天，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向徐景賢和『工總司』頭頭王洪文等透露了毛澤東於一月二日的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張春橋說：『對市委不

必再抱什麼幻想』，『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一月六日，他們假借全市各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上海市黨政各級領導幹部，壓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

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張春橋之流已經奪取了上海市的一切大權。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在一月十八日建立了他們的全市性政權組織——『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以代替上海市人委，並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來取代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組織聯絡站』作為全市最高機構來代替市委。他們控制了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與此同時，他們策劃張貼了『擁護張春橋當市委第一書記』的大標語。一月十九日，這撮權慾狂在拼湊班子的會議上恬不知恥地把他們的反革命奪權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稱為『一月革命』，而把上海市政權組織稱作『新上海公社』，把成立宣言定名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開張，在中國的省、市、自治區一級開創了全面奪權的先例。

但是，上海市的廣大群眾，出於對張春橋一夥的胡作非為極端不滿，不願意聽任他們的擺佈。一些懷有野心的群眾組織的頭頭和骨幹們，也不甘心張春橋一夥獨吞全市各造反派組織獲取的『勝利果實』。為了平分秋色，他們利用群眾的不滿心理，極力煽動派性情緒，操縱一些造反派組織與張春橋、王洪文一夥明爭暗鬥，使上海奪權出現了你搶我奪、你死我活的激烈局面。一月十五日凌晨，王洪文『工總司』所屬的『三兵團』和『上海市紅衛兵第二司令部』（簡稱上三司）等十一個組織，在『二兵團司令』耿金章率領下進駐上海市委機關大樓，宣佈『奪權成功』，並且連發三道『通令』。其中一道

『通令』竟是『任命張春橋為上海新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為新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張春橋雖然覬覦這些職務已久，但他豈能容忍耿金章那副儼然一派『上級』的神態而默認這項『任命』？他便依靠王洪文『工總司』的實力，軟硬兼施，很快迫使耿金章就範，宣告這次奪權破產。一月二十三日，擁有一定實力、參與十五日奪權的『上三司』頭頭趙全國等人，憤於這次奪權被壓，再度殺進康平里（市委所在地），宣告奪去上海市委一切權力。張春橋又令王洪文出動大批人馬，大打出手，將他們趕出了市委機關大樓。一月二十四日晚，『紅革會』（上海高校造反派組織）的紅衛兵動用大批摩托、汽車，採取閃擊方式衝進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辦公大樓，奪取了象徵權力的市委二十三枚紅色大印，自慶得計，宣告『成功』。結果又遭王洪文『工總司』人馬堵殺，第三次奪權也告失敗。正當張春橋驚魂稍定、一心籌辦『上海人民公社』的時候，耿金章再度糾集『工總司二兵團』為首的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準備秘密籌組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結果再次被張春橋『降服』，使這第四次奪權還未出籠，就被張春橋『粉碎』。

在對立面的四次奪權已被壓下去後，張春橋正為『大獲全勝』奔走時，突然又爆發了『紅革會』『炮打張春橋』事件。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鬧市區，連續出現了《一問張春橋》、《為什麼——二問張春橋》的大字報；一月二十七日深夜，『紅革會』出其不意地把張、姚在上海的幹將徐景賢抓到復旦大學關了起來，逼他交代張春橋的問題。張春橋聞知後異常緊張，即要上海警備區調派部隊前去鎮壓。警備區師政委徐海濤帶領全副武裝的四個摩托車排和一個步兵連，包圍了復旦大學『紅革會』總部，逼令交出徐景賢。結果，徐海濤被學生質問得無言以對，便率部隊退出學校。這樣一來，張春

橋成了最先動用武力鎮壓學生的野心家。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規模浩大的『炮打張春橋』事件，大街小巷都出現大標語：『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警惕反革命兩面派！』『屢遭張春橋鎮壓、奪權失敗的『工總司二兵團』聞訊出動人馬，在南京路上貼出『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台！』的大標語。『紅革會』的支持者，上海柴油機廠『工人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工聯司』）也群起響應，貼出打倒張春橋的標語。二十八日晚上，張春橋、姚文元被迫『接見』『紅革會』各高校負責人時，陷入紅衛兵的重圍。從晚上七時到凌晨一時，紅衛兵對他們面對面地鬥爭六小時。當場質問張春橋：『為什麼派軍隊鎮壓紅衛兵？』『你三十年代做了些什麼？』並高呼『張春橋是兩面派』的口號，嚇得張春橋面色死灰，冷汗直流。一月二十九日晚，『紅革會』聯合其他組織召開了『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大會，並舉行示威遊行。這次，張春橋又想用部隊鎮壓，但當部隊了解真相以後就撤走了。張春橋慌忙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歪曲事實真相，緊急求援。江青、陳伯達立刻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來其內容為不應把矛頭對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張春橋、不能組織十萬人的遊行、要放回徐景賢的『特急電』，為張春橋解圍。這封電報，如同強心針，使張春橋氣粗膽壯起來。他馬上批示：將電報印八開，二十萬份，立即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散發，同時又令『工總司』調動人馬鎮壓。三十日凌晨，『紅革會』看到這份『中央文革特急電』，又得知『工總司』已在調動人馬鎮壓，便取消了開全市大會和示威遊行的計劃，並釋放了徐景賢。這個組織也由此被整垮。在這起『炮打事件』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如狼似虎，對被抓的兩千五百多人嚴刑拷打、肆意摧殘，其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瘋，有更多的人被打成殘廢或

導致終生病患。如果加上那些被迫『請罪』、寫『檢查』的青年學生，這次受到迫害的人又何止千萬！張春橋的血腥鎮壓，在上海市民中成為永遠不能抹去的噩夢。

可是，這年四月十四日，張春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專門談了上海奪權的經過。當說到這次鎮壓『炮打』的事件時，他再一次地施展瞞上欺下、顛倒黑白的兩面派伎倆，竟把事情說成了這樣：

當時，我們商量過，讓他們鬧吧！不要管他。因為工人不支持他們，許多學生也不支持他們。鬧了幾天，越來越不像話，我和姚文元同志去參加他們的會，受了六個小時的圍攻，我們還是耐心地勸他們以大局為重，團結對敵。他們不聽，還要開『打倒張春橋』的大會。中央文革小組才決定發個電報批評他們，發這個電報以前，我們還反覆地考慮了兩天（！）發不發？批評了他們以後，多數人接受了，少數人不接受，又鬧了幾天。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工人、學生組織要把『紅革會』的頭頭抓起來，我們勸阻了，一個人也沒有抓。『紅革會』戰士起來造了他們頭頭的反，要開萬人的請罪大會，我們明確表示不要開，戰士們是沒有罪的，頭頭只要檢討了，把事實真相弄清楚了，也還是給他們出路……

儘管張春橋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把這次廣大群眾的『炮打』壓了下去，但是，反對張春橋的思想依然存在。事隔一年後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發了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新高潮，結果又被鎮壓下去。但在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間，雖然張春橋之流已經權勢薰天，不可一世，卻又遭到北京、南京以及其他各地掀起的最激烈的正義討伐。這次討伐於清明節前後，在天安門廣場達到高峰，目標正是當年策劃上海奪權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其黑後台江青——『三公一母』結成的『四

人幫』。儘管他們曾經拚命掙扎，不惜動用一切力量鎮壓。但是，人民群众的憤怒宛若火山爆發，終於支持黨中央粉碎了這一小撮敗類。

從上海奪權事件中可以看出，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幾件事在做法上不一致，顯得混亂。首先表現在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上。

『安亭事件』源於『工總司』成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由上海十七個單位組成，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正式組成，並公開發表『我們要奪權』的宣言。對這個造反派組織，上海市委根據中央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並經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後，決定對它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

『工總司』沒有得到市委的承認，便於十日凌晨，由王洪文帶領兩千餘人在離上海不遠的安亭小站臥軌，企圖攔截過往列車赴京『告狀』。致使滬寧線中斷運行三十多小時，南來北往交通嚴重阻斷。

當時，陳伯達根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的指示，於十一月十日打電報給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十二日，陳伯達還給參與安亭鬧事的上海工人發出一封電報，要求臥軌工人顧全大局、考慮國際影響，希望他們三思。並在電報中告訴他們，中央文革小組將立即派張春橋去與他們當面商談。

當時被派往上海的張春橋是完全知道中央的精神，而且在他到達上海後，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他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也默認了上海市領導關於不承認『工總司』的主張。可是當天下午，他就擅自簽字同意『工總司』代表提出的五項要求：（一）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一一九大會(指工總司成立大會)以及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動。(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五)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張春橋的這一作法遭到華東局、上海市委和陶鑄等人的譴責。陳丕顯打電話質問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一個中央文革成員，可以不同上海市委、華東局商量，就在群眾組織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究竟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還算不算數？』陳伯達大耍兩面派手法，不僅不去追究張春橋的責任，反過來倒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作檢查，並對於陳丕顯打電話提出的正當質問，強加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批准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意見。他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態，後有政策。

其實，奪權的想法是毛澤東早就有了的。還在批發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時，他就說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為重大。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他的這種思想，但沒寫要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只是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至於『接管』政府機構的思想，也是毛澤東早有的，只不過沒提過『自下而上地奪權』。

『自下而上地奪權』這個口號是由將『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當作口頭禪的張春橋首先在上海提出來的。按他們的說法：『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是在一月革命過程中自下而上地進行的。』

在由上海首先興起的這場奪權風暴中，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意張春橋這種觀點的。正如他在這年一

月八日針對《文匯報》奪權說的：『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

一月間，在一次研究奪權問題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周恩來提出，對當權派要分析，採取不同的奪權形式。他將當權派具體分成五類：第一類是黑幫；第二類是走資派；第三類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四類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第五類是犯有個別的、一般性錯誤的。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前兩類面要劃小，孤立打擊最少數。他對奪權後對當權派的如何處理提出了五種辦法：第一種是全部改組，如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提出的；第二種是監督留用，邊檢討，邊工作（根據指示工作）；第三種是停職留用；第四種是撤職留用；第五種是撤職查辦；第五種要少。

周恩來說：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奪權後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奪權後工作不能停頓。撤職查辦的要極少。即使是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只讓掃大街，掃完就休息，睡大覺。有了對立面，可以壯大左派隊伍，工作才能搞好。周恩來意在儘量保護幹部，工作少受損失。毛澤東同意這些意見，在當時被廣泛宣傳，後來也執行了一些。

時隔不久，毛澤東又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不要分類了，把權奪過來再說，到運動後期再說。』於是，報紙上就大肆宣揚：『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與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所竊取的黨、政、財等各種大權，統統要奪回來。』一剎間，風雲突變，當權派統統被打倒了，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的幹部更少了。當時的形勢，如同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的一次會議上說的那樣：『今天除了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

張春橋在上海提出的『自下而上』地奪權這個口號一月間傳到北京時，曾經一度受到陳伯達的批判。可能是跟不上『張春橋的思想』，陳伯達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講話時，一面讚揚上海的奪權很好，一面又批評『自下而上地奪權』的口號不對。結果，毛澤東知道後，馬上召集會議批評了陳伯達，並充分肯定上海奪權的口號是對的。

上海奪權後成立的『新政權』的名稱問題，也曾發生了波折。張春橋先斬後奏，將『新政權』稱作『上海人民公社』。他自以為得計，結果適得其反。他所用的這名稱，同他善於投機取巧、迎合領袖意志的本性是分不開的。因毛澤東說過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為了有把握起見，他還先打電話向陳伯達摸了底。當陳伯達支持張春橋、同時向他透露『毛澤東正在考慮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成員名單』時，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二月五日，《文匯報》在頭版頭條刊登出《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誕生》的長篇報道，大事張揚地說：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熱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誕生了。從此，上海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上海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真正回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當天下午，張春橋在上海人民廣場上舉行的號稱百萬市民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宣告：舊上海市委、舊市人委被無產階級革命派砸爛了，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躊躇滿志的張春橋

跟他的夥計們先後都在會上亮了相，並發表了得意忘形的講話。姚文元吹噓『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並信口開河地說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產生的。

可是，從二月六日到二十四日，北京《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台，都對『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始終保持沉默，對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洪文之流在上海大肆折騰的這個『偉大壯舉』隻字不提。

這個時候，張春橋、姚文元都像熱鍋上的螞蟥，心裡發慌。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和曾遭受殘酷鎮壓的造反派組織，東山再起，又掀起了新的反對張春橋的風波。街頭出現了《一向上海人民公社》、《二向……》的大字報，有的秘密商議組建『第二上海人民公社』以相抗爭。這些反對派還組成『進京代表團』到國務院接待站控告張春橋、王洪文，在天安門廣場張貼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單方面的奪權，上海人民不承認；黨中央不承認！』等標語；使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大丟面子，大傷腦筋，大煞威風。

關於此事，陳伯達當初向張春橋『透露』的信息並非不實，只是後來有了變化。這次上海開始奪權的時候，毛澤東確曾考慮過在全國成立人民公社式的省市政權。可是，他很快覺察這種做法欠妥，認識到不能像巴黎公社那樣使用暴力來砸爛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重建政權。因此，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緊急召來了張春橋、姚文元，嚴肅批評了他們的做法，要求停止使用『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稱，還是照老辦法，因為將來還是要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人民委員會，已建的臨時權力機關叫革命委員會。毛澤東還嚴厲批判了『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指出這是反動的。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

地改善。毛澤東說：這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這個革命是我們發動的。他要中央文革小組考慮寫一篇文章，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專政』（其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在《偉大的歷史文件》中，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問題』）。

張春橋這次玩弄『先斬後奏』的把戲失手了，因為沒摸準氣候碰了一鼻子灰。

葉劍英在二月十四日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嚴正地指著張春橋和陳伯達一夥說：『上海奪權，改名上海人民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你們想幹什麼？』張春橋自知理虧，只能嚥下這個苦果。同年四月十四日，張春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當著葉劍英等眾老帥的面，不得不對此事承認錯誤：『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也不少。我們的臨時最高權力機關，曾經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條影響大的錯誤。』——不過他卻故意扯謊：『這是群眾提出來的，我們同意了。』

在上述的這個問題上，無疑又一次暴露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當時是亂了腳步的。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舉行慶祝『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百萬人的大會；二十五日，北京未發表這次開會的消息，遲至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才以綜合報道『文化大革命』概況的方式，提到了二十四日在上海曾開過這樣的一次大會。其中記述：二月五日，在自下而上地奪權已經取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上海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實行了『三結合』，奪取了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切權力，建立了上海市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完全迴避

了當時作為這個『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實體『上海人民公社』，好像它根本就不曾在地球上出現過。

隨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連續發表社論和報道，對上海的奪權加以肯定和讚揚，並且號召各地學習上海的經驗。這就使上海的奪權風暴在中國發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影響，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劉格平在山西，王效禹在山東，潘復生在黑龍江，李再含在貴州，群起效法張春橋，其他各省也紛紛奪權。在這股逆流的衝擊下，中國大江南北，一片混亂。

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央進行了撥亂反正。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所謂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是一場反革命風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們搞亂全國，進行全面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把上海市委誣陷為『修正主義的』、『反革命的』舊政權，把堅持毛主席路線的陳丕顯、曹荻秋等一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強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策劃這一篡黨奪權反革命陰謀的頭目和主要骨幹分子，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餘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朱永嘉、陳阿大、潘國平、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葉昌明等人。他們確實是一夥反革命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搶者、反動文痞。他們通過一場篡黨奪權的大陰謀，結成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

中共中央在轉發這一個《報告》時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這樣，就把這一段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二、『大鬧懷仁堂』的風波

一九六七年二年前後，在北京發生了『大鬧懷仁堂』、『大鬧京西賓館』的事件。這些事件曾被林彪、江青一夥誣蔑為『二月逆流』。

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爭』，並不都發生在二月，由於影響最大的抗爭——『大鬧懷仁堂』發生在二月十六日，所以被誣稱為『二月逆流』。在這場鬥爭中，老一輩革命家提出的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究竟還要不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的動亂局勢的根本原因。同時，要不要穩定人民解放軍，要不要保護老幹部，也都是這場爭論中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這場抗爭首先是從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爆發的。

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開始，在京西賓館召開中央軍委碰頭會，主要討論軍隊搞不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一夥認為，軍隊不能特殊，須和地方一樣，開展『四大』；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們則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戰備任務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他們尖銳地提出：『黨政機關已經都搞亂了，不能把軍隊搞亂！』『軍隊搞亂了，要天下大亂！』兩種意見針鋒相對，鬥爭激烈。這時，葉群突然拿出發言稿，點名攻擊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搞修正主義』。江青、陳伯達也隨之誣蔑蕭華『已經使我們的軍隊變成了修正主義的軍隊』。繼後，又有幾個發言者，都有發言稿，這表明，他們都是有備而

來。江青、葉群等人講話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想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以便從亂中奪取軍權。這天晚上，蕭華的家就被抄了。第二天，江青、陳伯達和葉群等繼續糾纏蕭華的問題。老師們在會上談到許多軍隊高級幹部的家被抄、許多黨和軍隊的秘密文件被竊時，變得異常憤怒。他們毫不留情地揭露有人企圖搞亂軍隊的罪惡用心，並反對誣陷蕭華。徐向前憤然站起來，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了地下。他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軍隊難道就叫你們幾個毀掉嗎？』葉劍英也憤怒地用拳頭猛擊桌子，警告江青一夥說，誰想要搞亂軍隊，絕不會有好結果。盛怒之下，葉帥在拍桌子時把右手掌骨都震裂了。這就是後來被誣陷為的『大鬧京西賓館』。

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受到接見的軍隊領導人情緒激動，在毛澤東談話時紛紛插話，向他匯報挨整被鬥的情況。毛澤東一方面要求軍隊『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不要吃老本』，『要有新貢獻，在這場鬥爭中立新功』，同時明確表示：『搞「噴氣式」（造反派強迫被鬥人彎腰低頭、雙手後舉的鬥爭方式），一鬥四五個鐘頭，侮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麼！這是天津工人鬥資本家的方式，這樣不行。』『隨便抓人，省委書記也抓，軍隊幹部也抓，許世友也抓，到處抓人怎麼行？』『不能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這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過，犯了應該改。』『要允許工作，不能過頭了，不能搞逼、供、信。』毛澤東還提出要保一大批當時挨鬥的幹部。他說：『江渭清、譚啟龍、江華、韋國清、劉俊秀、張體學、張平化、李豐平要保。』『楊勇還是要保。』他還特別提出，朱德『這個人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國際國內有影響。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可是，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卻在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大放厥詞，大唱反調。他一開口就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拿槍的全國性的大內戰』，『大快人心』。他鼓吹說：『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對象，有各種各樣的程度，必須要有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貼大字報，有的一般的開會批評。取消這一種方式，只要那一種方式，就不能適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就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很需要，用了大家叫好。』『有時動一下手，打一打威風，甩了一下也可以。』林彪還強調：『軍隊有特點，但主要是革命的共同性。』『軍隊文化大革命要有新姿態，要堅決站在群眾一邊，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字當頭……機關要徹底搞。主要一條是革命，把革命擺在第一位。』『對老幹部有的要燒，不但燒，有的還要燒焦。』林彪還指責『舊的全軍文革小組沒有搞好，劉志堅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講話中，他還不時地為自己臉上貼金，自我標榜地說：『爭取了一些主動，如不讓院校串連，我來個大串連，他們規定院校和部隊一樣搞正面教育，十月五日發了個緊急指示；衝國防部，扣不扣學生，我說不扣；機關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大開展，要開展，不怕。』……林彪的這些言論和思想，既與徐向前、葉劍英等老帥們的想法針鋒相對，也和毛澤東的意見大相徑庭，同時也背離了他自己經常『諄諄教誨』他人『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一貫『原則』。

徐向前、葉劍英等老帥們基於穩定軍隊的目的，於一月二十三日領導參加軍委碰頭會議的全體軍隊幹部，向毛澤東、林彪寫出『請示報告』，就軍以上領導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六條建議』，

提出了堅持黨委領導、軍隊不准奪權等具有重要意義的意見。這時即將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力求把軍委許多領導人穩定軍隊的指導思想變成具體的軍委命令和規定，以求約束全軍。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徐向前為此前往毛家灣林彪住處，請示他批准由軍委發一個文件，並在那裡和先期到達的陳伯達、臨時邀來的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一起，議定出了一個新的穩定軍隊的『九條規定』。徐向前等隨即帶著『九條』到中央文革小組徵求意見，並請周恩來、陳毅前來參加討論。經過激烈的爭論，議定擬以中央軍委命令形式發出的『七條規定』。『七條』經由林彪寫信報到毛澤東處，毛澤東對林彪的信和『七條』十分重視，支持制定『七條』。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同時又補充了『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子女問題……成為軍委《八條命令》』。一月二十九日，軍委《八條命令》發出。軍委辦公廳在通知中要求廣為張貼，並要印成材料，做到每個指戰員人手一份。

軍委《八條命令》的發出，是老帥們在這場鬥爭中取得的初步勝利。但是，林彪和江青一夥仍在千方百計地破壞軍隊的穩定，或明或暗地支持衝軍隊、反軍隊的激進派。由京西賓館軍委碰頭會開始的這場爭論，延續到後來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達到了面對面鬥爭的高潮。

在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從二月七日開始，大致隔一天舉行一次。會上經常研討的問題是『抓革命，促生產』。但因陳伯達、康生等到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常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逼得與會的副總理和老帥們不得不同他們進行爭論。目睹全國山河的一片混亂，面對造反派的全面奪權，一大批老

幹部的被打倒和國家政治與經濟生活陷於癱瘓狀態，憂心忡忡的老師們都心急如焚。在二月九日的會上，徐向前和陳伯達曾為劉志堅的問題爭論起來。這天，陳伯達再次誣陷說劉志堅是『叛徒』，對抗中央文革，破壞文化大革命。抗日戰爭期間，劉志堅曾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工作；在冀南打游擊時，曾受傷被俘，但於第二天在敵軍押送途中，即被我軍搶回，根本不存在叛變問題。陳伯達信口雌黃，純屬惡意陷害。徐向前當時任第一二九師副師長，對此情況一清二楚。他當場請了有關情況的經過，有力地駁斥了陳伯達，斬釘截鐵地說：『劉志堅不是叛徒！』在事實面前，陳伯達還蠻橫無理地說：『劉志堅叛徒的案已經定了，再也不能改變了！』徐向前氣憤地質問陳：『你憑什麼給他定案？沒有證據怎麼定案？』徐向前還針對前幾天陳伯達在接見群眾時所說的『我不光保你們，也得保徐向前』一番話，拍著桌子凜然地問他：『誰要你保，我有什麼要你保的！』

在二月十一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和徐向前就軍隊『文革』問題繼續對陳伯達等人進行譴責。葉劍英質問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也激動地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這時，康生卻不識時務地跳出來，打斷徐帥的話，昂首望天地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麼了不起！』

葉劍英抓住張春橋在上海奪權後擅自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質問陳伯達，並就此嘲弄他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

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陳伯達被質問得無詞答對，只是說：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李富春在當時協助周恩來抓國務院的工作，經常找一些副總理研究情況，而康生卻當面誣蔑他是『反黨俱樂部主任』。李富春在會上也氣憤地回擊說：我再不抓，對周總理的壓力更大。你們既然這麼講，那就組織專案審查吧！

聶榮臻也針鋒相對地對陳伯達、康生進行了批評，他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員，都是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還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被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這次會議本來的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一開始就圍繞著從要不要穩定軍隊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最後，周恩來出來收場。他說：今天議程上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在以後再說。

由於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導致了在二月十六日的會議上發生了『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爭。

『大鬧懷仁堂』事件發生的那天，我正被江青強逼回到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接受『造反派』的批鬥，沒能親臨其境。因陳伯達在二月十七日凌晨下達了『從今天開始不要再揪鬥穆欣了』的電話指示，我又重新回到了已離開了一個月的釣魚台。王力就把他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研究、由他執筆

整理上報毛澤東的十六日的會議記錄交給我和唐平鑄看，並講了一些向毛澤東口頭匯報的情況及『老人家』的反應。

從這份記錄和在以後陸續聽到的有關情況中知道，二月十六日這次面對面的交鋒是從譚震林指責張春橋的談話開始的。

這天，周恩來主持會議，議題仍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到會的有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當譚震林邁步走進懷仁堂的時候，迎面碰見張春橋，就攔住問：『為什麼不讓陳丕顯來北京？』——當時周恩來鑒於各地揪鬥黨政領導人情況十分嚴重，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把各大區和一些省、市委二十多位負責同志接到北京保護起來。可是，上海卻把陳丕顯扣住不讓來京。所以，譚震林一見張春橋就質問他。張春橋不冷不熱地回答說：『群眾不答應啊！』譚震林一聽火了，就朝張春橋嚷道：『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卻回答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震林頓時怒火滿腔，憤怒地指著張春橋說：『原來一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啊！』

譚震林進到會議室一坐下，就又提出陳丕顯來京的問題。他說：張春橋說，上海科以上的幹部全被打倒了，不知他們犯了什麼罪？難道這些人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陳丕顯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張春橋再次陰陽怪氣地回答說：我說了嘛，是群眾不答應。

譚震林聽他還是這樣說，更怒不可遏，大聲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

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不是形而上學！他又說：我早就看透了，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要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一口氣地往下說：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剿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超過了王明、張國燾。

聽到這裡，陳毅憤然地站起，雙手插腰，嚴正地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講句公道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康生見會場上的勢頭不對勁兒，急想轉換話題。他向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就不要談其他事情了吧！

譚震林就接過這個話題說了下去：去年十二月，我讓農林部發了個通知：魚汛期間集中力量捕魚，漁輪可暫不回港參加運動。為這事，連著逼我檢查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當著我的面說的（謝富治打斷他，說：譚老板，不要衝動嘛！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還是保你的）。譚震林說：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康生卻陰冷地打斷譚震林的講話，說：批捕魚問題是主席點了頭的，希望譚老板正確對待！

譚震林立即反駁說：我跟了主席四十多年，從來沒有反對過他。可這一次如再這樣搞，我就不跟了。說到這裡，譚震林站起來，提起皮包，拿上大衣，一邊往外走一邊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見譚震林要走，急了，嚴厲地叫住他說：有話坐下說，但不能走！

陳毅也說：譚老板，不要走，要留在裡邊鬥爭。

譚震林的腳步停了下來，陳毅一邊拉他在身旁椅子上坐下，一邊忿然說：這些傢伙上台，他們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在延安整風有人對老幹部整得很兇，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了修正主義嗎……

葉劍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財富。對犯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那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

譚震林說：許多老幹部，戰爭年代受了傷，現在又殘酷虐待。

余秋里憤慨地拍了桌子說：現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來整老幹部，你們中央文革小組可以看看，全國打死多少，打殘多少，被關起來多少，被逼得自殺多少，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專案組、憲兵隊。我對造反派講了，你們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計委』（國家計劃委員會）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連你們的會也不去參加。

謝富治插話辯解說：群眾運動嘛，難免有過火的行為，但主流還是好的，還是……李先念忿然打

斷謝富治的話，說：你不要和稀泥！什麼主流？難道鬥爭老幹部講主流，對待老幹部就不講主流嗎？就該統統打倒嗎？我們黨一貫強調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內大搞逼供信。老幹部就是有錯誤，也不該往死裡整。我就不相信共產黨內會有那麼多的走資派！『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又說：我這個人，打記事起就沒有哭過，可近來我連著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書，又有孩子，只能背地裡流眼淚（這時，謝富治又不知趣地插話：譚老板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我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又接著說：我也哭過幾次。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全國就開始大規模的揪鬥，老幹部要徹底批鬥嘛。老幹部統統打倒了。這篇社論公開提出對老幹部要徹底批鬥嘛。

這時，周恩來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康生明明在發表以前看過，卻當面撒謊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周恩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給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周恩來又問陳伯達，陳伯達也一樣撒謊說：『我也沒有看！』其實康生、陳伯達是在掩非飾過，他們不僅看過這篇社論，陳伯達還為此社論改定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標題。

葉劍英還質問陳伯達、康生：你們到處組織奪權，奪了政府的權、地方的權，還要奪軍隊的權，解放軍能聽你們的嗎？

這次碰頭會，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從下午三點開到了七點。在所主持的這次會議上，周恩來雖然講話不多，但在這場十分尖銳而又不容迴避的重大原則問題的爭論中，他和老師、副總理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並且以其特有的鬥爭方式給予這場正義抗爭以持續和有效的支持。

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從懷仁堂回到釣魚台，急忙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會議記錄》，然後一起到十一樓向江青匯報。江青聽了，大發雷霆，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王力後來說：李富春在會上沒說話，記錄上沒有他的事兒，所以沒提到他）。她叫他們馬上一起去向毛澤東匯報。她給毛澤東辦公室打了電話，還寫了張紙條送去：『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江青，二月十六日』。

毛澤東這天夜裡召見了張春橋、王力、姚文元，聽取他們的匯報。開頭，毛澤東態度是平靜的。當張春橋匯報說陳毅曾講了『延安整風』的事和『斯大林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時，變了臉色；當張春橋又說到李先念批評《紅旗》雜誌十二期社論、周恩來說『這樣大的事，你們也不給我們看看』時，毛澤東就說：黨章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我們黨沒有這個先例。不過，毛澤東沒有發大脾氣，聽完匯報後，對他們說：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生產要搞好，要抓鐵路和煤炭。

十七日早上，張春橋和姚文元離開北京回上海，江青和王力一起前往毛家灣，向林彪匯報『大鬧懷仁堂』的情況。事後王力說：『報告林彪，江青要同我一起去。是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

賓館等著，然後再接我和她同車去到林彪那裡。見了林彪，江青和葉群在座，叫我匯報，葉群記錄。林彪只是聽，沒講多少話。一句話是罵徐向前，說「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還說了一句：「陳伯達不過是一個書生。」匯報完了，江青叫葉群派車把我送走了，她一個人留下來了。」

林彪罵徐向前的話，是針對徐向前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兩次『大鬧』中衛護解放軍的發言而來的；對陳伯達講的這句話，則是指在這年一月四日，因陳伯達夥同江青『打倒陶鑄』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大鬧自殺的鬧劇而言的。

不平則鳴。就在這一天，譚震林餘怒未消，他振筆疾書，給林彪寫了以下的一封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不聽毛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兇。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銜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人的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了××，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

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覆加了，北京的群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覆說過要保的，無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因為這樣太露骨了，又來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巨大損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對於醜化黨的行為，對於老幹部倒下去這樣多，他們一言不發，少了幾噸魚，就如此大發雷霆，就可看出他們喜的是什麼，恨的是什麼。他們根本不作檢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他們能當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噲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此致

布禮！

譚震林

二月十七日

林彪將這封信轉送給了毛澤東：並附上了自己的評論：『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毛澤東批：『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這封信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二月十八日深夜（其實已是十九日凌晨），毛澤東通知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到他那裡開會。這次，毛澤東的火氣很大，語言尖刻。他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接著，他說：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當組員。力量還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干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他指名批評陳毅、譚震林：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說話？

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這樣生氣的同時，自己作了檢討，說沒有掌握得好。這樣，氣氛才得以緩和。毛澤東最後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毛澤東講完這些話就退了場。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會上決定，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來稱作『政治局生

活會』，批評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並且確定由周恩來找陳毅談話，由李先念、謝富治與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與徐向前談話，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

此後，從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先後開了幾次『政治局生活會』，批判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的人，責令他們檢討。周恩來也作了檢討。林彪、江青一夥把『大鬧懷仁堂』誣為『二月逆流』，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和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自所謂『反擊二月逆流』以後，中央政治局碰頭會開不成了，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於一九六六年五月成立，按照《五·一六通知》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實際上只屬於毛澤東一個人指揮，別的常委都難以過問。從此，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以後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會），而林彪、江青一夥實際上操縱了中央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權。

事後，徐向前在談到這段『政治局生活會』期間自己備受摧殘的痛苦經歷時，說：『在二月十七日以後，他們就一天到晚批我們了。每天吃了晚飯後，就一直批判到後半夜，天快亮了，才讓回家。檢查都要自己寫。當時我咳嗽得厲害，吃藥也止不住。我曾親自打電話給黃永勝請假。我說，晚上的生活會我不能去參加了，一是身體不大好，二是要寫檢查。黃永勝回答我：會是要參加的，寫檢討嘛，另找時間！我只得硬撐著去參加會議，實在支持不住，就躺在長沙發上聽批判……文革小組說我們幹政變陰謀，叫我交代在西山開什麼會，他們天天追問陳總（陳毅），哪裡是聯絡點？什麼是聯絡信號？不講就過不了關……』徐向前說：『這時我才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要聯合起來整我。四月十

一日下午，我在大會上作了檢查發言……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在大會上講話。陳伯達調門最高，給我扣上「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代表」、「對抗中央文革」、「搞獨立王國」等帽子。謝富治發了脾氣，說我的問題遠不止這些。我說，富治同志啊，錯誤路線我都承認了，你還要怎麼樣啊！難道還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務嗎？四月十二日至十六日是小組發言，天天出簡報，羅織我的「罪狀」，無限上綱上線，康生、關鋒、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在小組裡竄來竄去，煽風點火，說我的檢討「沒有觸及靈魂」、「不像樣子」、「極不深刻」。康生說：「徐向前算什麼！他代表誰？能代表解放軍嗎！」還說：「徐向前帶頭衝擊林副主席住地。」（指一月二十四日我去林彪家一事）會內會外配合，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打倒陳、徐、葉的大標語，滿街張貼。十六、十七日兩天，軍內「造反派」二百多人，兩次抄我的家，門窗玻璃被砸碎，室內翻得一塌糊塗，將我保存多年的資料、信件、作戰日記搶去不少。抄家前我在家裡，一點消息也不知道。幸好葉劍英同志關心我的安全，聽到點風聲，晚上打電話來，要我去西山，這才免遭揪鬥。」（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第八百三十六至八百三十七頁。）

陳毅遭到了江青、林彪一夥更加殘酷的圍攻、批鬥。據記載，政治局生活會期間，『整整一個月間，陳毅白天是副總理兼外長，代表中國政府出現在談判桌邊，宴會廳裡，精神鷹揚，莊諧成趣；太陽落山後，走進「政治局生活會」，便成了眾矢之的，受盡侮辱。而這種圍攻、批鬥，總是延續到後半夜，才能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稍事休息，他又得穿戴整齊，笑容可掬地出現在接待外賓的會客廳裡，各國記者的鏡頭前。』（鐵竹偉：《霜重色愈濃》，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第一百九十三

頁。）

其後在浙江省委存檔的案卷中找到一份一九六八年的報告記錄。在當年這個省革委會主任傳達所謂『二月逆流』問題的講稿中寫道：『陳毅實際上是「二月逆流」的黑統帥』。『他們都是黨內一些「老資格、地位高、有名聲」的人，但是一向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他們這夥人，實際上就是第二個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執行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主要是七個人，形成了兩個中心。一個是以李富春家裡為「裴多菲俱樂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參加多次開黑會；一個是以京西賓館、西山為黑據點的中心，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三個副總理，三個軍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他們中間，穿針引線的就是副總理又是軍委副主席陳毅。陳毅實際上是「二月逆流」的黑統帥，他是兩面跑，一下到軍委，一下到國務院，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兩個中心，是一股勢力，實際上是一個中心。資產階級的中心。他們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圖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讓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得逞，那是多麼危險啊！「二月逆流」，不是一般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揪住『二月逆流』不放，無限上綱，大張撻伐。毛澤東本來指示只能限制在中央內部小範圍內進行批評，可他們故意捅到社會上去，掀起一股『反擊復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的黑風』。

三月一日，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籌備小組會上散佈謊言：『北京有一個黑司令部，北京大聯合不起來，與這個黑司令部有很大關係，可能又要出現陶（鑄）式的第二個人物。』在他的煽動下，北

京街頭很快就貼出了所謂『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反撲』，『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譚震林』，以及誹謗、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的大標語、大字報；三月八日，遵照江青的指示和戚本禹的部署，譚厚蘭帶領北師大一千多名學生衝擊曾受到毛澤東的親筆批示的農業學大寨展覽和工業學大慶展覽，誣蔑展覽『不突出毛澤東思想』，喊叫『打倒譚震林』等口號，並當場還揪走農業部代部長江一真等人；三月九日，陳伯達在部隊軍以上幹部會上提出，要迎頭痛擊『復辟資本主義的逆流』；三月二十日，林彪親自出馬，在這次會上大放厥詞，大唱批鬥老幹部的高調。他的講話實際上成了江青一夥掀起所謂『反對二月逆流』的理論綱領；三月十日，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去慰問佔領農展館的譚厚蘭等人，和他們一起舉手狂呼『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以此為他們打氣，撐腰；三月十四日，林彪、江青煽動北京十萬學生示威遊行，高呼『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口號，企圖將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老幹部置於死地。

直到一年多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之流仍耿耿於懷，再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他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軍隊」、「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在這次全會上，一貫望風承旨的謝富治又與林彪、江青一夥桴鼓相應地圍攻陳毅、李富春等中央領導人。他宣稱『「二月逆流」是一個集

團』，是為了『破壞文化大革命』，『奪軍權』，『為劉鄧翻案』；並誣陷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李富春、陳毅、徐向前等人是『老牌機會主義者』、『舊軍閥』，『跳出來參加『二月逆流』』，搞奪權，搞翻案，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從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這次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可以看出，他對『二月逆流』的看法已有所改變：即與林彪的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毛澤東說：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點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乎多過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節目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那就不好囉。

在這次全會後，毛澤東親自找幾位元帥談了話，並於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李大章、張國華等，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對到會的人員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接著他又對大家說：『『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師。老師們就有氣囉，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

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一九七二年一月初，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現在我有事，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葉劍英當場核對了記錄。一月六日十六時二十分，葉劍英趕到醫院向重病中的陳毅傳達。當夜二十三點五十五分，陳毅與世長辭。

所謂「二月逆流」，實際上是一場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正義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些老一輩革命家挺身而出，對林彪、江青、夥篡黨奪權的陰謀進行抗爭，代表了黨和人民的意志，充分表現了老一輩革命家敢於堅持真理、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無私無畏的凜然正氣，同時打擊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囂張氣焰。

關於此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



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認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

第七章

狼煙四起，勢頭不善

一九六七年夏天，繼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在全國範圍內動亂急劇擴大、上升，『文革』運動像一頭脫韁的野馬任性奔馳，幾乎失去了控制。雖然，林彪在八月九日接見武漢軍區新任司令員曾思玉和政治委員劉豐的時候，依然閉著眼睛瞎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很大，真是代價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實際上，此時的中國已經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在打、砸、搶、抄、抓的狂飆中，林彪、江青一夥又挑起了駭人聽聞的武鬥。中國的大局已經失控，亂到了『親自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也無法駕馭的程度！正像以後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的那樣：『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有人將這年的七、八、九三個月叫作『失控的三個月』，內政、外交都已到了幾乎失控的地步，整個局勢瀕臨不可收拾的邊緣。

為了穩住局勢，當時，周恩來和毛澤東曾經一再採取措施，但都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六·六通令》，嚴格規定：『一、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設公堂和變相地私設公堂。二、各級黨政軍機關的檔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搶奪、竊取和破壞。三、社會主義的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絕對不可侵犯。革命群眾都有保護的責任，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侵佔，不准砸搶，不准用任何藉口進行破壞。四、嚴禁武鬥，嚴禁行兇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的財物。五、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對任何團體和個人，進行搜查和抄家。六、由各地衛戍部隊和駐軍負責保證上述各條的執行。自即日起，對於違犯上述各條的，都應該嚴加處理……』；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發表毛澤東的新的『最高指示』：『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七月十八日，在武漢，針對當地兩大派工人組織的勢不兩立和一場更大規模武鬥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由於林彪、江青一夥唯恐天下不亂，極力挑動內戰，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致使中央的指示，不論是黨中央的《通令》，還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呼應不靈。七月二十日，當毛澤東正在武漢親自解決『武漢問題』的時候，當地發生了圍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數十萬軍民示威遊行事件（即

所謂的『七·二〇事件』；八月七日，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了『砸爛公檢法』、『不把舊機器徹底打碎，要轉變過來是困難的』的荒謬主張，致使公檢法專政機關陷於癱瘓，廣大的公檢法幹部受到殘酷迫害，無政府主義的狂瀾泛濫成災；同日，王力發表了煽動奪外交部權的《八·七講話》，促使造反派隨即奪了外交大權。——毛澤東說，外交部大權有一個半月在反革命手裡……接著發生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了中國對外關係和聲譽。

一、武漢『七·二〇事件』

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於武漢的震驚中國的『七·二〇事件』完全是由林彪、江青指使謝富治、王力支一派打一派而釀成的。這是他們篡軍奪權陰謀的一部分。

這年一月，人民解放軍奉令介入『文革』運動，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二月初，武漢的極左派強行接管《長江日報》，並於二月八日發表《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二月九日，在《長江日報》發表社論，誣稱是在人民解放軍『支持』下接管報社的。武漢軍區於二月十八日發佈了批評前述聲明的《嚴正聲明》，揭穿謊言，以正視聽。其後，由於對這兩個聲明的態度不同，武漢地區的群眾組織分為兩大派，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衝突。兩大派爭論的焦點是：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確？『百萬雄師』擁護軍區，而極左派『工人總部』則要掀

出『武老譚』（意指『武漢的譚震林』，矛頭對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治委員鍾漢華）。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武鬥不斷發生。三月十七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軍委《八條命令》，並為了穩定武漢局勢，抓了一批在軍內外搞打、砸、搶、抄、抓的壞頭頭和骨幹分子；三月二十一日，軍區發出《通告》，宣佈解散『工人總部』及所屬組織，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黨政幹部，使武漢地區的混亂形勢得到迅速的扭轉。

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既然堅持全面奪權，就不可能支持擁護武漢軍區的『百萬雄師』，他們一味地支持和扶植它的對立面『工人總部』。極左派組織因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有恃無恐，提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號，並多次衝擊武漢軍區機關，甚至綁架鍾漢華及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軍人進行漫罵、圍攻和毆打。

追本溯源。衝擊軍事機關、到處動亂的根子原來是在『上邊』。在年初的一月十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王力參與起草了一個《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文件，提出了『徹底揭穿軍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報》社論公開了這一口號。次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社論，於是『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迅速傳遍全國，軍隊的高級幹部紛紛被揪鬥、遭迫害。三月以後，林彪多次對吳法憲等人說：『要把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吳法憲心領神會，一再命令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等人不要聽大軍區的；四月十六日，江青在北京對軍內外造反派代表說：『成都、武漢都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六月四日，武漢軍區發表《公告》，在肯定軍區支左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檢討了自身工作

中的某些不足，希望各個群眾組織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不料，軍區鄭重發表的這一文告，卻被造反派誣蔑為『假檢討，真反撲』。在這個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擺出一副貌似公允的面孔，將對『工人總部』的暗中支持改變為對『百萬雄師』的公開責難，並在六月二十六日給武漢軍區發去的電報中，嚴厲指責，把武鬥的責任歸咎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澤東在人大會堂召集會議。到會的有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毛澤東先談了搞『文革』的總設想，又對各地運動形勢作了分析，最後他決定到長沙、武漢等地看看，還說準備到武漢後在長江游泳。

七月十四日早晨，周恩來率領李作鵬等人飛抵武漢，為毛澤東到武漢打前站，同時也想實地了解武漢的局勢。中午，奉令到西南解決兩派群眾爭鬥的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帶著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紅旗』組織的四個人，從重慶趕至武漢。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汪東興、楊成武、鄭維山等人陪同下乘火車到達武漢。

毛澤東到武漢後，於七月十五、十六日兩次召集周恩來、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謝富治和王力等人開會，聽取西南各省和武漢等地情況的匯報，著重商討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毛澤東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鴻霞（造反派骨幹之一）；『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謝富治、王力要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陳再道的。毛澤東還讓周恩來在武漢多留幾天，做軍區的工作。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從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連續召集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和駐武漢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開會，聽取陳再道等人的匯報。十八日下午，周恩來作了總結性發言。他在指出武漢軍區支左犯了錯誤的同時，也肯定了軍區抓革命、促生產的成績。隨後，周恩來又向陳再道、鍾漢華做工作，勸他們承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陳等當時接受不了這種批評，不承認自己犯了這樣的錯誤。周恩來苦口婆心地開導他們：『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因此犯了錯誤。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為了打倒你們。』他還告訴鍾漢華說：毛澤東離京時就講到要去武漢保陳再道。

當天晚上，周恩來要回北京，臨行前特意帶陳再道等人去見了還在武漢的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就問陳再道：『你們怎麼樣啊？』陳再道回答說：『我們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澤東見他這樣回答，就笑道：『這怕什麼呀？現在他們一提就是路線錯誤，誰都是路線錯誤。』接著說：『工作要做好，慢慢來，不要著急，首先要抓部隊的工作做好，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群眾組織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來開會協商，解決問題。』經毛澤東這麼一說，陳再道等人心裡感到踏實多了。陳再道說：『希望中央文革小組出面解決武漢問題。』毛澤東說：『要對「工人總部」做工作，要擁護軍區。他們要打倒你們，我們要他們（指中央文革）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但不打倒你們，而且擁護你們為止。』說到這裡，他讓謝富治和王力開設一個接待站，專門接待來訪群眾，做思想工作（不過，謝、王並沒有這樣做）。毛澤東在談話結束時說：『武漢的形勢還不錯嘛。你們想一想，一個工廠，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們相信嗎？』當陳再道等人起身告辭時，毛

澤東親自送他們到走廊上，還招呼服務員同他們握手，風趣地對服務員說：『再不能打倒你們司令員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來先前曾經指示謝富治和王力，到武漢暫不要公開露面，不要作傾向性表態。但在到達武漢當天的夜裡，謝富治、王力就上街看大字報，與造反派談話，並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漢造反派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歡迎』謝富治、王力來解決武漢問題，稱他們為『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武漢軍民為之震驚，謝、王來到武漢，連一些高級幹部都不曉得，造反派怎麼知道的？

在周恩來在武漢召開的匯報會上，謝富治違背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指責陳再道『支保（保守派）吃「左」，屁股坐歪了，方向錯了。』還武斷地說：『「百萬雄師」是壞的，「三鋼」、「三新一揪一武老譚」，是把矛頭指向走資派，大方向是對的。你們得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不轉變，你們自己考慮。』

謝富治、王力繼續四出活動，不斷接近造反派代表，發表講話支持他們。七月十七日晚，他們到『百萬雄師聯絡總站』，指責其為『反動的保皇派』。他們還讓聯絡總站開出了一張『百萬雄師』『頭頭』們的名單（到了七月二十七日，這張名單上的十三個人全被加上各種罪名逮捕了，其中的八人一直關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醫』而放出來）。第二天，『百萬雄師』所屬各組織得知王力在他們的聯絡總站的言論，感到十分憤慨，很快就貼出了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下車伊始，哇喇哇喇！』『我們不是阿斗！』有些標語還直接點名批評王力，要他下連隊當兵，到工農群眾中去。

七月十八日晚，周恩來離開武漢回京。謝富治、王力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視若罔聞，仍繼續在群眾中煽風點火（就連遠在北京的葉群，也打電話給劉豐等人，要他們『有事找王力，聽王力的話』）。他倆在機場送走周恩來後，馬上驅車徑直前往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造反派總部。他們一到那裡，先戴上了造反派袖標，並視察據點、工事，慰問武鬥中負傷的人員。王力在大會上講話說：武漢問題一定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復返……

七月十九日，造反派用無數個高音喇叭，在武漢到處播放謝富治、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同時，還播放了王力的『四點指示』：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聽到這些，武漢軍民群情激昂，『百萬雄師』更加怒不可遏，一時間，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的街頭。

當天下午，武漢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為了儘快穩定局勢，軍區領導請謝富治、王力出面做工作（據陳再道說：經謝、王兩人商定，由謝出面講話，王就不說了）。

謝富治在這個會上講了話。他說：武漢軍區解散『鋼工總』是錯誤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軍區要發表聲明公開承認錯誤。『三鋼』、『三新』是革命派組織，軍區應該支持他們。『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不能依靠他們。可能是王力嫌謝富治的講話不夠有力，他又即席發表一通『高見』。

陳再道等對王力的講話十分不滿。他在後來撰寫的一書中回憶說，武漢軍區與會的幹部對王力感到最不滿意的地方，是他那種盛氣凌人、讓人難以忍受的傲慢態度。「王力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用教訓的口吻說：『看來，你們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給小學生上課一樣，從一年級的第一課講起……』從會場上的氣氛看，大家對王力的開場白，有的表現不解，有的表現愕然，更多的與會幹部則被激怒了……坐在台上的王力，似乎沒覺察到這些，沒完沒了地講了起來。他從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寫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講起，一直講到一九六七年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王力還結合武漢的實際情況說，武漢的「工人聯合會」，也就是「百萬雄師」的前身，一開始就是陶鑄的官辦組織，是用來破壞工人運動的。而「工人總部」則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點燃了武漢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因而要大樹特樹「工人總部」等等。在講到當前鬥爭的主要矛盾時，王力還無中生有地宣稱，現在的主要矛盾，是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看不到這一點，因此發表了《二·二八聲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眾打成了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王力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講得嘴角冒白沫，一直講到夜裡十一點多鐘才收場」（陳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〇事件親歷記》，解放軍出版社，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王力的講話不僅沒有達到給軍隊做工作的目的，反而激怒了到會的幹部，造成了地方兩派更大的對立情緒。

楊成武曾經說道：那天「王力的講話，既沒有請示周恩來，也沒有向毛澤東報告。就在毛澤東認為武漢問題解決在即的時候，由於王力在幾個地方發表違背「七·一八會議」精神的講話，頓時加劇了武漢的形勢的混亂，挑起了兩派之間更大的鬥爭，導致了「七·二〇事件」的爆發。」（張子申：

《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一百八十頁。）

就在軍區幹部開會的時候，『百萬雄師』集合群眾抗議王力於十八日夜在水利電力學院的講話。他們乘坐幾十輛拉響警報器的消防車、上百輛大卡車湧進軍區大院，質問王力憑什麼把『百萬雄師』組織打成『保守組織』……軍區領導要求謝、王出面會見『百萬雄師』代表，但他們拒不會見，事態進一步擴大。

七月二十日凌晨，兩千多名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的『百萬雄師』群眾，乘坐卡車、消防車來到軍區大院，當眾宣佈要求當面質問謝富治和王力：『百萬雄師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性路線錯誤？』『說『百萬雄師』是保守派是什麼意思？』『軍區負責人做了大量工作，都希望謝、王兩人出來接見，可是他們拒不接見。結果，上午七時許，二百多名『百萬雄師』代表和一些戰士到謝富治、王力下榻的東湖賓館繼續要求與王力對話。王力仍拒不相見。當群眾衝進屋內，要求他去軍區大院與大家對話，他依然不走。與他相隨的幾個『北航』的造反派依仗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辱罵群眾，激起了人們更大的義憤。在一片叫喊聲中，『百萬雄獅』的代表和一些軍區戰士就把王力揪到了軍區大院，王力這時挨了打，腿部受傷。接著，『百萬雄師』調出二百多輛汽車，出動數萬人上街遊行（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軍區和駐軍的幹部和戰士），造成武漢三鎮交通中斷。當天下午，『百萬雄師』召開了七萬人大會，向王力示威。軍區領導及時採取措施，將王力轉移到了安全處所，予以保護。

對於這些情形，有關方面經過核查後指出：『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親赴武

漢，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步驟和方法作了明確指示，交代謝富治，王力等人，對群眾組織不要作傾向性的表態，要協助武漢軍區做好部隊和群眾組織的工作，要實行大聯合。但是，謝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漢以後，背著軍區黨委，私下四處活動，支一派壓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們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公開吹捧「三鋼」、「三新」等群眾組織，宣稱「我們是支持你們的」；而把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當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激化，釀成了「七·二〇事件」。

在經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轉發的湖北省委、省革委會、武漢軍區黨委《關於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的請示報告》中也說到了：『七月十四日，謝富治、王力、李作鵬等人來武漢，他們秉承林彪、「四人幫」的旨意，對抗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煽動反軍亂軍，破壞軍民關係，支一派，壓一派，支持武鬥，支持打砸搶，加劇武鬥升級，造成機關癱瘓，工廠停產，交通中斷，幹部、群眾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廣大群眾、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對王力等人的這些罪惡活動十分憤慨，七月二十日紛紛上街遊行、反對王力，有些解放軍指戰員和群眾，把王力拉到軍區大院進行說理鬥爭。這就是所謂「揪鬥、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就在這天的上午，林彪避開在北京的周恩來，和江青一起共同策劃給在武漢的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派邱會作、張春橋分別乘專機飛往武漢、上海。邱會作趕往武漢；張春橋則於下午四點二十分趕到上海，準備在上海『迎接』毛澤東。邱會作在下午五點多鐘見到毛澤東時，故意虛張聲勢說，外面形勢不好，林彪、江青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請主席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翌日（三十一日）凌晨兩點半，

毛澤東由武漢空軍劉豐等人秘密護送到機場，飛往上海。

陳再道後來說，林彪、江青『給毛澤東的那封信，到底寫的什麼內容，一直是個不解之謎。直到一九七四年，張春橋在空軍的一次講話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實情。張說，毛澤東在被送到上海後，一夜沒有睡覺，他對身邊的人說：『不是他們說的那樣吧？如果陳再道搞兵變，我們走得出來嗎？這都是他們搞的，我在那裡，為什麼不和我通氣呢？』……陳再道認為，這說明，當時毛澤東對林彪、江青等人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沒有戒心，他就會同意林彪、江青等人的『兵變』之說，那麼，這件事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關於林彪、江青寫給毛澤東的這封信，楊成武回憶說：『當時，群眾既不知道毛澤東在武漢，也根本沒有危及他安全的任何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行動，更談不上是什麼『陳再道搞兵變』。林彪、江青一夥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卻有意要把『七、二〇事件』說成是一個『兵變事件』。就在這天，林彪親自給毛澤東寫信，並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認為此事至關重要，找到陳伯達、關鋒一起修改，最後又簽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同時署名的信由邱會作帶著飛抵武漢。當時我正在機場安排毛澤東（去上海）的飛機，邱會作就把信交給我。信封上寫著『親啟』兩個顯赫的字，我便馬上呈送毛澤東。毛澤東拆閱後，把我找去說：『準備馬上離開武漢，去上海。』因為這封信危言聳聽地說，武漢形勢不好，毛澤東的安全受到威脅，要及早轉移……妄圖嫁禍於陳再道。』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楊成武隨毛澤東乘坐飛機到達上海，住進虹橋賓館。第二天，毛澤東對楊成武說：『武漢的問題，我看當作錯誤處理，如果他有什麼決心，我們也出不來，總理他們也進不去，他並沒有下命令，無論誰

也不准進出，可見陳再道並沒有下個死命令。『他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將陳再道等四人保護起來。』又過一天，毛澤東對楊成武說：『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如果陳、鍾要整我，我們從武漢也出不來啊！』（《楊成武將軍訪談錄》第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四、一百八十五頁。）

周恩來在北京得知武漢發生突發事件的消息後，決定立即去那裡親自處理。

七月二十日下午三點五十四分，周恩來乘坐專機直飛武漢。飛行途中，隨行的吳法憲一面欺騙周恩來，說：『陳再道已派部隊包圍了武漢王家墩機場，要劫持周恩來，專機不能在那裡降落』，一面又給林彪辦公室打電話：『武漢有幾十輛汽車衝進機場，要劫持總理。武漢軍區有鬼……』由於吳法憲的從中搗鬼，把周恩來的專機調到距武漢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機場降落。在專機到達之前，吳法憲已以『反兵變』為名，指使武漢空軍緊急調來空降部隊，提前控制這個機場，故意製造緊張空氣。周恩來不以為然，讓秘書與中央警衛團的負責人和兩個中隊留在機場，僅帶隨身的兩名衛士，立即乘坐汽車趕到了市區。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和穩定武漢局勢，他廢寢忘食，周密安排。毛澤東安全抵達上海後，他又令部隊找回一度『失蹤』的王力。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武漢軍民繼續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此間，『百萬雄師』收到湖北二十多個縣、市的聲援電報，還得到陝西、遼寧、四川一些群眾組織的聲援。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周恩來在王家墩機場召集武漢軍區負責人開會，希望儘快穩定武漢局勢和武漢軍區的領導班子。他讓武漢軍區的葉明、孔慶德住到某師去，暫在那裡主持軍區的工作；並讓他們轉告陳再道和鍾漢華迅速表態，爭取主動，這樣他才好說話。他還特別強調：武漢空軍仍是雙重領導，

要聽武漢軍區的話，不能隨意表態。他在整個談話中，並未責備武漢軍區。當天下午，他即離開武漢。當時在場的李作鵬和劉豐等人陽奉陰違，周恩來剛走，李作鵬就叫海軍黨委給海軍駐漢單位發電報，要他們表態『打倒陳再道』。受其操縱的東海艦隊很快就發表了《嚴正聲明》，說：『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林彪、江青等人組織數萬人到北京西郊機場歡迎從武漢飛回的謝富治、王力這兩個『英雄』。本來，周恩來乘坐的專機比謝、王乘坐的飛機約晚半小時從武漢起飛。可是，在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策劃下，通過吳法憲的操縱，周恩來的專機提前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逼他參加為迎接謝、王『凱旋』而歸的『歡迎儀式』。

當天晚上，林彪親自主持會議聽取謝富治的『匯報』，當場決定：把『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同時，決定以中央的名義調陳再道、鍾漢華進京及召開一百萬人參加的『歡迎』謝富治、王力的群眾大會。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聲討『七·二〇事件』。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獨立師師長）、蔡炳臣（獨立師政委）、巴方廷（武漢市人武部政委）等一行共十五人飛抵北京。剛住進京西賓館，他們就遭到數以萬計的北京文藝系統造反派成員的圍攻。雖然在現場反覆播唸周恩來要造反派馬上退走的指示，並向造反派頭頭做工作，但均未奏效。後經周恩來嚴令跟造反派關係密切的謝富治、戚本禹前去做工作，造反派就『撤走』了。但是沒過多久，由林彪、葉群指使的三軍造反派包圍了京西賓館，並且衝進賓館『找陳再道辯

論』。在葉群的親自佈置下，『打倒陳再道、鍾漢華』和『揪出「黑後台」徐向前』的大標語貼滿全城。當天晚上，康生和吳法憲親自坐陣，在京西賓館『開會』批鬥陳再道、鍾漢華等五人，有武漢部隊師以上幹部參加。一些便衣打手對被鬥的陳、鍾等人拳打腳踢，逼他們下跪，搞了一個通宵的殘酷鬥爭。

中央文革小組在討論『七·二〇事件』宣傳口徑時，康生和江青、陳伯達等人堅持要寫上『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華社送審《首都百萬軍民集會支持武漢革命派》的新聞稿時，由關鋒執筆，康生審定，加上了『堅決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頭條發表了這條新聞和相應的社論；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表寫有『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七月三十一日，謝富治接見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他一再挑動搞亂軍隊，揚言：『軍內確有一小撮走資派』，『現在這兒揪陳再道，那兒揪陳再道，這是真的。軍內有真正的陳再道』。八月一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

從此以後，到處發生揪『陳再道式人物』和衝擊軍事機關的嚴重事件，不少部隊內部兩派尖銳對立，全國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浪潮——就是在那封《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鼓吹的『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這場在武漢發生的、當時震驚中國的事件，反映了廣大群眾和軍隊官兵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抗

和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左』傾錯誤的強烈不滿。

林彪、江青掀起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徐向前、徐海東、王任重、彭紹輝等人被誣為『七·二〇事件』的『黑後台』，徐向前和徐海東的家多次被抄，許多軍隊負責人被批鬥、監禁，遭到殘酷迫害，甚至連一些在農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人民武裝幹部也被打成了『陳再道式人物』。據中共湖北省委統計，湖北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後，被打傷、打殘、打死、打死的軍民多達十八萬四千餘人，僅武漢市就有六萬六千餘人致殘，六百餘人被打死。如果加上其後林彪、江青於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又一次挑起的造反派之間武鬥所造成的傷亡人數，就更加駭人聽聞了。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北省委、省革委會、武漢軍區黨委在給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的請示報告》中明確指出：『經過長期調查，證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鬥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是他們陰謀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報告》記述了這一事件的經過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並且反映了廣大群眾要求澄清這一事件的性質的強烈願望，要求把被林彪、江青一夥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報告》強調指出：省委、省革委會和武漢軍區黨委『一致認為這個事件是林彪、『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而製造的陰謀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實，顛倒敵我，混淆是非的，應公開宣佈徹底平反。』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同意並向全黨轉發這一《報告》的《通知》。事實正是這樣，當時林彪、江青一夥，處心積慮要打倒不跟他們走的軍事將領，圖謀把全國各軍區都置於他們的幫派

控制之下。製造武漢「七·二〇事件」，就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

二、外交部奪權前後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武漢的七月風暴尚未完全平息，中央文革小組又煽動了外交部的奪權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

早在『一月奪權』以前，江青一夥就覬覦外交部的大權。他們煽動外事系統的學校造反派『火燒』、『炮轟』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特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陳毅、賀龍、徐向前和葉劍英四位老帥在北京首都工人體育館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講話以後，向陳毅造反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時，四位老帥講話的情形是這樣：陳毅等幾位老帥以及其他軍隊的高級領導人，目睹由林彪、江青一夥煽起的這場動亂不斷升級，特別是當動亂衝擊到軍隊及出現了部分軍事院校學生衝擊國防部的嚴重事件後，無不憂心如焚。這年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兩次大會上，老帥們向這場動亂作出最初抗爭。他們義正詞嚴地提出『國家不能亂，軍隊尤其不能亂！』面對來京串連的全軍院校十萬名師生，陳毅激憤地說：『路線鬥爭，第一個要顧大局……最近發生一些學生衝中南海，把中南海的鐵門衝開，竟然發生學生衝國防部，我堅決不同意！』『動手打解放軍，又是解放軍的學生，沒有人聽到後不痛心的！我當解放軍，從一九二七年當起，當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嘛，我還

沒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哩……」陳毅又說：『我不贊成這個「逐步升級」的辦法。口號提得越高越好，口號提得越左越好，請大家考慮這個是不是妥當……搞倒幾個部長還不過癮，還要升級，那麼就是搞我們這幾個副總理，是不是？這就是叫作路線鬥爭，要有一定的限度。』葉劍英也說：『真理是有限度的，跨過了就成了謬論。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發生質變。』「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麼，你們如果不改，就是廢品。」他又說：『有人對人沒有階級感情，我對這件事情很憤慨……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南海，解放軍打解放軍，是少有的事，是無產階級的感情嗎？不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軍打解放軍是幫助誰？』徐向前說：『我們的陸、海、空軍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周圍還存在著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經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絲毫的鬆懈。」他還向聽眾指出：『各總部領導都有重要的任務，你黑夜、白天，白天、黑夜地纏住他們，這怎麼了得，國家的安全問題怎麼考慮？我們希望同志們不要做有損於解放軍榮譽的行動……』賀龍沒有講話，他以元帥身份出席這次大會，本身就有力地回擊了林彪、康生一夥的陰謀陷害和惡語中傷，粉碎了他們捏造『二月兵變』之類的彌天大謊。

老師們的講話，贏得全場春雷般的熱烈掌聲和高昂的擁護口號聲，但是受到了江青一夥的猛烈攻擊，他們叫囂『軍內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聲嘶力竭地叫嚷：『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北京各造反派組織緊跟『旗手』的腔調，打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招牌，掀起了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惡浪。造反派將批判陳毅的調子急劇上升，並在一九六

七年『一月革命』風暴中達到高峰，國務院的六位副總理都遭到了『炮轟』，陳毅首當其衝。

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在奪取上海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以及其他權』後，仍一個勁地、歇斯底里地叫嚷『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在『奪權』問題上，周恩來雖不同意，卻又無法阻擋，但他始終堅持一條：造反派只能奪取『文革』的領導權，而不能奪取各業務部門專管業務的權力；各業務部門仍應由原來熟悉業務的幹部掌握、領導，造反派只能實行『監督』。為此，他在各種場合同江青一夥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大鬧懷仁堂』一事被林彪、江青之流宣佈為『二月逆流』後不久，中央文革小組揪住幾個老帥、副總理不放，煽動外事系統的各路造反派集中火力轟擊陳毅。他們將呼喊的口號從『批判』、『火燒』，迅速提升到『炮轟』、『打倒』，最後竟打出了『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種對付敵人的口號。

在這場動亂中，周恩來始終挺身遮擋明槍暗箭，免使陳毅受到傷害和影響中國的外交事務。僅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五次接見了外語學院造反派，竭力說服他們正確看待陳毅和耐心講解外交部的權不能奪的道理。

此後，他還多次接見外事系統造反派。五月十五日凌晨周恩來緊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統院校紅衛兵代表，就外語學院紅衛兵於十四日為『揪陳』而強行衝入外交部之事件向他們發出警告：『你們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並且當場宣佈：『我要下命令讓部隊開去，以加強外交部的保衛！今後，誰也不許再去衝，不管哪一派，誰去衝就扣留誰！』可是，外事系統的有

些造反派組織一意孤行，竟然貼出了矛頭對準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朝他『炮打』起來。

七月十三日，戚本禹組織成千上萬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外搭設帳篷，圍困中南海，設立『揪劉火線』，並在那裡召開了數十萬人參加的『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在謝富治、戚本禹的慫恿煽動下，北京外國語學院等外事系統一些院校紅衛兵又組成千人『揪陳（毅）大軍』，從七月十五日起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外交部辦公樓門前『安營紮寨』。他們架起高音喇叭，日夜喧嚷，同時組織街頭集會，堵塞交通，阻撓外交活動，使外交部所在地區連續數周不得安寧。他們妄圖以此向周恩來施加壓力，逼他交出陳毅。

這些造反派，趁周恩來七月十四日晨飛往武漢的時候，在戚本禹的煽動下開始行動，圍困外交部。周恩來解決了武漢問題回到北京後，立即指派身任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去做勸說工作：要求衝進外交部的造反派，必須迅速撤離外交部。謝富治對周恩來的指示陽奉陰違。他參加造反派反對陳毅的『聲討大會』，主動地到『安營紮寨』的造反派中表示『慰問』，一再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對周恩來要他們必須迅速撤離外交部的指示卻隻字不提。戚本禹則向造反派進行『火線鼓動』，『指示』他們說：『揪陳是革命行動！』『外交戰線的希望，看來就寄託在這些革命小將身上了！』

受到謝富治、戚本禹撈腰打氣的造反派們將反對陳毅的言行上升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不顧周恩來的多次批評和嚴厲警告，悍然聲稱：不交出『三反分子』陳毅，決不收兵。

八月四日，北京新聞界舉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鬥爭』大會，關鋒、戚本禹由中央文革小組派去

參加了大會。他們和外交部造反派頭頭姚登山策劃了外交部的『奪權』問題——姚登山原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在印尼政府宣佈同中國『斷交』後，他曾作過鬥爭，在率領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人員撤回北京時，曾經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歡迎和接見，成為赫赫有名的『紅色外交戰士』，後來成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頭頭（其後在奪權中掌握了幾天外交部的實權，於是曾經有人叫他『姚登天』）。戚本禹向姚登山講了兩點：一是陳毅應該下到群眾中去接受批判；二是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

這次大會結束後，姚登山即向外交部的造反派傳達了戚本禹的上述談話。當時外交部除『革命造反聯絡站』外，還有一個和它觀點針鋒相對的『革命造反總部』。後者雖然人少勢孤，備受壓制，被對立面稱作『老保』，但仍自強不息，堅持鬥爭。他們聽到了姚登山傳達的戚本禹的講話，認為戚本禹這個煽動群眾鬧事的談話與周恩來保護陳毅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八月五日，他們向周恩來、同時也向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等上告（還附上了姚登山講話摘要），指責姚登山編造謠言，煽動群眾、『聯絡站』要打倒陳毅奪權的大方向是完全錯誤的。王力看了不以為然，還寫信『安慰』姚登山，說：『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此事又進而引出了王力發表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八·七講話』（有人稱為『王八·七講話』）。

王力的『八·七講話』，是王力八月七日在釣魚台『召見』姚登山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時的談話。當時，我雖然已被江青下令趕回到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但尚未離開釣魚台，所

以也拿到了一份印發的『八·七講話』記錄。這個記錄自然是徵得了王力本人審查、同意過的（這點姚登山也予以證實了）。

記錄有以下方面的內容：王力『左小腿部分打著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因在武漢事件中受傷。姚登山首先提問：『武漢問題解決了吧？』王力脫口而說：『解決了。武漢問題證明一個道理，凡是爛透了的，可以很快、徹底、痛快地解決。凡是不痛不癢的，要拖些時候。武漢這次事件後，軍區立即改組，司令部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〇一部隊調出去改編，「公檢法」徹底改組，武裝部徹底改組，對革命造反派堅決支持。對「百萬雄師」本來想慢慢誘導，現在問題一清楚，下面起來造反，問題就解決得快』

王力說完開場白，就讓大家先匯報外交部運動進展的情況。

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一開始講了外交部的運動『三起三落』。他們認為，陳毅是外事系統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根據他的『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所以行動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要把陳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他們說：有關陳毅問題的看法，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的運動阻力仍大。

當造反派的代表說到這裡時，王力插話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部曉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部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造反派說：外交部『走資派』沒有真正打倒，業務還是原來的班子抓。

王力立即發出了一連串的提問：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戚本禹那天對姚登山講的話是對的。總理不是講過『三結合』嗎？老、中、少『三結合』，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代表說：有人批評我們奪權過頭，說業務權是中央的。

王力說：這話不對。外交業務權指路線方針政策，這個權集中於中央，集中於主席。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如果你們奪了權另搞一套路線、方針，那就不對。按照中央方針政策，具體執行和貫徹，誰執行和採用什麼方式是另一個問題。幹部司掌握人事大權不能動，那麼照這樣說來，中央組織部要恢復囉！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你們要充分運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選幹部，你們監督就要把它監督掉。挑幹部出國也好，幹什麼都好，第一條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沒有這一條什麼都不行。不看這一條，只看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這個統統打倒（說到這裡時，王力坐了起來，用手揮了一下，很激動）。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麼不可以？二十幾歲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我們小組的戚本禹、姚文元三十幾歲。沒有這首要的一條，不管什麼『長』，多少級，出去代表誰？代表毛主席？還是代表劉少奇、鄧小平？我看你們現在沒掌權，有點權才有威風。出國首先提出什麼『長』，多少級，不管是擁護毛主席還是擁護劉少奇的，這不行，這是原則分歧，要是這樣，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後出去要革命派來挑選，來審查。我們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邊……因為要辦外

交，要幾個『長』，當然這幾個『長』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組成的新班子堅決批判『三降一滅』，貫徹毛主席的外交路線。你們要記住一個最根本的分界線，是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以此為分界的條條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王力最後說……八月五日姚登山向全部同志傳達了關鋒、戚本禹和我的談話。我們知道有人反對，現在竟有人告狀告到我們這裡，告到總理、伯達、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做法，鮮明的反對！姚登山傳達後，群情激昂，這竟成了罪狀，說什麼『居然喊出打倒劉、鄧的口號』，對他們來說，這倒成了罪過。為什麼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

接著王力唸了『革命造反總部』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信說：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做檢查，就是可以揪。揪他有什麼不對？不是革命行動，是反革命行動？堵了外交部大門，這當然是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網，說的那麼嚴重。

王力的『八·七講話』以後，外交部造反派更加走入歧途。他們無視周總理的一再批評和警告，肆意妄為，終於在八月十九日衝砸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佈『奪取』外交部黨委大權。他們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將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關入地下室寫『檢討』。『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時間，整個中國的外交事務陷於一片混亂。奪得外交大權的造反派們竟堂而皇之地行使

起『外交部長』、『副部長』的『職權』，開始發號施令。在他們的『批准』下，在短短的幾天內，就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中國駐各國的外交機構。其中，還強令中國駐外使領館『貫徹執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就這樣，一直由毛澤東、周恩來掌握的中國外交大權一度落到了一夥篡權奪位的野心家手中。

三、『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就在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後的數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這是一起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發生的最嚴重的涉外事件，它給中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害。

一九六七年五月間，香港一家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這一事件迅速擴大，香港市民同港英當局的衝突逐步升級。中國政府對此作出了一系列強烈的反應，北京、上海等地相繼發生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和舉行示威遊行。在中央文革小組操縱下，北京外國語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北京第一機床廠等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於七月間聯合成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專門造『國際帝、修、反』的反。這時，一些港人與港英當局發生了衝突，港英當局迫令《夜報》、《田豐報》、《新午報》停刊，還逮捕了十九名愛國的新聞界人士和三家報紙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八月二十日，中國外交部就此事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最後通牒』式的照會，表示最強烈抗

議，提出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上述三報的停刊令及釋放被捕人員。同時，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聲援香港同胞、聲討港英當局的大會。『反帝反修聯絡站』也決定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採取『革命行動』。外交部和外事系統院校許多人都參加了對英國代辦處的圍攻和聲討。

周恩來早已預感到事態有可能發展和擴大，曾經派秘書和有關人員多次勸阻造反派不要衝擊英國駐華代辦處。但此時此刻，他的指示已經無效。八月二十二日，在事態一觸即發的緊急關頭，周恩來力挽狂瀾，親筆寫出指示，急速派人送到這場暴亂的始作俑者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那裡，要求他們簽名向群眾傳達，以便能夠阻止事件的惡性發展。可是這幾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故意拖延，任憑事態的蔓延發展。當晚二十二時三十分，成千上萬包圍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外面的造反派，不顧北京衛戍區部隊人員的極力勸阻，從三面衝進英國代辦處的院子，並且立即在東、西院一齊點火，燒燬了東院的門窗、汽車房、油庫、七輛汽車和西院樓內的三個臥室、檔案室及兩輛汽車。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及數名外交人員從大火中撤出，少數人逃離代辦處到附近使館和公寓避難。經趕來救火的衛戍區部隊和消防人員奮力撲救，大火於零時許熄滅。

很快，英國《每日電訊報》駐華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在其所著《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中，按照自己親眼目睹的實況和本人的觀點，對這次事件的過程作了詳細的記述：「八月二十二日，大批群眾聚集在英國代辦處門外。由於中國政府已照會香港當局，限四十八小時釋放被捕人員，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其餘二十三名代辦處工作人員（其中五名女士）正在等待消息。代辦處門外，

中國軍隊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示威者以保護裡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十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

『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裡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通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裡大約有五千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婦女發瘋似地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確實不知道怎麼到了那個離門不遠的地方。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胳膊，用中文朝我喊「這邊來」。他拉著我朝英國代辦處後面的印度使館跑去，在那裡，他將我藏在印度使館的大門後……』』

克萊爾還寫道：『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凌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髮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有一個領頭的——「家庭出身好」——還穿著精製的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踩。』

『高音喇叭內播出了周恩來的指示。命令人們解散，但也沒有立即奏效。直到凌晨，狂熱的人群才離

去。』

八月二十三日，新華社報道了這次事件，說道：『被英帝國主義瘋狂迫害我香港愛國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首都紅衛兵和群眾一萬多人，今晚湧到英國駐華使館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且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一周後，中國駐英代辦處在倫敦遭到英國政府的報復。新華社於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報道：二十九日，英國『出動大批警察、特務、暴徒，兩次襲擊中國駐英代辦處，並野蠻地打傷我代辦處工作人員多人』。這天上午十一時，英方藉故尋釁：『一批暴徒立即蜂擁而上，對我代辦處工作人員進行挑釁和襲擊，首先動手毆打我工作人員，在場的警察和暴徒一起毆打，打傷我工作人員多人。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大批英國警察、特務又有計劃地在我代辦處汽車庫門口製造了更加嚴重的流血事件。當時，一名便衣特務在我代辦處工作人員面前故意將毛主席像章顛倒佩戴向我挑釁，我代辦處工作人員當即向他提出嚴重抗議和警告，並要他賠禮道歉。正當我代辦處工作人員同英國警察特務進行說理鬥爭時，數十名手執警棍的英國警察一擁而上，野蠻地毆打我代辦處工作人員。許多同志被打倒在地，血流滿面，代辦處司機于慎之同志頭部被打破，傷勢十分嚴重。我代辦處工作人員李殿昌被數名警察按倒在地，蠻橫地毆打，頭部和下額受重傷。代辦處工作人員李惠堂、王振譜也被警察毆打受重傷。當時在場的我代辦處其他工作人員也遭警察毒打，多人受傷。』報道還說：中國駐英代辦處臨時代辦沈平，在事件發生後，立即用電話向英國外交部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在這之前，沈平從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已多次就英國政府對我駐英代辦處及其他機構所採取的一系列非法措施和野蠻行徑向英國當

局提出過最強烈的抗議。

四、毛澤東批准採取斷然措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在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系統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他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佈：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佈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三、封副部長們的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犯罪了！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交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儘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控，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就在這次召見中，有的造反派頭頭仍然固執己見、執迷不悟，公開頂撞、打斷周總理對他們的批

評，還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講話』，為自己的極端行為辯解、掩護。這些動向引起了周恩來的密切注意。

江青一夥唆使造反派繼續挑起事端，以激怒毛澤東，扳倒周恩來這根頂樑柱。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外事系統造反派繼續在陳毅『問題』上作文章，一再無理阻撓周恩來出席『批判』陳毅的大會，並威脅將組織『群眾』衝擊會場。他們簡直喪失了理智，根本不聽周恩來的批評和勸阻。對此，周恩來無比憤怒！他義正詞嚴地向造反派指出：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你們採取輪流戰術，從（二十六日）中午二點到現在，整整十八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先前在會議進行中間，周恩來的心臟已隱隱作痛，連服兩次藥後仍不見好轉。他的保健醫生焦灼不安，寫紙條給姚登山，姚竟置之不理。造反派繼續糾纏不已，保健醫生忍無可忍，衝到姚登山面前憤慨地說：『如果總理今天發生意外，你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罷攙扶周恩來離開會場。那班造反派仍在叫嚷：『我們就是要攔陳毅的汽車！』『還要再衝會場！』已經走到門口的周恩來陡然回轉，兩眼燃燒著憤怒的火焰，厲聲對他們說：『誰要在路上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會場，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由於心臟病發作，周恩來從這時起到二十八日下午五時，整整三十六個小時無法工作……

外交部『奪權』後不久發生的這次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國際影響，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代革命家艱辛開創的新中國外交事業的一次嚴重破壞。這次事件顯示全國混亂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中央文革小組乃是這一切混亂的總根子。這時要想穩定北京的局

勢，就必須對中央文革小組採取相應的措施。而要對中央文革小組採取任何措施，只有請毛澤東下決心才能辦到。

於是，周恩來命人找來王力「八·七講話」的記錄稿和其他有關材料，委託人民解放軍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帶往上海向毛澤東當面匯報，請他定奪。在楊成武按總理的指示向毛主席匯報和轉交材料的兩天後，毛澤東對楊說：「你回去告訴總理，「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單獨當面向總理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請總理負責處理。」楊成武記錄了毛澤東的話，又將記錄向毛澤東唸了一遍。臨上飛機返京前，他又到毛澤東住處，詢問他有何別的指示。毛澤東說：「回去告訴總理，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楊成武回到北京，立即向周恩來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做了一個用手抓的手勢。周恩來想了一下，果斷地說：「事不宜遲，馬上開會。」（見董保存著《楊余傅事件真相》，解放軍出版社，第七十三至七十五頁。）當時林彪不在北京。事後，楊成武說：「周恩來叫我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決定……當時，林彪正在北戴河休息，我一下飛機就直接到了林的別墅，匯報了毛澤東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處理情況後，他只是微微點了個頭。」（見張子申著《楊成武將軍訪談錄》第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七頁。）

據陳毅文學傳記《霜重色愈濃》的作者記述：「周恩來一拿到王力「八·七講話」記錄稿，立即報送正在上海的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看後，揮筆批了五個字：大大大毒草！不久，他在一份外交部送來的報告上又批示：總理說話不靈的局面再不能繼續下去，外交部是總理領導的，別人不能插手。毛澤東又指名由陳伯達去向造反派宣佈：封閉外交部無效，奪權的造反派退去，立即恢復姬鵬飛、喬冠

華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晚上，周恩來親自前往釣魚台主持處理王力、關鋒問題的會議，當場宣佈王、關隔離審查，會後即將二人軟禁到釣魚台二號樓內，不久被送入秦城監獄。

在周恩來主持的處理王力、關鋒問題這次會上，江青、康生和陳伯達深感大禍臨頭，為洗刷罪責，他們擺出一副『堅持原則』、『劃清界限』的面孔，狠加批判，把所有被指責的罪過統統推到了王、關的頭上。擅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康生、江青，還給王力加上『國民黨特務』的罪名，甚至將其妻王平權的家裡誣蔑成是『一窩黑貨』。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對王力、關鋒宣佈隔離審查後，『外交部展開了，批極左，抓壞人一的群眾運動；造反派薦頭了；「革命幹部」姚登山被審查了；姬鵬飛、喬冠華又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曾對此事加以評述。在『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一節中指出：當時『局勢的發展，已到了幾乎失去控制的地步。』『面對這種嚴重的局勢，毛澤東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八月底，他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一九六八年一月，又對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同時，中央連續發佈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物資設備、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命令，採取了保護外國使館和外國僑民的措施，還決定對一些最亂的省市和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毛澤東領導採取的這些措施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對於制止局勢繼續惡化，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

史出版社，第二百零五頁。）

還有不少書刊評述了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有位作者評稱：『一九六七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後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借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衝，接下來，便是戚本禹。王、關、戚的相繼倒台，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金戈：《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二百三十七、三十八頁。）

這次戚本禹雖還暫未觸動，但也不免兔死狐悲、心顫膽寒。他自然明白，自己的『前程』不妙。五天以後，即九月四日，戚本禹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並在信中向毛澤東反映了處置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引起的劇烈震動。他說：『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什麼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裡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單從派張春橋和戚本禹前去『看了』和『開導』王、關的舉動，就可看出江青對於處置王、關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她對處置他們兩個雖不情願，但只好『捨車馬、保將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凌晨，戚本禹被叫到中南海懷仁堂，也被抓了起來，逕直送往秦城監獄。這次由毛澤東批准、周恩來執行的處置王、關、戚的事件，無疑，是對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沉重打擊，迫使它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

江青一夥野心家、陰謀家，為了實現篡黨奪權的政治陰謀，大耍資產階級政客兩面派手法，欺世盜名。他們感到對於王、關、戚的處置已經回天無術、無計可施，便立即將臉色一變，轉而對王、關、戚進行公開聲討，說這三個人是『混進』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小爬蟲』，以示徹底『劃清界限』。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毛澤東接見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幹部的會議上，他們竟胡編亂造，將王、關、戚的事與被他們誣陷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聯繫在一起，把楊、余、傅說成是王、關、戚的『後台』。

在這個會上，江青居然聲稱：『像王、關、戚，我們過去是不知道的。他們原來就在中央文革起草小組的時候（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成立），他們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安插進來的，他們就是劉、鄧、陶，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成武）的黑秀才，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許多事不請示伯達同志和我，更不請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他們封鎖，並且把我們架空，使我們和同志們隔離，和小將們隔離，他們幹了許多壞事……』——江青信口開河，越扯越遠，顯然她是因『操勞』太多而變得健忘了。陶鑄一九六六年六月間才從廣州到北京任中央宣傳部長，八月間

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第四把手』的。

陳伯達和著江青的腔調，講道：『我們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中的幾個小爬蟲關、王、戚，或者講王、關、戚，揭露出來了……像王、關、戚，就是一種變色的小爬蟲。我們在文化革命開始時，他們就變了顏色，鑽到我們的隊伍裡來，也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他也指名道姓地說了楊成武『實際上是王、關、戚的後台』的話。

康生也用同一個調子說：『在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奪取全面勝利的階段，毛主席的陽光，又將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隊伍中間，是劉、鄧安置的變色小爬蟲，王、關、戚的面目被揭露出來了……他（按：指楊成武）表面上反對王、關、戚，但實際上他是王、關、戚的黑後台。』

過了三天，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大會上，康生、江青依然信口雌黃，蠱惑人心。

康生當著數萬與會者枉口拔舌，說：『鑽進中央文革的劉鄧分子王、關、戚，企圖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麼人呢？王力是個國民黨。王力是執行鄧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線的積極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軍會議上就執行鄧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線，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欣賞，還要送給他金質獎章。關鋒、戚本禹是什麼人呢？他們是彭真的親信……』江青又數黃論黑地說道：『這些變色的小爬蟲，他們勾結楊成武，他們勾結很早了，我們不知道，勾結著余立金、傅崇碧。他們企圖在群眾面前造成中央文革出了壞人了，來否定中央文革，這意味著什麼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及部黨委成員，重申：外交部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管。我管。他嚴厲批評了帶頭在外交部『奪權』的姚登山，批評他到處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口號的錯誤。周恩來說：『你在外面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在外貿部的講話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個剛回國的代辦，客觀上是在對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回答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的精神講的。』當時他還不知道，王力已在前一天，即三十日被隔離審查。

對於前一時期『炮打周恩來』的逆流，周恩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節外生枝，無中生有，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他還指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正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連續接見各地駐軍及有關省、市負責人，向他們提出：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後再攻別人；外事系統裡有壞人、『黑手』、反革命。

五年以後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奈克夫人時曾說：『我們的左派是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裡頭。』『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

多年後，一位曾經訪問過剛從監獄釋放不久的姚登山的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一九六七年八月

間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事件寫有這樣的一段話：『王力這個講話的焦點在於陳毅，當時是否打倒陳毅已經成了雙方爭執的中心。一方是搖旗督戰的王、關、戚，一方是竭力保護陳毅的周恩來，雙方都很清楚，一旦陳毅被打倒，接著就是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最後是周恩來。筆者當年曾追問過一個外交部造反派的骨幹，為什麼非要打倒陳毅不可？據說這個能「通天」的頭目支吾一陣後喊出了一句話：「因為不打倒陳毅，就不能打倒周恩來！」』（司任：《文化大革命的外交部奪權動亂——姚登山一席談》）

第八章

鴟梟鳴銜軌，豺狼當路衢

這裡記述的，是筆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陳伯達、康生、江青、林彪的片斷印象。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場突然降臨的浩劫，幾乎所有的人（或說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思想準備。但是為時不久，這場『革命』的本質和一些偽君子的真面目，就逐漸地為人們所識破。許多人出於對這場『革命』的懷疑和不滿，戲謔地把它叫作『大革文化命』，而把由陳伯達主持撰寫的那篇《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顛倒過來，唸作『牛鬼蛇神橫掃一切』。

日益覺醒的人們驚奇地發現，這幾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被造反派奉若神明的『左派領袖』，原來是一夥篡權奪位的野心家，是一幫口是心非的兩面派。他們口口聲聲反對『走資派』，朝朝暮暮發誓要『防止反革命政變』，不過是在玩弄『賊喊捉賊』的伎倆。實際上，他們才是最大型

號的『牛鬼蛇神』，是『正在走』的『走資派』，是全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厚顏黑心、刁鑽陰鷲；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發跡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災難之上。他們出於奪權篡國的野心，不惜塗炭生靈，迫害無辜。

這夥野心家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不能僅僅歸咎於他們的個人品性，而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個人崇拜的盛行，封建專制主義的遺毒，民主與法制的被踐踏，社會風氣的被嚴重破壞，為這種現象提供了滋長的土壤。社會上，這類人並不多，只因他們官高位顯，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給社會造成的危害特別大。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公開審判，人們看到了他們的廬山真面目。但對他們如何陰謀策劃、陷害忠良，並不是盡人皆知的。充分地揭露他們犯下的罪行，有利於識別這一類人，以減少對社會和大眾的禍害。

一、兩個陰謀家的勾心鬥角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幾個人之間，自始就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即使在掌有小組實權的江青、陳伯達、康生三人之間，也存在著非常尖銳的矛盾和爭鬥。

陳伯達這個組長，始終受江青、康生掣肘。江青不但有『高參』康生為她搖鵝毛扇、指點迷津，還有一個刁鑽陰鷲、見風使舵，被公眾稱作『狗頭軍師』的張春橋。他們三人聯手鬥法，自然使野心

雖大卻又書生氣十足的陳伯達自感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講話的時候，就曾不勝感慨地說，他不過是『劉盆子』。——劉盆子，原是赤眉軍中的一個放牛童子，因係西漢遠支皇族，公元二十五年被赤眉起義軍抬出來當了皇帝，但朝政實權都操縱在丞相徐宣、御史大夫樊崇以及其他起義軍首領手中。赤眉義軍攻入長安立國，公元二十七年，因飢荒向東撤退，陷入東漢光武帝劉秀所部重圍，當了不到三年小皇帝的劉盆子即隨樊崇等人投降劉秀。陳伯達之所以這樣講，無非是讓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江青當家，他這個組長不過是個傀儡而已。他的這種處境，在當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因此，雖然他在『文革』中幹了不少壞事，並因此於一九七三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和於一九八〇年，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被押上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的被告席；但還有些情況使他有別於其他主犯。他的辯護律師甘雨沛在談到『被告陳伯達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時，為其作了較為客觀的辯護。他說：『被告陳伯達在誣陷、迫害劉少奇這一共同犯罪活動中，他負有一定罪責，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於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陳伯達在庭審過程中，承認了全部犯罪事實和所造成的後果，承認他的『罪惡是重大的』，並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擔罪責，接受應得的懲罰，態度是比較好的。因請法庭考慮能夠對他從輕判刑。』結果，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陳伯達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而江青、張春橋均被判決『死緩』，姚文元則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沒有點陳伯達的名。

一九六六年八月間，由於陳伯達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八月三十日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從此，陳伯達大權旁落，一切都憑江青說了算。江青頤指氣使，陳伯達阿諛逢迎，終使他越發陷入尷尬的困境。在各種群眾集會上，總是江青搶先講話，陳伯達跟著表態：『剛才江青同志講得很好。她的意見就是代表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方針。』在不少場合，他還得口角春風地吹捧江青是『好黨員』，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藝革命中『有特殊的貢獻』，等等。而在陳伯達和康生之間，則有著更加深刻的矛盾。陳、康二人都以『理論家』自詡。就其在黨內的歷史說，康生的資歷要老一些。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後，兩人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公佈的名單上，陳在前，康居後；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均為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仍排在康生前面。那時，陳伯達所任職務有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馬列研究院院長，面康生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此刻，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任組長，康為顧問。這兩個人極工於心計，彼此間常有明爭暗鬥。凡與他們有較多接觸的人，都會感覺到這一點。每每提到陳伯達的時候，康生經常會流露出一種不足掛齒的神態，有時甚至公開冷嘲熱諷，使對方尷尬；陳則顯得有點『窩囊』，雖對康處處設防，仍難於招架。兩個人雖然都是野心勃勃、慣於投機的政客，但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政壇上的大手筆；一個則遇事憂柔寡斷、畏葸不前，帶有明顯的書生氣。

一九六六年五月上旬，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從上海回到北京，剛住進釣魚台時，陳伯達就說：『釣魚台不能住！』為什麼，他不無譏諷地說：『人家早就說啦，住在釣魚台這樣漂亮的樓房，過這樣豪華的生活，寫不出好的反修文章』。大家聽了，都知道他是在影射康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康之間的芥蒂，其實，由來已久。還在一九六〇年時，中共中央為了適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調集了一個秀才班子住進了釣魚台。康生是這個班子的負責人。在以後的三年多時間裡，這個班子曾在報刊上發表了七篇重要的論戰文章；從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發表中共中央答覆蘇共中央來信的長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後，又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的名義接連發表了『九評』。其中有些文章是陳伯達受邀參加起草和審定的。當時，陳伯達對於這個秀才班子極想插上一手，但是一看康生那種咄咄逼人和惟我獨尊的派頭，不免望而生畏。陳伯達插不進手，始終耿耿於懷。上述陳的風言風語正是對康生不滿的發泄。

陳伯達為了表示其真的不想在釣魚台安營紮寨，便帶上了秘書，讓我和戚本禹陪著到外面找房子。雖看過不少個地方，均因為是市民居屋的構造，既不適宜於集體辦公，又不便於警衛，只好仍落腳在釣魚台內。陳伯達自始住進十五樓後，一直未再移動過。

這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晚，陳伯達率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不久，報社有人張貼大字報，說，需要清查釣魚台反修文章的稿費賬目。此事一傳到釣魚台，康生大動肝火，非常氣憤地說：『這是衝我來的！』似乎猜疑這是陳伯達在整他。我當時兼管文革小組辦公室的工作，經大家建議，我找來了有關反修文章稿費的賬單一看，發現這些文章的酬標較高，數量較大，但這些賬單都是統一保管、統

一使用，誰會捅出來呢？說來也巧，經核查，唯獨陳伯達從中支取過稿酬（有的文章是他執筆寫的）。陳伯達這個人似乎生來就是鼠肚雞腸，有時為了達到某一目的，卻暗示、鼓動別人去幹他自己不便出頭的事。如果人民日報社這張大字報真是受了陳伯達的『啟發』而寫出的，那麼認真查起來，結果必然是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終歸是小事一樁，隨著其後群眾鬥爭如火如荼的迅猛發展，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過後不久的一天，在《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文章中，點到了中央宣傳部的名。康生曾經為此在八樓找我提出批評，同時表明，他並無意『保護』中宣部，只是出於『策略』，考慮端出它的時間和方式。這天稍遲一些時候，中央文革小組在十五樓開會，康生又就此事聲色俱厲地當眾批評一頓。此人慣於這樣作態，抓住別人小辮子死不鬆手。那天會後我和戚本禹隨陳伯達外出，車從釣魚台剛一開出，他就伸手按電鈕，使前後排座位間的隔音玻璃升到車頂，以免我們的談話被司機和秘書聽到。然後他就朝著我說：『我可是鼓勵你們年輕人大膽造反的！我絕不會對你們發那麼大的火！』意在挑撥對康不滿，我和戚都是清楚的。不久，陳伯達就成了全黨『第五號人物』，用他的身份衡量，在背後噉噉噉這樣的小動作，確實無聊。

中共中央紀委曾在對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中指出：康生『慣於耍反革命兩面派手腕，長期掩蓋了其陰謀家偽君子的本相』。

的確如此。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初期，康生對大多數中央領導人態度還是較正常的。可是隨著運動的深入和政治氣候的突變，此公的態度發生了『急轉彎』，到了後頭，『橫掃一切』開始了，

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在對待劉少奇的態度上，康生的這種變化速度尤其令人驚駭。

劉少奇是『接班人』時，康生除了極力奉承毛澤東、極力製造個人崇拜外，對劉少奇也始終是畢恭畢敬。即使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間政治局擴大會上講話時，雖然他對彭真、朱德大肆攻擊、誣陷，但對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還是持相當尊重的態度。當時，康生還當眾檢討了自己於一九三一年曾對劉少奇攻擊過的事，他說：『當時職工國際有一個文件，說少奇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我也相信了，攻擊少奇同志在職工運動方面是右傾機會主義，還在《鬥爭》上登上反對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為謝康，這個誰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錯誤。沒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時他還沒有看出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會有改變。正像其後他所說的：『當時只想到彭真（的問題），沒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有問題。』一語道出了他的天機。這次會議後，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或稱碰頭會）上，康生對劉少奇依然保持著恭敬的態度。六月九日，毛澤東改變了對工作組問題的態度，到八月五日，在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之後，康生對劉少奇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以後在製造將劉少奇迫害致死的特大冤案上，康生作出了奇特『功勳』。他夥同江青、謝富治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和『特務』，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

說得全面一點，康生在這個時候的變化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急轉彎』。對於權勢蒸蒸日上的林彪、江青一類，則又是另外一種變化。開始時他看不起江青，對她都是直呼其名，曰『江青』，繼則改稱『江青同志』，隨後寫信變成『呈送』江青了；開始時遇事都是江青去找康生，後來改為康生前去『請

示』江青。康生變成了江青的附庸；江青則在她原來所自稱最尊敬的『康老』面前也就開始擺起了譜，端起了架子。及至到了『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時，康生再來一個『急轉彎』，把他長期為江青隱瞞的歷史問題向中央作了『公正無私』的『揭發』。

康生對陳伯達一直持輕慢的態度。與他們一接觸，我就感到，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根本不買陳伯達的賬。尤其在小組成立初期，他對參與由陳伯達主持的一些小組活動經常是召而不來，隨心所欲。直到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他才驟然活躍起來。有一天，陳伯達給還留在上海的江青打電話，告了康生一狀。當時我正在分發文件準備派人分送。他打完電話對我說：『告訴康老，就說江青同志來電話，請他對小組的事多管一些。』我未加思索，就照他的意思寫在便箋上交給了康生。康生看完便箋，惱怒地大筆一揮，在便箋上批寫：『不要穆欣傳話！』以後康生當著陳伯達和眾人的面多次發牢騷說：『我這個顧問是不問不顧，有問也不一定就顧！』

因為他們兩個人相互『抬杠』，使不少事變得更複雜，甚至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其中青海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報》發表一篇題為《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的社論，響應『文化大革命』，鼓吹大動亂。其言詞之激烈，調門之高，真可謂是當時地方報刊的獨步一時。這篇社論說：『大進攻就是大「動亂」，就是要打亂資產階級的反黨時間表，打亂牛鬼蛇神的舊秩序，什麼「亂了套」，什麼「天下大亂」啦，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要來個「天下大亂」，把資產階級的舊天下打亂、打垮；叫你們不成個「體統」，叫你們亂套慌神，我們無產階級要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

天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大搞、大鬧。不管他是資產階級的權威，還是封建幫會的「祖師爺」，我們要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把政治思想文化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搞得熱火朝天，鬧得煙雲滾滾，搞它一個天翻地覆，我們一概要把他們鬧得六神無主，統統踩倒，剝奪他們的統治權。書生氣十足，要不得……』還說：『我們要革命，我們要徹底革命，誰敢阻擋我們，我們就打倒他；誰要打擊我們，我們就踏碎他；誰要干涉我們，我們就砸爛他。』

康生在北京看了這篇社論，讚不絕口，認為是篇『好文章』；陳伯達則不以為然，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社論捅了漏子，是『大毒草』，還叫辦公室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西北局書記處書記楊植霖和青海省委第一書記王昭，請他們『追查』文章作者和報社的責任。由於康、陳對這篇社論的不同態度，引發了青海省西寧地區兩派群眾組織的尖銳對立和激烈鬥爭，終於在第二年的二月造成一場傷亡二百七十七人的嚴重流血事件，簡稱『二·二三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最早、最大的慘案。

事件發生的簡單經過是這樣的：

這年的六月中旬，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決定全體成員去上海開會。作為小組成員、西北局代表的楊植霖因已知道康、陳兩人對社論的意見有分歧，所以一到北京集中時，就找他們『請示』如何表態，結果康、陳各執己見。他們一個是組長、一個是顧問，楊無所適從；又因當地群眾屢逼西北局對此表態，他又非要取得答案不可。所以到上海後，楊在會議間隙，繼續在康、陳兩人住處『穿梭』。兩人意見仍針鋒相對，使楊植霖非常為難。會後他回到西安後，受到造反派的逼問，厚道誠實的楊植霖只

得如實相告。此後，西寧地區的造反派代表屢次到北京來，要求陳伯達表態。陳對此十分惱火，但一直仍拒不表態，並多次派筆者去見這些代表，作實質上是『無可奉告』的『接見』。轉過年來的二月，當青海軍區按中央『支左』命令要對《青海日報》實行軍管的時候，遭到了已經控制該報的造反派阻撓、毆打和驅逐。引發了一場流血慘案。因為當時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在現場指揮制止武鬥，林彪、江青便借題發揮，對趙永夫無限上綱上線，稱為『趙永夫事件』，還乘機把此事件說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表現，用以打擊葉劍英等老帥。雖然造成此慘案的因素諸多，但因康生、陳伯達對社論的不同態度為開端，形成兩派的尖銳對立和迅速惡化，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要原因。

看來，陳伯達在這個問題上確有難言之隱。六月三日《青海日報》的那篇社論，是在陳伯達主持寫的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兩天發表的。兩者相較，應該說，陳伯達的那篇煽動性更高。既然你在上頭向全國放火，豈能怪罪別人在下面點燈？陳伯達起先否定那篇社論，未必不是出於同康生賭氣、『唱對台戲』。不料他的這種輕率態度促使事態迅速向惡性發展，最終引發了一場慘重的血案。正像他後來自己承認的那樣：『那時候我像發瘋了一樣！』不過，這時他若對那篇社論的事公開認錯，不單意味著在康生面前認輸，對於青海的血案又該如何交代？因此，陳伯達儘管一提起此事就火冒三丈，卻又無可奈何，只好默然。

在『文革』中，陳伯達和康生同是製造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造神』者，但是康生比陳伯達更勝一籌。康生竭力鼓吹毛澤東的理論已經『全面發展』、『全面超過』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是『第三個里程碑』、『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

義的頂峰」……在這一點上，陳伯達也不遺餘力，屢有『創造』。他們憑藉在黨中央所取得的一部分權力，打著最『革命』的旗號，煽動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狂熱，把『左』傾錯誤推到極端。

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晚年不檢點、有缺點。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經說過『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的話，對於當時個人崇拜的發展也是有責任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心態又是矛盾複雜的。他需要個人崇拜，又不同意搞得太過頭，太肉麻。當康生、陳伯達和林彪這些野心家，利用這一點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鼓吹到狂熱的程度，造神造得太過分了，他們都曾當面受到過毛澤東的申斥。對康生夥同林彪制定『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當面曾表示不以為然。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對卡博·巴盧庫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麼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以後毛澤東又於一九七〇年對斯諾說：『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厭！』

『四個偉大』是怎麼製造出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澤東第一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主持會議的陳伯達致詞時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接著，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當天新華社報道這次大會的新聞題目就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將陳伯達和林彪這天給毛澤東冠上的頭銜合起來就成了『四個偉大』。康生還把幾本外語辭典帶到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室來，翻查、考究、推敲的結果，認為『偉大的導師』最重要，應放在前

面。在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林彪開口就說：『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問好，向大家問好！』但可以說，這個『發明權』是屬於他與陳伯達和康生共有的。此外，陳伯達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說『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光焰萬丈的、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這樣的句子。有次小會上毛澤東當眾駁斥陳伯達：『我就不信世界上會有「無際」的東西，再遠也有個邊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達在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講了『光焰無際』的話，在報上發表時被勾掉了。這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談起對外宣傳問題的時候，又批評了『四個偉大』和『光焰無際』的提法。他說：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周報》、新華社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過去不搞，現在文化大革命後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受不了。接著，毛澤東批評了關於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把『光焰無際』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裡有無際的？都有『際』，所以勾掉了。『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把『萬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千分，而是萬分。我一分也不要，統統勾掉了。這年七月中旬，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到達武漢後，又曾說過：『誰封我四個官呀？偉大舵手、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他告誡隨行者：『你們不要宣傳這個，要宣傳馬克思主義萬歲，要宣傳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

到了後來，陳伯達不但神化毛澤東，還要為林彪造神，終於在狂熱的『造神』中『翻了車』。一

九七〇年八月，陳伯達在廬山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二中全會講話中鼓吹『天才論』，說對『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這種人應該『揪出來』，『應該鬥倒鬥臭，應該千刀萬剮』。陳伯達這時鼓吹『天才論』，已經不是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是要為林彪謀取『國家主席』權位製造輿論的一場政治陰謀：就在八月的這次會上，林彪反革命集團抓住設國家主席和稱天才兩個問題爭奪個人權力。陳伯達不但在發言中宣傳『毛澤東是天才』，還選編了題為《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材料，正是按照林彪的旨意搞的政治陰謀。毛澤東覺察到林彪等人為爭奪個人權力進行的宗派活動，於八月三十一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提出『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說：這『是專批天才論的』。全會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對陳伯達展開揭發批判。毛澤東的《意見》雖然不長，卻從政治上宣判了陳伯達的死刑。

陳伯達與康生的矛盾，隨著時日的延伸而不斷地激化。到了後期，在『造神』的競走中，他們不但在『偉大統帥』毛澤東面前爭寵，也表現在爭向『副統帥』林彪帳下獻策。但在這一點上，兩人也見了高低。當這位『副統帥』機破人亡、粉身碎骨的時候，陳伯達因為勾得太緊，無論如何也解脫不開，首先被拋出來；康生則是『隱跡潛蹤』，『金蟬脫殼』，反過來還像沒事一樣去做『批陳』、『批林』的急先鋒，毫不手軟地打起陳伯達這條『落水狗』來了。儘管到頭來他也沒有逃脫正義的審判。野心家的聯盟是靠不住的。及至這夥野心家的末日來臨的時刻，『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忽喇喇

如大廈傾覆』之際，已陷絕境的康生把江青、張春橋兩個『戰友』也拋出來了：他把長期庇護下來的江、張叛黨罪行告訴王海容、唐聞生，並讓王、唐報告毛澤東和黨中央，企圖從此再一次地逃脫黨紀國法的懲處。然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康生和謝富治不是死後也沒有逃脫正義的鞭笞和歷史的審判麼？！

二、蛇蠍一樣的女人

關於江青其人對黨和國家所犯下的罪行，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報刊上和一些書本上已經揭露不少。鄧拓說：『這是個蛇蠍一樣的女人』；譚震林說：『她比武則天還兇』；陶鑄說：『這個婆娘，瘋瘋癲癲。確實難招惹，但她成不了氣候。她不具備辦大事的任何一點素質。』毛澤東也多次說江青『刀子嘴，是非窩』，『她到哪裡，那裡就掃興！』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訪問時，法拉奇曾經問道：『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鄧小平回答說：『零分以下。』又說：『江青壞透了。怎麼給「四人幫」一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百五十二至三百五十三頁。）

江青卑鄙醜惡、充滿罪惡的一生，已經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劃上了遺臭萬年的句號。

權慾熏心的野心家江青時刻夢想奪取最高權力、做女皇。為了篡黨奪權，她必先篡改歷史，製造歷史的迷霧，蒙蔽人民的眼睛。為此，她不惜歪曲黨和國家的歷史的同時，還千方百計『再造』個人的歷史，進行政治『整容』。

江青最大的難言之隱是她於三十年代在上海灘的一段經歷。她極其害怕人家知道她曾有過放蕩墮落的私生活，她生怕那些風流韻事公之於眾；但她更怕自己曾在政治上的自首變節行為被曝光。所以，『文革』開始不久，她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派人到上海圖書館、報刊檔案館及私人住宅裡，將記載有關江青三十年代那段歷史的報刊、照片、信件和各種文件、資料全部抄走。此後，凡是三十年代同她共過事的人，都無一例外地遭到她的摧殘；幾乎所有了解江青過去歷史的人，都被以各種罪名監禁起來。為了追索自己過去寫給鄭君里的信，江青將這位中國著名的電影導演活活迫害致死；著名電影女演員王瑩，只因三十年代同江青角逐過演出《賽金花》一劇的主角，也遭到慘死；為了遮掩那段骯髒的歷史，她將知道她老底的孫維世逼死，同時她『恩將仇報』，就連當年在生活上對她多方照顧、有救命之恩的舊交、執友、已經退休的女傭秦桂貞也不放過，將她抓到北京投入監牢，以防泄露她的『機密』。——用江青的話說，即『防止擴散材料』。

當時，凡從上海抄來的『防止擴散材料』全都送交江青，由她親手銷毀。儘管如此，她仍然忐忑不安：為確保『萬無一失』，她還要把那些與『防止擴散材料』有過接觸的有關人員投入鐵窗。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江青親自佈置經過軍委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選派的四人偵破小組，去上海收集饒漱石案的檔案材料。偵破人員發現一小箱由上海市公安局封存的、有關揭發江青三十年代腐化墮落的材料，

並按江青的『指示』帶回北京。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按照周恩來總理批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監銷，謝富治當場點火全部銷毀，三位監銷人都一一簽字為證。事後，江青卻反咬一口，誣陷楊成武等人整了她『一大箱黑材料』，並迫害在偵破小組擔任組長的陳虹，使其因此而蒙冤坐牢六年零五個月。在那段時期，有關揭發江青歷史的材料在全國廣為傳播，這更使得她坐臥不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中央文革小組文件組收到從香港一家書店寄來的一個郵包。打開來一看，全是一些刊有關於江青演員時代所拍攝的風流照片和艷聞軼事的報刊。因害怕江青怪罪，文件組馬上把郵包送交給了辦事組組長矯玉山。矯即送交江青的秘書姚文元。結果，做賊心虛的江青仍採用老手法，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凌晨，將無辜的矯玉山投進秦城監獄，整整『審查』了七年半之久。

筆者雖同江青在歷史上從無任何瓜葛，竟也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無妄之禍。一九六六年五月，當我們初住進釣魚台時，雖然江青仍留在上海，但戚本禹對我說：『江青同志要我『檢驗』你的著作。』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常感到，戚本禹的眼睛經常盯著我。因為工作需要，光明日報社曾訂過一些港台出版的報刊，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江青成了港台報紙上的熱門人物，尤其《香港時報》常刊有涉及江青過去私生活的文章。我在看這些報時，有時雖也掃一眼這類新聞的標題，但因當時工作繁忙，從未有過細讀內容。這事卻引起戚本禹的『關注』，並向江青打了小報告。

一九六六年，江青從上海回到北京不久的七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忽然來到釣魚台十六樓會議室，找我和戚本禹、姚文元一起『聊天』（這是唯一的一次）。她眉飛色舞地談了自己早年的『奮鬥』史，從到上海做演員當『明星』談到她同俞啟威（黃敬）、唐納、章泯等人戀情經過；從她於三十年代被

國民黨特務逮捕談到她與唐納之間糾葛的詳情及唐納兩次自殺事件在當時社會上引起的轟動。從她有聲有色、沾沾自喜的說話口吻中可以聽出，她始終覺得自己高尚無比，而別人卻是卑賤不堪。其實，她隱瞞了曾在濟南與一個小財東少爺結婚之事，也省略了因她充當『第三者』而造成話劇導演章泯妻離女散的人間悲劇。從侃侃而談的江青的神態中，筆者看不出她內心有任何羞愧的感觸。江青在最後談到一九三四年於上海被捕的事情，她說，那時她在一所女青年會辦的平民夜校裡做教員，有一天，突然在馬路上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她在獄中什麼也不承認，只是大哭大鬧，『弄得特務沒辦法對付我』，馬上就把她放出來了。因為本人對江青的『過去』知道甚少，聽時頗感『新鮮』，但也感到驚異：怎麼她大哭大鬧一通，敵人就會把她放出來了呢？後來，經中共中央查明，原來江青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後，自首叛變，十二月出獄；不久與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來往，關係密切，並在影劇界積極從事擁護蔣介石的活動，為國民黨效勞。

這次『馬拉松』式的『聊天』結束時，已是夜深人靜。當自己在聽江青回憶『往事』時，一直對她這次突發性的舉動感到驚疑、迷惑，心裡始終懸著一個問題：大家忙得手腳朝天，她怎麼還有閒情逸致談這些東西？答案很快就出現了！當江青的『故事』講完的時候，戚本禹突然轉向我說：『這些事只有穆欣會知道，我和姚文元都年輕……』（按：戚、姚兩人大約都比我十來歲），一語道破天機。聯繫戚本禹仰承江青鼻息『檢驗』我所著的書之事，回想戚本禹曾以『改組』某一學術專刊為名，派五名造反派進駐光明日報社的情景，再聯想他平日虎視眈眈的眼神，我馬上就明白了，原來江青是衝著我來的呀！當我上樓回到住室門口的時候，戚本禹再向我曝光，狡黠地對我說：『你最好把剛才江

青同志所講的事情追記下來，這是很很有價值的……』這就是戚本禹的『風格』，也算是一大『優點』：因得意忘形而容易把自己的某些『底牌』亮給人看。

我意識到，江青分明是在演『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故技，她唯恐那些知道她當年底細的人道出真相。她的本意是想掩蓋自己某些不光彩的經歷，卻在我這個本來對她一無所知者的心裡劃上了一連串的問題。

江青這晚的做法可能意在對我『消毒』（她受了戚本禹虛假情報的騙），同時也對戚、姚注射『免疫』針。她在述說這些事情的時候，態度比較平靜，聲音還算溫和，但是內心裡顯然在壓抑著惱怒，這從她的眼神可以覺察出來。既然她是一個睚眦必報的人，就不會容忍和饒恕任何對她的窺測。雖然只是戚本禹『虛報軍情』，筆者還是大吃苦頭。

江青不學無術，可是利欲熏心，嗅覺靈敏；她善於窺察方向，伺機而動；她可以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將人置於死地。她利用《緊急呼籲書》事件，將王任重打倒，這也是她的『傑作』之一。

一九六六年中，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出現了它的糾察隊的組織『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是北京最早出現的一支紅衛兵糾察隊，也最為活躍。由於它的宗旨是維護政策，執行紀律，『糾察』紅衛兵的活動及糾正各種危害運動的偏向，所以受到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老一代領導人的支持，周總理還親自委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指導該組織的活動。儘管在它後來的行動中有過不少錯誤，但在保護人民安全、國家財產，尤其在掩護一大批黨外知名人士方面作出過貢獻。江青一夥最初對『西糾』的成立、活動不反對，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他們對『糾察隊』的

憎惡、惱恨與日俱增，很快站到了這批『革命小將』的對立面。

不久，在北京的紅衛兵中發生了由家庭出身論引發而成的一場動刀傷人的事件。事件的經過大概如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北京的一部分紅衛兵在第三十中學串連開會。不料，會議剛開始，就發生了搶話筒風波。即誰的出身最好，誰就有資格拿話筒登台發言。工農子弟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應首先發言，幹部子弟認為，他們的父輩為革命出力、打江山，最為優秀。這時，該校一位叫唐畏的學生上台講了話。他對這種論出身發言的做法深表異議。不少人對他的膽量和發言水平持肯定態度。但因他的父親曾是歷史反革命（已去世），一些紅衛兵當場把他當作『反革命』拉到學校後院進行批鬥和毆打，後來把他當教員的母親也揪來了。唐畏有個姓袁的『鐵哥兒們』（好朋友），為給『兄弟』報仇解恨，找了幾個幫手，當晚就對批鬥過唐畏的幾個紅衛兵動了刀子，扎傷了他們。這一下，禍從天降。北京市委負責人聽到反映後，立即一口咬定，是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刺傷紅衛兵』，是嚴重的『階級報復』，並在七月下旬，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專門批鬥唐畏等三個中學生，並給唐畏判了刑。

這次會後，清華附中、人大（人民大學）附中、北航（北京航空學院）附中聯名印發了一份《紅衛兵緊急呼籲書》，號召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同時提出要將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黑蛋清理出紅衛兵的隊伍。

這份《緊急呼籲書》的主題應予以充分肯定，因為它是反對打、砸、搶，制止剛剛出現苗頭的武

門，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不久，繼搶話筒風波後的七月二十九日，在北航附中貼出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很明顯，這是一副宣揚血統論的對聯（血統論原是為了封建等級世襲制辯護的一種錯誤理論，是以血緣形成的系統來確定親疏貴賤的繼承關係、評判政治觀點，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謬論。後來，有人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的好壞作為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標準的觀點，故又稱『唯出身論』、『唯成分論』）。寫這副對聯的作者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一是要借上聯來證明自己言行的正確；二是借下聯攻擊不同觀點中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這副很像打油詩的對聯在學生和青年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被指責為『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學生，旗幟鮮明，堅決反對這種論調；有些出身好、頭腦比較清醒的學生，也不贊成這副對聯。當時，有個深受血統論傷害的二十三歲學徒工遇羅克，在他所寫的《出身論》一文中批判這副流毒極廣的對聯。他指出：『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父親怎樣，兒子就怎樣，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遇羅克認為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如『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為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

抗衡的。」「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娘胎裡決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他呼籲「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努力「填平這人為的鴻溝」。

八月六日，清華附中等幾所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天橋劇場開會，辯論對上述對聯的觀點。

當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成員應邀也前來參加了辯論會。會上，陳伯達和江青都作了講話。他倆並沒有從根本上批判血統論，而是將這副對聯「修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理應如此」。這一修改雖貌似是對原來對聯的糾正，但仍未脫出血統論的巢臼。由於血統論實質上是維護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狂熱的理論依據，是林彪、江青一夥維護特權的武器，不可能站在公正立場上去徹底否定原來的那副對聯。所以，血統論的種種做法在後來貫穿於「文化大革命」的始終：一人有罪，株連九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由於林、江之流對血統論持縱容、支持的態度，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公然當眾宣佈遇羅克為駁斥血統論所寫的《出身論》是反動的。遇羅克雖身陷囹圄，仍堅持真理，他所著的《出身論》一文在大江南北廣泛流傳。為掃除障礙，消滅異己，江青、謝富治一夥終於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對遇羅克「宣判死刑，立即執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遇羅克昭雪平反，正式宣佈「遇羅克無罪」。

現在回過頭來再談《緊急呼籲書》之事。八月六日參加辯論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會場上人手一份地收到了紅衛兵印發的《呼籲書》。領導北京市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主任重仔細閱讀以後，認為《呼籲書》切中時弊，寫得很好，當即送給周恩來總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總理同意王

任重的意見，即將此件送給毛澤東主席和江青。毛澤東圈閱同意之後，送回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圈閱同意，又批示在文革小組內傳閱。傳到王任重手上時，他認為，小組成員已各有一份，既然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已同意，無需再行傳閱，於是便親自送給陳伯達批交辦公室辦理。陳伯達第二次圈了圈兒，批示交給我辦，並叫秘書送來。

這份《呼籲書》反對打、砸、搶的主題，同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的《八條規定》很相吻合——《八條規定》總的精神就是有領導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開展運動，其內容是：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從我的思想來說，也十分贊成《呼籲書》的主張。我把有周恩來批語、有毛澤東圈閱同意的原件收存了起來，另找一份送往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為此，我曾給辦公廳負責人寫了便箋，說此件排出後，請印一批先送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聯合接待站散發。當時我想到，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在進行之中，既然決定《呼籲書》公開印發、廣泛張貼，也有必要分送給全會的與會者，就像開會期間逐日贈送《光明日報》給與會者看一樣。想到這裡，我又在便箋上寫道：我不懂得規矩，不知這種公開印發的傳單，可否作為不編號的文件，分發給參加全會的人員，請那位辦公廳負責人酌定。我的毛病在於『過分熱心』，又『不知深淺』，事先未向組長請示就自作主張。《呼籲書》鉛印出來後，送了一批到釣魚台，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分發外，我即檢出幾份送到王任重為領導北京市運動而設立的辦事機構，請他們廣為印發、張貼。

此後，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都在場的會上，毛澤東曾以肯定的語氣、饒有興趣地談到這份《呼籲書》。可是，當江青加油加醋、別有用心地將北京市委召開十萬人大會批鬥三個中學生之事告訴毛澤東後，在另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舊事重提，一改原來的意見，而批評十萬人大會的事欠妥並突然望著王任重說：『你們那個《呼籲書》……』話雖不多，但看毛澤東的神情和語氣，否定的意思是不容置疑的。

其實，江青早就與王任重、陶鑄『較勁兒』了。根據我當時印象，自從宣佈王任重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陶鑄任小組顧問（而且排在康生前面）和中央宣傳部長以後，江青一夥就心存不滿（尤其在陶鑄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一躍為黨的第四號人物、排在陳伯達、康生前面之後，他們更是忌恨難忍，務要除之而後快）。對王任重負責領導的北京市的運動百般挑剔，『動輒得咎』，甚至當面誣蔑王任重『背著小組幹了許多壞事』。

如今，江青有了『主席也否定』的這把尚方寶劍，一回到釣魚台，就催促陳伯達開小組會，專門就此事對王任重進行了批評。她惡狠狠地逼迫王任重要對召開十萬人大會鬥三個中學生的事和向上推薦《緊急呼籲書》的事承擔責任；她還對撰寫《呼籲書》的紅衛兵惡言否定，恣意誣蔑。批判會接連開了多次，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時還未了結。本來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王任重在會上發言時，對有關情況作了說明和看法，並不感到有什麼錯誤。可是江青故意小題大作，無限上綱，揪住不放。由此開始，江青一夥屢向王任重挑釁、施明槍、放暗箭，直到王任重和陶鑄被『打倒』為止。

當然，我也受到了『過分熱心』、『自作主張』的懲罰。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天，當時擔

任江青秘書的姚文元看到全會的『不編號文件目錄』中列有《緊急呼籲書》，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查問：『是誰把《呼籲書》發到全會上去的？』我就將有關情況當場說明。江青聽了大發雷霆，並要我拿出原件。在我拿來有毛澤東、周恩來及她本人圈閱同意印發筆跡的《緊急呼籲書》原件當眾交給她後，江青打開來看了一眼，就用打火機把它點燃，向大家說：『燒啦！』原件頃刻化為灰燼。這樣一來，證據全無，這事情的責任就全落在了筆者身上（這是江青一貫的作法：開會她從不讓記錄，避免留下任何痕跡；而對別人，從她身邊的秘書、護士、公務員直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甚至副組長，凡她不如意的事，就逼迫對方寫出書面檢討，收存起來備作整人的依據）。燒了之後，江青即刻對我發出嚴厲斥責，自然，趁機大獻殷勤的在座人員立即『緊跟』，對我指責。會後，康生更是不分皂白，倒打一耙。他對我說：『你怎麼敢向中央全會『批發』文件，我雖然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敢幹這樣的事！』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禍不單行』。就在這個時候，又發生江青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到懷仁堂批判胡喬木的事。前面已經說過，江青誣陷喬木是『三反分子』、『反對毛澤東』。我對喬木的情況雖不很了解，但是無論如何無法把他同『反毛主席』的概念聯結起來，因此，凡在批判胡喬木的會上我都只好默不作聲；與此同時江青之流逼我『揭發』鄧小平『反中央、反毛主席』，我無以應命；接著，又有人向江青打小報告：說我罵她『有神經病』。隨著這些事情的紛至沓來，這位女皇對我的不滿、惱恨與日俱增。她責令我寫『檢討』，結果是，我前一個『檢討』還沒有寫完，下面的一個又接上來了。

批評王任重的會議直到八月下旬方才告一段落。此時，江青派張春橋、王力找我談話。他們對我

說，有關印發《緊急呼籲書》的『錯誤』是嚴重的，江青非常生氣；她要我馬上搬出釣魚台回光明日報社。既然叫我回報社，他們自然可找到一大堆理由。我也不想再往下聽了。最後，他們告訴我，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還會通知我來參加的。

從我的思想來說，並不熱衷權勢，正是這樣，才促使自己選定記者作為終身職業；同時經過這段時期的經歷，我對釣魚台這個地方也無所留戀。可是，此時此刻，我卻不願驟然離開，因為這是江青作為一種『處罰』的手段逼我離開那裡，而我始終認為，在這個事情上我並沒有什麼錯誤，自己是完全按照他們閱批的意見辦事的。至於後來江青、陳伯達等見風使舵，看法變了，將『香花』驟然打成了『毒草』，但鞭子為何打到奉令辦事的人身上？何況自己始終認為《緊急呼籲書》的內容沒有錯，它對抑制當時混亂局面是有積極作用的。另一方面，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發展，若我在這時離開釣魚台回報社，個中原因和自己的看法又絕不能當眾加以說明，到時候，我立即會遭到造反派的批鬥。所以決心『抗旨』，看看再說。這樣我就繼續呆了下來，但我被撤銷了辦公室『召集人』的差事，改由王力管理；同時暫時停止我參加小組的各種活動。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整天呆在自己房間裡讀書報、看文件。直到九月下旬，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問起怎麼老看不見穆欣。經了解情況後，他批評江青不該這樣處理。不久，江青又叫王力、關鋒前來傳旨：江青考慮你的『錯誤』是由於不熟悉情況、缺乏經驗造成的，決定恢復你的工作，在實踐中鍛鍊。這樣我才恢復了工作。國慶節在天安門觀看群眾遊行後，當晚觀看節日焰火，江青還安排我在城樓大廳裡和王、關、戚、張、姚一起接受毛澤東的會見，並與毛澤東、周恩來合影。毛澤東關切地問詢了我和《光明日報》的情況，勉勵我把報紙辦好。

可是，有關《緊急呼籲書》的事並沒有完。以後毛澤東還曾多次談起。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捉回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他又說，共青團中央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四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宣佈作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鬥左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宣佈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新市委為什麼反不得？……

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江青使出潑婦罵街本領，大罵『西糾』、『聯動』，並對周恩來進行突然襲擊。這天除總理、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到會，中央文革另一位顧問陶鑄也去了。先到場的江青，跟每個走上主席台的領導人都握手致意，但當陶鑄隨眾走來向她伸出手的時候，她卻板起面孔，怒目而視，不予理睬，弄得陶鑄十分尷尬。在會上，江青講了話。雖然王任重沒有到會，但她仍指名道姓地對王任重進行了指責。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和林彪這兩個反革命集團頭子，出於共同的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始終是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他們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吹捧。

這種勾結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已開始。江青把林彪奉作『尊神』，請他作靠山。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中說：『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託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

林彪則『以桃報李』，使江青在這場骯髒的政治交易中撈到了無法估量的『好處』。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任命江青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九月又任命她為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使出一個『絕招』，把江青的行政級別一下子從九級提高到五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把江青吹上了天。他說，江青『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感情』。就在這次大會上，林彪夫婦倆唱了一齣『雙簧』，老公在上面指揮，老婆葉群在台下舉手狂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林彪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資』當然不是徒勞的。江青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身份，在各種場合肉麻地吹捧林彪，一再宣揚林彪是什麼『光輝榜樣』，是『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直到林彪叛逃之前不久，她還親自登門為林彪拍攝『孜孜不倦』學習《毛澤東選集》的大頭照片，在《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上刊登；在將林彪推崇為『接班人』的關鍵時刻可謂是勞苦功高，功不可滅；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江青在一次討論黨章的會上，極力鼓噪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說：『這一條不寫上，我們通不過！』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九大召開前夕，江青再次堅持：『林副主席的名字還是要寫上（黨章）；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

江青一夥和林彪之間雖然始終互相勾結此唱彼和，此呼彼應，但因雙方都是貪婪無厭的野心家，一個是時時刻刻都在做『女皇』夢，一個是日日夜夜想建立『林家王朝』，所以他們之間必然有難以調和的矛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江青一夥勢力擴展，無疑對企圖獨霸天下的接班人林彪是一個潛在的、十分嚴重的威脅，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日益加劇。但是基於共同的罪惡目的，他們仍然繼續勾結，直到林彪偷機逃跑為止。在『四人幫』被粉碎後，從江青住處查獲的一份電話記錄上可以看到，僅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江青和林彪、葉群來往的電話即達四百七十餘次，平均每隔二至三天就要通話一次。就在林彪已策劃叛逃的前三天，九月八日，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假惺惺地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接著又派人送來了幾個西瓜。可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江青立即換了另一張面孔。她竟不知羞恥地『控訴』起林彪來，說：『這幾年，他採取種種陰險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幹掉！』可是歷史是無情的，任何罪惡的痕跡都抹不掉。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的起訴書寫道：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藉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奪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自詡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旗手』的江青，在文藝問題上要盡了欺世盜名的兩面派手法。這個始終熱衷於演鬼戲、看舊戲、反對京劇團排演現代戲的人，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搖身一變，一下子就變成了舊戲、鬼戲的『反對者』和現代戲的『捍衛者』、『培育者』和『首創者』；很快還被她的吹捧者們抬為『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線，進行了艱苦鬥爭的「京劇革命的英雄」』。

就是這個『革命文藝旗手』，長期以來，卻對西方電影情有獨鍾。她在不厭其煩、如癡如醉地觀看那些進口『參考片』的同時，對許多中國拍製的优秀影片大張撻伐，扣上封、資、修的大帽，進行

粗暴的踐踏，並對有關人員進行殘酷無情的摧殘。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剛從上海回到北京的一個晚上，她跑到辦公室對我說：打電話到文化部電影局，讓他們從電影資料館找出美國影片《出水芙蓉》拷貝送來。當時我感到十分驚駭：『文革』的風暴已經席捲中國，形勢已發展到了林彪說的『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的時候，她竟還有『閒情逸致』調看這種影片？何況，除了她批准可以上演的《紅色娘子軍》之外，幾乎所有的國產影片都被她宣佈為『大毒草』而打入『冷宮』，現在她自己卻要關起門來欣賞這種影片，實在令人費解。儘管如此，我還是打了電話。稍後文化部值班室來電話告知說，沒有找到《出水芙蓉》的拷貝，因這部影片已因禁演封存很久了。當我將此訊轉告江青後，她的臉頓時從『晴轉陰』，老大不高興。江青一向飛揚跋扈，凡是她想要的東西，到不了手決不罷休。由於她的執意，在我兼管辦公室的職務被江青撤掉以後，她終於如願以償，得到了那部影片。

有人不無嘲諷地談到江青和電影的關係說：『三十年代演電影，五十年代審電影，六十年代批（判）電影，七十年代導電影。』

此後，隨著江青權位的飛升，她不僅將觀看西方電影作為自己日常的娛樂消遣，還假借竊取的權力，從海外進口大批無積極意義的影片。她津津樂道地欣賞著那些影片，將之說成是『轉移神經』的『催眠劑』。她擁有自己的放映機、放映員和放映室。在她住所不遠，釣魚台十七樓中還曾長期秘密存放著一大批外國影片，供她獨享專用。這些影片都是通過她安置在文化部的親信給她從『中影公司』調出來的和為她專從國外進口的，以後就被她佔為私有。因為她所霸佔的資料影片越積越多，江青『指

示』建立一個特別影片的檔案庫。同時，她還對文化部的親信說，檔案庫內的所有影片的調用務必請示她批准。根據江青的這一旨意，終於在『中影公司』東郊資料影片倉庫第十三號庫房秘密設立了『特別檔案影片庫』還附加成立了專為江青服務的十人『資料影片小組』。江青一次就從釣魚台用卡車運來了密存的九十八部影片。有一次，江青點了十八部在廣州療養時所看的香港影片，要文化部把其中的彩色片的拷貝都買來，美其名曰『敵情』片，說看這些『敵情』片，是供批判和借鑑用的。文化部就以此為對外口徑：購買西方影片拷貝，是『為了解『敵情』和藝術上的借鑑』。江青將看進口電影作為每天的必修課，在北京如此，就是到外地，也決不放棄，即使到農村小靳莊和大寨『考察』和『體驗勞動』時，也不例外（曉高：《江青與特別影片檔案庫》、《大地》一九九三年第八期）。

在對待評《水滸》的一件事中，再次暴露出這位自稱為『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旗手』的『高水平』和她信口開河、出爾反爾、嫁禍於人的拙劣表演。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江青就日本某些公司拍製《水滸》電視片持支持態度。其間，她對日本客人說，宋江是農民起義領袖，後來受招安了。據客人的理解，認為江青把宋江看作是位『兩面派人物』。當江青從接待簡報上看到外賓如此反映，就矢口否認，說自己根本沒有講過宋江是『兩面派人物』的話。她即刻下令『追查』，是翻譯錯誤還是簡報寫錯了。二月二十二日，江青仍小題大作，就此事召集中聯部、外交部和對外友協有關負責人開會。會上她極力美化宋江，說：『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宋江等農民起義的領袖。對宋江首先應加以肯定，然後再分析他的階級出身所帶來的影響。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有智、有謀、有正義感，喜歡劫富濟貧，能團結人，因此

受人民群众的愛戴，人們稱他作「及時雨」。在封建社會中，官逼民反，宋江被逼上梁山後，領導起義，同封建統治階級堅決鬥爭，起了很大作用。這些積極方面，應充分予以肯定。」為了替宋江塗脂抹粉，江青在談到宋江的投降行為時，還說道『宋江接受招安，雖然反映了他的動搖性，但不能因此說他是兩面派人物』；宋江『有歷史的局限性』，『我們不能以無產階級政黨的標準去要求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完，江青還下令對她於二月二日在接待日本客人時所講的話加以『澄清』。因當時外賓已經回國，只好通過中國駐日使館派人向對方解釋：宋江是『肯定的英雄人物』。江青沒有料到，就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老人家與她唱了反調。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關於《水滸》的談話中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

江青『聽風就是雨』。她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立即發動評《水滸》的運動。她一改常態，變成對《水滸》和宋江持完全否定態度。她說：看《水滸》『可以看到宋江那個奴才、陰謀家、兩面派的醜惡面貌』。九月十二日，在山西大寨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她又大罵說，當初『宋江這個傢伙死也不肯上梁山』；『鑽到革命隊伍裡，抓住這支軍隊，你皇帝老兒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又說：『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晁蓋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等等。江青利令智昏，這時擺出一副一貫正確的架勢，又破口大罵起國內的出版部門和文學工作者來。她悍然不顧事實地說：我們這個出版社、出版系統，還有一些所謂學了馬列主義的文藝評論家，說什麼宋江是有農民的局限性。我問問大寨的農民同志們，你們革命有局限

性嗎？氣人哪！咱們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這麼一小撮壞蛋，混到咱們的隊伍裡，吹捧這部美化叛徒的書。這部書在明朝就是官書，在清朝成了官戲。皇帝下命令排成連台本戲，水滸戲多的很哪！這為了什麼呢？為了維護他們的封建統治。

一個人厚顏無恥到這等程度，真是創了『史無前例』的紀錄！

這還不夠。在『四人幫』大評《水滸》、借題發揮影射中央領導人時，江青多次強調提出，評《水滸》要『聯繫實際』，說什麼『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黨內的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幹的事情是公開敵人做不到的』，『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所以這部書要好好讀，看看這個叛徒的嘴臉，對照一下咱們黨內的十次路線鬥爭的一些叛徒嘴臉……』他們一夥想要幹什麼？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一時，江青一手遮天的胡亂折騰鬧得人人自危、不知所措。最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澤東說，江青的話是『放屁，文不對題』，他又指示，她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終於，這場由江青一夥精心策劃、大吹大擂發動的『評《水滸》』運動只好就此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江青本是一個思想平庸的女人，卻在自己的權勢上野心勃勃；她平日幾乎不讀書不看報，熱衷於西方影片，但她自命不凡，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喜歡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好為人師；她不懂學術，無所事事，但她精於害人伎倆；她憑藉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竊取黨的名義，以勢壓人，以勢害人。

江青愛出風頭、愛講話，不管她走到那裡，都能聽到她的嘰嘰喳喳聲；不論她參加什麼大小會議，她都要指手劃腳作指示，她從來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炫耀『我代表毛主席』說話的機會。翻開那些有她講話記錄的本子看看，幾乎每次她都有這樣的開場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向大家學習！向大家致敬！』，『告訴同志們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他要我向你們問好！』，『我代表毛主席問候你們！毛主席很關心你們的革命事業。』還有什麼『我一定把同學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真可謂是大言不慚，厚顏無恥！她企圖利用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來撈取個人的政治資本。

為了實現自己的『女皇夢』，江青對群眾軟硬兼施。時而，她把自己打扮成謙遜好學的『小學生』，時而，又忘乎所以，頤指氣使。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她在北京大學講話。開始時，似乎她還懂得『謙虛』，她說：『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塊來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點錯誤……』可是，一會兒，就提高了嗓門，甚至歇斯底里地喊著說：『革命派跟我們在一起，誰不革命誰就走開！』此後，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大講話時，又故伎重演，老調重彈，她不失『斯文』地說：『毛主席要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要我們做你們革命派的小學生。革命要求我們來，我們就召之即來，我們如果不正確，同志們可以貼大字報，可以直接寫信給毛主席。』可是到了第二天，在廣播學院卻大發雷霆說：『你們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條「××不准進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七月二十九日，江青去了北師大。她剛『客氣』地說『我們的意見不對，

你們就來貼大字報』，接下來就大聲喝斥：『我還是這樣說法，革命的跟我們一起來，不革命的走開！』當然，在更多的場合，江青總是情不自禁地自我吹噓，有時簡直吹得神乎其神，不著邊際。

七月三十日，她在中國科學院講話，話講到一半忽然冒出一句：『我在老一輩的革命者面前，說不上什麼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歷史了……』一次，在清華大學講話時，江青竟說：『主席讓我們選王明當中央委員，我們都不選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說當反面教員也要選。』言外之意，好像她也參加了黨的七次代表大會和參加『選王明當中央委員』的議程。其實，她故弄玄虛，企圖蒙蔽不知道她底細的群眾。較長時期以來，直到這次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她當副小組長前，她的職務始終只是毛澤東的秘書，後來的什麼『首長』、『旗手』等等全都是她自己的創意。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她權勢的上升，江青吹牛的口氣和本領也日益見長。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居然口出狂言，說：『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她竟然把自己與主席並提而論，無恥之極！她還說：『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文革』後期，她在大寨還曾沒臉沒皮地為自己貼金，說：『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當然就是鄙人。』

一九七二年，江青抓住美國維特克女士在華訪問的時機，與她進行了長達六十多小時的談話，大泄黨和國家機密，大曝個人生活隱私，其間充滿了無邊無際的自我吹噓和標榜。本來，吹破天的、打上『江記』印戳的八個樣板戲全是江青奉行『我的也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強盜哲學而竊取的別人的創作成果，可是，在她們談話時，當在場的文痞姚文元吹捧：『江青同志既是藝術家，又是政治家，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領導者，樣板戲都是她親自創作出來的……」的時候，江青不知羞恥，居然心安理得、得意忘形地說：『我是有藝術經驗的。我很下功夫，背台詞可不容易啦！如果我沒有經驗，我能把樣板戲搞得那麼好嗎？我一樣一樣地教他們呀，怎麼唸，怎麼做，我都教。我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對啦，今晚我要陪你看樣板戲《紅燈記》，在劇場你會看到觀眾的情緒，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國人民是怎樣對待我的，那麼多人都歡迎呀，真使人感動。』

江青愛出風頭、愛講話。由於她的人品極壞，素質極低，在講話時，經常喜怒無常，說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和話；由於她失常的心態，也鬧出了不少笑話。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上，當江青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有關工作組問題的辯論萬人大會上講話時，她把同毛澤東的『家事』端了出來，將她與毛岸青（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兒子）之妻張少華（現名邵華）和岳母張文秋（張少華的母親）的矛盾公之於眾，故意把家庭矛盾政治化；她也說到她女兒李訥參加農村『四清』時同別人的糾紛；她還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地『控訴』起『這四年』在文藝界『受了多少迫害』！江青在東扯西拉、講這些事的時候，竟漫罵張少華的母親張文秋『是個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誹謗張少華『她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指張少華），我們根本不承認。』據原記錄者所註：在講此事時，江青同志講了過程，講得非常激動，流了淚，我們沒記清。大意是說，毛主席的兒子得了精神分裂症，讓大夫、護士看，後來張少華去了，沒有一點革命人道主義，就和他結婚了，結果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意思是說，張少華與毛岸青結婚是別有所圖的。

在談到其在文藝界所受迫害時，她又東一榔頭、西一榔頭地說：這四年，我在文藝界工作，東來

一下子，西來一下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了，受了多少迫害，我本來沒有心臟病，現在我心臟也不好，我也要控訴！

聽到這樣一些潑婦罵街式的咒語，人們會對江青極力推銷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會產生什麼樣的感想？見她如此聲嘶力竭地喊叫『毛家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時，縱是『緊跟』江青的那些狂熱的造反派，難道心裡不會『咯噔』一下嗎？

江青為了惡毒攻擊張文秋、張少華母女，不僅罵不絕口，還造謠惑眾。謊言畢竟是謊言。只要看一看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寫給兒子毛岸青的一封親筆信，就可以領略江青的這種無事生非、無風掀浪的『本領』。事實是，毛澤東非常贊成兒子毛岸青和張少華的真誠相愛，並儘力促成他們的婚事。在毛澤東給毛岸青的親筆信中，是這樣寫的：

岸青我兒：

前覆一封信，諒收到了。甚念。聽說你的病體好了很多，極為高興。仍要聽大夫同志和幫助你的其他同志們的意見，好生靜養，以求痊癒。千萬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齊（即劉思齊，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妻子）和她的妹妹少華來看你，她們十分關心你的病情，你應好好接待她們。聽說你同少華通了許多信，是不是？你們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華是個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談一談。有信，交思齊、少華帶回。以後時時如此，不要別人轉。此外嬌嬌（即李敏，毛澤東的女兒）也可以轉。對於幫助你的大連市市委同志、醫療組織各位同

志們，一定要表示謝意，他們對你是很關懷的，很儘力的。此信給他們看一看，我向他們表示衷誠的謝意。

祝愉快！

父親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四百一十頁）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毛岸青和張少華在一九六〇年完婚。可是，六年以後——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卻背著毛澤東，突然在北京大學的萬餘師生面前，歇斯底里地狂叫：『毛家不承認這個兒媳婦！』試問，江青又有什麼資格代表『毛家』！

雖然在每次講話中，江青口不離『代表毛主席』、『緊跟主席』，但是在行動中經常違反黨的政策，同毛澤東唱反調。譬如，在『文革』中，毛澤東一貫主張要文鬥，不要武鬥，而江青卻最先煽動打人，後來又提出『文攻武衛』，煽動全面內戰。

自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全面奪權』，造成空前混亂，不斷出現武鬥後，毛澤東就反覆不斷地講反對武鬥，反對打砸搶。他曾指示：『不管什麼情況，打人要受刑事處分』；『凡是私設公堂的，一律解散，一律把人放了』；他還認為，當時的鬥爭方式太低級了，如『砸爛狗頭』，『什麼狗頭，是人頭嘛！還有什麼油炸、火燒，都沒有用，要求從政治上、理論上把批判對象批倒』。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專門為此寫信給周恩來說：

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這裡我順便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應當分析武鬥的大多數是黨內一小撮別有用心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黨的政策，降低黨的威信。凡動手打人應以法處之。請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這年秋季，毛澤東到南方各地視察，沿途又談了不少反對武鬥的話。在江西南昌，他說：『一鬥就戴高帽，掛黑牌，下跪，搞噴氣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在湖南長沙，他說：『不要搞武鬥，批判鬥爭會要搞文鬥，不要搞武鬥。犯了錯誤的檢討了就可以了，不要過火了。』

毛澤東反對武鬥的主張及他所講的這些話，江青都是一清二楚的。毛澤東給周恩來這封信，當時全國各地各派群眾組織曾經廣為印發。可是江青背著毛澤東，多次講話，煽動武鬥。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就在一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接著又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她在接見河南代表團時，再次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又一次煽動武鬥情緒。她向這些造反派說：『也不能太天真爛漫了，就是當挑起武鬥的這一小撮人在達成協議以後，他們的武器還沒收回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她要造反派們做到『文攻武衛』，『不能天真爛漫』……她還語無倫次地亂打比方說：『已經達成協議，誰撕毀協議誰就是蔣介石。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跟我們訂了協議，他馬上就撕毀了。這樣的人我們要揭穿他，河南也不例外。』

江青這番鼓吹『文攻武衛』的話是針對陳伯達的。雖然陳伯達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繳各個群眾組織的武器』則是根據毛澤東的主張和中央《六·六通令》的精神所講的，只因不合江青的心意，她就對這個『忠實』的戰友放了冷箭。

一九六七年，在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後，中央決定給武漢軍區黨委覆電。這封經過毛澤東批准的覆電道：『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其中陳再道名字後邊的『同志』二字是毛澤東親筆添加上去的。可是，在七月二十六日下午，當武漢軍區領導陳再道等被召參加討論覆電問題而步入會議室後，林彪、江青等人卻不准他們坐下，只准站著。會議開始不久，吳法憲受集指使開始了氣勢洶洶的發言，說著說著，竟然伸手打了陳再道兩個耳光，隨之，早已站在那裡的幾個打手惡狼似地衝了過去，先撕掉陳再道等五人的帽徽、領章，接著是一陣拳打腳踢，還不准他們講話。會議休息時，吳法憲又唆使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衝上去進行推搡、毆打，繼續對陳等武鬥。周恩來聞訊趕來制止，那些打手早已都溜之大吉。在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搞武鬥，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嚴厲批評吳法憲在會上帶頭搞武鬥的行徑，而江青卻立即張開保護傘，當面對吳大加誇獎，說：『吳法憲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九月五日，在接見安徽來京代表的會議上，江青再次大肆販賣『文攻武衛』的謬論，說什麼：『當階級敵人來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不過我聲明，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為了欺騙群眾，抬高自己，江青每次講話都打著『代表毛澤東』的幌子，她是

一個專靠「打著別人的旗幟」「販賣私貨」的行家。她對毛澤東陽奉陰違的事例不勝枚舉。

想必是毛澤東看穿了她這一套手法，所以在「文革」後期，曾多次對她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常翠聲明說：「孔老二講的，言必信，行必果。聽到沒有，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後期時，江青的個人野心惡性膨脹，她常以呂后、武則天自詡，還在外賓面前不知羞恥地說過「我是當然的接班人」的話。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全國四屆人大召開前夕，江青上竄下跳，妄圖干預人大的人事安排而陰謀組閣，達到進一步竊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爬上權力的頂峰、實現她夢寐以求的「女皇」地位。

毛澤東深知江青的狂妄、貪婪，公開提出不准江青「組閣（當後台老板）」，針對江青的陰謀，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



1966年9月，穆欣被江青找茬停職一個月，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同穆欣交談（左起：謝鐙忠、穆欣、胡震、唐平鑄）

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經過毛澤東一次再次地批評，江青『組閣』終於失敗，王洪文沒有當上委員長，江青也沒當上黨的主席。毛澤東還在同王海容、唐聞生談到江青時說過：『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江青可恥的結局不出毛澤東所料：她還沒有『鬧』起來，就落入了人民的法網，她和她的『四人幫』終於被黨和人民的鐵拳所粉碎。

三、林彪——一個十足的偽君子

關於林彪其人，人們寫的已經很多，我在這裡只是說點片斷的印象。

『文革』初期：在江青夥同林彪將我投入監獄之前，我曾在各種大小會議上見到過林彪和聽到過他的講話，但是個人和他沒有過單獨的接觸。那段時間，林彪單獨同中央文革小組（和先前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全體成員見面總共也只有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開會期間，林彪偕葉群到上海來找江青等進行密謀時，曾在一家戲院裡同起草小組全體成員見過一次面，還陪大家觀看了江青、張春橋插手搞的京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我記得，那次見面的氣氛是冷冰冰的，林彪除了和大家拉拉手外，幾乎沒有講一句話，只是坐在那裡瞇著眼睛看戲（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看戲，還是坐在那裡動腦筋想『壞點子』）。當時劇場裡外戒備森嚴，觀眾就只我們十幾

個人和林彪帶來的少數隨從人員，演員演起戲來也沒勁。一九六四年，京劇現代戲在北京匯演時，《光明日報》因為刊登過一篇對這齣戲的劇本改編、藝術表演略有批評的文章，江青和張春橋鬧得天翻地覆，現在我又和他們兩人一起『觀賞』這齣戲，感到格外『敗胃口』。

另一次會面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不久後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也就是毛澤東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印發給到會人員的當天下午。這次，林彪突然來到釣魚台，在十五號樓召見了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在陳伯達將文革小組的成員逐一介紹後，林彪坐了下來，開始了大篇的講話。他說：『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們見面一下，認識一下。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主席，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同志們進行過緊張的勞動，你們的工作碰到困難，有很大困難，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佔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變人的靈魂，把舊思想打垮。』他說：『你們這些同志這幾個月起了作用，今後還希望起更大作用。當然冷水潑下去，靠主席扭過來。不然大山壓下來頂不住，大石頭攔住通不過。』

林彪和江青一夥都大叫大嚷要在『亂中奪權』，他們總嫌社會上亂得不夠，所以他的這次通篇講話就是在給中央文革小組打氣、鼓勁，要求我們千方百計煽動群眾使局面更加動亂。

我記得，他在這次全會上講話時說過：『文化大革命』『不要走過場，干脆大鬧幾個月，弄得人們睡不著覺。』『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很不簡單。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很容易，改造

人的思想，改變人的靈魂是不容易的，要經過大震動，像這次是氫彈、原子彈震動人心。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打倒；要使他們的威信掃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大家動動腦筋，在靈魂上大震動，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建立無產階級權威。」其後，在另一次軍委召開的會議上，林彪鼓吹要掀起更大風暴：『我們要颶他的風，讓他颶我們的風還不行，我們要颶他的風。我們要颶十級、十一級、十二級的台風，來摧垮他們。單純的消極防禦不行，要採取主動的進攻。我們過去一段的時間預防是必要的，但是過了這一段時間，採取主動的進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後，有的時候還可能轉到防禦，但有的時候要採取大規模的進攻，或者小規模的進攻。』

許多年來，不論在什麼場合，林彪始終念念不忘鼓吹個人崇拜。在這次見面會上，他仍以慣用的『唯我獨革』的口氣，點了許多革命老幹部的名，稱他們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加以猛烈抨擊說：『他們不想革命，也不讓別人革命，他們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反共分子；名義上是革命者，實際上是反革命分子，不少人不能正確地評價主席思想，認識主席思想的偉大。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最偉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責任感，最現實的革命精神。毛澤東思想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的考驗，是無產階級最高的理論，是無產階級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國有史以來最高水平的著作。我們不以此為武器，為動力，不重視，就要犯大錯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視這一點，就是很大錯誤，如同蘇聯人丟掉列寧主義一樣。』

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就吹捧『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羅瑞卿因曾

反對這種不科學的、唯心主義的提法而受到了殘酷迫害。其後，林彪憑藉自己取得的權力，打著最『革命』的旗號，繼續別有用心地煽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狂熱。不論大會小會，或者其他場合，林彪都在盡心竭力地『造神』。他不但把個人神化，也把科學變成神學。在這一點上，前文講過的陳伯達和康生這兩個造神吹鼓手，都是對林彪甘拜下風的。他們在『造神』過程中，處處以林彪為『表率』。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他那篇被稱作『政變經』的講話中就大造其神。他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主席廣泛發展和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九月十八日，他又在北京軍事學院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還說：『什麼唯物論，什麼辯証法，什麼歷史唯物論，什麼自然科學，不學也行』，『唯獨學會忠於毛主席』，才是『超過一切，高於一切的最大的學問』。他極力主張對毛澤東要做到『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四無限』——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他通過這套形式主義的拜神論，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還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他把科學的理論變成迷信的咒語，在全黨提倡盲從。

歷史已經證明，林彪『造神』只是為了欺世盜名，哄上騙下，愚弄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林彪聳

人聽聞的高調，純粹是彌天大謊！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曾假惺惺地講道：『我最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預料是要出錯誤的。』又說：『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思考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然已經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也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曾幾何時，他按捺不住那篡黨奪權的野心惡性膨脹，公然跳出來『搶班奪權』。群眾已將他的言行加以對照，給他畫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畫像：『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一九七〇年春，在北京討論修改憲法時，毛澤東建議不設國家主席，然而，早就企盼當『國家主席』的林彪對此建議十分不滿，他於四月十一日在蘇州通過秘書向中央再次提出自己反對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年八月間，在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秉承葉群的『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的旨意，在發言中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同時編發『稱天才』語錄（他在下面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及時地識破了林彪欲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意圖，決定從陳伯達開刀，終於挫敗了林彪的奪權陰謀。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到外地巡視途中，在談到廬山會議上的這場鬥爭時，他說：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

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還說：『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按：指『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麼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這樣一來，毛澤東把林彪在『造神』時所講那些謊言全都揭穿了。

這年十二月十八日，著名的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主席萬歲）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毛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的——因為別人喊「萬歲」，他們也跟著喊。第三種人是偽善的。你（按：指斯諾）千萬不要受這一套的騙。』（斯諾：《漫長的革命》，香港南

粵出版社，第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二頁。）

林彪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他和葉群在賣國叛逃、折戟沉沙之後，在他們遺留的一些記事本裡，有許多被葉群記錄下來的、林彪對她講的私房話。這些記錄充分揭穿了這個口是心非、欺上瞞下的偽君子的真面目。林彪因要『造神』而公開講的那些對毛澤東阿諛奉承的話，都是為了搶班奪權的需要，是他謀算躍登『當代偉大人物』寶座的訣竅。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葉群記錄的林彪談話中就有這樣一段：『黑格爾說：何謂偉大人物？偉大人物就是公眾利益代表者。一〇一（指林彪）說：何謂當代偉大人物？一號（指毛澤東）利益的代表者（應聲蟲）。』而在林彪自己的筆記中也寫有『得一人者得天下』。林彪正是把自己偽裝成對毛澤東唯唯諾諾的『應聲蟲』，得以一步一步地爬上『當代偉大人物』的寶座，騙取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這個罩著閃閃發亮的金色光環的稱號。再看一段可以作為這段註腳的筆錄：『「萬般皆下品，利益唯獨高」。離開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條萬條中第一條。』還有『三不』、『三要』之類的哄上手段：『三不：不干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以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蘇州記錄的黑話：『只有服從，才能獨立。意即百依百順，才能有權……』對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著作的態度，林彪說的是：『為省腦力，勿讀一號（指毛澤東）和斯（指斯大林）。』但在公眾場合，林彪卻永遠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也叫別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還要倡導『天天讀』。由於林彪作俑，以後發展到『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在中國造成駭人的宗教般狂熱的個人崇拜現

象。把林彪的言行與他心聲記錄加以對照，不正是活脫地勾畫出一張偽君子的醜惡臉譜嗎？！

我最後一次看到林彪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處理『青海事件』的會議上。

『青海事件』又稱『趙永夫事件』，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青海省西寧市發生的一次流血事件（有關此事件的起因，本章第一節中已作了簡述）。趙永夫當時是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當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群眾的命令，青海省軍區為執行這一指示，協調西寧地區『支左』工作，建立了西寧地區駐軍聯合辦公室，趙永夫擔任辦公室副組長。不久，中共中央要求軍隊對報紙、電台實行軍事管制。當時青海日報社已被西寧市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所佔領。他們在報社內大搞打、砸、搶、抄、抓，對報社工作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幾個人被活活打死了。為了阻撓解放軍實行軍管，他們對給他們做工作的部隊戰士從進行武力威脅發展到用暴力驅逐。西寧駐軍聯合辦公室決定，如果任這幫人胡作非為，後果不堪設想，決定對報社強行軍管，由趙永夫擔任現場總指揮，並確定『敵人開槍，我還擊』的原則。二月二十三日，佔據報社的造反派不僅不聽從要求撤出的命令，反而向部隊開槍挑釁，部隊被迫進行反擊，雙方發生武裝衝突，一些人被當場打死，其餘的人被驅出報社。這場衝突，共造成死一百七十人、傷二百零四人的嚴重流血事件。此事在中國引起極大的震動。

這次事件發生前後的一切情況，青海省軍區都向林彪和中央軍委作了報告。曾經支持開槍的林彪見風頭不好，企圖把責任推給葉劍英，誣陷他是『罪魁禍首』趙永夫的『黑後台』。並利用這一事件

鼓吹『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鬥軍隊領導人，搞亂軍隊。

中央文革小組對青海事件最初保持沉默，幾天後就利用《簡報》刊登有些造反派紅衛兵來信，信中哭訴他們被趙永夫『鎮壓』的經過。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據此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三月間，『調查』了兩次。所謂『調查』，就是只聽取由中央文革小組挑選出來的『受害者』的控訴。結果，是非曲直完全顛倒，將『罪魁禍首』說成是趙永夫。林彪、江青又添油加醋地乘機把此事說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表現，用以打擊葉劍英等老帥，同時陷害青海一大批黨政軍革命老幹部。葉群矢口否認青海軍區曾就此事向林彪辦公室作過報告。他們極力上綱上線，擴大事態。康生誣蔑趙永夫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是反革命。中央文革小組將按照林彪、江青一夥構思的『調查』結論向毛澤東作顛倒黑白的匯報。經毛澤東點頭、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三月二十四日下達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中說：趙永夫等人篡奪軍權，對『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是一個反革命政變』，並說這一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決定：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總後辦事處副主任）、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向群眾宣佈『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著手籌建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

在京西賓館召開處理『青海事件』的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宣佈《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趙永夫當場被捕。林彪在這次會上發表了冗長的講話。他給這次事件定性說：青海問題，三月十一日主席

批了。經過調查已經查清楚了，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是一個反革命政變。隨即痛罵趙永夫，點了一大片青海黨政領導幹部的名。他毫無根據地說：趙永夫這個傢伙，他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是隱藏在黨內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這件事是和王昭有關係的，王昭和羅瑞卿的關係很密切，和彭真、劉瀾濤是有關係的，是個壞蛋。王昭是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急先鋒，他操縱保守組織與『八一八』死作對。趙永夫在鎮壓『八一八』以後，就急於把王昭做為反革命的『三結合』對象……其實，當時王昭根本不在青海，他因骨折正在河南洛陽一家骨科醫院治療，與此事件毫不相干。只因林彪在北京如此信口開河，他在青海的代理人就一口咬定王昭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後台』，並將王昭活活地整死。

會上，林彪還借題發揮，危言聳聽，顛倒黑白，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內老一代革命家。他說，從這件事中我們要吸取教訓，軍隊也是不純的，有壞分子的，像趙永夫這樣的人還存在。不但青海有像趙永夫這樣的壞分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後勤部、總政治部和總參謀部都有這樣的壞人，這些人要造反，要奪權』。林彪狂妄之極，竟然把在冤案平反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紀委第二書記的黃克誠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顧委會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洪學智誣蔑成『壞人』，而把他們的爪牙，李作鵬、邱會作說成是『好人』。

實際上李作鵬、邱會作這兩人均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一九八一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趙永夫問題重新審查，實事求是地分析了



1970年8月，林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

『青海事件』發生的歷史原因，認為這一事件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趙永夫等人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干擾的影響下所犯的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決定給予趙永夫撤銷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原級不動，按正師職重新安排工作。因為長期遭受殘酷迫害，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含冤死去的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亦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徹底平反。

第九章

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康生，製造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

在中國這場延續十年的動亂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抱著篡位奪權、『改朝換代』的惡目的，從一開始就大造『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輿論，煽動各地造反派打倒老一代革命家，誣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軍系統的負責人，使無數在槍林彈雨中和白色恐怖下不曾折腰的革命者、幹部以及一大批愛國的知識分子，遭受著滅頂之災的厄運。十年中間，他們用極其殘酷的手段迫害無數革命幹部，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

『文革』期間，康生一直夥同林彪、江青等人，緊緊把持中央專案工作的大權，陷害了成千的高級幹部。在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由康生分管的彭真、劉仁、陶鑄、賀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王任重、林楓、『新疆叛徒集團』、『蘇特』等專案組，據現有統計，『審查』對象達二百二十人；而其他三十三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周揚、小說《劉志丹》等大案），『審查』對象一千零四十人，也由他直接控制和參與謀劃。據確鑿材料統計，在『文革』中被他直接誣陷和迫害的幹部多達八百三十九人，其中，他在講話、文件中加罪定性、點名誣陷的有五百二十九人（包括他老婆曹軼歐點名誣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他親自審定的報告上點名誣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在這八百三十九人中，三百六十人是中央副部長、地方副省長、部隊大軍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其餘的大部分是老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當時，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殘致病的，則無法統計。

康生夥同江青等人，為了在黨的『九大』實現『改朝換代』的陰謀，極其陰險地從組織上搶先下手，幹了兩樁黨史上罕見的、罪大惡極的勾當：

一樁是把大部分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誣陷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親筆寫了一封絕密信，附上親自排列的黨的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九十二人名單，作為『要件即呈』江青『親啟』。在這個名單中，其中被劃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及『列專案審查』的有八十九人，有二十九人被劃為『有錯誤』或『歷

史上要考查』，有七人屬『靠邊站』。除去病休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竟有高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的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康生誣陷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有政治歷史問題』。『文革』中，他們就是按照這個黑名單點名批鬥和陷害老幹部的。

另一樁是給大批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和第四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常委任意加罪定性，戴上敵我性質的帽子。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康生指使當時的中央組織部負責人郭玉峰，把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和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的政治情況分類排隊，開列名單送給他。結果，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常委中，分別有四十一名和五十四名中共黨員常委被劃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黨自殺』和『有嚴重錯誤』，各佔黨員常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九和百分之六十四，而非黨員常委被劃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分別為七人和十七人，各佔非黨員常委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二，還有一些人被註明『問題很嚴重，但在運動中沒有觸動』。康生接此報告後，立即給郭玉峰寫信，叫他進一步把『特務』、『叛徒』、『特務叛變嫌疑』、『三反分子』、『修正主義走資派』、『政治上、組織上有嚴重問題尚未定性』的名單分類排列，並在原有名單中，親自為另外的十七人加上了『特務』、『叛徒』等帽子。

這兩個駭人聽聞的政治陷害名單，成了江青、康生之流在『文革』中殘害中共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依據』，同時，也是康生罪行的鐵證。

由於康生一夥把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的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

致使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時，絕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力，八十七名中央委員，只有四十人到會；九十八名候補中央委員，僅十九人到會，遠遠不足半數。開會時，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十人為中央委員，才剛過半數；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能出席會議的只剩九人；而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人員達七十四人，佔會議成員總數一百三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七還多。因此，人們把這次會視作中共黨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全會。

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康生一手製造了著名的中央黨校『哲學公案』，組織批判『合二而一論』，使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等八十多人慘

附件即呈

江青同志親啟

絕林

康生 2/11/68

江青同志：

送上你定的名單。
現在對人尚難定性。
有的人運動中還會下
降或上升。這是粗略
的統計，很不精確。
僅供參考。

康生 2/11/68

遭迫害，波及、株連理論界、文藝界、教育界上萬人；繼而帶頭圍剿《海瑞罷官》，迫害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以致吳晗、袁震夫婦及其女兒小彥均含恨而死；他又親手製造所謂『大特務劉仁案』，把劉仁、徐子榮等迫害致死，許多人受株連。僅原北京市委二十個常委，就被逮捕九人，逼死二人；致殘一人，還有六人被長期隔離，原北京市各部局及大專院校領導幹部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他還親自散佈謠言，捏造所謂『二月兵變』事件，誣陷賀龍、彭真；親自製造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製造『新疆監獄叛徒集團案』，致使二十三人含冤而死，大批親友受牽連；他一手策劃了內蒙『內人黨』案，這一案株連數十萬人之多，並製造了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特務案』，使十餘萬人因此受株連；他還夥同林彪、江青極力煽動派性，挑起武鬥，鎮壓群眾；先後在河南、武漢、寧夏等地製造了多起流血事件。

道貌岸然的康生，實際上是個心毒手狠、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二、康生說：『反對林楓是同反對劉少奇的鬥爭分不開的』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伊始，林楓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扣上『特務』、『三反分子』

的帽子，列為批鬥對象被『揪』了出來。在康生的親自指揮下，林楓最終被迫害致死。這一樁冤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老一代革命家的典型案例。

林楓是黑龍江省望奎縣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在黨內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北平抗日救國聯合會黨團書記、北平市委書記、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等職；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副書記、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十年代初期，曾任國務院業餘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校黨委書記；此外，他還是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化大革命』起始，康生就積極配合林彪、江青等人篡奪中央各部門領導權，煽動『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聲稱：『一個黨校，一個組織部，一個聯絡部，基本上原來的領導人都是壞傢伙，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自一九六三年林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後，主管黨校工作的康生就把他看作眼中釘。而林楓因曾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到北方局工作時擔任劉少奇的秘書，先後與彭真在北方局、東北局共過事，並於東北工作時期曾向林彪提出過批評，林彪就以此誣陷他和彭真、呂正操是反對他的所謂『桃園三結義』。這又為康生對林楓的迫害提供了一枚重型炮彈。

『文革』一開始，在康生一夥的授意、慫恿和操縱下：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中央黨校就有人貼出大字報，『炮轟』以林楓為首的校黨委會。此後康生親自到黨校進行煽風點火，暗示『林楓有大

問題』。七月十日，黨校有人貼出了林楓『反毛澤東思想十大罪狀』的大字報。康生聞訊，趕忙找來黨校的兩個負責人，要他們支持年輕人『造反』，並叫他們通知這張大字報的作者智純和武葆華到他那裡『談話』。這兩個人根據康生的旨意，回校組織串連，籌組了『紅旗戰鬥隊』，旋即發表宣言：『決心揪出、鬥倒、鬥臭以林楓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準備林楓一回校，就把他拉下馬』。

八月十三日，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林楓回校，當即向黨委會議傳達全會的主要精神。十四日，武葆華等人遵照康生的策劃，貼出了《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就在前頭》的大字報，煽動全校員工向林楓『猛攻』。十五至十六日，當林楓召開全校大會傳達十一中全會文件時，造反派叫囂要林楓傳達康生的『批評』，頓時會場大亂。這時康生派人代表他宣佈：『我歡迎、支持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態度』，『要徹底揭發、批判林楓壓制民主、不准革命的嚴重錯誤。』八月十八日，康生向毛澤東書面報告黨校的運動。報告中說：『高級黨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六、七兩個月，主要是批判楊獻珍、侯維煜、王從吾。』『現在，運動已經揭開了蓋子，打開了局面。』在同一天，康生一手操縱的中央黨校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正式成立。二十日，在全校大會上，造反派把校黨委領導轟下主席台，並給林楓等校領導戴高帽子、掛牌子，揪他們到禮堂外遊鬥，進行人身侮辱。當晚，康生在人大會堂接見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表示：『我完全支持同志們的革命熱情，要把林楓等人的問題搞深搞透。』『戴高帽子沒關係，輕得很。』他接著說：『林楓的問題不光是黨校的問題，還有在東北反林總的問題。』康生唯恐天下不亂，接見後他又打電話給黨校的造反派，再三叮囑『把林楓

等人的問題揭深揭透』，並強調『戴高帽子、掛牌子不算武鬥。』二十八日，康生去黨校進一步點火，說『黨校是長期抗拒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黨校的蓋子又大又厚又深』，『楊獻珍的黨校是楊家黨，林楓的黨校是林家鋪子。』八月三十一日，他在人大會堂接見黨校『八·一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時說：林楓早在東北時就同彭真結成死黨，因而，這次揭林楓遇到了『彭真這個大蓋子』，遇到了『中組部、中監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林楓比楊獻珍『更狡猾、更陰毒、更厲害』。

經過康生一夥煽動，九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連續三天召開全校大會，『鬥爭』林楓。十月十六至十七日，一批《炮轟劉少奇》的大字報在黨校內出籠。大字報把劉少奇說成是『中國赫魯曉夫』，是『楊獻珍、王從吾、林楓的總後台』。

這時，康生開始策劃撤銷林楓的中央高級黨校校長職務。十二月十日，他指示造反派頭頭武葆華等人寫個撤銷林楓校長職務的報告，他說：『你們不向中央寫報告請求，我不好辦呵！』但他又叮囑：『有些事不要講是康老講的。』當時他還指示他們，把林楓、楊獻珍也拉去參加將要舉行的批鬥彭真、陸定一等老幹部的大會。這幫造反派心領神會，在十二日就召開了批鬥林楓的大會，並假用這次『大會全體革命同志』的名義，給中央寫了報告，要求撤銷林楓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康生拿著盜用群眾名義寫的這個報告，親自提請中央撤掉林楓的中央黨校校長職務，並對他立案審查。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下達關於撤銷林楓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校黨委書記職務和建立專案審查的決定。翌日，康生派人抄了林楓的家。

十二月十四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聯絡委員會』與中央黨校『紅旗隊』等十八個單位，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徹底摧毀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

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誓師大會』，林楓遭到殘酷鬥爭。這天被揪鬥的還有陸定一、張聞天、李維漢、楊獻珍、蔣南翔、陸平、于光遠、楊述、馮定、關山復、劉導生、張友漁、劉季平、范瑾、周游、梅益等。造反派強令他們『低頭示眾，繞場一周』。林楓身材魁梧但患高血壓、心臟病。在雙手反剪的情況下，紅衛兵逼他低頭、下跪，跪了又拉起來，拉起又下跪，來回折磨他。在嚴冬十二月的低溫下，他汗水卻灑濕了面前的大片水泥地。以後在回憶這天被鬥的情形時，他說：『我可以站著，可以躺著，就是不能跪著！』在此後的六年監禁生活中，他也從不低頭，從未屈服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淫威，表現出一個老革命家的硬骨頭精神。

這次批鬥後，林楓被衛戍部隊送往城郊萬壽路羅道莊兵營。彭真、劉仁、萬里等人也被軟禁在這裡。十二月十八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大會，『鬥爭』林楓和彭真、劉仁、萬里、鄭天翔、許立群、田漢、周揚、楊獻珍、蔣南翔、陸定一、吳晗、鄧拓、廖沫沙、張潔清等。

這天的批鬥會，從上午十點一直開到下午四點（被鬥者於凌晨兩點就被送入會場）。身穿舊軍裝、臂戴紅衛兵袖章、腰繫皮帶、腳穿翻毛皮鞋、雙手插腰、盛氣凌人的紅衛兵將被鬥者雙手反剪，勒令他們低頭，讓他們坐『噴氣式』，態度極端野蠻。林楓和有些被鬥者不服氣，掙扎著直起腰、昂起頭。他們的行動激怒了這些喪失理性的打手，更加強了對被鬥者的暴行，有的被按頭，有的被揪髮，被鬥者苦不堪言。及至大會結束退場時，林楓突遭這幫打手的拳打腳踢，當場昏迷過去。

這天從凌晨兩點，一直折騰至當夜二十一點多，林楓才輾轉回到羅道莊兵營。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說話，有時低聲呻吟。他的胳膊、肋骨、腿部、頭部都有傷，渾身痛得不能動彈。醫生來

診治時，發現他的胳膊腫得連襯衣也脫不下來了，疼的摸不得。當天夜裡，他被送進部隊的三〇一醫院。為防止紅衛兵闖進醫院搶人，相隨來的衛戍部隊戰士和保衛人員商量，給他起了個化名『李江』，裝作是『東南亞外賓』，還特地在病房裡掛上兩件西服、床頭放上日文畫報……他的真實身份只讓醫務主任和主治醫生兩人知道。經醫院診斷，結果是左臂肌肉瘀血，骨縱裂，左下第四、五根肋骨斷裂，胸部、肝脾被震傷。林楓硬咬著牙，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吃飯、洗臉等只好讓別人幫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他的內傷還未曾痊癒，就被逼迫出院回到了羅道莊兵營。

住院的二十多天內，林楓在病床上思潮滾滾，心情難以平靜，相隨的戰士經常見他凝神沉思。他是一個說話嚴謹、處事審慎的人，平常不輕易說句話；雖然遭受那麼多磨難，從不流露任何怨言。有好幾次，為他做護理的戰士同情地問他為什麼挨整？是否氣憤？林楓總是心平氣和地說：『大局為重嘛！』他還曾樂觀地說過：『這些到運動後期，黨中央、毛主席會做出正確的結論的……』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康生不顧林楓的傷勢尚未痊癒，唆使『林楓專案組』和黨校造反派頭頭對林楓『審訊』，要求『林楓的案子要集中精力突破重點。』在八里莊營房一間大屋子裡，他們連續對林楓『審訊』三天。面對這些張牙舞爪的造反派，林楓從容不迫，沉著應付。

第一天『審訊』時，這幫人提出的問題是：『你對「合二而一」批判不力，你要交代你是怎樣包庇楊獻珍的？』林楓想了一陣，反問道：『今天是講理論，還是講實際？』一個面瘦如猴的人扯破嗓子嚎叫說：『講實際！』林楓說：『好，講實際。我並沒有包庇楊獻珍，批判「合二而一」我是嚴格按照中央、毛主席的口徑辦的，不能說不積極。』這幫人個個目瞪口呆，無言可答，只好破口大罵起

來。林楓回擊說：『魯迅先生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至此，林楓再也不張嘴說話了。有人衝出人群，想要動手逼林楓低頭，但經相隨來的戰士和軍代表制止，『審訊』即告終結。第二天『審訊』時，這幫人又抬出所謂林楓的『歷史問題』，他們大聲吼叫：『你把你的反動歷史交待清楚！』林楓壓抑著內心的憤怒，沉默了一會，才說了一句話：『我的歷史中央清楚！你們代表不了中央，無須對你們說！』又一次把對方頂得啞口無言。這天的『審訊』就此告吹。第三天，仍是毫無結果，這場氣勢洶洶的『審訊』便草草收兵了。曾在場的一位軍代表後來對人說：『這個人真有水平，說出話來滴水不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林楓一直被監護在羅道莊兵營裡。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林楓的傷仍未痊癒，康生硬叫黨校造反派頭頭把他揪回黨校，先後召開大會、中會、小會，連續批鬥了一個多月。十一月二十二日，康生派人到中央黨校傳話：林楓、楊獻珍等五人『都作為中央重點審查對象』。『要在黨校成立五人專案組，這個專案組受黨校和中央專案組雙重領導』。黨校隨即成立林楓專案組，加緊對他逼供陷害。

三、大牆裡面的『逼、供、信』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林楓的迫害開始升級，由北京衛戍區將他逮捕

送進了秦城監獄。

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到一九七二年八月，林楓被關在秦城監獄的五個年頭中，黨校材料組配合中央『林楓專案組』，不顧林楓被打病殘，連續圍攻逼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誣陷迫害林楓所羅織的主要罪狀有三條：一、『參與劉少奇勾結國民黨的陰謀活動』；二、『東北問題』，誣陷林楓『反林總』；三、『偽造歷史，混入黨內』，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怎樣的呢？

關於第一條罪狀：『參與劉少奇勾結國民黨的陰謀活動。』一九三五年秋，隨著日本侵略者同蔣介石的矛盾日趨尖銳，蔣介石愈發感到中日戰爭已無法避免。迫於形勢，他急於同蘇聯簽訂軍事同盟以應付日本的進一步侵略，便令陳立夫一方面與蘇聯駐華大使交涉，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共產黨聯繫。陳立夫即派曾養甫具體負責。當年十一月初，曾養甫找到諶小岑（諶在『五·四』運動時期是覺悟社社員，和周恩來、鄧穎超相識），諶通過翦伯贊找到了呂振羽（呂當時任北平中國大學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的自由職業大同盟書記），呂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部長周小舟匯報。市委研究後，決定呂即去南京，探明真相。呂振羽於十一月底到達南京，開始和曾養甫會談。中共北方局對此事很重視，便派了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前往南京探討國共兩黨談判的事。周小舟先後回到北平、天津，就此問題和北方局研究後，於三月底再次前往南京，直接和曾養甫談判。二月初，北方局負責人之一王世英離開天津，三月初經西安到達山西前線，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匯報了和南京接觸的情況。

在此期間，林楓作為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劉少奇的秘書，曾替劉少奇接收和轉遞過王世英關於周小舟與國民黨談判的匯報材料和傳達過劉少奇對談判的有關指示。這些原本是正常的工作，無可非議，何況還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卻被江青、康生指控為『參與劉少奇勾結國民黨的陰謀活動』，並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向全黨下達一份所謂《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故意弄虛作假，硬將此事誣陷為劉少奇『勾結』蔣介石、陳立夫等『陰謀消滅紅軍，取消紅色政權』的『罪行』。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中，已將此項『罪狀』徹底平反。《決議》寫道：

一九三六年『勾結』蔣介石、陳立夫等，『陰謀消滅紅軍，取消紅色政權』的問題。劉少奇同志作為黨中央代表，於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國民黨代表談判聯合抗日，是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進行的。談判過程和結果，黨中央完全清楚。這根本不是什麼同蔣介石、陳立夫的陰謀勾結。

由此可知，康生一夥同江青就此事所加給林楓的罪名，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狠毒的誣陷。

康生一夥還栽贓林楓『為劉少奇收藏四萬元特務經費』。一九六八年三月，『林楓專案組』給康生報告說『林楓談到了一九三六年劉少奇給他一張匯票，款額四萬元，但來源和用途均說不清。』康生信口開河，就說『這是國民黨給劉少奇的特務經費』。

當時，林楓就此事所寫的材料是這樣的：『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間，劉少奇交來一張四萬元的匯票，要我取出並保存。何地匯來已記不清楚，取款銀行為天津中國銀行。四萬元取出後，就存在天津

中國銀行，分為四折，每折一萬。存折由郭明秋保存之。』

本來這已交代得明明白白了。至於『來源和用途均說不清』，在白區秘密工作情況下完全是正常的。可是康生死死咬定：『這是國民黨給劉少奇的特務經費。』他說：『不是特務經費，怎麼能有四萬元呢？』『咬住林楓，叫他交代這個東西。』唆使專案人員對林楓進行『突擊審訊』。在『審訊』中，審問人員為了迫林楓交代四萬元特務經費的來歷和用途，他們大搞逼供、誘供，還施行野蠻的打罵、體罰手段。

就在這個時候，『林楓專案組』在天津銀行檔案中查出四張存折卡片，每張卡片一萬元。康生如獲至寶，手舞足蹈地狂叫：『這是大成績』，『四萬塊錢的問題，用了四張卡片，一下子就落實了！』『證明劉少奇一九三六年到南京同蔣介石勾結。』他為自己『從口供中找證據，用證據來證實口供』的『重大發明』再次被『驗證』而欣喜若狂。

然而，紙總是包不住火的。後經查明，四張卡片原是東北軍某師長姨太太的存折。劉少奇收到的四萬元中，三萬元是黨中央給他的，一萬元是潘漢年給的。康生移花接木，死死抓住『四萬元問題』大做文章，其歹毒目的，就是為了要證明有一個『劉少奇叛徒集團』。一九七二年康生等人如此猖狂地對劉少奇、林楓栽贓陷害、大搞逼供信的罪惡活動，受到了毛澤東嚴厲的批評。

至於第二條關於林楓在東北『反對林總』的『罪行』。

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政變經』的講話中，曾經陷林楓在東北工作初期反對他。康生鸚鵡學舌，很快就對武葆華說：『林楓的問題主要不在黨校，』

『他在東北反對林彪同志』，『林副主席要召開軍隊幹部座談會來查清這個問題』，唆使他們就此貼林楓的大字報；六月二十日，康生對黨校『文化大革命』作『指示』時，當面對林楓說：『林楓要準備，你在東北反對林彪同志』；八月十三日，康生再次向黨校造反派頭頭授意說：『林楓主要問題不在黨校，他在東北對林總的態度應了解了解』；一九六七年五月，江青、康生一夥不顧林楓身受重傷，向『林楓專案組』下死命令要把林楓在東北『反林總的問題』『重點突破』。『專案組』立即就此對林楓連續進行一連串的『審訊』逼供；這年七月，『專案組』將一些誣陷材料上報康生後，康生親筆修改並報送毛澤東和政治局，以虛構的材料誣陷林楓，欺騙黨中央。

面對這些無中生有的中傷陷害，林楓總是堅持原則，坦然駁斥。一九六七年春，當『專案組』就此捏造許多問題逼他『招供』時，林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切，『全是羅織罪名，並無其事，在東北我除了跟黨中央有聯繫；與其他人無任何聯繫。』同年八月十四日，林楓在一份書面『交待』的材料中寫道：『對於林彪不記得我說過什麼。』

其實，林楓根本不曾有過什麼『反林彪』的事。據一位在東北曾和林楓共過事的老幹部證實，當時林楓只是認為林彪這個人有些飛揚跋扈，容不得不同意見。有次在撫順開會，林楓發言對林彪提出過不同意見，批評過他所表現的驕橫作風。

本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原是所有共產黨員共同享有的權利，是黨內生活中的常規現象，歷次公佈的《黨章》裡頭都有明文規定。不料林彪如此忌恨，不但當時排擠林楓，事隔二十年後，還勾結康生、江青一夥，故意嫁禍於人，給林楓扣上這頂『在東北反林彪』的帽子橫加迫害，進行報復。

隨著林彪和他的老婆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粉身碎骨、自取滅亡，康生利用『東北問題』把林楓置於死地的罪惡企圖成了泡影。

關於強加給林楓的第三條『罪行』——『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是『混入黨內的內奸』。

這純粹是康生一夥炮製的又一個謠言。早在康生煽動黨校造反派頭頭武葆華等人起來造林楓的反時就大造輿論，說：『林楓的歷史很複雜，不清楚』，『肯定不是一九二七年入黨』，『有人說林楓被捕過，在馬路上還帶憲兵找過人』……『專案組』秉承康生的旨意，給林楓戴上了『長期偽造歷史，是真國民黨，假共產黨』的帽子，羅列了需要查清的『九大政治歷史問題』，武斷地將林楓定為『是個十分可疑的人物，可能帶有特務任務，混入我黨，是個內奸』，然後進行『突擊審訊』，大搞逼供信。

事實上，林楓早在一九四五年在被選為中央委員時就經中央審查過，歷史清楚。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在南開中學任教的范文瀾介紹林楓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後他是天津南開中學黨組織和天津市委的聯繫人。當時正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天津各大、中學國民黨的活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所以，說林楓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混入黨內的內奸』，純屬誣陷。

至於所謂林楓『被捕，帶憲兵捕人的問題』更是捕風捉影的事。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康生的講話提綱自稱：『揭發人是間接知道的，林楓叫老鄭，揭發人把他寫成老鄧，糟糕的是這個人死了。有一天，我偶然問林楓，你在哪個監牢？林楓說他沒被捕過。』這段自白證明，康生對林楓完全是造謠惑眾，蓄意栽贓。

暴虐無道的康生、林彪一夥，為了逼迫林楓就範，日日夜夜地折磨他。但是，不論他們怎樣施毒

計、下毒手，他始終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不妄發一言，不含糊一事，嚴詞反擊對方的一切造謠誣陷，使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後經毛澤東批准解除監禁，住院就醫。在此期間，『四人幫』餘孽繼續逼他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他仍憤然拒絕。當時，有的造反派打著『外調』的幌子，妄圖從他口中得到打倒一些老一輩領導人的材料。他以對組織和事業極端負責的精神，總是實事求是地講述被調查者的歷史功過。他堅持真理，寧折不彎，沒有在逼供壓力下傷害過一個人。一些和林楓『同案』受迫害的人上，在『四人幫』垮台後對林楓的親屬說：『從專案組的審訊、問話中，我們就能知道林楓同志沒有說過一句不符合實際的話。』他對自己所遭受的百般折磨，雖心懷極大委屈，身受嚴重摧殘，默默忍受。即使對家人也不吐一字。因此，當他去世以後，在查證他是怎樣受迫害被打傷的情況時，誰也說不全，連他家裡人也不知詳情。他在醫院治療期間，許多人前去看望。他對自己所受的殘酷折磨，從不提起，絲毫沒有流露過任何個人的埋怨情緒。他意識到，『文革』動亂時期，是非混淆，黑白顛倒，中華民族正在受難，人民正在受苦，他深信，黨和人民最終能夠辨明是非，戰勝邪惡，排除一切障礙，讓真理重放光輝。

四、毛澤東批示出獄治病，『監護』仍未解除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楓就被作為『群眾監督』對象，不得與家人見面。自一九六八年三月林

楓被送進秦城監獄後，家裡對他的去向更是一無所知。經他子女多次向『中央專案組』提出要求，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才允許孩子們前去探視音訊無通、整整隔絕六年的親人。

在秦城監獄的探視室裡，當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向他們走來時，『這是誰呀？』六個子女都驚呆了。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林楓緩步走上前來，拉起他們的手，子女們才從那深切的、緊緊盯著他們的目光中確認出他們的父親。

林楓的形象完全變了，體重掉了四十多斤，瘦削、衰憊，完全失去了原來的風采。他的腰和腿都直不起來了，他的眼睛灰蒙蒙的……這是因為，他在監獄裡遭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四年中，他只見過不足二十四小時的陽光；由於一碗米飯就能洗出一碗底的砂子，他經常挨餓；原來就有嚴重的心臟病，又染上了肺結核並出現肺空洞，糖尿病也正在日益加重……

他的外形變了，但他的傲骨丹心卻絲毫沒有改變。就在這個時候，林楓極為激動地打著手勢說：『毛主席有一句話是「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些年我就是靠這點精神過來的。我給自己起了個名字——林樹樂。人家有「八段錦」，我給自己編了「三段錦」，每天堅持做……』正是這種堅強意志和樂觀主義的精神，支持林楓度過幾年牢獄的殘酷折磨，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

康生夥同林彪、江青一直用『反林彪』的罪名在林楓身上做文章，所以對林彪叛國斃命的消息，對他嚴密封鎖。即使在過了一年以後，在這次批准林楓的子女們前來探視時，『專案組』還不准他們告訴林楓關於『九·一三』事件。孩子們決心衝破封鎖，把這個天大的喜訊帶給父親。四女兒林京京把『林彪叛國已死』幾個大字寫在雙臂內側，炎熱的八月天，穿上長袖衣來遮蓋；六個兒女把林楓圍

在當中，四女兒京京緊挨著他，將手臂上的字給林楓看。為了作好掩護，二女兒雙雙故意把帶來的不滿周歲的孩子擰哭。他們的計劃成功了！當子女們問他有沒有想到林彪會出問題時，林楓脫口而出，說：『想到了，因為他離毛主席近了，越近，他暴露得越快！』

林楓性格內向，舉止素來沉穩老成。可是，這次會見深深觸動了他的心弦，無法抑制飛騰的激情。當他見到多年隔絕、歷經苦難的子女，並且獲悉林彪『折戟沉沙』的信息時，再也遏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思潮滾滾，似沖決堤壩的洪水奔瀉千里，不能自己。這天他回到牢房，一直默默地坐在床板上沉思，忘記吃飯，忘了練功，直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被人喊『醒』。

兒女們從秦城探監回家後，感到林楓病情嚴重，生命垂危，他們馬上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反映父親林楓在獄中飽受折磨，奄奄一息的情況，請求早一點對他的重病進行搶救。毛澤東看到這封信，立即親筆批示：『林楓問題過去沒有弄清楚，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放他出來治病。』這樣，生命垂危的林楓方得出獄治病，住進北京阜外醫院。

這時林彪反革命集團雖已滅亡，康生、江青一夥依然不肯放過林楓。他們公然違抗毛澤東的批示，妄圖在醫院繼續對林楓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整整四個月不讓他走出房門，只許子女們來探視。直到孩子們又給毛澤東寫信，林楓才獲得了自由。在以後的日子裡，『專案組』繼續對他百般刁難，對他的案子不作結論，不給恢復黨籍，不解決他生活上的困難。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作了《關於林楓同志問題的審查結論》，在此結論中，仍誣蔑林楓『偽造歷史，混入黨內』，『黨齡從一九三一年算起』。

面對日趨複雜、嚴重的形勢和情況，林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堅持不到被徹底平反的那一天。對於一個畢生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革命家來說，當他覺察到這一點的時候，心情是痛苦的。他曾嚴肅地對子女們說：『和正面的敵人作鬥爭，在戰場上會有犧牲；和革命隊伍內部隱藏的敵人作鬥爭，也會有犧牲。幹革命，對各種犧牲都要有精神準備。』他對人類在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歷史進程中會發生各種曲折的必然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在嚴峻的鬥爭中能夠保持堅貞的氣節和樂觀精神，也就對個人的事情必然會充滿了自信。他常常說，『岳飛的案子，是八十年之後，他孫子那一輩翻過來的。』『古語有「蓋棺論定」，實際上是「蓋棺」不能「論定」！』

林楓雖然蒙冤受屈，身陷囹圄，但他對黨的感情，對毛澤東主席的感情都沒有變。出獄後，因為遲遲不給他恢復黨籍，內心非常痛苦。他曾多次慨嘆：『這個黨，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呀！』還說：『黨審查一個幹部是正常的，凡是黨員都應該接受黨的審查。儘管林彪很壞，在搞破壞。』

一九七六年九月，由於地震之後波動的生活，他的病情愈發加重，步履維艱，有時竟會因為一口水而喘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在舉行毛澤東追悼會那一天，他請夫人郭明秋攙扶著，面向天安門的方向，隨著九時電視播放的實況，在那小小的病房裡，他靜默、三鞠躬，表示深沉的悼念……

林楓酷愛學習。在重病中，還讓大女兒梅梅從拮据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點錢給他買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並說，將來有了錢，還要買齊他們的全集（當時沒有工資，原來的藏書早已被抄走）。因他患白內障，讀書、寫字都十分困難，林楓對夫人說：『我不能看書了，可是也要買呀，聞聞書香也是好的！咱們給孩子們沒有什麼遺產，就是留下這些書。』

實際上，林楓給子女們留下了一筆異常豐盈的精神財產，這就是他對子女的諄諄教誨，對於他們的嚴格要求，更重要的是他的剛直不阿、百折不撓的高尚品德。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有些回到工作崗位上的同事，前來醫院看望他。每次，林楓總是忍著病痛，非常興奮地同他們促膝長談，給與熱情的鼓勵，深情地對他們說：『小平同志是要鬥爭的，你們要支持他工作，他缺幫手啊！』轉過年來的一九七六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針對鄧小平的）的風波使他無比的憤慨，周恩來的逝世又引起他莫大的悲痛。這時，他的病情更趨嚴重，但他仍對江青一夥的篡黨奪權活動十分警惕。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傍晚，子女們從天安門廣場趕回醫院，把廣場上為悼念周總理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林楓原是在病床上躺著的，但剛聽了一個開頭，就自己掙扎著坐起來。他一直用手臂支在雙膝上面，直板板地坐著、聽著孩子們描述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他聽著，聽著，消瘦的臉頰上泛起紅暈，嘴角浮現出發自內心深處的微笑，灰蒙蒙的眼睛裡射出欣慰振奮的光彩。正可謂：『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睡眼開。』毫無疑問，青年一代為了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天安門廣場上展開了關係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大搏鬥，在他心頭點起希望之火，燃起了勝利的憧憬。

隨著時間的推移，局勢愈加複雜。看到江青一夥垂死掙扎的頻繁活動，林楓不禁諷刺地說：『沉不住氣了，急什麼呀！』又對子女再三叮囑：『條件惡劣起來，你們可以不說話，但是不能跟著說！』當時，有一些人憂心忡忡，來找他談心說：『外面都說中國要出女皇帝了！』林楓胸有成竹地回答說：『現在的中國，不會出女皇帝，沒那個條件！』果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

幫』。江青一夥野心家，被拋進了垃圾堆。

五、飽受折磨，含恨而逝

一九七二年，林楓帶著垂危的病體出獄。在許多正直善良的醫生、護士的精心治療和護理下，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長。但是他們無法治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他殘酷迫害所造成的致命創傷。由於『四人幫』的阻撓拖延，林楓蒙受的冤屈一直未能得到徹底平反。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林楓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含冤離開了人間。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作出《關於林楓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結論》根據確鑿的事實，逐條駁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林楓的誣陷，認為『林楓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是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在東北工作期間與林彪作過鬥爭。』《結論》指出：『根據上述情況，說林楓同志「偽造歷史，混入黨內」和「長期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是對林楓同志的誣陷。對林楓同志的逮捕審查，施行逼供，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撤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武葆華等人以鬥爭林楓同志大會名義撤銷林楓中央黨校校長和黨委書記職務的報告。建議中央撤銷中發（六六）六一六號文件 and 一九七五年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關於林楓同志的審查結論》。推倒強加給林楓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銷毀審查期間

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的材料，為受到牽連的家屬，子女消除影響。」這份《審查結論》在報告中共中央後，中央批覆同意。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又發出《關於林楓同志入黨時間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七七年九月林楓同志逝世後，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了《關於林楓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業經中央批覆同意。《復查結論》指出：說林楓同志「偽造歷史，混入黨內」，是對林楓同志的誣陷。根據林楓同志「七大」代表登記表和彭真、張柏園同志寫的材料，證明林楓同志是一九二七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中對林楓同志逮捕審查，施行逼供，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林楓從秦城監獄出來（仍處於「監護」狀態），在北京阜外醫院治病時，與親屬合影（1974年秋初）

第十章

憂心悄悄，愠於群小

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異常困難的處境中，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周恩來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始終堅持自己的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穩定局勢，消除動亂，既要維持國家各方面工作繼續運轉，又要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他殫精竭慮，千方百計地保護了相當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著名民主人士和專家學者。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夥的極大忌恨，他們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對他的攻擊和誣蔑不斷升級。在我未被江青一夥投入監獄之前的那段時間裡，曾經見到、聽到有關周恩來同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一些事情。出獄之後，聽到他更多的令人感動的事跡。周總理的大智大勇，給我留下了銘心刻骨的記憶。

一、保護了一大批人

林彪、江青之流，出於奪權、掃清障礙需要，他們大搞打倒一切。為了使一大批黨、政、軍的老幹部和著名人士免遭劫難，周恩來不顧自己處境的極端險惡，一次又一次地保護了許多人過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來寫了《一份應保護的幹部名單》送毛澤東批准，名單上的頭一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她是已故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因為在宋慶齡的心目中，江青是一個『報復心強而又權慾熏心的女人』，所以，平時很少與她來往，只是在『文革』開始後，她曾勸過江青『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江青心胸狹窄，睚眦必報。她決不會容忍宋慶齡對她的冷漠與批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江青等人煽動北京的一些紅衛兵造反派貼出攻擊宋慶齡的大字報，砸毀孫中山的塑像及衝闖宋慶齡的寓所。

周恩來得知後，嚴厲告誡北京的紅衛兵，制止他們的破壞行動。周恩來說：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他的夫人自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裡貼大字報不合適……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

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為此，在一次『文革小組』會上，江青衝著周恩來撒野叫嚷：『這個你也不讓批，那個你也不讓鬥，你的的確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

在『文革』運動初起階段，上海紅衛兵搗毀了宋慶齡的雙親在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地。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下令上海有關單位緊急搶修，並在修復後指示將修繕後拍攝的照片寄給宋慶齡。

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將出版《宋慶齡選集》，周恩來親自為此書題寫封面標題字。江青看後，馬上將書扔到地上，一邊用腳踩，一邊罵宋慶齡。惱怒之下，連孫中山的紀念大會也拒絕參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紅衛兵抄了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的家。第二天早晨，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求救。毛澤東在章士釗的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當即嚴厲批評了有關人員，責令立即送還從章士釗家抄走的所有書籍和物品，並派警衛保護章宅。九月一日，總理命解放軍總醫院接收已經或將會受到紅衛兵抄家、揪鬥的章士釗、程潛、傅作義、蔡廷鍇、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對他們加以保護。

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十年浩劫』期間，也是周恩來竭盡全力保護的對象之一。『文革』剛開始，江青一夥就對郭沫若誣蔑詆毀，煽動紅衛兵貼他的大字報。由於周恩來和毛澤東下令保護，方免被揪鬥，但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在北京農業大學被造反派私設公堂，

嚴刑拷打，含冤死去。周恩來得知這不幸消息後，親自前往郭家弔慰。以後他還兩次派聯絡員去調查此案，都因江青一夥橫加阻攔，均沒有結果。到了後期，江青、張春橋不顧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勸阻，假藉『批林批孔』運動當眾點郭沫若的名，煽動造反派對他批判和揪鬥。他們兩個還竄到郭老家裡逼他寫『檢討』，寫『批宰相』的文章，但都遭到郭沫若的嚴詞拒絕。在此前後，周恩來兩次親臨郭沫若寓所看望和安慰。就在江青利用『批林批孔』大會公開點名批判郭沫若的那天晚上，周恩來得知郭沫若病倒了，特意派人到他家中，就郭沫若的健康與安全下達了四點指示，並指定郭的秘書王廷芳負責執行。雖然郭沫若患的是肺炎，多次出現險情，由於周總理的指示，都被搶救脫險。周恩來十分關心他的病情和醫療，還派自己的保健醫生到醫院探望。郭沫若主要依靠周恩來的竭力保護才得以闖過這場災難。當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傳來時，郭沫若悲痛欲絕，在病榻上寫下飽含深情的悼詩：『盛德在民長不沒，豐功垂世久彌恢，忠誠與日同輝耀，天不能死地難埋。』同時，他還用顫抖的手在日記中寫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詩句，以寄託他對總理的不盡哀思。

周恩來以經毛澤東批准的《應保護的幹部名單》為依據，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地採取種種措施，來達到保護大家的目的。他曾把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和政府各部部长們輪流請到中南海『休息』，以免受造反派的衝擊揪鬥；他有意安排一些領導人參加接見紅衛兵的會議，或讓他們上天安門，參加一些重要的會議和活動，或有意讓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報刊以表明這些人『沒有問題』；他還在報請毛澤東批准後，把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接到北京，以『開會』、『匯報』為名保護起來；當有些領導人被批鬥時，他或親自陪同到場，或派聯絡員代他陪同，以免被過分批鬥；他還曾將一批領

導人分散到幾個工廠『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實際上責成有關工廠的軍宣隊將這些領導人保護起來（這些是毛澤東親自抓的點，軍宣隊是毛澤東派去的，造反派不敢輕舉妄動、胡作非為）。有時他乾脆把人交給衛戍司令員傅崇碧，讓北京衛戍區加以『看管』。

由於總理的關懷，曾被造反派追索、劫難在即的許多領導人都到過中南海避過『風頭』。王震、廖承志等是最早被請進去住的『客人』。後來，賀龍、薛明夫婦就住在西花廳周總理的家裡。有一段時間，周恩來還特地把受到衝擊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接到北京加以『看管』。他說：『許世友同志脾氣不好，比較暴躁，萬一跟造反派鬧僵了，就不好了。因此，要他來北京住上一段時間。』

在陳毅受到衝擊後，周恩來多次親自陪同他出席批判大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親臨並主持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有外交部造反派參加的『陳毅檢查大會』。在陳毅以沉重的語調、誠懇的態度唸完自己的檢查稿後，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道：『……陳毅同志的檢討是通過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們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陳毅同志的工作……我希望同志們給他一個機會，考驗他這樣一個老同志，他為黨工作了四十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幫助他。以同志式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你們的幫助比我一個人好，我可以比較放心外事系統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工作上去』。

陳毅誠懇而又深刻的檢查和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周恩來以為陳毅的檢查已經過關，格外高興，因為這是『文革』以來被『解放』的第一個副總理。可是林彪、江青豈肯就這樣放過陳毅？他們對外交大權志在必奪，因而繼續煽動造反派揪住陳毅不放。周恩來堅持不懈，保護陳毅。

僅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五十天裡，他所接見外語學院造反派就有五次，每次都要花四、五個小時和他們談話、講道理。到一九七三年為止，他共接見這個學校的造反派二十多次，每次他都苦口婆心、忍氣相勸。一九六七年八月間，因為陳毅被造反派連續批判六、七次，周恩來怕他病倒，想法把他接到人民大會堂以得一些休息。造反派仍對陳毅窮追不捨，周總理只好另闢地方接見他們，對他們進行耐心說服。在以後的日子裡，周總理仍堅持親自陪同陳毅出席各種批判大會，以便制止造反派可能採取的的粗暴行動。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周恩來冒著盛夏酷暑趕到外交部小禮堂，出席對陳毅的『批判會』。剛到會場門口，衛士長成元功向他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已經踏上禮堂門前石階的周恩來立刻停住腳步，當面質問會議主持人：為什麼違反昨天達成的『協議』？他站在台階上不動，堅持撤下標語後他才入場。他冒著三伏天的高溫，抱臂站在烈日下整整一個鐘頭，直到造反派自知理虧，被迫摘掉了『打倒……』的標語，他才步入會場。在『文革』期間，如果沒有周恩來用自己的身體擋著那些明槍暗箭，陳毅早就被江青一夥整垮了。

陳毅患病期間，周恩來對他更是關懷備至。當他發現邱會作等人控制著陳毅所在的三〇一醫院、還在那裡推行什麼『醫療為政治服務』的怪論時，就請致力於鐳放射研究數十年的老專家吳桓興為陳毅放療，後又親自批示，將陳毅轉到北京日壇醫院，並親筆批准該醫院為陳毅做胃腸短路手術。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不幸病逝。周總理衝破了『四人幫』重重的阻攔，經周密的組織和安排，不僅確保了陳毅追悼會開得莊嚴隆重，而且毛澤東也親自前去參加了追悼會。這給在這場動亂中被衝擊、受迫

害的人以極大的慰藉。

周恩來對老帥徐向前的保護也令人記憶猶新。

徐向前和其他老幹部一樣，也是『文革』中首當其衝的『黨內、軍內的走資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在江青夥同陳伯達、康生宣佈『打倒』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劉志堅後的兩天，徐向前被任命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江青為顧問，關鋒為副組長。因為他在多次會上與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使這幫人對徐向前的迫害進一步升級，尤其在他們掀起反對『二月逆流』的邪風以後，徐向前實際上成了有名無實的掛名組長（但又不讓他辭掉這個職務）。在以後的半年多時間裡，徐向前受盡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關鋒、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等人的圍攻、誣蔑——『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代表』、『對抗中央文革』、武漢『七·二〇事件』的黑後台，遭到了造反派們一次又一次的批鬥、抄家。更有甚者，七月二十九日夜，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令人衝進徐帥家，搶走五鐵櫃機密文件。周恩來從徐帥秘書處獲悉情況後，立即指示：（一）所進人員全部撤走；（二）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三）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責成北京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在總理的親自干預下，才使抄家的風波平息。

轉眼就是『八·一』建軍節。林彪、江青竄通一氣，極力反對『二月逆流』的『參與者』和在被揪鬥人士出席慶祝『八·一』招待會，而周恩來則堅持讓老帥們和盡可能多的老幹部出席這一活動。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左右，周恩來打電話給葉劍英，要他轉告徐向前，作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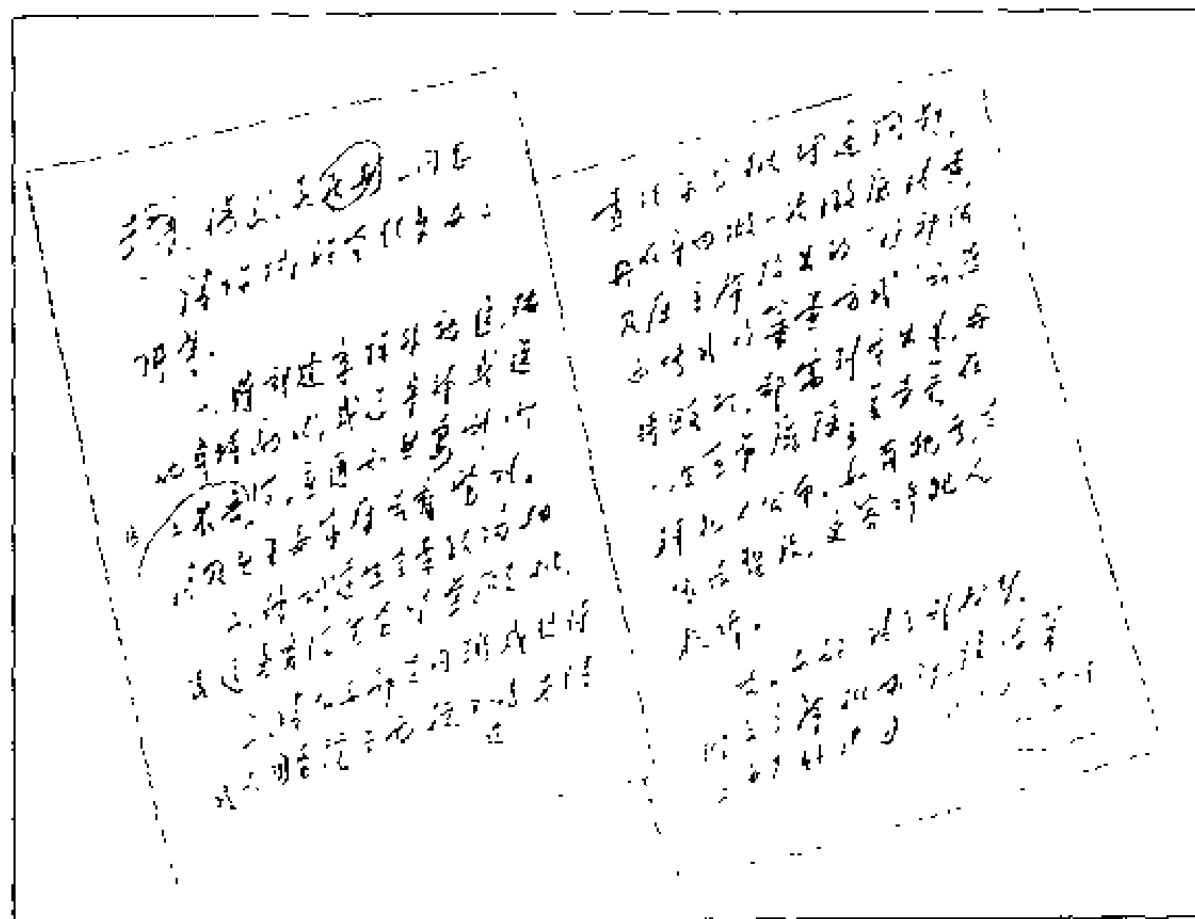
於對出席招待會的人員名單爭論不休，當時他已直接請示毛主席，只待決定後再作正式通知。稍後，正當葉劍英帶了理髮師在徐向前的住處給徐理髮作準備時，總理來了電話，說：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會，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為了保證安全，周恩來還親自佈置了徐向前的行車路線，並加強了沿線警衛。徐向前和葉劍英剛出門，周恩來又來電話：問走了沒有，而且還叮囑徐向前的夫人黃傑說：『你和徐帥要多多保重啊！』

周恩來還曾竭力保護過處境更加艱危的彭德懷。他深知彭德懷的為人剛直不阿、寧折不彎，如果同造反派硬頂，會出現不堪設想的結局。所以，在『文革』初期他就告訴秘書，密切注意彭所在的成都方面的動向，要求有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間，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組織『東方紅』戰鬥隊決定把彭德懷從成都揪到北京。周恩來在得知此訊後，立即讓秘書告訴成都軍區司令員、政委，務必即刻向在成都的紅衛兵頭子王大賓傳達中央的指示：彭德懷由成都軍區派專人和部隊護送來京；坐火車，不准坐飛機；沿途要保密；不准任何人劫持，途中不准對他有任何侮辱行為；要保證他的絕對安全。抵京後，指定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親自去接，由衛戍區負責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紅衛兵插手。在如何押送彭德懷來京的問題上，曾因紅衛兵與成都軍區領導的意見對立，氣氛十分緊張。現在有了總理的指示，紅衛兵不得不執行。十二月二十七日，火車抵達北京，傅崇碧親自帶了一連軍人前去迎接。一到那裡，他發現情況不妙：北京站內『造反派』雲集，大有搶人架勢。到場的各派互不相讓，儼然要動武。總理在接到報告後，馬上接見了那些紅衛兵頭頭，批評了他們不聽中央指示的行為，同時也同意他們派人會同衛戍區共同管理，但約法三章：對彭德懷

不准遊鬥，不准武鬥，不准搞逼供。但因林彪、江青一夥的操縱，『造反派』有恃無恐，對總理的指示陽奉陰違，彭總終於落在他們手中，飽經殘酷折磨，患了重病。周恩來發現此情況後，馬上將彭德懷送進了醫院治療。其後，周恩來又親自安排和過問，為彭動手術、治療等事項，並且派了自己的保健醫生卞志強大夫坐鎮。

同樣，周恩來對陶鑄的全力保護也是眾所周知的。尤其在陶鑄被確診為癌症時，他及時向中央作了匯報，並將所寫的《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呈報毛澤東批准。報告內容為：『擬同意送入三〇二醫院，進行保密治療。即呈主席批閱。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衛局的報告才知陶鑄的病情較重，經追問後，送來這一報告。』

在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年代裡，周恩來以高超巧妙的鬥爭藝術、用人民給他的權力，殫精竭慮，為人民和人民的事業保護了一大批中華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致信公安部等部門負責人，責令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

民族的精英。而他對於那些長期患難與共的老戰友的真摯感情，特別令人感動。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不管是陶鑄胰腺癌，陳毅腸癌，還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那一片真誠是可對天地，可昭日月！換碎了那顆心。』

二、蔑視林、江一夥的明槍暗箭

周恩來，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還是一名普通黨員，中國人民對他的崇高品格和他對中國革命事業所作的偉大、光輝業跡都是有口皆碑的。但是，江青之流把他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在『文革』中，對周恩來的反對、陷害更是甚囂塵上。面對種種嚴峻形勢，周恩來始終以大局為重，以大智大勇、高超的鬥爭藝術頂住了對方一次又一次的明槍暗箭。

我清楚記得，在『文革』期間，周恩來每次要出席較大的群眾集會時，大都事先親自或委託秘書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派人陪他參加，並都按時到會。細緻周到固然是他的一貫作風，但也意在免除江青一夥有刁難的藉口。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談到要派人陪同總理出席某項活動的事時，江青指著戚本禹和姚文元說：『總理常要小組派人去陪，你們年輕，不要去，可以由春橋、關鋒、穆欣他們去。』實際上，張春橋和關鋒從來都不願去陪，這個『差使』十有八九都是由我前去。不過，對我來說，是十分樂意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周總理要在中南海接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代表。因關鋒當時是總政治部副主任，總理親自打電話叫他參加。關鋒本來閒著，但他既拒接總理的電話，也執意不去。結果，接連來三次以上的電話，我實在覺得不像樣，就對關說：『這樣一直讓總理等，不大好吧！』關鋒兩眼一瞪，板著面孔答道：『我就是不去陪他！』後來，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請總理參加。事前總理親自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也叫他參加（陳伯達當時還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開會時間定在當天午後三時。陳伯達叫關鋒陪他前往，關不願去；改派戚本禹，戚也斷然拒絕，還當面教訓起他的『組長』來：『要去你去，你作為科學院副院長去！』（意即不要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身份出席，因為他們不想承認科學院革委會），其狂妄神態溢於言表。陳伯達到達人民大會堂後對總理說：『他們誰也不來，我也不好同大家見面。』周總理見他如此畏葸，也就不難為他，說：『你見見主席團！』結果陳伯達去了未敢在前台露面，只是在一個會議室內見了一下主席團諸公。這時，周總理饒有風趣地說：『這就算中央文革承認了！』

我十分樂意讓我去陪總理。總理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對人關心、體諒、寬厚。能常同他在一起，實在是莫大的幸運，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總理為人謙遜，虛懷若谷，無論對什麼人，總是平等相待，關懷備至，有許多這方面的事，使我永生難忘。凡是筆者在場，總理談話中涉及新聞報道的事，他總是要提到《光明日報》，給予鼓勵。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陪同他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小林雄一為首的日本記者訪華代表團。在客人來到前，他主動詢問我有關新聞界的情況，關懷我和《光明日報》的困難處境。他早知道江青每天把我『發配』到《人民日報》管『版面』的事，還問我

《人民日報》的情況，同時讓我轉告唐平鑄（《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努力把報辦好』。在此前的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和其後六月五日在國際俱樂部舉行的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文藝講話》討論會閉幕式上，他見到我的時候，都主動關心地鼓勵我。

『文化大革命』前期，周恩來花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經常通宵達旦地接見紅衛兵和各種群眾組織代表；親自多次前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對師生講話。鑒於當時特定的橫逆形勢和自身的艱難處境，在有些場合，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甚至錯話，因為不這樣做，他既保不了自己，也保不了別人，國內的局勢會更加惡化。但在多數場合，他都坦率地仗義直言，敞懷闡述自己對運動中出現的各種現象的觀點。既有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也有苦口婆心的批評幫助，甚至不乏聲色俱厲的批駁、責問。在他的努力下，使不少人犯了錯誤又洗面革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從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勢力，並卓有成效地與他們進行了較量。

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刁難、陷害真可謂處心積慮、無孔不入。每次派我去陪總理時，江青常要使出些小手腕，暗中搗鬼。有時他們故意很晚才告訴我，讓我遲到，好讓總理在會場等我，故意給公眾造成一個印象：中央文革小組在怠慢總理。例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飯後，戚本禹冷不丁地告訴我說，江青要我和他去北京礦業學院與學生見面。在去的途中，戚本禹說他將發表講話，至於講什麼，他不想讓我預先知道。在與礦院學生見面不久，突然釣魚台來電話，說總理當晚七點到北京體育館參加國家體委的批鬥大會，通知我去參加。我即乘車穿城而去，趕到北京體育館已八點多鐘，見

總理還在休息室等候文革小組成員的到來，已坐了不短時間。那天大會安排了賀龍元帥發言，所以總理要等到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人到後，才偕同賀龍一起進入會場。當時江青、康生一夥煽動紅衛兵到處張貼『打倒賀龍』的大標語。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代表參加和陪同賀龍出場，造反派是可能搞小動作搗亂的。

又如，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總理給中央辦公廳的同志們講話。戚本禹事先知道總理要去講話。他和王力約定，總理一講完就去『消毒』。當戚本禹得知總理講完了，就跑來對我說：『中南海貼出了劉少奇的大字報，快和王力一起去看看。』我們到了貼大字報的地方，戚本禹悄悄走進室內，很快又出來說：『辦公廳的同志聽說你們來了，要求你們進去見見面。』由於戚本禹事先搞鬼，周總理講話後人們未散，滿屋是人。戚將王力和我向公眾逐一介紹後，留下王力講話，戚就和幾個人陪我進另一個房間去『聊天』。王力那天在大廳裡講了些什麼，直到後來我被江青關進秦城監獄，有關專案人員向我調查他們反總理的活動時，我才知道。事實上，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貼出的。頭一天，他召集中央辦公廳一些人到釣魚台，煽動他們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當晚這些人就率眾闖進劉、鄧、陶的住處圍鬥他們。周恩來講話就是批評此事的。中南海的群眾組織也有兩派，戚本禹就是中南海造反派的頭子。當時在場的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以後談到那天王力所講的內容。他在《我為少奇當秘書》這本書中寫道：『王力、戚本禹等人，為了配合奪權的「革命行動」，在中南海召開所謂活動積極分子會議，他們在會上對一些年輕人邊訓斥、邊煽動：社會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轟轟烈烈，已開始了大奪權，可是作為黨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的中南海，還是冷冷清清，死水

一潭……這不是中南海的光榮，這是中南海的恥辱……劉少奇、鄧小平就在你們的眼皮底下，為什麼他們至今還逍遙自在……」

『從此，中南海又熱鬧起來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其中一張貼在大食堂門口的大字報率先開始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惡毒攻擊……』

至於那個被毛澤東指責是『刀子嘴、是非窩』的江青，更是明裡暗裡隨時將矛頭指向周恩來。她經常對總理無理糾纏，到處撒潑。『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在周恩來身邊擔任警衛工作的成元功說：有一次，『由周總理主持召開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問題的會。會議定在下午四時在大會堂接見廳開，那時我是警衛處副處長，負責這次會議的現場警衛工作。大約在三點半鐘左右，江青的警衛員孫佔龍同志打電話給我，說江青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要我在大會堂給她準備吃的，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先吃飯後參加會議：要吃雞蛋餅、雞湯麵、兩葷兩素四個小菜。我找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同志，儘快按要求備好了吃的，放在旁邊小山東廳裡。此時黨中央、國務院、軍委、中央文革等有關同志都到了，就等著江青了。此事我向在場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作了匯報。我們兩人站在會議廳門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約晚到了十五分鐘，汪東興給她敬了個禮，我對她說：「開會在這個廳，你的飯在小山東廳，要不要先吃點東西，她沒說話斜了我一眼，就進了會議室。那時大家對她出於尊敬都站了起來，她卻不理睬，徑直走向總理，以質問的口氣說，你們在開什麼會，為什麼叫成元功在門口擋著不讓我進來？當著與會者的面大吵大鬧起來。總理解釋她不聽，會也開不成了。為了照顧影響，總理宣佈休會後，同江青、汪東興、楊成武、李作鵬等人來到小山東廳。江青繼續吵

鬧不休，硬說總理安排我在門口擋著不讓她進去，意思是總理背著她搞什麼活動。總理就讓汪東興叫我進去當面說清楚。當我走到門口時，聽見總理大聲說：「我是個老同志，你應相信我們這些老同志，根本沒有的事。」我推門進去後，總理說：「你們查對吧，我不參加。」說完總理就到走廊裡去了。這時汪東興要我把情況說一下，我就把她的警衛員來電話說的話原原本本地講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說：「根本沒有的事，去把我的警衛員叫來。」汪東興把孫佔龍叫去，孫說：「是我打電話讓成元功準備飯的。」江青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你們都給我滾出去，不要你們在這裡工作，你們去給總理說去。」我出來遠心地對總理說：總理，今天我們工作沒做好。總理沒有說什麼，又進了小山東廳。後來她又和總理大吵大鬧了一個多小時。說什麼孫維世是一條狼，成元功是一條狗，罵不絕口。我心裡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頭指向周總理，拿我們開刀的……」



1967年5月25日，穆欣陪同周恩來接見日本記者同盟代表團團長小林雄一（左二），副團長小泉省吾

三、挫敗江青鎮壓『聯動』的陰謀

『文革』初期，周恩來為了指導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活動，曾派國務院副秘書長周榮鑫與他們聯繫，動員他們儘力把混亂的局勢穩定下來。最初，中央文革小組並不反對這個組織的活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組出席紅衛兵在天橋劇場召開的辯論大會的時候，江青還有意和他們親近，把幾個紅衛兵頭頭叫到一間化妝室裡，為他們撐腰打氣，同時挑撥與中央的關係。她說：『現在我們站在前台來支持你們，但是背後有人給你們捅刀子。你們要知道，中央內部也不一致啊！』八月底，江青、林彪一夥還戴著『西糾』的紅袖章參加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隨著運動的全面開展，『西糾』對林彪、江青之流的反革命野心的認識逐漸加深。他們開始起來造中央文革小組的反，張貼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敲響了中央文革的喪鐘』等反對林彪、江青的大標語。這時，江青一夥就翻臉不認人了，即刻站到了『聯動』（即『西糾』等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對立面。一方面，他們通過《紅旗》雜誌的社論『鬥爭矛頭對準什麼，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來恫嚇這個組織；另一方面，採取逮捕來鎮壓這些剛把鋒芒指向他們的青年學生，並對周恩來進行突然襲擊。

十二月十六日，由江青一夥策動，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上，江青活像一個潑婦，口不擇言地大罵，並威嚇說：『對於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這樣一小撮，我們要堅決地實行專政！』她事先未向周恩來打招呼，當場突然點了周榮鑫、雍文瀾（國務院副秘書長）和不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的名字，誣陷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

台』，還逼周榮鑫、雍文濤到前台低頭認罪，並且指著他們的鼻子對群眾說：『我希望你們對這些年輕的、犯了錯誤的同學們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堅決死不回頭的執行資產階級路線的人，鬥倒、鬥臭、鬥垮！』

面對江青的突然襲擊，周恩來異常震怒，但仍然儘力克制。人們看到，從來不抽煙的周恩來伸手拿起一支香煙，默默地抽著，神色十分嚴峻。會議的主持人覺察會場上緊張氣氛和總理的憤慨，在江青還沒有講完話的時候，來問我（在江青後面接著先要講話的是陳伯達）：是否還要請總理講話？我認為，畢生經過無數驚濤駭浪、與世界超級反動人物經過反覆較量的周恩來，豈能被江青這般鼠類的耀武揚威所嚇退？況且先已宣佈總理要講話，這也是在場的絕大多數紅衛兵的殷切期望。於是，我以堅決的口吻回答說：應照原定議程不變。

在陳伯達講話後，總理從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針對江青對『西糾』聲色俱厲的指責、漫罵，他親切而關注地說：『總結這四個月的經驗，成績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長過程中，不可能沒有毛病，沒有缺點，沒有錯誤。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像一個新生的孩子，剛從胎裡出來，長一個瘡呀，長一個疤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成長起來的。』講到這裡，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這掌聲說明了人們的意向，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總理在講到有些紅衛兵被捕的時候，他異常沉痛地說：『因為他們是青年，只要他們誠心悔過，交代出犯錯誤的原因，就應該得到寬大處理，這樣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們大家。』

周總理深知，江青一夥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來的。他唯恐這些青少年繼續遭受他們的

鎮壓摧殘，所以，在十二月十七日召開的『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上，為了儘早解除江青一夥鎮壓的口實，他勸告各糾察隊馬上自動解散。

江青一夥心毒手狠，悍然搶先對『聯動』進行大規模的殘酷的鎮壓。他們狡猾地躲在幕後，唆使大學生圍攻中學生。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一、二、三、三個『司令部』和首都兵團以及一部分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煽動他們鎮壓西城、東城的紅衛兵糾察隊。

本來，中共中央已在十一月二十日剛向全國批轉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中指示：『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的法律。』『如果有人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

可是，江青完全無視中央的指示。她召來了當時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商討如何讓上述的三個『司令部』抓人『合法』化。江青說：『聽說你們抓了很多，我很怕你們走向反面，犯錯誤。抓來的人，你們可以交給公安部，讓他們替你們管，告訴公安人員管好，隨叫隨到，發生問題由他們負責。』她還惡狠狠地說：『北京的這股歪風一定要鎮壓下去，給全國做個示範。對於那些打人多的，態度不好，年紀大一點的，可以鎮壓，一定要判死刑；年輕的可以判死刑緩期。』關鋒立即補充說：『把西城區糾察隊的後台查出，嚴重的槍斃！』

有了尚方寶劍，三個『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對紅衛兵糾察隊——『聯動』大舉鎮壓。謝富治指揮蒯大富、聶元梓等，先後數次調動數以萬計的大專院校學生，配合謝富治下令調派的警察，連續

對多所中學進行大包圍、大搜捕。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謝富治指揮蒯大富、聶元梓之流調動三萬餘名不明真相的群眾，把「八·一」中學圍得水泄不通，如鐵桶一般，把這座具有光榮歷史的中學砸得稀爛，並當場抓走三十二名學生。當時有兩名同情學生的教師，因表示不滿，也被當作『聯動』份子投進了監獄。這次瘋狂的搜捕，逼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舉國嘩然。在各校被抓的人中，有一百多名只有十幾歲的『聯動』成員被當作『專政對象』關進了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囚禁了三個多月。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才把監獄大門打開，把他們釋放出來，送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會議室，等候總理接見。

看到周恩來總理走進來，孩子們全都站起來。都像受了委屈的兒女見到了親人，頓時哭聲喊聲交織一片。總理一邊招手，一邊審視著這群衣衫襤褸的『小囚犯』，眼睛也濕潤了。總理揮手讓大家坐好，先問：『董良翮在不在？』又問：『誰是孔丹？』他們都滿眼熱淚，默默地站起來。董良翮是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兒子。是董老嚴守組織紀律，老老實實交出去的（這天董良翮回到家裡，董老對他說的第一句話：『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親許明原是周恩來的秘書，其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當時在北京四中讀書的孔丹是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負責人，有一次會議上被江青點了名，硬誣蔑說糾察隊是壓制紅衛兵運動的，要揪出『黑後台』。許明自知江青是對著她來的，被迫含恨而死。總理得知消息很痛心，說自己沒有關照到，沒保護好。總理對孔丹說：『你父母的情況我都了解，你不要難過，你們是黨和人民一手撫育大的，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總理講話的聲音低沉。人們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裡飽含著對革命後代的

愛憐和一種難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們的禍首江青和陳伯達、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著。這次是根據毛澤東的命令釋放的。江青等人雖不甘心認輸，卻也無可奈何。總理生怕孩子們再受折磨，這時面向大家，明確地告訴他們說：『你們回去後，不要搞向毛主席請罪的活動，這樣不好，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反對的，應當以實際行動跟著黨幹革命！』

被江青一夥關進監獄而在這次獲釋的卜大華是清華大學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後來，他在談到當時被釋放出獄前後的感懷時說道：『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我被扭送入獄。對此，我最大的感覺是氣憤而不是害怕，難道僅僅因為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就可以抓人嗎？在監獄待了八十八天，沒有人理我。我憤怒地要求將我釋放，我渴望辯論，渴望見到最高領導人。我巴不得他們提審、批鬥，我會拿出自己的全部辯論才能和他們幹一場。可就是沒有人理我。後來監獄的管理員透露說：「你們都是中央文革讓抓的，不是我們管得了的。」我們乾等了三個月。四月二十二日，監獄突然一個一個牢房提人，一下子點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紅衛兵。我們說這回有戲看了，要是去批鬥才有意思，一百多個紅衛兵往台上一站，看他們怎麼批。沒想到不是去批鬥，而是坐著大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央首長的接見。中央碰頭會的成員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說了一句「委屈你們大家了」。當時我們都哭了起來，覺得委屈，委屈極了。還有一個原因，好久沒見到周總理，這回又見到了。周總理問：「有沒有清華附中的？」我站了起來，但哭得說不成話。總理那天很嚴肅，開始是一聲不響，

後來也流淚了。總理說：「在這裡見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賓到廣州，發現抓了許多人，都是些孩子，這怎麼行呢？不能不教而誅嘛！回京後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後來我們還得知，所謂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師和副總理向中央文革發言，其中也說了這樣的話：「你們不教而誅！十七八歲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們。」（《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

四、江青『放火』，周恩來『滅火』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鼓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到處煽風點火，製造混亂，以便在『混水中摸魚』達到篡權奪位的陰謀。周恩來為了穩定局勢，維持國家機構的正常運轉，保護一大批老幹部過關，就時時處處地充當『滅火』隊長。這一『放火』與『滅火』的鬥爭，一直持續到周恩來積勞成疾，因病逝世。

『文革』初期，經常由周恩來主持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本來，中央文革小組是指派副組長張春橋前去參加的（另一位副組長劉志堅也常參加，但他還另兼有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但每當張春橋和江青要策劃陰謀、鼓動鬧事及給總理和老師們出難題的時候，他們就會派我去『當差』，這樣他們也可避開老師們詰問和指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隨劉志堅去參加碰頭會。會議剛開始不久就接到電話報告說，

北京市委的一位領導人被揪到西單長安戲院批鬥，經交涉，造反派不讓出來。總理望著我和劉志堅，還沒來得及說話，就有人提出是否讓我去解圍。劉志堅心裡明白，這些事情都是戚本禹等人唆使造反派頭頭幹的，非由他們一夥出面不可。所以，他說：穆欣去不行，解脫不了他。我們兩個誰去都不行。這一案還未了結，又傳來北航『紅旗』等紅衛兵組織正在衝擊國防部大樓的警報。會場的氣氛陡然緊張。在座的葉劍英、陳毅等幾位老帥一聽怒氣填胸，攘臂瞋目地說：簡直無法無天！

衝擊國防部的事曾在這年十一月八日發生過。那天，有六百多名張家口外院和解放軍工程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衝破了門外兩個營的警戒和阻擋，野蠻地打破門窗，衝進了國防部大樓。當時，林彪視而不見，撒手不管。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勸阻不果，只好向中央文革小組緊急求援。最後，由陳伯達給衝進國防部大樓的造反派寫了一封信，派張春橋、戚本禹和代表全軍文革小組前去求援的謝鏜忠（他兼為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成員）前去現場解決。在張春橋宣讀了陳伯達的這封信後，造反派即行退去。為使讀者了解真相，現把陳伯達這封信的全文供讀者一讀：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和那樣，千條和萬條的道理，但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神聖的國防部這樣的大事來，你們的各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那樣的小道理，擺在大道理之上，這怎麼能說是正確的呢？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什麼事情可以一個一個談清楚，有什麼委屈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

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更要不得，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再往那裡頂了。你們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偏聽偏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託張春橋、謝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來見你們。說這番話，請你們考慮。

應該說，陳伯達在信中所說的這些道理也很一般，並非什麼『錦囊妙計』。問題的關鍵是，『解鈴還須繫鈴人』，因為造反派是『認人不認理』的。在這以前，劉志堅、謝鏗忠代表全軍文革小組講了千言萬語，並反覆傳達了葉劍英、徐向前老帥的指示，造反派頭頭全然無動於衷。如今張春橋就憑陳伯達信手寫的這個『指示』一唸，就易如反掌地把這些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勸』走了，這完全是因為這些造反派組織是被陳伯達、張春橋、戚本禹一夥所操縱的，而那次衝擊國防部大樓的行動正是由他們挑動起來的。

這次衝擊國防部的消息傳來，總理和老帥們都打電話去勸學生們撤退，都未生效。在座的老帥心裡都很明白，肯定又是江青一夥在搗鬼。

國防部是黨和國家的軍機要地。如一旦遭到打、砸、搶，就會給中國的事業造成巨大危害。總理

非常著急，立即招呼劉志堅和我到隔壁房間，以他的名義起草一封信函，勸告前去衝擊的學生迅速退走。總理一邊口授，我一邊筆錄，每寫完一段，他同我們琢磨一番，在措詞上作些推敲。過了一會兒，信件還沒寫完，總理的秘書跑來說：經過張春橋、戚本禹前去『勸說』，衝擊國防部的紅衛兵已經開始撤退。

衝擊國防部的警報雖然解除了，但周總理和老師們無不憂心忡忡。透過眼前發生的這一系列怪現象，他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反革命兩面派的手腕。他們個個嘆息連聲，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自『文革』開始後，幾乎天天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碰頭會，每次討論的議題，不外乎全是研究如何解決在社會上和各單位內部挑起的諸種『事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實際上是中央文革在釣魚台『放火』，中央常委在人民大會堂『救火』。自從劉少奇、鄧小平被衝擊後，會議一直由周恩來主持。總理忍辱負重，支撐危局，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他盡心竭智，嘔心瀝血。的確，他在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他要竭盡全力地把他們煽風點火攪亂了的秩序穩定下來，他是這幫野心家篡權奪位的巨大障礙。正是由於這樣，江青一夥對周恩來耿耿於懷，極端忌恨，居然在下面諷刺總理是『救火隊長』。一九六七年二月間的一天，不知具體是什麼原因，江青又怫然作怒，當面咬牙切齒地指責周總理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你存心拆散中央文革！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一副無賴潑婦的嘴臉，活靈活現，同時也充分暴露了她內心對周總理的深仇大恨。

五、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而廢寢忘食、日夜操勞的周恩來，從「文革」開始的第一天起就沒有過片刻安寧。他忙於安排國民經濟，力爭保持國家機器繼續運轉；他要調和派性、武鬥及應付林彪、江青一夥製造的種種麻煩。凡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都能看到，總理通常一天的工作時間都不少於十八小時，不單是在辦公室辦公，就是在臥室、飯廳、衛生間、外出途中，隨時隨地都在工作。他睡覺的時間極少，每天最多也只能睡三、四小時，經常是只睡一、二小時或者只能打個盹；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他會連續工作數晝夜。如一九六七年春天，正當中國廣州春季交易會召開之際，紅衛兵造反派以「交易會裡那些「泥菩薩」、「老壽星」、「大阿福」以及時裝、珠寶、首飾全是「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該砸爛」為理由，要打砸廣交會。總理聞訊，專程從北京飛往廣州，親自做說服紅衛兵的工作，輪流同各派紅衛兵代表談話。為此，他一連三十多個小時沒能睡覺，接著又連續七十多小時未能好好休息。這屆廣交會保住了，並圓滿結束，但周總理由於過度勞累，心臟病發作。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眼看身體一直不錯的周恩來日漸消瘦下去，還患上了心臟病，可是他仍堅持通宵達旦地工作，無不感到心疼。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總理辦公室的秘書、醫生、護士、服務員、警衛員、炊事員、司機們自動地湊在一起商議，結果由秘書趙茂峰起草，聯名給總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總理辦公室的門上，希望能起到經常提醒總理注意休息的作用。大字報全文如下：

周恩來同志：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最初在大字報上簽名的都是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兩天後，鄧穎超又提出五條『補充建議』，貼在這張大字報邊上。這五條是：『（一）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改為白天工作；（二）開會，談話及其他活動之間，應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三）每日節目規定應留餘地，以備臨時急事應用；（四）從外面開會、工作回來後，除非非常緊急事項，恩來同志和有關人員之間不要立即接觸，得以喘息；（五）學會開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要簡練些。以上幾點，希望恩來同志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人員堅持大力幫助。』常到總理那裡去的中央領導同志葉劍英、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人也都在大字報上簽名表示支持。

周恩來歷來十分尊重群眾，第二天就在大字報上工工整整地寫了八個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大家的心意他是感動的，而且確實願意接受。可是，又如何『實踐』呢？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一方面要做好各派群眾組織的工作，繼續維持全國的生產，保障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還要對付江青一夥的搗亂和刁難。後來他跟大家說：『我不能休息。你們看，這麼多的文件都等著我批，這麼多的事要等著我辦，我能休息嗎？』這以後，隨著運動的發展和形勢的日益嚴峻，他不但

得休息，反而更加操勞，直到身心交瘁，終於崩潰。確如他在重病期間：對跟隨自己直到生命最後時刻的警衛喬金旺說的：『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有人曾在『文革』初期對周總理的緊張的工作節奏作過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的幾個月中，總理參加的紅衛兵大型匯報會、座談會在四十次以上（未計人無數小型的匯報和個別的約見）；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半年多時間內，他親自接見紅衛兵、處理由紅衛兵引發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各種文件，就多達二百三十次之多。這個時期，他在紅衛兵身上耗費了極大的精力。面對來勢洶湧、迅速推向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他不得不放下手頭的許多重要事情來親自做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們的教育和勸導工作。他不分晝夜地與紅衛兵代表談話，向他們宣講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盡最大努力和可能來緩解群眾運動對各級黨政機關的衝擊，減少無政府主義對國民經濟的破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先後在北京接見來自中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總共約一千一百多萬人。每次接見時，從毛澤東的安全保衛、行進路線，直到紅衛兵的食宿、軍訓等細微瑣事，都由總理自己親自安排和落實。即使是這樣，他還要受到江青一夥人『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刁難和責難。

在我被捕前，總理每次召集籌備接見的會議，中央文革幾乎都派我去參加。那時，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以前那種步子矯健、生氣勃勃的神采，看到的只是他滿臉倦容和疲憊的腳步。我還好幾次看到他掏出手帕輕輕地揩拭額頭沁出的汗珠。

極度的勞累，深重的憂憤，已使總理身心交瘁。儘管如此，周恩來始終堅守崗位，為穩定局勢做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

毛澤東決定在十月十八日第五次接見全國紅衛兵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接見大會指揮部發佑了一份『標語口號』，後來中央宣傳部刪去了『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堅決擁護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等口號；還將『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中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字樣刪了。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專院校『三司』造反派頭頭劃大富藉口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乘機鬧事。『三司』總動員，糾集大隊人馬衝向天安門，大呼『要揪出篡改口號的黑手』，並且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周總理獲悉後，當天凌晨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研討當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安排，責成有關人員恢復刪去的口號，從而平息了這一突發事件（在有的關於『文革』內容的書中寫道，是『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三司』提出的標語口號。』其實，這是當時一些小報的誤傳及有些人的自吹）。

有關十八日凌晨在人大會堂召開的這次會議，還有一段意味深長的插曲。周總理步入會場、坐下來正要講話時，謝富治滿臉堆笑地湊到周恩來的跟前，望著總理極度疲勞的臉色，虛情假意地說：『總理可要愛護身體呀，您又通夜沒有睡吧，這樣可不行啊……』他話還沒有講完，總理就面帶怒容、雙目盯著謝富治斥責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當時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大家還都從來沒見總理發過這麼大的脾氣。謝富治猝不及防，驟然面紅耳赤，無言以對。

周恩來這時發火不是偶然的。謝富治是靠著『揭發』、誣陷『老上級』鄧小平迅速『飛升』的。他和江青一夥沆瀣一氣，是站在『造反派』一方的高級幕後策劃者。正是他們迫使總理沒有片刻安寧，給折磨得身心交瘁，卻假惺惺地表示『關心』，正是這種虛情假意的『關懷』，激發了周恩來長期壓抑著的憤慨。

隨著形勢的急劇發展，江青之流對周總理的刁難、折磨和陷害，從低調升到高調，從暗處轉到明處，由隱蔽進而公開化。

『文革』最初期，江青、陳伯達大多攻擊周恩來『和稀泥』、『搞調和』，是『折中主義』。如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大會上講話時，指桑罵槐地影射、攻擊周總理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叫囂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們折中主義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陳伯達的授意下，在由王力、關鋒執筆的《紅旗》雜誌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中，更露骨地指責：『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搞折中主義，實際上就是站到敵人一邊。』隨之，攻擊周恩來的調門節節上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實行突然襲擊的第五天，陳伯達在接見群眾時說：『除了陶鑄之外，是否還有旁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至少！』據陳伯達後來的『坦白』，他所說的這個『個把子』，指的就是周恩來；而當三位副總理和四位軍委副主席大鬧『懷仁堂』、抵制中央文革之後，周恩來又被誣為『二月逆流的總根子』。一九六七年五月，江青利用國民黨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偽造的所謂『伍豪啟事』（誣蔑周恩來以『伍豪』化名聲明自首變節），企圖迫害周恩來。康生本來知道事實真相，卻故

意默不作聲。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北京大學有人在江青『首長』的鼓動下，寫信給毛澤東企圖再次挑起事端。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一九六七年八月末，江青指使學生在天安門貼出『炮轟』、『火燒』周恩來的大標語。

面對這此無恥

周恩來同志：

我們要送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否則你才無法為黨工作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誠懇接受
者看官談

周
日
三
日

趙煒、霍愛梅、李進才、張作文、
鄭淑云、趙華輝、桂煥云、張仁良、
張高雲、紀書林、陸樹連、蔣金明、
高九升、孫雲

的攻擊誹謗，周恩來巋然不動。他忍辱負重，力撐危局，同時與江青之流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這使江青一夥更加仇恨之，必欲將他打倒而後快。一九六七年八月，江青等人就公開叫囂：『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享有世界聲譽的偉大政治家周恩來，在其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雖然經歷了許多驚濤駭浪和極為複雜驚險的政治鬥爭，但都沒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臨的這樣艱難、這樣複雜。當這場風暴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時候，周恩來奮力拚搏，委曲求全，苦撐危局，始終堅守崗位，頑強戰鬥。他以極其高超的鬥爭藝術，和林彪、江青一夥周旋，力排干擾，消除動亂，把國家和人民從危難和困境中解脫出來。他在這場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他為挽救國家民族危局的又一次不可磨滅的功績，將永世留存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第十一章

暴內陵外，心狠手辣

一、美麗的釣魚台成了『全面內戰』的指揮台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其組閣之初（一九六六年五月）就在北京西郊的釣魚台國賓館『安營紮寨』。它地處京城名勝玉淵潭東岸，是著名的園林之一。玉淵潭古時叫『望海樓』，也稱『釣魚台』。早在金代，這裡就已成為帝王遊樂的場所，後為歷代帝王垂釣的地方。金哀宗完顏守緒曾寫一首詩，云：

金主鏖興幾度來，釣台高欲比金台

八百年前一位詩人也吟詠：

玉淵潭上草萋萋，百尺泉聲散遠溪，

垂柳滿堤山氣暗，桃花流水夕陽低。

足見其時此地已是景色迷人的遊客佳麗匯聚的場所。

清朝乾隆年間，曾在這裡興建行宮，現在，『古釣魚台』的皇帝行宮，基本上保留了當年行宮的原貌。在國賓館西南面的圍牆上，依舊立著一座青灰磚砌的高台，在其西面大門上方的一橫額上鐫刻著『釣魚台』三個瀟灑剛勁的大字，傳為乾隆皇帝手跡。台上四周壘砌雉堞，宛若一座小型城堡。距台不遠，就是皇帝行宮。澄漪亭是行宮最高的地方，亭外森木環抱，登臨俯視，可一覽四面風光。行宮的齋、軒、亭、台各具特色。正殿為養源齋，是行宮的主體建築，回廊圍繞，疊石為山，淙淙溪流在齋前匯成一池碧水。清露堂，蒼松翠竹，清新典雅。近在咫尺的瀟碧軒，敞廳前濱臨池水，這裡才是歷代帝王垂釣的真正的釣魚台古跡。

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古釣魚台以北建築起來的這座國賓館，專供接待訪華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社會名流。這座賓館包括古台在內，面積四十二萬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積五萬多平方米。初時，沿湖四周建起的別墅共計十五座，其後又添建了一座貴賓樓和一座建築面積共四千五百平方米的現代化的俱樂部。新建的這些亭台樓館，造型古雅，雍容華貴，各有風采。這個昔日帝王遊息的行宮，已是

一座規模宏大、佈局和諧的園林建築。院內闢有三個人造湖，四周萬木蔥蘢，綠樹濃蔭，碧波漣漪，相映成趣。遠處西山泉水經玉淵潭流入釣魚台內，曲折迂迴於亭台樓榭和花木石橋之間，把原釣魚台行宮和新建的別墅連成一體。滿園奇花異草，鳥飛魚躍，萬紫千紅，分外妖嬈。但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國大地上颳起『文化大革命』的颶風及中央文革小組進駐後，這裡也就不再是往昔那座平靜安謐、嫵媚可愛的園林了。

初進釣魚台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大都住在十五號樓。開始，未設辦公室，只有從中央聯絡部調來的矯玉山一人作秘書，所以忙得他幾乎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連軸轉。不久，從馬列研究院調來了王廣宇作秘書，仍然忙得難有喘息的功夫。其後陸續又調進來一些人，開始形成辦公室。後來，調來的工作人員逐漸多起來，十五號樓難以容納了，七月初，將辦公室搬往十一號樓，並在此樓由康生主持開會，宣佈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決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軼歐（康生老婆）負責，穆欣為召集人；辦公室下設文電組，由穆欣兼管；簡報組，由戚本禹兼管；調查組，由曹軼歐負責。

七月中旬，辦公室又從十一號樓搬到十六號樓，而七月二十日從上海回到北京的江青即住進了釣魚台十一號樓。那時康生、張春橋、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早就住在了釣魚台，王任重、劉志堅等是後來住進來的。這樣，中央文革小組陸續佔用了這座國賓館的七棟樓房。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從武漢回到北京不久，曾來釣魚台十二號樓住了幾天。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他在十二號樓召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成員開過兩次會，其後有時也來十二號樓小住幾天，以便就近召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議事。

自從中央文革小組這個中國歷史上的大怪胎住進釣魚台後，這裡便群魔亂舞，風波迭起；刀光劍影，腥風血雨；成了華夏大地全面動亂的策源地，『指揮台』。

二、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所在

美其名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隨著它的崛起和不斷膨脹，其成員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內部的鬥爭日益錯綜複雜。作為一個非常時期的共產黨的機構，它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無政府、最無章法的部門。

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是他是江青眼中的『劉盆子』，是其他成員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當然，這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江青這個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份，狐假虎威，假傳『聖旨』。她和陳伯達既是一夥，也是勾心鬥角的對手。每逢小組開會，不管原定幾點鐘開會，只要江青還沒到會，陳伯達這個組長和其他成員就得耐著性子等候；開會時，經常由江青包場，『哇啦哇啦』地說個沒完，從不顧及別人的想法；一旦她與陳伯達發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會，把陳伯達拉到隔壁房間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顧問』康生，都只好耐著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陳伯達被『打通』回來繼續開會。江青心胸狹窄，喜怒無常。得意時，胡侃神聊，一不如意，佛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氣，別人再熱，也得把空調關掉；她講話發言時，不怕別人振

耳欲聾，可是，她卻不許別人出大聲……在小組裡江青儼然就是凌駕全組之上的『女皇』。

在這個小組裡，許多事情既無章法，又不成體統。例如，江青最得意的寵信和幹將戚本禹，到處煽風點火，上竄下跳。江青要整人，他就先放炮，大造輿論。為了打倒鄧拓，戚本禹筆桿一搖，就在《紅旗》雜誌上拋出《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大肆誣陷鄧拓是『叛徒』，致使鄧拓含恨而死；江青為了剷除一貫藐視自己的心頭之患、當時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田家英，她的馬前卒立即登門，抄了田家英的家，還勒令其『停職反省』、『立即搬出中南海』，終於使田家英憤然而逝。當時劉志堅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也是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在一次會議上，他說到了一些關於國防部大樓被衝擊的情況。當他講到近百名戰士為了阻撓造反派的衝擊而被打傷時，坐在旁邊的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斷他的話，還拍著桌子罵劉『胡說八道』。在座的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如此粗暴無理的行徑，還含血噴人、反咬一口，說：你是老傢伙，為什麼跟年輕人吵！他是我們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

江青、戚本禹及其一夥，之所以如此蠻橫無理對待劉志堅，是事出有因的，因為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如：保留還是廢除工作組的問題；堅持還是取消黨的領導（『踢開黨委鬧革命』）；穩定還是搞亂軍隊；對幹部『打倒一切』還是區別對待；以及在炮轟還是保劉鄧……的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和鬥爭。概括起來，就是『要亂』和要穩定兩種意見的鬥爭。副組長王任重、劉志堅及顧問陶鑄等是『要穩定』的對立派。

還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在陳伯達受毛澤東指示，主筆起草《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

定》（即《十六條》）的過程中，劉志堅和王任重等就提出過，有些毛澤東說過的話，如『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應該刪去，因為他們擔心『造反派』很可能會以此為根據而用當年貧苦農民對待惡霸地主的敵對辦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但陳伯達不予理睬，堅持寫上了，還說什麼：要革命就不能怕亂，毛主席的話沒有過時，搞『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質彬彬。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小組會上討論這個文件草稿時，劉志堅基於『部隊無論如何不能亂』的思想，提出要對軍隊的運動加一條『但書』，以便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作出某些特殊規定，做些必要的限制，以利於部隊保持穩定。這個意見又多次遭到了江青、陳伯達一夥的無理反對。因為得到周恩來、陶鑄和老帥們的一致支持，後經全會通過，在文件中加上了一條：『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依仗權勢、一手遮天的江青當然決不甘心自己的『挫折』，她決不容許有人反對自己。

當時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經毛澤東的批准，兼任北京市『文革』顧問。因為他抵制江青一夥的極『左』做法，所以後來也受到江青、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喪心病狂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八月間，即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江青抓住北京市印發西城區紅衛兵《緊急呼籲書》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內部會議上連續對王任重進行批判，誣蔑他『背著中央文革搞陰謀活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體育館舉行『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江青對王任重突然襲擊，當眾誣陷他是『保守組織』的『後台』；此後，又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判王

任重時，她悍然宣佈要把王任重趕出中央文革、『送回湖北』，並命令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鬥王任重。同時，在預先不與周恩來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逼迫曾給『西糾』作過指導的周榮鑫、雍文濤站到台前挨批判。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中央的第四號人物。他初來北京工作時，江青曾妄圖拉攏他反對鄧小平。但是陶鑄並不受她的擺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只有謝富治一人出來批評鄧小平；陶鑄沒有讓謝富治的講話在簡報上發表。陶鑄在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時常和江青爭吵。因此，江青對陶鑄心懷不滿，欲打倒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青下令召開科委系統的萬人大會，卻不通知主管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和陶鑄。當陶鑄聞訊趕到會場時問她『怎麼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赫然而怒，破口大罵：『你發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儘管江青處處找陶鑄的『茬兒』（即毛病），陶鑄仍然堅持抵制江青一夥的錯誤言行和立場。因為他絕不同意江青之流不問動機、不問政治背景而一味保護『造反派』的那些做法，總是毫不示弱地與她爭辯。每次爭吵都以江青的大吵大鬧告終。通過倆人的多次較量，江青深感自己『勢單力薄』，於是進一步勾結陳伯達和康生等人要將陶鑄致於死地。他們在多次大會上圍攻陶鑄，說他是『最大的保皇派』，『保的一夥是壞人』，康生甚至誣陷說，陶鑄『保的王任重是一個CC特務』。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當時王任重任廣州治病）。江青、陳伯達和康生在接見中公開發難陶鑄的名。江青說：『王任重的後台是誰？是陶鑄！你們哪，先不要去廣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鑄！他是你們中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派！為了挽救他，

我不遺餘力，我對他很耐心，費了很大的勁去幫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劉鄧路線的新的代表人物！」『他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幾乎昏過去！他鎮壓我，他還鎮壓中央文革！』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王任重是有後台老板的，一個後台老板就是陶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你們揭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康生的調子更高。他說：『他是叛徒！希望同學們把材料收集起來，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從此，陶鑄落到了江青一夥的『法網』之中，開始了日日被聲討、天天被揪鬥的苦難，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終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夥宣佈『打倒』陶鑄的這一天，他們又推出了『打倒劉志堅』的反動口號。

劉志堅作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始終堅持『軍隊不能亂』的思想，儘力抵制江青一夥的極左做法，因此也遭到了江青一夥殘虐不仁的迫害。他根據部隊實際情況和軍委領導葉劍英以及其他老師的意見，起草了許多文件和電報，但都被江青、陳伯達等人以『壓制革命』、『鎮壓群眾』為藉口予以扣壓。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的『紅色縱隊』造反派頭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給群眾限制太多。林彪聽後就令全軍文革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

指示，要求軍隊的『文革』完全按地方一樣搞。全軍文革小組只得按林彪的意見起草一個《關於軍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考慮到軍隊與地方的不同，因而在這個文件草稿中，仍提到了要堅持黨的領導等要求。林彪指示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組審改。江青、陳伯達、康生和張春橋在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對草稿進行審查後，大為不滿，立即大刪大改，並在將改稿本交給劉志堅時以咄咄逼人的口氣說『一個字也不准再改動！』劉志堅看完改稿本後，憤慨地說：『取消黨的政治領導，這在我軍是史無前例的。』當時雙方爭論激烈，但毫無結果。最後，這個文件以改稿本為準、經過毛澤東的同意發了下去。《緊急指示》下達後，給軍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北京相繼發生了多起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事件。為了及時制止軍隊的動亂，劉志堅根據葉劍英等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提出禁止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行動。林彪把這個通知又轉送給了中央文革小組，後來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扣壓不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周恩來和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先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兩次接見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共有二十餘萬人次參加）。劉志堅奉命具體組織了這兩次大會。會議事先報經林彪批准。會上，周恩來總理的講話，老帥們堅持黨的領導、穩定軍隊、正確對待革命幹部的正義呼聲和正確主張，都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支持。會後，江青一夥不僅當面指責劉志堅，罵道：『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而且還煽動張貼大標語攻擊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時還揚言要『批判這些老傢伙』。其後，在關鋒的直接支

持、煽動下，全國四十多所軍隊院校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他們決定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召開『批資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劉志堅等人到會接受批判。

周恩來聽到有關『批資大會』的消息後，一方面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午親自到釣魚台同中央文革小組商定，設法勸說學生不要開這個會；另一方面，於當晚和第二天晚上，同總參、總政的負責人、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全體成員會見軍隊院校來京學生的代表。在總理的耐心說服下，學生代表表示取消召開『批資大會』的決定。劉志堅遵照總理關於顧全大局的指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當他剛講到自己有點『折中主義思想』，『又想發動群眾，又害怕搞亂』的時候，康生突然拍案而起，蠻橫地指著劉說：『劉志堅，你不是什麼折中主義，你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這個會要開，要批，要鬥，就是要批鬥你劉志堅！』原來情緒已經平息下來的造反派，立即又被康生的言論煽動了起來，會場上即刻響起了『打倒劉志堅』的口號聲。江青和陳伯達也跳出來聲援康生，說：『在軍內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以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它不和軍委聯繫，也不和中央文革聯繫。劉志堅不向中央文革請示……他誰也不請示……主席回來叫撤工作組，他遲遲不撤。經過他們這一番發作，總理用兩個通宵所做的工作全部告吹……此後，軍隊院校來京造反派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衝擊國防部和各軍事機關的行動，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被查封，劉志堅被打倒。一月十九日，由關鋒指揮造反派學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鬥劉志堅的萬人大會。劉志堅從此被關押逼供、無情折磨，遭受了長達七年零九個月的殘酷迫害。』

在劉志堅被江青一夥『打倒』後不久，一月十日，江青接見群眾代表時洋洋自得地說：『隱蔽在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裡邊的，開始是王任重，後來是劉志堅，現在是陶鑄。」江青不打自招地宣泄了他們有計劃、有預謀地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幹部一一打倒、把中央文革小組變成他們這些篡黨奪權分子的一統天下的天機。堅持穩定、反對動亂的中央文革領導成員在江青一夥的陰謀策劃中，終於一個又一個地被『揪鬥』，被『打倒』的惡浪吞噬，最後只剩下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員反革命黑將。隨著『文革』運動的縱橫發展，中央文革小組從一個『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進而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篡奪了更大的權力。

中央文革小組這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不但引起許多小組成員不滿，也曾受到毛澤東多次批評。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毛澤東批評這個小組沒有建立制度，沒有民主集中制。他說：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以正式會議作過決定，而是各人說各人的，康生說一套，陳伯達說一套，江青說一套。他還批評說：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沒有民主集中制，對上也沒有報告。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任意攻擊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表示不滿，特別是對江青、陳伯達擅自打倒陶鑄一事非常生氣。在中央專門召開的會議上，他對江青和陳伯達又進行了嚴厲批評。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毛澤東在會上又嚴厲批評他們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被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

他說，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毛澤東又於二月十日的會上，繼續嚴厲批評陳伯達和江青。他氣憤地說：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

眼高手低，你跟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決定立即把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為此，陳伯達心裡十分緊張，還鬧出了一齣要『自殺』的醜劇。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就毛主席的批評開會，江青卻以『病』為藉口躲了起來。會上只是把陳伯達批評了一通，根本沒有批評江青。

江青對毛澤東的批評只當耳邊風，事後仍然我行我素，為所欲為。在她的指揮下，中央文革小組繼續堅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終於使無政府主義在全國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整個中國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三、挑動派性混戰的『總後台』

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成立之初，它的主要任務是了解和向中央反映學術、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部門運動進展的情況，根本無權下達指示或對某事表態。接待群眾的來訪也是其任務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還在起作用，毛澤東不在北京，中央常委聽取『文化大革命』匯報會由劉少奇主持。雖然《五·一六通知》規定，這個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但江青、

陳伯達之流從不請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他們一味強調要直接對毛澤東負責。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重大改組。林彪在政治局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並成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這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根據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已成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康生一夥獨攬大權，發號施令。因為在全會以後，毛澤東親自主持常委會，直接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周恩來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所以江青和陳伯達、康生有事直接向毛澤東匯報。雖然周恩來也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但向毛澤東匯報時署名的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他不簽字，有事就向毛澤東單獨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江青之流認為劉少奇已經打倒，剩下來的最危險敵人即是鄧小平，於是，他們將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欲把鄧小平的問題定為敵我矛盾。鄧小平已無法繼續正常地工作下去，就把他分管的專案委員會、中央聯絡部、中央調查部等交給了康生去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曾經正式提出健全書記處的建議，但被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否定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在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上，毛澤東打破過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三家署名的慣例，讓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組』，此後同類電報、文件即由四家署名。二月初，毛澤東就在常委擴大會上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表了書記處。』這麼一來，中央文革小組開始走向其鼎盛時期。

這時，中央文革小組幾乎天天開會，討論各單位、各地區『文革』的情況以及運動中出現的各種

問題。該小組的辦公室的機構也逐漸擴大。從原來的文電、簡報、調查三個組又陸續成立了三個不歸辦公室管轄的來信組、快報組和記者站。

各組均有明確分工：來信組負責處理各地給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件及摘要編發在內部刊物上；快報組，顧名思義，務必迅速、及時地向黨中央反映有關運動的情況。其出版的《快報》，篇幅小，記者隨時報道快報組隨印隨發，速度快，頻率高，有時一個鐘頭內出版多期；由王力主管的記者站是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其二百名左右的成員主要來自部隊（大多數是非新聞記者），均以『解放軍報記者』身份派往各地或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記者的名義活動。他們從各地發回信息資料，由記者站編印成《文革簡報》或刊登在《快報》等內部報刊上，專供中央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考。

這些完全由中央文革小組操縱的《快報》、《文革簡報》以及其他內部刊物，雖也曾刊登過不少重要的真實情況，但在有些關鍵的問題上受到了江青一夥的干撓。他們將這些出版物竊為向中央和毛澤東『謊報軍情』、『製造輿論』、影響黨中央決策的最佳工具。他們慣用的手法是，先向某些紅衛兵頭頭（主要是蒯大富、韓愛晶、聶元梓、王大賓、譚厚蘭『五大領袖』）暗中泄露某些『玄機』，散佈一些尚未向毛澤東請示或者明知毛澤東一時不會允許而他們又急於行動的『意圖』，好讓這些人以發表個人意見的方式到群眾中去傳播這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以便在社會上造成議論紛紛、沸沸揚揚的氣氛。『記者』們收集到這些議論後自然會加以報道，通過上述的內部簡報來影響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決策。

『文革』初期，毛澤東還把劉少奇、鄧小平作為黨內問題處理。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當面對劉少奇說：『有錯誤就改。誰要打倒你？我才不要打倒你哩！』江青一夥當時不敢公開違抗。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造反派代表時，江青、張春橋等人對當時有人遞條子說要『準備揪出劉少奇、鄧小平』不以為然。江青還嚴肅地說：『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問題，中央可以解決。現在搞他們不適合，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在清華和北大不是有人貼劉少奇的大字報嗎？主席親自派陳伯達同志去糾正……』

『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用這話來形容江青、張春橋之流的嘴臉一點也不過分。就在當天下午二時，張春橋又在中南海西門單獨約見蒯大富，鬼鬼祟祟地對他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聽了，心領神會。他明白，張春橋所指的『那一兩個』，『禿子頭上的虱子』，不就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嗎？『搞臭』，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他們打倒。但當蒯大富向張春橋保證『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時，張春橋卻又狡詐地眨眨眼睛，把嘴一抿，說：『關於這次談話的內容，你儘可以去行動；但不准對任何人說；你說，我也不承認。』蒯大富回到清華大學，當天下午四時就在『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召開會議，決定要『把打倒劉少奇的運動推向社會』。一周以後，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率領五千餘人衝向天安門，舉行遊行示威，沿途張貼標語，高呼口號，第一次公開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反動口號推向社會，使江青、張春橋的『授意』變

成了『群眾』的『行動』。因為對於這次『行動』的幕後活動，《快報》和記者站的『記者』、編輯都是一無所知，他們自然會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當作運動的『最新動向』向上反映。實際上，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在人民大會堂一次接見造反派組織的代表結束後，就曾乘著會完人散的時機，偷偷地把一包供作打倒劉少奇的『材料』交給了蒯大富，叮囑他『好好批判』。

很清楚，中央文革小組派出的『解放軍報記者』和其領導下所出版的各種內部刊物實際上成了江青一夥煽風點火、製造動亂的輿論工具。對此，劉志堅曾一針見血地提出批評。他說：『其實，這些人很多不是現役軍人，更不是什麼軍報記者，他們同江青一夥掛鉤，有的踢開各地黨委，到處『造反』，煽風點火，通風報信，直接指揮各地的運動。』

有些打著中央文革小組旗號四處活動的『解放軍報記者』，為了迎合林彪、江青一夥的口味，不惜胡編亂造，歪曲事實，甚至無事生非，製造事端，陷害地方領導人，淪為江青之流的探子和幫兇。在造成武漢軍區與當地造反派的對立而演變成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中，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正在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鍾漢華奉命到釣魚台匯報武漢『文革』運動情況。周恩來在聽取匯報後，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儘快地接見一次武漢的造反派，以幫助武漢軍區對造反派做說服工作。江青當場表示同意，並決定由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於四月二十一日接見。她還說，考慮到自己的身份，不宜參加接見，否則會抬高武漢造反派的『身價』。

江青當時的決定和表態，似乎是站在武漢軍區這一邊的。實際又是如何呢？就在鍾漢華向武漢軍

區黨委常委傳達了匯報會的情況後的不久，此事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武漢的一位『解放軍報記者』刺探到了。此人將此消息添油加醋地通過《情況反映》，十萬火急地報到北京，說武漢軍區已傳達了中央文革十九日會議的有關指示，詢問這些指示是否屬實……經他這麼一攪和，江青、張春橋之流馬上向陳再道等人興師問罪，強令他們作出檢查和書面交待。

應該說，事到此時，應可以結束了。可是江青仍不依不饒，揪住不放。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兩點，她派人以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前往陳再道、鍾漢華下榻的京西賓館，沒收了他們四月十九日參加匯報會時作的記錄，同時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不准再提十九日匯報的事情，取消原定二十一日造反派的接見，而且宣佈中央文革小組不再幫助武漢軍區做造反派的工作。自此日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對於武漢軍區的請示報告一律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七日，軍委擴大會議結束。這時其他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收到參加慶祝『五·一』節活動的通知，唯獨陳再道、鍾漢華接到了『逐客令』。他倆只好立即離開北京，打道回府。在武漢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火藥味濃烈的大標語：『徹底粉碎帶槍的劉、鄧路線！』『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在以後的兩個多月中，林彪、江青之流繼續採用挑撥離間的手段，通過派遣王力、謝富治等人到武漢支持『極左』派、鎮壓『保皇派』，最後導致了震撼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詳見第七章第一節）。

江青、張春橋、康生一夥，也是分化、煽動群眾對立，挑動武鬥，製造混亂，乘機混水摸魚的高手和總指揮。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北京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就分裂為兩大派：一派是以韓愛晶為首的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和清華大學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結成的『天派』；另一派為由王大賓掛帥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井岡山兵團』及從蒯大富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來的『井岡山四一四總部』結成的『地派』。從表面看，這兩派嚴重對立，武鬥不斷，但從幕後來看，他們的總後台同出一源，都在釣魚台，均被中央文革小組所操縱。形容這兩大派『就像一根線上牽著的兩個木偶』實在是太恰如其分了。例如，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在『奪權』的風暴中，江青等人暗中授意『天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鬥當時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因此事被毛澤東及時制止，蕭華未到會。籌辦批鬥大會的『天派』頭頭們急得團團轉，不知所措。就在這時，江青等人暗中由中央文革小組調遣『地派』造反派衝進『天派』組織的大會，大鬧一通，把這場大會衝散。而當時相互撕殺，鬥得頭破血流的各派頭頭，卻大都沒有覺察到這一點。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當曾為江青、林彪一夥陰謀篡權立下『汗馬功勞』而名噪華夏的蒯大富，在其結束了十七年鐵窗生活、回到陽光普照的大地的時候，他不禁回首往事，深有感觸地說了這麼一段話：『二十二年前，我們那一代熱血青年，天真而狂熱，幼稚而殘忍，昏然盲從而懷疑一切，激昂慷慨而又隨波逐流，極端的行動變為人性的扭曲。於是，起初成為混戰的工具，之後淪為浩劫的犧牲品。似乎也是在劫難逃。』

曾幾何時，赫赫有名的『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在她的揭發、檢查書中懺悔地寫道：『我是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黨、對人民犯了罪的人。』『回想自己

在十年浩劫中的所作所為，目無法紀，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可以隨便剝奪別人的人身自由，隨便把人打倒。我在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中，就是這樣對待譚震林副委員長和余秋里副總理的。我還對另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人身迫害……我是罪人，也是見證人。」

四、七任『辦事組長』的下場

江青是一個十足的權力迷，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迫害狂。凡是被她認為可疑或者不被馴服的人，她就會加以打擊、迫害、批鬥、隔離「審查」、關進牢房。因此，在江青的「後院」經常籠罩著恐怖的陰影，在她手下的工作人員無不為自己的命運惶惶不可終日。

中央文革辦公室曾是中央文革小組下設的一個辦事機構。在中央文革小組從其上台到消亡的三年時間內，這個辦公室的負責人先後撤換過六次。前後任職的七屆負責人，除蕭力（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名李訥）外，穆欣、宋瓊、王廣宇、閻長貴、矯玉山以及王力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厄運。他們不是被抓到衛戍區，就是被打入監牢。我是第一屆辦公室的召集人。儘管當時我自認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但始終跟不上陳伯達、江青、康生之流的步子，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江青撤銷了我這個『召集人』的職務。於是，辦公室『召集人』的差事落到了王力身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江青決定將辦公室的名稱改為『辦事組』。辦事組的正副組長為宋瓊和陳滿池。宋瓊原是《解放軍報》

快報組的負責人，陳滿池因是記者站的副組長，任命後始終沒有到釣魚台辦事組來就過職。不久，江青派到解放軍報社的蕭力，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率領軍報造反派奪權。宋瓊及從軍報同來的工作人員被打成解放軍報社『胡癡反黨小集團』，軍報的造反派把宋瓊等人揪回報社批鬥。此後，辦事組改由王廣宇、矯玉山負責。同年九月一日，又因王廣宇不能『緊跟』而遭江青『送回本單位參加運動』、『接受批鬥』，原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和矯玉山分任正副組長。不久，閻長貴他調，矯玉山任組長。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矯玉山被江青誣為『特務』，下令逮捕，任命蕭力為組長。

在遭到迫害的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第一負責人之中，任職最長的是王廣宇。從王力、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告訴他『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由王廣宇任辦事組組長，矯玉山任副組長』至九月一日被遭送原單位，他任職也只不過八個月的時間。辦事組雖然由他負責，卻從來沒有當眾正式宣佈過。王廣宇是一名來自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年輕幹部，他工作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可是江青之流仍處處對他挑剔，把他當作奴隸使用，而自己擺出一副『太上皇』的威風。他們經常對他找茬，稍有『怠慢』，就會遭到斥責。江青曾經罵他：『我看你總像還沒睡醒似的，一見你就想批評你。年紀輕輕的，怎麼這樣沒有精神？』一次，陳伯達指著王廣宇問江青：『他是辦事組長麼？』江青竟然搖頭表示否認，弄得王廣宇十分尷尬。

釣魚台十六樓會議室隔壁是辦公室的長途電話間，也是江青經常『打通』陳伯達思想的『密室』。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王廣宇出於工作方便，在電話機上安裝了一個微型擴音機。結果，被又來『打通思想』的江青看到了。她立刻怒氣衝衝地質問王廣宇，為什麼要裝『竊聽器』，並下令立即拆掉。從

此，王廣宇成了江青的『砧上之肉』。

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應作記錄，可是江青卻從來不准。她以『機密性』為託詞，行逃避責任之實。她認為，這樣，她就可以信口開河，咒天罵地，就可以大搞陰謀詭計，因為誰也不會在記錄本上留下她的罪惡言行。後來，周恩來經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他要求每次開會要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他的辦公室派人作紀錄。頭一次，由矯玉山、周家鼎來作紀錄，『平安無事』，江青也沒有什麼反對意見，但在第二次，當王廣宇作記錄時，江青一見，立刻神經過敏，怪腔怪調地責問：『我們開會還要作紀錄麼？是誰叫你來的？』周恩來回答說：『是我叫來的！』轉身又對王廣宇說：『今天不用記了！』儘管是總理的決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踐踏。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宣佈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後，第二天晚上，江青就叫張春橋、姚文元找王廣宇談話。張春橋說：『決定你馬上回原單位參加運動，以後需要你的時候再叫你來。』王廣宇回到馬列研究院，就遭到造反派軟禁，不讓回家，逼他『揭發王力、關鋒的罪行』。馬列研究院造反派也不斷地點他的名，對他施加壓力。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晚上，陳伯達、蕭力等三人突然來到馬列研究院『造反總部』，逼王廣宇『交待問題』——『早先戚本禹曾讓王廣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取過一份魯迅的手稿（《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原稿），取回後當即交給戚本禹。這時陳伯達突然前來討要，並誣陷王廣宇將魯迅手稿『賣掉了、私分了、銷毀了』。他們不聽王廣宇申說，不容許他分辯，當時就把他關進功德林監獄，後又關押在南苑的一個監獄，一九七二年一月又轉押到秦城監獄，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才被釋放出獄。實際上，他們誣

陷王廣宇『賣掉了、私分了、銷毀了』的這份魯迅的手稿，早由戚本禹交給江青，當時仍收藏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室裡。他們拿這個來逼王廣宇，只不過要捏造一個逮捕他的『由頭』。

閻長貴、矯玉山都步了王廣宇的後塵，也被江青先後投入了秦城監獄。

矯玉山是最早調到辦公室來工作的人員之一。他始終勤勤懇懇、夜以繼日地工作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辦事組收到了一個從香港某書店寄來的郵包，裡面全是載有反映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當演員時的艷聞軼事的報刊和照片。雖然他看都沒看，立即送交給當時擔任江青秘書的姚文元。兩天後，江青當著張春橋、姚文元的面，指著矯玉山大喊大叫：『他們這些人不是我們的人，要進行審查！』『他們是特務，是監視我們的，安了竊聽器。』從來就是和江青一唱一和的張春橋也點頭稱道地說：『是的，現在我連給上海打電話都不敢打了，就是安了竊聽器！』就這樣，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凌晨，江青下令以『特務』罪名拘捕了矯玉山，直送秦城監獄，從此在大牆之內，矯玉山被『審查』了七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方見青天。

原任江青機要秘書、並在王廣宇下台後一度擔任辦事組組長的閻長貴，也被江青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秦城監獄。除此外，當時在辦事組擔任總支部書記的王道明及兩位來自解放軍部隊的辦事組成員——張根成和周佔凱，也被江青等人妄加罪名『揪了出來』、打入鐵牢寒窗。

辦公室和辦事組的前後七任負責人中，只有最後一位蕭力，從一九六八年初走馬上任後，『穩坐釣魚台』，一直幹到一九六九年夏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後，中央文革小組自然消失的時候。一九六八年，正是江青、張春橋之流搶班奪權鬧得最兇的時候。他們打著

毛澤東提出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處這個旗號進行欺世盜名、欺上瞞下。他們為了完全、徹底地壟斷中央文革小組和所屬的辦事機構，想方設法地擺脫周恩來對『文革小組』及『碰頭會』的領導和過問。原來，每次開碰頭會前，都是由周恩來吩咐秘書趙茂峰先擬定議程和通知，然後交給中央辦公廳發送給有關部門，其中包括中央文革小組。自從蕭力上任後，江青就在豆腐裡挑骨頭，提出通知應由中央文革辦事組送發，否則會給她的工作造成『被動』。周恩來從顧全大局出發，滿足了她的要求。可是江青仍不善罷甘休。當趙秘書遵照總理指示為蕭力草擬了一個『會議通知』的樣稿給她以便作今後擬文參考時，江青卻不知好歹地對周恩來說：『你看，連你的秘書都不放手，通知還得代擬。』結果，趙秘書只好『負荊請罪』，向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組長蕭力寫了『書面檢查』。

一九六九年夏天，隨著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紛紛登上了中央領導的『寶座』和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權力，曾被江青、康生一夥控制作為篡黨奪權工具的中央文革小組因已『光榮完成使命』而開始退出歷史舞台。

五、她在『後院』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中央文革小組所屬的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的部分成員也沒有能逃脫辦事組一些負責人的厄運。

在江青『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他們先後遭到誣陷和迫害。

一九六七年一至二月，在一片搶班奪權的浪潮中，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相繼成立了取代中央宣傳部的宣傳組和取代文化部及全國文聯的文藝組。前者的成員有王力、唐平鑄、胡癡，由王力任組長；後者的成員有臧本禹、金敬邁、李英儒、舒世俊、陸公達、劉巨成，由臧本禹任組長。其後還成立了理論組，也由臧本禹負責。

宣傳組的成員，唐平鑄、胡癡和該組辦公室主任李廣文，都相繼遭到了江青一夥的迫害。其中，李廣文受到的迫害是十分典型的。

李廣文原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部主任兼校委委員。一九六三年，他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時，進中央高級黨校研究班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在此前，當康生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兼山東分局書記時，他曾在其領導下工作。因為李廣文看穿了康生及其一夥陰險奸詐的真面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揭發他，並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在中央高級黨校內貼出揭露康生的大字報。康生勾結江青，利用權勢，唆使黨校造反派殘酷批鬥李廣文，並加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將他逮捕，使他在歷時十年的冤獄中受盡折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經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批准予以徹底平反後才被釋放。

青年作家金敬邁原是文藝組的副組長，因為他不同意江青要他修改自己的作品——《歐陽海之歌》而屢遭迫害，最後，只因接觸了江青三十年代『防擴散材料』，被莫名其妙地送進了大牢，一關就是近十年。

金敬邁原是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的編劇。一九六五年十月，他因創作和出版了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而嶄露頭角。當時中國正處於學習雷鋒『一心為公、為人民』的熱潮，這部歌頌解放軍戰士歐陽海捨己救人降驚馬而獻出生命的作品，以其生動的內容和獨特的創作力量感染著中國千百萬讀者，它的發行數量迅速達到了二千萬冊，金敬邁一時也成了讀者心中的偶像。厚顏無恥的江青企圖以『竊取樣板戲』成果的手段，將這部轟動全國的作品，打上『江記』的印記，又伸出了『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旗手』的黑手要對它進行修改、加工，並美其名曰地說『要更完美』。為了達到目的，她竟下令說出了『非改不可』的話。

因為陶鑄十分了解江青此人的本性，所以在金敬邁向他徵求意見時，他直言不諱地說：『不要改，不要一聽什麼意見就改。』正因為金敬邁違背了江青的意志，『埋下了幾乎被置於死地的禍根』。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江青在京西賓館當著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謝富治、葉群等許多人的面，劈頭蓋臉地訓斥他說：『金敬邁，怎麼，我提的那幾條意見，你不改？你真是個大作家呀，這麼大的架子！』接著又是一陣恫嚇：『我告訴你，你那『最後四秒鐘』呀，是《雁南飛》裡面的東西。（按：《雁南飛》是蘇聯一部描寫衛國戰爭的電影。當時批判它寫了英雄臨死前對生命的留戀，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我是為了保護你，看你還是個解放軍，才沒有對紅衛兵小將們講。只要我說一聲，他們早就揪你的人，燒你的書了。』（按：作者在《歐陽海之歌》中，對主人公，在驚馬衝向人群、許多百姓面臨九死一生的千鈞一髮之際，對生與死作出抉擇的內心的描寫。）江青還說：『書裡那兩段『黑修養』（指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怎麼來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養』的毒太深，

你這是為劉少奇樹碑立傳嘛！你這是搞「兩個司令部」嘛！你到底是哪個「司令部」的！」『光刪去不行，要消毒，要批判！』江青不給金敬邁有絲毫的喘息機會，罵得他狗血噴頭，無法下台。由於周恩來的解圍，江青才唧唧囔囔地閉上了嘴……

在江青的大棒壓力下，金敬邁出於無奈，對《歐陽海之歌》作了修改。

這樣一來，江青偷天功為己有，把金敬邁違心修改後的《歐陽海之歌》吹噓成她的『再創作』，由此，對金敬邁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讓他登上天安門，參與領導『五·一』節文化活動，親自帶領他去見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的毛澤東，並肉麻地向毛澤東介紹說：『主席！這就是「我們的作家」金敬邁同志。』當年五月，又讓金敬邁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萬人大會上發表講話，還指派金敬邁任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副組長……

這些突如其來的榮譽和光環使金敬邁受寵若驚，他無法解釋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在後來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不無感慨地說：『一切都像演戲一樣。不久，我成為慶祝「五·一」文化活動的負責人；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紀念文章的定稿人；不久，我以「解放軍負責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門；再不久，我成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真正負責人。』

又是一個好景不長！時隔不久的九月，即國慶前夕，謝富治、戚本禹等派金敬邁去北京圖書館將刊有江青三十年代情況的書報刊物清理出來送往中央宣傳部辦公室保存，以防止擴散。此事剛一辦完，江青藉『有人陷害我，』下令將參與其事的文藝組成員劉巨成抓了起來。同時聲稱：『用金敬邁，本來就出於「不得已」，現在看來，金敬邁不是我們的人。』在她的指揮下，戚本禹等人毫不羞愧地在

文藝組召開會議批鬥金敬邁，並當場宣佈：『金敬邁不能繼續在北京工作！』

接踵而來的又是一場牢獄之災。出獄後，金敬邁回憶說：『由謝富治簽發的逮捕令。以我「收集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陰謀反對毛主席」和「趁毛主席南巡時，陰謀綁架毛主席」的罪名，將我反銬雙手，投入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裡，七年零四個多月，二千六百七十八天。然後，釋放出獄，送河南許昌某農場勞改，四百八十五天——兩項相加，三千一百六十三天。三千多天，也算「彈指一揮間」！「四人幫」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換場地」，她進了秦城一號……』金敬邁在獄中飽受折磨和迫害，一九七五年五月，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雖然年方四十五歲，卻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了。

理論組由戚本禹負責，辦公機構設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內。調來主持全組工作的楊永志，原是《紅旗》雜誌哲學史組的編輯。以後又陸續從部隊調來廖初江等幾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戚本禹交待給他們的任務是搜集劉少奇的全部著作，整理、編印出來『供批判用』，先後印過十幾本。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戚本禹被捕後，楊永志就被揪回《紅旗》雜誌社批鬥，造反派竟誣陷他『包庇劉少奇』、『劉少奇的孝子賢孫』，說他對劉少奇『假批判，真包庇』。因他不堪忍受長期的殘酷批鬥，一度精神失常。他把白布單撕開，纏到頭上『戴孝』，手裡打個白幡，自言自語說：『我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光景淒慘。以後他又被謝富治抓到公安部關起來，直到一九七五年夏天才獲得釋放。

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過的幹部，都是由黨組織從各地區各單位抽調到這裡來的。這些同志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深信不疑，懷著對毛澤東真誠的崇拜，以『反修防修』為出發點參加這

場運動。儘管對這場突然到來的政治風暴缺乏精神準備，還『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基於對黨的忠誠，對毛主席的熱愛，無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力圖跟上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其時這裡的工作千頭萬緒，工作節奏十分緊張，特別是在辦公室（辦事組）工作的人，經常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相當辛苦。——當然，因為受到個人崇拜、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人雖然在有些事情上有懷疑和抵觸，卻不可能不執行照辦，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的說錯話、做錯事，損害了黨和人民的利益。

為時不久，就出現了『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混亂局面。景色秀麗的釣魚台絕非世外桃源，而正是製造這場全面內戰的一個策源地。這裡確實不存在『紅色保險箱』，每個人都經受著這場風暴的嚴峻考驗。大家對黨和毛主席傾注了滿腔熱誠，換來的卻是江青迎頭潑來的冰冷的污水。這些人來到這裡工作不久（例如小組成員尹達被趕走時距離中央文革小組名單正式公佈還不到三個月，金敬邁只在文藝組工作四個月零三天），就被江青當作『革命對象』加以迫害：被批鬥，被監禁，精神上 and 肉體上都遭受殘酷的折磨，血淚斑斑，傷痕累累，九死一生，有的還犧牲了生命。

受到江青迫害的大多數人，儘管艱難，還是頑強地經受了這場嚴峻地考驗。在那烏雲滾滾、黑夜茫茫的日子裡，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前景，始終懷有希望，充滿信心，堅信寒冰終將溶化，春天即將到來。大家的心願沒有落空，一九七六年十月，終於迎來了勝利的時刻：高興地看到了林彪的死亡和『四人幫』的毀滅，幸運地盼到了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重新為革命工作、為人民服務的日子。

歷史是最無情的。林彪、江青一夥已被永遠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上，康生、謝富治死後也未能逃脫歷史的審判。林彪、江青製造的無數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正如金敬邁在自己的冤案平反後所發出的無限感嘆：『本來世事自有公論。誰優誰劣，誰個流芳百世，誰個已被或是將被釘在恥辱柱上，不在乎傳媒如何說法，老百姓心頭，早就刻著呢！不是有句詞叫「銘刻在心」嗎？』他的這些話，正道出了千百萬民眾的心聲。

第十二章

深文周納，無法無天

一、在動亂中辦報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陳伯達從參加中央常委擴大會回來告訴我說，已批准我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兼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其實，到此時，我已在《光明日報》工作了九年，我一直任報社黨組書記、副總編輯，全面主持報社工作，因為原來的社長、總編輯都是兼職的，從不過問報社的具體業務。

六月中旬，從上海開會回北京後陳伯達又對我說，希望我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輯兼秘書長，

並把《紅旗》雜誌機關的運動抓起來。以後，他就此事又找我談過多次，已在《紅旗》工作的關鋒、戚本禹也從旁勸說我。沒過多久，《紅旗》雜誌社職工選出了本單位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組，其中有我、關鋒夫婦、林傑等。我被指定為組長。此事先沒有人告訴過我，也未通知過我參加這次選舉會議，因此以後我就沒有出席過有關這方面的任何會議。

就自己的意願來說，我是堅決不願接受這份『重要』職務的。當然，原因是多種的，有的是明正言順的理由，有的卻是難言的苦衷。面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多次苦苦相逼，我只能首先用『無法兼顧』婉言推辭。那時中國的局勢，正如林彪揚言的『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我每天在釣魚台的工作不少於十八個小時，有時甚至連睡眠的時間也沒有。加上毛澤東起居無定時，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習慣在夜間工作，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召參加活動或處理各種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還得擠時間兼顧《光明日報》的工作。其時，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急驟上升，紅衛兵『小將』們經常以此檢查新聞媒體、報刊雜誌的文章、標題、字體等等，並橫加挑剔，動輒就扣上『反對偉大領袖』的大帽子。所以我就以必須兼顧報紙業務並要聽取紅衛兵的意見為理由，一再向陳伯達表明無力再兼管《紅旗》雜誌的編輯業務和『文革』五人小組的工作。

我不肯接受陳伯達這一兼職安排，還有兩個主要原因是無法向他講明的。一是，原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輯的范若愚雖然是陳伯達在打倒鄧力群後親手選定的，但他和秘書長杜敬都正在分別接受由陳伯達夫婦及關鋒夫婦主持的專案組的審查，如果我答應去主持《紅旗》雜誌社的運動，勢必得照他們的意圖批鬥他們要清除掉的人員，及至『大功告成』，必然鬧得天怒人怨。最後終會有那麼一

天，他們會說『穆欣背著我們幹壞事』，而宣佈我為『小爬蟲』之類。范、杜二位的前車之鑒，我不可視而不見。二是，尹達的遭遇使我始終念念不忘。尹達當時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黨組書記，也是文革文件起草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小組內，他年歲居長。毛澤東對尹達在《紅旗》發表的《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一文曾表示過讚賞，說：『尹達的兩句話是對的——『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大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老的』。章太炎打倒康有為，歷史上就是這樣。』陳伯達、戚本禹曾對尹『恭維』、『奉承』過。陳伯達甚至十分親昵地拍著尹達的肩膀說：『我們兩個『達』到一起工作了！』為了表示『器重』，陳伯達連續『提拔』尹達：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給他『升』任《紅旗》副總編輯；五月初，將他『升』為馬列研究院副院長；中央文革小組名單公佈時，又將尹達的名字排在前頭。誰知，白天陳伯達、戚本禹和尹達三個人還同坐在一起商討工作，到了晚上，戚本禹和關鋒就到歷史研究所去發動群眾造尹達的反。不久，尹達就被他們一腳踢開，離開了釣魚台。尹達遭暗算挨整的原因再簡單不過，除了因為他『不屬於江青『圈圍』裡的人』之外，似乎還和戚本禹覬覦歷史研究所的大權不無關係。

看到尹達的遭遇，我聯想自己的前景未必會比尹達好。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人屆十一中全會後，陳伯達再也沒有提過要我管《紅旗》雜誌社的事。我清楚地知道，除了我『不識時務』、態度拘泥外，還與我『揭發』鄧小平『不力』及沒能為他給周恩來打電話有關。我結合當時的局勢和周圍的人的不同處境，思前想後，很快感到釣魚台是一個是非之地，也預感到日後自己可能碰到的遭遇。所以，我除了『奉令』辦事和『遵命』去做我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以外，在人際關係上，一般採取不與個人接觸

的態度。這期間，我基本上做到了：凡是為私事到釣魚台來找我的人一律不見；私人來的信一律不覆；私人間的來往一律停止。這固然是我怕為自己惹麻煩，也怕日後出事而牽連別人。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新聞媒介始終首當其衝，這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對於輿論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認識，各派造反派組織都把奪取輿論工具視為奪權的首要目標和奪權的主要標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強行封閉《解放日報》，數千名紅衛兵佔領報社八天八夜，後來由於遭到上海五十多萬人遊行抗議才撤出。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造反派相繼奪權。一月八日，毛澤東就此事講了兩句非常重要的話，一句是——『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另一句——『搞一場革命，要先搞輿論。』他還說了一句：『許多報，依我看，封了好。但報總是要出的，問題是由什麼人來出。』

毛澤東的談話很快地在社會上廣泛傳播開來。由此，開始了一場被江青等人打著『一月革命』旗號掀起的全國範圍的奪權風暴。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三個『造反司令部』在他們『五大領袖』蒯大富、聶元梓等的率領下，同各新聞機構內部的『造反派』沆瀣一氣，極力製造混亂，致使直屬中央的各大新聞機構深受騷擾。他們擅自闖進人民日報社，對報社進行『監督』；他們湧進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廣播電台；他們還奪了新華社的領導權和業務權。各省、市報社和廣播電台也都相繼發生了類似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蕭力等八人貼出了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指責

『《解放軍報》在劉志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一直脫離文化大革命與兩條路線的鬥爭。』還發佈了《革命造反派宣言》和《告全軍書》。十四日，在他們奪取該報大權後，發表了以《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為題的社論，號召『軍隊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徹底……決不能藉口軍隊的特殊而有所動搖。』同時，他們上書林彪，請求批准和支持他們造反奪權的革命行動。一月十七日，林彪覆信。在這封經毛澤東審閱和同意的覆信中寫道：『《解放軍報》由蕭力、方撫時、孫浩剛、李志高、宋玉芬、武將、楊秉文、孫福小等八同志組成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你們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的行動好得很！我堅決地支持你們。』……『「亂」不要緊，「亂」然後才能治。《解放軍報》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報紙才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了照顧人民解放軍的威信，照顧國際影響，對於《解放軍報》要採取「內批外幫」的方針。在報社內部革命烈火燒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採取《文匯報》、《解放日報》的作法，不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解放軍報社的《革命造反派宣言》、《告全軍書》之類的東西。』

一月十六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北京大學『紅旗兵團』等單位進駐北京日報社，並奪了權。他們成立了『徹底摧毀舊《北京日報》、促進《北京日報》新生革命造反聯絡站』，還發表了革命派聯合起來的《呼籲書》。他們要全面奪權『取而代之』，但只強調由外面接管，排斥報社一切編輯人員。因此，很快與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等造反派組織發生分歧，引起了衝突。後因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干預，決定《北京日報》停刊，才使進駐報社的大學生紅衛兵撤離報社。

一月三十日，毛澤東針對廣播事業局奪權所引起的相互爭奪情況說：『中央廣播電台的革命同志奪了權，很好。聽說現在又要分裂，內部爭吵。還有廣播學院革命派奪了權又分化，要勸他們團結，以大局為重。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小團體主義。管他反對不反對自己，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也要善於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贊成。』

二月五日，毛澤東又針對由於外單位造反派插手、內戰打得十分厲害的《工人日報》社的奪權問題發表談話說：『《工人日報》的問題，外單位的人不要在那裡辯論。那裡的事，由報社內部革命同志自己來解決。』

但到了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控。毛澤東的話已經不能制止這種混亂現象。林彪、江青等人看到事態的發展猶如脫韁的烈馬，很有可能打亂自己的預定計劃，於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匆匆宣佈『它們都是中央直屬的宣傳機構，不得奪權和接管。』與此同時，派出了解放軍對這些新聞機構實行軍事管制，以防止脫離他們的『軌道』。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及二十三日，連續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電台問題的通知》和《補充通知》，宣佈各地廣播電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制』；『已經進入廣播電台的革命群眾，應當立即退出』。二月二十一日，又發出《中共中央通知》，重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和各地廣播局和各地廣播電台，不許由外單位人員接管。已經進駐這些機關的外單位人員，要立即退出。』

就在毛澤東說『許多報、封了好』的話後不久，在一次會上又談到報紙問題時，他抬起右手伸出兩個手指說：『報紙不必要這許多，過去影響大的是申、新兩報』（即《申報》、《新聞報》，是解

放前在上海出版的兩家歷史悠久、影響較大、銷路較多的全國性報紙）。陳伯達接著話茬說：『北京就留一個《人民日報》、一個《光明日報》，除軍報外，其他報紙可以停刊。』接著，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地保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的正常印刷和發行。

儘管有中央的指示作『護身符』，但在當時的一片『造反』聲中，要堅持辦好一張報紙又談何容易！報紙印出來，儘管並沒有出什麼錯，只要有人感到有什麼東西『不順眼』，就會唆使造反派包圍報社鬧事，迫使報紙停刊。報社內部的造反派往往火上加油，力使事態擴大，以便乘機奪權。那是一個天昏地暗、是非顛倒的年代，人們想要打倒一個人，可以信口開河，隨便羅織罪名，潑一身污水。《光明日報》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刊用以毛澤東墨跡作報頭的事，就發生過一場風波。毛澤東的書法藝術造詣很高，功力深厚，是舉世公認的。他的筆力蒼勁灑脫，氣勢磅礴，為國人所喜愛。我到光明日報社工作不久，社內外許多同事和廣大讀者，多次建議換用毛澤東題寫的報頭。一九六四年夏天，我曾為此專門向毛澤東同志寫過報告。開頭他以為原先用的報頭是郭沫若寫的，曾說：凡是報上用的魯迅、郭沫若寫的報頭，都不再給題寫。情況並非這樣，郭只題寫了《文學遺產》專刊的刊頭。經過說明以後，仍然沒有應允，這事便拖下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光明日報》自然同樣面臨內外造反派的挑剔。那夥人到處找茬，『在雞蛋裡挑骨頭』，常把一些本屬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無限上綱，羅織罪名。因此，報社編輯部的同事格外小心，未出現過什麼足使那夥人抓住作為『由頭』造反的差錯。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當時出版的全國範圍發行的報紙，只有很少幾家報頭不是毛澤東題寫的。有些社外的造反『小將』，受到報社造反派的教唆煽動，就拿《光明日報》報頭大做文章，來報社造反。本來，自己和編輯部大多數同志換用毛澤東題寫報頭的願望始終沒有放棄。如能早點改換了報頭，也就可以消除那夥人找茬的藉口。但是盡人皆知，當時毛澤東特忙。不想再為這種事情給他增添麻煩。後見毛澤東手書《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末頁有『郭詞見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報』字樣。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就以其中的『光明日報』四字製成報頭，並將所製版樣送請毛澤東審閱後，於一九六七年元旦啟用。這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報社的同事和廣大讀者當時都很高興。為時不久，林彪、江青一夥掀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奪權風暴。報社內部某些妄想混水摸魚、乘亂奪權的野心人物蠢蠢欲動，就和報社外面覬覦輿論工具的造反派頭頭勾結起來，教唆那批造反『小將』就此找茬鬧事。只是這時的『由頭』，卻從『為什麼至今還不換用毛主席題寫的報頭？』變成了『為什麼偏在這個時候改換報頭？』不過，如此胡攪蠻纏，畢竟不得人心，他們就此編造的那些謊言無人相信，所以鼓噪一陣，也就偃旗息鼓。可是那些懷有野心的人不肯認輸，並不就此罷休。一有機會，又會興風作浪。

一月十七日，一位當時得寵於江青、紅得發紫的紅學家（研究《紅樓夢》的學者也），來到光明日報社貼出了他寫的《穆欣是反革命兩面派》的大字報，他『揭發』筆者所謂『反對京劇革命、辱罵江青同志的嚴重罪行』。這張純屬子虛烏有的大字報，剛一貼出，就被正直的人們識破了，鑑於當時的形勢，不少人敢怒不敢言。當然也有些人受了蒙蔽。

當天下午，一位曾在光明日報社擔任過數月副總編輯現已離去的江某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穆欣

是什麼人？」，他『揭露』我『抵制林彪同志四個念念不忘的口號』（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說：《解放軍報》首先在頭版上大字刊登這四個口號。《解放軍報》編輯部『當晚通知了《光明日報》，可是第二天，《光明日報》未採用。以後幾天，全國報刊都刊用了，《光明日報》仍不用。六月四日，我到《光明日報》開始工作，經過力爭，才於六月五日第一次見報。我又建議連續刊登，穆又不採納。我找夜班負責編輯談話，他說：「我曾經建議，不用不好吧，而穆欣同志回答說，不見得吧！」「四個念念不忘」是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的，穆欣列席了那次會議，親自聽了林彪同志的報告。但是，全國報刊都立即刊用了，唯獨《光明日報》遲了十來天，這是什麼原因，難道不值得深思嗎？」其實這事並無什麼『值得深思』的地方。當時自己這樣處理，並不是個人對林彪有什麼反感，也絕沒有『預想』或『預見』到他日後會如何，只是覺得，天天用頭版頭條的大塊篇幅來刊登這些口號，似無必要，更何況，類似這樣的口號及講話幾乎在每天報紙的各個版面上都有，既然如此，何必再多此一舉呢？不可否認，我對當時新聞報道中出現的『一窩蜂』的風氣是不以為然的。江某在大字報中還揭發筆者反對江青對京劇的改革，刊登林涵表妄圖扼殺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的文章。在他的大字報中，還引用了那位紅學家給我寫的大字報中捏造筆者『反對』江青的一些話。

兩個人在同一天貼出兩張大字報，一個揭露我『辱罵』第一夫人，一個聲討我『反對林副統帥』。凡是經歷過『文革』這場劫難的人，都會知道這兩張大字報有何等的分量！一夜之間，針對我的大字報就貼滿了報社的七個樓層。很快，又印發了《穆欣的十大罪狀》傳單。我的『罪狀』與其說是十條，

還不如說兩條更為貼切，即『公然反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林彪同志』，『公開辱罵江青同志「有神經病」……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矛頭指向誰，還不清楚嗎！』

一月十八日，江青見『萬事俱備』，報社內外的造反派已經起來向我開火了，於是立即勒令我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接受群眾批評』；報社的造反派也夥同蒯大富手下的紅衛兵，緊跟『首長』的指揮棒，也送來了逼我回報社的『勒令』書。這樣，我在報社被批鬥了一個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江青再次逼我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以後，當報社『造反總部』串通外單位紅衛兵對我實施綁架的時候，『《光明日報》革命造反總部』編印的《光明戰報》第三期——係與『首都新聞批判聯絡站』《新聞戰報》第十五期的合刊，在第二版又全文刊登了那個紅學家『揭發』我的這張大字報）。

看來，如此相激相蕩的『日程』，絕非是偶然的巧合。從後來的大量事實表明，這是一起有預謀、有策劃、有步驟的政治大迫害，也是對《光明日報》奪權的開始。

二、紅學家李某的羅織誣陷

對知識分子來說，整個『文革』的歷程，就是一場惡浪滔天的文字獄。『文革』這場悲劇，是江青指揮姚文元之流製造一連串文字獄而揭開其帷幕的。一篇文章從政治上宣判一個人的死刑，乃是江

青一夥的『發明創造』。在江青一夥專橫統治下，大網垂天，人人自危。他們嚴格控制輿論，迫使整個民族『萬馬齊喑』，造成新聞事業空前的災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我從釣魚台回報社參加運動。報社的造反派就紅學家李某揭發我的『罪行』進行了多次批鬥。批鬥會上，只許他們大叫大罵，不許我有任何申辯、反駁的權利。他們為了收集筆者更多的『罪行』，竟然將我在《光明日報》主持工作十年（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七年）期間在報紙上發表的各種新聞和文章（字數總計約達一億二千多萬字）搬了出來，企圖對我採取『新賬老賬一齊算』的鬥爭策略。儘管其中有不少是曾由他們中的一些人親手撰寫或編發的新聞、文章，但此時此刻，為了政治的需要，也被他們親自定為『毒草』，並強令我『承擔全部責任』。一位慣於附膺逐穢的『老報人』，竟當眾現醜說：我要是『保』穆欣，從這個口袋裡可以拿出十萬字的材料；我要是反穆欣，也可以從這個口袋拿出十萬字的材料來。正因為有這樣一幫『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報痞在攪騰，對我的迫害與日俱增。

某紅學家這張大字報的確大有來頭。江青公開對我進行迫害，正是從這個由頭開始的。據王力說，『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以前說過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說他是叛徒，讓我派人調查。我調查結果說不是叛徒……』（《「文革」第一年》）。從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夜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安徽來京代表的會議上，當眾誣陷『穆欣是特嫌』的話與此對照，王力所講的這些情況是可信的。從此以後，江青和葉群勾結起來，對我的迫害步步緊逼，終於將我關進牢房。江青始終抓住這個問題不放，直到八年冤獄完了，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專案組『一辦』的張宏學們給我看的『結論』

稿中，還說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攻擊《智取威虎山》的大毒草，扼殺京劇革命』，犯了『路線錯誤』。

為使讀者了解真相，現將紅學家李某這張題為《穆欣是反革命兩面派》大字報的全文照錄於此：

長期主編《光明日報》大量放毒的穆欣，會是革命左派嗎？親自給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華君武的所謂『內部漫畫』出題放行的穆欣，會是革命左派嗎？《光明日報》的革命同志們，應當擦亮眼睛！

我這裡只揭發他反對京劇改革、辱罵江青同志的嚴重罪行。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親自領導了京劇革命，江青同志為了貫徹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線，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終於衝破了周（揚）、林（默涵）（彭（真）、陸（定一））是他們的後台——黑幫的種種阻撓，舉行了革命現代京劇的匯演大會。但是，周、林黑幫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特別仇恨江青同志。要盡陰謀破壞京劇革命，圍攻上海京劇院的《智取威虎山》，就是京劇革命中的一個突出的反革命事件。林涵表的大毒草——《〈智取威虎山〉觀後漫筆》，就是在《光明日報》上拋出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衛東文的《革命京戲花最紅》一文，批判了林涵表的大毒草，其中談到，周揚、林默涵，利用職權，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耍了一系列陰謀手段，進行了種種反革命活動……《光明日報》的同志們，在發這篇文章的時候，難道沒有想一想嗎？是誰勾結林默涵搞了這次反

革命活動，是誰和林默涵合謀拋出了這株大毒草，又是誰在批判以後，迫不及待地向林涵表表示道歉的？你們是了解實情的。

讓我們看看事實真象吧！

林涵表的毒草發表以後，有一天，林默涵突然打電話通知陳笑雨（叛徒，前《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叫我立刻趕寫一篇批判林涵表的文章。我連夜寫了出來，送給他們，過一兩天，林默涵又通知我，江青同志對文章有意見，想找我談一次並請我看戲。當天下午我就去中南海，江青同志和我長談了三個小時，批評了我的某些文章，並給我指出了京劇革命的歷史意義，批判了林涵表文章的危害性。回來後，我就改寫了那篇批判文章。又過了兩三天，前中宣部黑幫召開了一次各報刊宣傳現代京劇的會議（在中宣部教育樓），我碰到了穆欣（我和他並不熟悉），他就和我說，《智取威虎山》你也寫了一篇文章啊！我就和他說：『江青同志批評了我！』不料他惡狠狠地說了一句，『這個人有神經病吧！』聽了他的話，我雖然吃了一驚，但一方面由於自己政治嗅覺不敏銳，一方面由於江青同志也和我談起過，她有一個時期由於動手術聽覺神經失靈，因此就沒有往最壞處想，但也覺察出他的情緒不對頭。後來我又問他，『你不是也寫了一篇嗎？』他表示不屑於談地說：『那是張緯寫的，是默涵同志非把我的名字加上不可。』

這時我有點懂得了，林默涵這樣做，無非是搪塞江青同志的批評。但由於不了解背景，還不敢做明確的判斷。不過，這件事一直在我腦子裡留著問號。每當遇到他時，我就想起了

這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伯達同志在《人民日報》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介紹穆欣是中央工作組成員時，這個問題又在我腦子裡出現了。七月初，我寫了一篇批判周揚的文章，送給了江青同志。穆欣在釣魚台找我去談話。我想他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就向他檢討，我過去寫了不少壞文章，辜負了主席和江青同志對我的培養和教導。他問了我一些情況，說這個是『壞傢伙』，那個也是『壞傢伙』，當時我的腦子裡又猛地閃出他是一個什麼『傢伙』，再聯想一九六四年京劇革命時的階級鬥爭形勢，我醒悟過來，久已存在的那個問題明朗了，穆欣是代表周、林黑幫的一群辱罵江青同志。他這種惡毒的字眼，正反映了以彭真為首的革命集團對江青同志領導京劇革命的強烈仇恨。我曾多次想寫信給江青同志，懷疑他這個左派面目。但是，由於江青同志身體不好，我實在沒有勇氣把這件事告訴她。考慮結果，在七月初我還是把這封揭發信寫給了唐平鑄。『希望』他認為必要時轉給伯達同志。等過了幾天，我碰到他，問起這件事。他說，這問題很重要，但需要等一等，這顯然是唐平鑄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要包庇穆欣，從此也就石沉大海了。

七月中旬，我部廖俊傑同志參加了文化部的所謂集訓班的工作，據他和我談，林涵表交代，他的那篇大毒草，是《光明日報》編輯（張卉中，即穆欣妻子）傳達林默涵意見讓他寫的，發表時經過林默涵修改。發表受批判了，張卉中又親自向他道歉，說什麼他們『發表批判文章是不得已的』，請聽聽，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立場。這些鬼花樣，難道不是穆欣勾結林默涵幹出來的嗎？

穆欣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林默涵是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記得一九六三年，我的一篇批判鬼戲的文章，被林默涵改了一個題目。穆欣看到我，就大肆宣揚。說林默涵最近改了幾篇文章的題都好極了，他要打印出來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學習。《光明日報》的文藝報道，像《人民日報》文藝報道一樣，完全執行周揚的一套。

《光明日報》的革命同志們，我們難道能夠容忍像穆欣這樣的反革命兩面派的人物滑過去嗎？一千個不能，一萬個不能！穆欣一定要交待他勾結林默涵反對江青同志破壞京劇革命的重要罪行。

必須挖出這顆定時炸彈！必須揭露這個假左派的真面目！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李希凡

一月十七日

他把偷天功為已有的江青吹捧為毛澤東文化革命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勇敢捍衛者，而把林涵表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評論文章誣蔑為『大毒草』，將批准發表這篇文章之事定為『反革命事件』，同時還將各種置人於死地的大帽子，如『黑幫』、『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強加到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華君武、張卉中等十人的頭上。

李某在其大字報中用無恥謊言諂上欺下、掀風鼓浪。事實到底又是怎樣的呢？這還得從一九六四年舉行的全國京劇革命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說起。

一九六三年，江青獲悉中共中央決定在下一年舉行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信息後，聞風而動，馬上把『她的』劇本送到幾家京劇團。這些劇本原是地方戲劇工作者創作或改編的，江青並沒有付出過一星點兒的勞動，卻厚著臉皮全都說成『我的劇本』。蟄伏已久的江青決心要『露崢嶸』了！

一九六四年，江青打著『搞京劇改革』的旗號竄到上海，依柯慶施作靠山，以張春橋為幫手，開始了對《智取威虎山》剽竊。雖然張春橋對京劇一竅不通，但他對江青的『政治需要』瞭如指掌——從這齣戲入手，作為騙取『文藝革命旗手』的資本；這也是這位張『助手』求之不得的事，他也正想要通過與她的『合作』，扶搖直上。『心有靈犀一點通』，兩人一拍即合。經過一番苦心經營，終於在緊鑼密鼓中推出了上海第一齣由江青『親手培植的』京劇革命現代戲——《智取威虎山》。

不久，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開幕了。上海就以《智取威虎山》作為參加匯演的主要劇目。作為上海代表團團長的張春橋在率領大隊人馬抵達北京後，不僅不主動和各報刊、記者聯繫表示歡迎報道、評論，反而擺出一副昂首天外的神態，將一批預先寫好的、自吹自擂的劇評『分派』給各大報刊登載。派給《光明日報》的一篇是《〈智取威虎山〉的改編與演出》。可是，《智取威虎山》在京演出後，反映不佳，不少觀眾紛紛議論，認為上海對自己的這齣戲吹得過火，『言過其實』，大失所望。

為宣傳報道反映中國戲劇改革豐碩成果而舉辦的這次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光明日報》在編發演出評論專欄時，可謂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機。經過反覆研究，大家認為固然要考慮上海代表團

的『情緒』，亦須正視社會上對《智取威虎山》評價不高的實際情況，決定按照匯演廣告上各劇排列的順序，即將山東京劇團演出的《英雄的讚歌——〈奇襲白虎團〉觀後》放在劇評專欄的首篇，然後才是《〈智取威虎山〉的改編與演出》及北京京劇團的《〈蘆蕩火種〉觀感》。報紙印發後，各方反映較好，唯獨張春橋大發雷霆，表示不服。盛怒之下，連隨同上海代表團來京的《光明日報》常駐上海的記者的求見也遭拒絕（此記者還是由上海市委調配並常駐市委的）。

事實證明，《光明日報》對上述三齣戲評論的排序是正確的。在此專欄與觀眾見面後的最初一周內，各報就收到不少評論文章，其中對《奇襲白虎團》給予熱情鼓勵的最多，刊登見報的就達十一篇，而對《智取威虎山》的評論甚少，奇怪的是沒有一篇是出自北京觀眾和記者之手。據知，很多文藝圈內的人都不願與顧盼自雄的張春橋打交道。雖我報記者多方聯繫約稿，仍無反應。為了顧全大局，力求平衡，我報文藝部記者張卉中（筆者之妻）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最後只得去中國戲曲研究院求林涵表撥冗寫一篇。根據中宣部有關建議，林涵表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寫了一篇題為《〈智取威虎山〉觀後漫筆》的評論文章。在文章中，他對《智》劇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勵：認為《智》劇『堅定地力求以提高劇本的思想性出發，不被情節所迷惑，儘量刪除渲染土匪惡習和有損於英雄性格的某些情節，力求突出地表現少劍波和楊子榮等英雄豐滿的精神面貌，突出表現黨的領導作用。這些做法是有意義的』……同時，他對改編中的某些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如說舞台上的少劍波（《智》劇主人公之一），『對於熟悉小說的觀眾來說，可能有點不習慣。少劍波的藝術形象到底怎樣處理更好一些呢？這個問題是可以進一步作深入的鑽研探討的。』在提到劇中第一主人公與小說原著中的相比較，

『《智》劇表現楊子榮與眾匪徒周旋時的潑辣驍悍粗獷的鬥爭手段不太多，而表現他的內心獨白較為充分』。林還就『劇本改編怎樣更好地發揚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和『演出怎樣使林海雪原中的特殊鬥爭表現得更有特色』兩個問題發表了意見。此外，在表演藝術方面，他指出該劇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有某些地方還可以加工和再探討』，並提出了一些供作參考的具體意見。作者最後表示，《智取威虎山》『改編演出是有成績的，上面提到某些可以研究和加工之處，也不一定準確，不過是『愛之越深，求之越切』，希望它搞得精益求精而已。』

我報編輯部和有關人員讀了這篇文章後，普遍認為內容客觀、中肯，態度謙誠，遂於六月十五日見報。那知，張春橋看了此文後，頓時咆哮如雷，惱怒萬分。一向恃寵生驕的他豈能見得別人對他所做的事評頭論足！他嚴厲質問我報社駐滬的一位記者：在這個時候，你們《光明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是什麼意思？接著，他借題發揮，竟然對沒能得到專供中央參考的我社內部刊物《情況簡報》（中央曾規定『不出北京』）一事也大加訓斥。這位記者對平白無故地遭到張春橋的訓斥，感到委屈，回來向我匯報時，我也覺得張春橋實在太蠻橫，就脫口說了一句：『這個上海灘的地頭蛇！』不料在張春橋發跡以後，有人告密，這句話也使我大吃苦頭。

很快，張春橋將此事告訴了江青。江青看了林涵表的文章後，同樣，火冒三丈，即向中央宣傳部大發雷霆，施加壓力，提出要穆欣寫文章來反擊林文。當時我感到他們太小題大作，『無事生非』。鑑於自己對戲曲外行，也沒有看過這齣戲，所以就請擅長文藝評論、這時又在匯演報道辦公室負責組稿的張綽勉為其難，撰寫一篇。張綽是《光明日報》駐廣東記者，素愛文藝，經常撰寫文藝評論文章，

讓他完成此任務應該說是得心應手和無可非議的。

張綽很快完成了《在新的 heights 上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評京劇〈智取威虎山〉》一文。我和一些同仁看後，覺得此文和林文基本大同小異，只是對林文提出的某些問題發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同時也指出《智》劇『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如在表演藝術上，他指出『演員的生活底子還不太深厚，對傳統表演的程式的運用，有的地方顯得不夠調和、熨貼，這也是一時難免的。這個問題不僅上海京劇院如此，其他不少的劇團也同樣存在，這是在今後長期努力才能夠解決的問題。』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最後他表示：『這些畢竟是次要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這齣戲站在較高的角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並且對反面人物作了正確的處理，這就大大提高了這齣戲的思想意義。』張的文章雖然是一篇討論文，但態度是中肯謙和的，是說理的，絲毫沒有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跡象。可以這麼說，這篇文章並不是對林文的論戰和反擊，而是對它的補充。

江青在審閱張綽的文章清樣後，仍抓住我不放，她和張春橋通過中宣部向我報社提出：須由穆欣署名發表。這使我更感為難，因為自己從來不在別人寫的文章上署名，況且我連這齣戲都沒有看，哪有資格與人爭論和說長道短！當時我就向領導據實相告，懇切求免。在那個時候，誰敢捅江青這個馬蜂窩？在四位副部長聯名向我提出勸告後，我從大局出發，違心地署上名字，於六月二十五日和張綽聯名發表了張寫的這篇文章。

這篇聯名文章的發表，不僅立即引起了林涵表的強烈不滿和讀者的無比驚異，而且使本報社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無奈，只好請匯演報道辦公室的有關人員向林真誠地表示歉意，並委婉地說明其中

難言的『苦衷』。

為了清除林涵表所寫評論的『流毒』，江青、張春橋在一方面逼迫《光明日報》組織文章進行『論戰』的同時，還利用各種場合對《智》劇進一步吹噓和推銷。

六月二十三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京劇現代戲觀摩人員座談會上講話時，針對上述『事件』，專就《智》劇講了一大堆話。

她自以為對中國京劇藝術無所不曉，其實，她對這門中國藝術瑰寶所知甚少，只是語無倫次地妄加評論。她說，京劇『容易表現反面人物，不容易樹立正面人物。』所以在改編《智》劇過程中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由於她的努力，才使《智》劇中的人物不再『乾癟癟』。她一再稱揚『上海是京劇改革的好典型』。江青她喋喋不休，又臭又長地講了半天，使在座的不少與會者好生厭煩。

七月二日下午，江青約我到中南海頤年堂談話。只見她餘怒未消，仍在那裡嘰嘰咕咕地罵林涵表的文章。我不知她這次找我來要談什麼重要事，可是聽她東扯西拉地，一會兒說《海瑞罷官》反黨、《紅燈記》『不按我的意思改』、《朝陽溝》是『四不像』、『怕連豫劇也不承認它（指《朝陽溝》），應按京劇語言，音樂改成京劇劇本。』一會兒說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後來又罵蘇聯的《靜靜的頓河》、法國的《巴黎聖母院》，蕭洛霍夫、雨果都被她臭罵了一通……我感到驚愕，到底她要跟我談什麼？她大言不慚地標榜自己說，文藝界有許多問題都是她這個『哨兵』先發現，然後告訴毛澤東的。說她發現《武訓傳》有問題，就寫社論批判，『主席見我寫得太吃力，拿過去改過才發表……』。

前後兩個鐘頭，幾乎沒有容我開口說一句完整的話。直到談話結束了，我仍沒有弄明白，她究竟為什麼要約我到這裡來？為什麼要向我說這些沒頭沒腦的話？因為這次是第一次單獨見面，我摸不清她的性格，只覺得她嘻怒笑罵無常，情緒激動；講起話來，前言不搭後語，似乎像有些書本上描寫的『歇斯底里』症……因此，回到報社，當有人問到她找我談話的事時，我又『口無遮攔』地說：『沒見過像她那樣易於激動的樣子，不知是不是腦袋有病？』

過了一段時間，誰也沒有再提起林涵表文章之事，人們以為這樁公案到此總算已經『了結』。

不料『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把已被劃上句號的歷史一頁又翻了開來。紅學家李某以其特有的政治靈感，將我曾在報社說的話『詮釋』成『江青有神經病』，還跑到報社貼出了一張殺氣騰騰的大字報。這不是故意中傷無辜，討好江青又是什麼？

李某寫道，是他親耳聽到筆者咒罵江青『這個人有神經病』的。我不妨在此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在『文革』前，紅學家李某深受江青的寵愛，是文藝界和新聞界盡人皆知的事。當時，他恃寵生嬌，每逢在學術問題上同別人發生爭執時，就有恃無恐，露出一副學霸的臉孔。就在他寫批判林涵表文章前後，與著名文學評論家、詩人何其芳就文藝寫作中的典型問題發生爭論。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寫了一篇題為《典型『共名』是說階級論還是人性論？》的文章。有關刊物將其文章送周揚看時，周揚認為李某的態度不好，過於粗暴，勸他修改，他不願改，因此拖延了刊出時間。李某大動肝火，埋怨『文章在周揚那裡一壓就是幾個月』。過了十年，他寫文章追記這事的時候，還憤慨地說：『當時我在氣憤之下，就把此文小樣寄給江青同志，並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說明，此文已送給江青同志。』其後中宣

部的有關人員仍勸告他修改，他的火氣更大，竟說：『這是原則分歧，不能修改。如非要我改，文章可以不發，但中宣部不發我的文章，就是欠了債。』（一九七三年《紅樓夢評論集·三版後記》）

他在當時這樣狐假虎威，咄咄逼人的形象，人們都是看在眼裡，記在心底的。像他如此目空一切，派頭十足的人物，筆者一向是避而遠之，不去領教的。何況他在這張大字報裡也明明寫著『我「碰」到了穆欣（我和他並不熟悉）』。既不熟悉，對方又是此等樣人，筆者何至愚蠢到竟把『辱罵』江青的話，特意說給他這個江青特別寵愛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舉起棍子打人的紅學家……

李某大字報裡說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初筆者和他談話的事，這是真的。大字報裡還說到他『辜負了……江青同志對我的培養和教導。』——他在以後寫的文章也說過『深深感到愧對……江青同志的關懷和培養』。這裡說的『辜負了』、『深深感到愧對』，並不是一般的『客氣』套話，而是具體有所指的。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並非像他說的那樣談他所寫批判周揚的文章，是我當時兼管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事務，『奉命』轉告江青批評他的話。江青多次當眾說過，當她決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這齣戲時，先曾找過這個紅學家撰寫批判文章，因他不願意寫，才又到上海去找姚文元寫的。這一情況許多人都知道，李某在『四人幫』垮台之後，也愛拿這件事當作『資本』，到處宣揚，意在掩蓋他在當年投靠江青，作惡多端的卑劣行徑。對於此事，假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容易誤信他的謊言。因此，揭去假相，露出真相，還它本來面目，就是非常必要的事。

本來，李某當時不寫批判吳晗的文章是對的。假如他能堅持這種態度不變，是會受到人們尊重的。可惜李某根本缺乏這種風骨。『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拉開以後，看到江青的走向，他就發現這次

打錯了算盤，風向沒有看準，『深深感到愧對』江青。他這一種痛悔心情，在《紅樓夢評論集·三版後記》裡表白得淋漓盡致：

特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黨需要我拿筆進行戰鬥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著鼻子拉去，做了他們搞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的方向。因而，當我們第一次讀到毛主席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時，一方面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同時，也感到羞愧，感到痛心。我們有負於毛主席的教導和期望，有負於江青同志的熱情的鼓勵和支持。我自己更是有負於江青同志多次耐心的啟發和教育，這是沉痛的歷史教訓……

那個時候，李某正是帶著這樣悔、愧疚加的心情，給江青寫了不少信，向她檢討認錯，乞求饒恕，表示效忠。當時江青還和張春橋留在上海，雖然李某寫了那麼多信，江青對他不肯輕饒，長久不予理睬。六月下旬，她打電話叫戚本禹找李某談話，轉達她對他的嚴厲批評。戚本禹從中搗鬼，後頭改叫我出面找李某談。推也推不掉，我就約他到釣魚台談了一次，把江青的話照實告訴了他，有些話是很難聽的。李某在這張大字報中說：『穆欣在釣魚台找我去談話，我想他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就向他檢討。』看來，李某對這次談話感到氣惱，耿耿於懷。其實，當時筆者只是照實轉達了江青的話，並未添加任何個人的意見；除了照轉江青對他的意見，更未涉及其他的事。隨後我把談話情形轉告江青，就算完成了任務。其後江青回到北京，在李某貼出誣陷我的大字報以前，仍舊對他不予理睬，拒絕見他。直到他來光明日報社貼了這張大字報之後，又經過檢討再檢討，『頓首』再『頓首』，過了一段時間，即江青把我關進監牢之後，方才饒恕了他。有人看到，江青同他見面時『情緒激動』，兩人都

不止『熱淚盈眶』，而是『淚流滿面』的（本書登錄當時他拉著江青的手痛哭流涕的照片，『立此存照』）。自從得到江青諒解之後，這個紅學家重整旗鼓，大張撻伐，寫了一篇又一篇大批判文章，為江青一夥掃除篡黨奪權的障礙。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造反派對我的批鬥暫停下來。但是，事情卻並沒有完結。一九七五年，經過八年冤獄後的我回到報社後，中央專案組仍然說我是有『問題』的。繼續誣陷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攻擊《智取威虎山》的大毒草，扼殺京劇革命』。這說明紅學家李某的這張大字報頗具『生命力』，也表明他此時此刻的『權威』地位。只是當年那張大字報定的罪名是『反對京劇革命』，現在改為『扼殺京劇革命』，這頂帽子扣得更沉重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北京爆發了充分表現廣大人民群眾決心打倒『四人幫』意志的『天安門事件』。而這位李某仍對江青一往情深，繼續效忠。五月十九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要塑造典型》一文，維護江青提出的違反典型化創作原則的『三突出』，在這篇文章中七次點名攻擊誣陷鄧小平。令人憤慨的是，他在這裡給鄧小平捏造的『罪名』竟然是『惡毒攻擊樣板戲』。說什麼『圍繞肯定還是否定革命樣板戲的鬥爭，反映了文藝領域裡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鬥爭』。李某在文革中以莫須有的罪名指責『鄧小平在『整頓』文藝的旗號下煽起文藝右傾翻案風』，『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咒罵鄧小平這個『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對革命樣板戲惡毒攻擊』……

某紅學家此時此刻發表這種專門攻擊誣陷鄧小平的文章，絕非偶然，而是有其現實的政治背景，是在他所說的『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為『四人幫』效勞的。

所謂『三突出』，其實是『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于會泳根據江青的指示精神創造發明的成果。這個『三突出』的內容是：文藝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要做到突出正面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這個原則是由姚文元改定、江青親自批准的。從此，『三突出』被『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吹捧成，這個『文藝旗手』江青『發明』的『無產階級文藝創作的根本原則』，是文藝創作的『普遍規律』，把肯定還是否定『三突出』原則，說成是政治路線上復辟與反復辟鬥爭的直接反映，對反對『三突出』者進行政治迫害。當時文藝界許多人對『四人幫』推行『三突出』和炮製陰謀文藝作品強烈不滿。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領導全面調整，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他也著手調整文藝政策。這年六月間，他責成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于光遠、鄧力群等組成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直接推動文藝調整工作。根據鄧力群的提議，這場文藝調整就是從調查研究『三突出』問題入手的。政治研究室組織人力，著重查閱了在由『四人幫』控制的主要報刊上發表的大量有關文章，發現他們在連篇累牘地鼓吹『三突出』的同時，故意閹割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砍掉『百花齊放』，許多引毛澤東的話不見了『百花齊放』四個字。政治研究室很快編寫出《關於報刊上宣傳『三突出』創作原則情況的材料》和《關於報刊中宣傳『雙百』方針情況的材料》兩份文件，揭露了以江青為首的一夥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本質，以及他們從理論到實踐抗拒毛澤東的文藝方針、割裂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說明正是自稱『旗手』的江青及其同夥公然反對毛澤東文藝方針、割裂毛澤東思想，持續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十月四日，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插話，運用這個材

料，揭露和批評了『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鄧小平說：『我總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澤東思想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林彪主張就學『老三篇』（後來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澤東思想……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志說，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

這一時期，鄧小平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經過文藝調整，衝破了他們所推行的文化專制主義，使一批中國優秀的電影藝術作品，如《創業》、《海霞》等相繼得救，重上銀幕，使一批文藝作品得以出版發行，使許多文化領導人、周揚及其一案中人得以釋放出獄……這一階段，那些長期踐踏與霸佔文壇的黑手及其親信，不僅在文藝上，而且在政治上、道義上都遭到發動『文革』以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四人幫』高壓下陷於沉寂的文壇得以重新顯露生機與活力，使文藝界人士受到巨大的鼓舞。關於這次文藝調整的實況，在夏杳珍所著的《一九七五：文壇風暴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版）一書中作了翔實精彩的記述。

在被揭露的鐵證面前，白紙黑字，無法抵賴。江青一夥無可逃避，只得暫作退卻。他們對鄧小平和這場文藝調整恨得咬牙切齒，詛罵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是『謠言四起』，是大颶『右傾翻案風』的三個月。不久，這次鄧小平提出的文藝調整，即因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聽信『四人幫』的誣告，動搖了對鄧小平的信任，又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而不幸中斷。

『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懷著對鄧小平的深仇大恨，把一九七五年的文藝調整誣為『右傾翻案風』加以攻擊，並對此次文藝調整進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某紅學家一直是賣力鼓吹『三突出』的，吹捧『三突出』是什麼『創造當代英雄典型』的『原則』。他不能容忍對『三突出』的任何反對意見，自然會對一九七五年這次文藝調整恨得咬牙切齒，也知道這次文藝調整是由鄧小平親自領導的。他在江青一夥煽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赤膊上陣，對鄧小平大張撻伐，正是對一九七五年文藝調整的反攻倒算，要替江青出這一口惡氣。

他在《要塑造典型》這篇文章中，把一切反對『三突出』的意見統統斥為『文藝創作的奇談怪論』，明言不諱地反擊『鄧小平在「整頓」文藝的旗號下煽起文藝右傾翻案風』，斥責這些所謂『奇談怪論』，『關鍵在於這是鄧小平煽起的右傾翻案風重新提出來的，它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胡說什麼『伴隨著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對革命樣板戲的惡毒攻擊，這一原則（按：指『三突出』）又受到了非難』。他為了效忠江青，在文中又胡說：『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不是曾惡狠狠地叫喊樣板戲不能「一花獨放一嗎？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樣板戲的鬥爭，反映了文藝領域裡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種鬥爭今後還要長期繼續下去。』這個紅學家又說：『有人就改換手法，妄圖通過歪曲和否定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來達到否定以革命樣板戲為標誌的文藝革命的目的。這是鄧小平在「整頓」文藝的旗號下煽起文藝右傾翻案風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他在這篇文章結尾處還寫道：『鄧小平越是攻擊革命樣板戲及其創作經驗，我們越是要普及樣板戲，大力推廣革命樣板戲創造的寶貴經驗，堅決回擊鄧小平煽動的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



《何故泣涕如雨？》李希凡說：“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黨需要我拿起筆進行戰鬥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著鼻子拉去，做了他們搞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的方向……有負於江青同志的熱情鼓勵和支持。我自己更是有負於江青同志的多次耐心的啟發和教育，這是沉痛的歷史教訓。”（《紅樓夢評論集·三版後記》）

李希凡1967年1月17日到光明日報社貼出的誣陷穆欣的大字報（這是刊於1967年9月3日光明日報社“造反總部”《光明戰報》第三期上的大字報全文）

果，將文藝革命進行到底！』李某這篇文章的發表，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甘為『旗手』陪葬的癡心，也是他親手寫出的又一份投靠江青，陷害忠良的供狀。

曾有不少人問過我，這個紅學家連自己也說和你『並不熟悉』，過去無冤無仇，他為何要如此打你悶棍，整你，如今你已經被弄得家破人亡了，還不讓你脫身？我認為，對於這位紅學家的這種行徑，當時像他這樣破格的積極，是極不尋常的表現。他在過去和我並無瓜葛，和我所在的這個報社也無多大關係，之所以他這樣大動干戈，上竄下跳，只能看作是爲了向江青表功。他同鄧小平又會有什麼個人恩怨？卻又如此執著地攻擊誣陷他。道理非常簡單，他既然投靠江青，上了賊船，也就身不由己了。『走狗不走』，主子是要發怒的。某紅學家就是陳毅罵的那種『踩著別人』、『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的『作風不正派』——心術不正的一類。

當然，這位紅學家這樣賣力氣地效忠江青，陷害忠良，就他個人的『前程』來說，並不是徒勞的。如前所述，某紅學家因為拒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惹惱江青，『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失勢，有過幾天誠惶誠恐的不好過的日子。但自經過反覆檢討，並且有了『立功表現』，在重獲江青寵信後，他就甘當『過河卒子』，赤膊上陣。正是這番癡心效忠，使他重得江青厚愛，『不可一世』。在江青一夥砍殺白家，文禍滔滔的十年浩劫中，就像人們所講的：『偌大一個中國文壇上就只剩下一個作家和一個文藝評論家。』這一位『文藝評論家』指的就是這個紅學家李某。

三、『內部諷刺畫』引來的災禍

在李某對我的『揭發』中還抓住《光明日報》發表華君武『內部諷刺畫』一事大做文章。他把我打成了『反革命兩面派』，也給華君武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黑帽，他武斷地把華君武筆下的作品攻擊為『惡毒反黨的內部諷刺畫』。

某紅學家這張大字報劈頭就說：『長期主編《光明日報》大量放毒的穆欣，會是革命左派嗎？親自給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華君武的所謂『內部漫畫』出題放行的穆欣，會是革命左派嗎？《光明日報》的革命同志們，應當擦亮眼睛！』報社造反派也『緊跟』某紅學家的腳步，在重翻發表林涵表文章《〈智取威虎山〉觀後漫筆》舊賬的同時，又把矛頭指向《光明日報》發表華君武漫畫的事情上。

某紅學家這張大字報貼出的當天下午，曾在《光明日報》擔任過幾個月副總編輯的江某也貼出大字報說：華君武『惡毒反黨的內部諷刺畫，全部是在《光明日報》刊登的。這些畫是穆欣提供材料約華君武畫的，華畫了以後穆欣還對他進行鼓勵……』接著，『光明日報社內外造反派聯合炮製的『穆欣的十大罪狀』，造謠說：『穆欣與反黨黑畫家華君武簽定了黑合同。從五九年到六六年初，七年之中華君武約二百幅左右的『內部諷刺畫』，僅有兩幅除外，其他全部在《光明日報》刊登。《東風》副刊有華君武的黑畫專欄，每周一幅，任其放毒……為了讓這個反黨黑畫家了解『精神』，穆欣親自把絕密文件送給華君武閱讀。每當華君武『提心吊膽』的時候，穆欣便請華吃飯，鼓勁打氣……華膽子壯大了，就說：『你敢登我就敢畫。』穆說：『你敢畫我就敢登。』真是一丘之貉。』這個『造反

總部』出版的小報《光明戰報》，第一期集中『揭露』『穆欣勾結鄧拓在《光明日報》上大肆放毒』，第二期就是『批判』華君武『內部漫畫』的專號。他們用兩版篇幅、刊登題為《穆欣和華君武合謀在《光明日報》上拋出『內部諷刺畫』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畫》的長文，信口雌黃，亂扣帽子，批判了華君武發表的幾十幅漫畫。從此，在歷次針對筆者的『批判會』上和形形色色的大字報上，幾乎無例外地都提到這個『漫畫問題』。

華君武是中國著名的老一代漫畫家。早在四、五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在不少雜誌、刊物上登載，並獲得讀者好評。他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事物惟妙惟肖，經常使讀者忍俊不住。因為華君武的漫畫顯示了鮮明的中國藝術特色，他過濾生活、解剖生活，使其作品既尖銳、又含蓄，完全不同於那些只記錄一個粗糙的生活畫面的、一覽無餘的東西。《光明日報·東風》副刊創辦於一九五八年元旦。這是融『思想的、文化的、藝術的、知識的』為一體的綜合性副刊。許多著名作家、詩人、畫家以及學術界人士，都曾積極支持這個副刊，為它寫了不少詩文，在文化界和廣大知識分子中有過一定影響，並構成這個報紙的特色之一。華君武的『內部諷刺漫畫』是開設時間最長、最受讀者喜聞樂見的專欄。

華君武的漫畫專欄，每逢周末見報一次，成為《光明日報》一大特色。它不但受到知識界的廣泛歡迎，也引起有些領導同志的關注。他所畫的《杜甫檢討》，周恩來看後大笑；另一幅漫畫《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曾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成都會議上印發給到會人員。當時曾有不少讀者來信稱讚這些漫畫。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東風》副刊發表唐嬰南所寫的《喜讀華君武的內部諷刺畫》，就表達了很多讀者的意見：『今年以來，華君武同志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許多內部諷刺畫。這些漫

畫真個使人愛不忍釋，一下子就抓住了讀者，不由使人笑從中來。同時卻又覺得不能夠一笑了之，而會自自然然生出聯想，有所感發。我們看到《誤人青春》的那些驟然衰老了的形象，看到《馬拉松》那由稿紙組成的無邊無際的跑道，不能不跳出畫面而想到更多的東西，細細品嚼著那很醇厚的餘味。』

唐嬰南還從理論上抒發自己對於『諷刺藝術』的見解，認為『諷刺藝術』的功能，就在於突破生動的表皮，把這些違反生活邏輯的事物發掘出來，集中起來，使它在人們面前赤裸裸地再現出來……只有搔到生活的癢處，人們才會笑，越是搔得痛快，人們也笑得越興奮，越自然。』他說：『正是在這一點上，華君武的漫畫顯示了很鮮明的藝術特色。它不是浮游在生活的表面上，製造廉價的笑料，而是在解剖生活，過濾生活，儘管許多人看到白石老人的青蛙印在熱水瓶上，印在床單上，卻沒有構成一種很完整的聯想。經過《齊白石作品展覽》的大集中，一下子就勾出工藝美術中的一個側面現象。人們明明知道這是誇張，卻還是信服，因為這誇張的基礎就是實際的生活。而且正因為挖得深，所以也概括得高，這樣，就使得作品又尖銳又含蓄，絕不同於那些只紀錄一個粗糙的生活畫面的一覽無餘的作品。』

唐還特別指出：『同樣是諷刺，內部諷刺跟對敵人的諷刺自然有根本的不同。華君武的對敵鬥爭的諷刺畫，總是要引起人們對敵人最大的痛恨、輕蔑和警惕，如像著名的《磨好刀再殺》、《在反革命的後台》，畫家總是帶著冷冷的笑意，指出敵人的矛盾和潰爛無藥可治的了。在內部的諷刺畫中，畫家卻是同他所創造的人物、同他的讀者共享著喜怒哀樂。他「諛而不虐」，刺，不是要把人置於死地，而是為了喚起注意，以求改正。這樣的內部諷刺是人們所熱烈歡迎的。在

日常生活當中，人們碰到不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現象。為了革命事業，這些矛盾需要揭露，值得揭露。揭露這些矛盾的諷刺，不僅不是跟黨的政策、工作相背馳的，恰恰是貫徹黨的政策，推進黨的工作的一支突擊力量……」

雖然華君武的這些漫畫受到讀者歡迎，但因當時黨內風波迭起，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左』的思潮逐步升溫，畫這類題材具有一定風險，很容易被人戴上『醜化社會主義』、『暴露社會主義的黑暗』的政治大帽子。這種風氣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壓力，《光明日報》編輯部有些同事也常為發表華君武的『人民內部諷刺畫』在心裡『打鼓』。在報社每周召開的評報會上，常見有人為某一幅漫畫『擔憂』。我總是說『沒問題』，『即使有風浪，華君武也能頂得住！』

我所以這樣說，是相信這些漫畫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問題。因為華君武畫這些『人民內部諷刺畫』，並非出於一時的『興之所致』，而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是基於一個畫家的責任感和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華君武的這些想法，以後他曾寫道：『當時畫國內的漫畫，顧忌甚多。毛澤東發表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後，我想既然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我們作國際時事漫畫大多屬於敵我性質，而人民內部的矛盾，既屬矛盾，就有問題，也應作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也說過，諷刺要分敵、友、我，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不可濫用。我想了個『人民內部矛盾漫畫』的題目，以區別於那些時事漫畫。』（《舊事新提》，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光明日報》）

但就當時的情形說，我們到底都有點書生氣。不料『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來，華君武的漫畫『在美術界首當其衝』，使他在這場風暴中大吃苦頭。我和他的那次『敢畫』『敢登』的對話，更是每次

批鬥會上都要提起的話題。報社某些『不學有術』的『造反派』，多是任意羅織、栽贓誣陷的高手。他們的『想像力』極強，總是『出乎意料』地強加給畫家某些從未有過的『思想』和『動機』。

在《東風》上發表的《杜甫檢討》這幅漫畫，本是一張畫得很好的『人民內部諷刺畫』。那個時候，從反右派鬥爭以後逐漸蔓延的極『左』思潮，正在全國範圍內泛濫開來。在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的錯誤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意識形態領域一系列政治批判，粗暴地對於許多文藝作品和作家亂戴帽子、亂打棍子，而且這種批判迅速地從文藝領域擴大到哲學、史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實際上把許多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文藝作品和學術觀點，當作錯誤加以批判，並且把學術上的討論和批評都當作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論戰，把學術問題完全等同於政治問題，對持不同觀點的人進行政治圍攻。同時大興文字獄，以某種作品或某人的學術觀點定罪，錯誤地給他們戴上『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分子』一類政治上的大帽子。畫家針對這種錯誤的極『左』思潮畫的《杜甫檢討》，入木三分地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是正確地及時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重大課題，發表以後引起了讀者的廣泛注意，對這幅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但是，那些被極『左』思潮扭曲了靈魂、心態失常的報社『造反總部』中一小撮『高參』，卻對這幅漫畫作出相當嚇人的『判決』。他們在所辦的《光明戰報》上複製了這幅畫，然後寫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可是，周揚卻唱反調說：「我們的反修鬥爭擴大化了」。於是，華君武就馬上畫了《杜甫檢討》這張黑畫，惡毒誹謗偉大的反帝、反修鬥爭。這副黑畫捏造了杜甫的「檢討」，用「兵車行乃和平思想」這句惡毒

的噱頭，嘲諷偉大的反修鬥爭，用意十分歹毒：一方面誣蔑我黨在毛主席領導下，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推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進行的鬥爭；另一方面攻擊我黨「杞人憂天」，國內本沒有修正主義，卻硬要「到處找修正主義批判」，連杜甫也只好「檢討」了。」

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東風》發表的另一幅漫畫《只顧掌舵，不顧看風》，他們信口開河，『上網』更高：『這幅黑漫畫，是一株大毒草，它配合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掀起的反華反共浪潮，配合國內牛鬼蛇神颺起的黑旋風，以航船為比喻，惡毒地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不會觀察「風向」，不會「使舵」，狂妄地要我們黨和國家改變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航道前進的方向。要我們在國際上放棄反帝、反修鬥爭，在國內向「單幹」風、「三自一包」風屈膝投降，順著修正主義的黑妖風「掌舵」和滑下去，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暗深淵中去。』

對於《該休息了》這張漫畫，他們不但挖空心思『上網上線』，而且東拉西扯故意與鄧拓的文章掛起鉤來，意在加重它的『罪責』。他們說道：『一九六二年中國的赫魯曉夫和國內外敵人互相配合，瘋狂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三家村」的進攻在這一時期也達到了極端猖狂的地步，鄧拓拋出《偉大的空話》，矛頭對準指導我們革命事業前進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咒罵毛主席的關於「東風壓倒西風」的科學論斷是「偉大的空話」，咬牙切齒地要黨的領導「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與此同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也攻擊毛澤東思想是「陳詞濫調」「老生常談」。』誣陷這兩幅漫畫『同周揚的黑話、鄧拓的《燕山夜話》互為策應，充分暴露了反黨黑話炮製者華君武、穆欣的真面目。』

他們還攻擊了《不會搖船怪河彎》等幾幅主題相近的漫畫。本來，在正常人看來，這些漫畫是健康的、正確的。前引《喜讀華君武的內部諷刺畫》一文談到這幅畫的時候說：『《公牛擠奶》、《不會搖船怪河彎》對那些不作主觀努力，不看客觀對象者的諷刺，不是恰恰可以促使人們認真地從實際出發，去做好調查研究嗎？而且，這些諷刺的漫畫，正因為是側擊，是「正面文章側面作」，而又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因而往往能喚起讀者的注意，收到一般的宣傳教育形式所不易收到的效果。諷刺得越是尖銳，這種效果往往越是顯著。』

但是，那些『造反派』用其特有的變態心理測量，卻與常人得出完全相反的評價。他們挖空心思，臆想出種種根本就不存在的『作者動機』，故意同彭德懷掛起鉤來。胡說『這些黑畫出籠在三年困難和大躍「翻案風」時期，實質上就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次向黨發動猖狂進攻，反對廬山會議反右傾的正確性，為彭德懷等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

這夥『造反派』列舉了幾十幅華君武的漫畫加以攻擊，然後作了一個『總判決』說：『刊登在《光明日報》《東風》上的大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漫畫，是穆欣勾結華君武有計劃有步驟地拋出去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

這些惡毒誣陷華君武和筆者的文章，大都出自那幾個被稱作造反總部『高參』的報痞的手筆。畫家本是對黨忠心耿耿，熱誠為人民服務的，他們卻恣意歪曲，借題發揮，噴射出這麼多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惡毒謾言，豈不是他們自己存心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他們上竄下跳，為江青一夥搖旗吶喊，不過是故意把水攪渾，進行政治投機罷了。

華君武在『四人幫』垮台後，曾經談到當時所受的折磨：「文革開始，我就成為美術界第一個作品受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東風》刊登的許多我的漫畫成了「大毒草」。至今不忘的某次批判會，把我的漫畫和鄧拓同志的《燕山夜話》結成了一對一，當時我坐著「噴氣式」，側眼想看也不允許，但批判時說鄧拓怎麼說華君武就怎麼畫，生扯硬拽就拉在一起了。」（《舊事重提》）。

筆者感到深為歉疚的是，當這些漫畫橫遭造反派不公正的攻擊誣陷的時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光明日報》還發表過一篇署名『文承延』、題為《剖析華君武『內部諷刺畫』的反黨實質》的文章。據報社造反派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的那份《戰報》『揭發』：當時筆者『一再扣壓廣大讀者』『批判』華君武漫畫的文章，『一直壓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全國美協「革命群眾」公開揪鬥華君武的大會，《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公開發表「批判」華君武的文章時，穆欣才迫不得已地發表了一篇……企圖以此搪塞過去。』儘管如此，當時面對來勢兇猛的橫逆，我們既未據理爭辯，也未挺身承擔責任，屈從於那些對畫家無中生有的誣陷，總是深感歉疚的。

四、《夏菊花發言》的風波

當時造反派糾纏時間最長，折騰得最厲害的，則是《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夏菊花的發言。他們無限上綱，誣陷這篇發言『是王任重之流向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出的反革命挑戰書，

是王任重之流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攻的反革命宣言」。還說發表這篇《發言》，『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唱讚歌，跟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十六條》大唱反調』；『完全暴露了王任重和穆欣要用劉鄧路線來壓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陰謀。』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趁機搞亂《光明日報》，打倒筆者，奪取報社的大權。

夏菊花是武漢市雜技團的演員。她以完美無缺的技藝贏得過無數榮譽，曾經譽滿中外。為此，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過她。當時，她的名字是國人皆知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在中共湖北省委出版的內部刊物《文化革命動態》上，有一篇她的《在武漢市雜技團幫助工作隊整風會議的發言》。其主要內容是夏菊花控訴她在過去受封建班主殘酷剝削的慘痛經歷，暢談解放後在共產黨培養下成長的過程。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比新舊社會的不同，對黨表示由衷的熱愛和擁戴；同時尖銳地揭露了派到武漢雜技團來的四清工作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夏菊花在發言中批駁封建班主對她的造謠、誣蔑，控訴自己在舊社會所受班主的殘酷虐待，訴說在獲得解放後的無限喜悅，內容是令人感動的。她說：

舊社會我是享福還是受罪？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你們造謠說我在舊社會非常『享福』，出門還『騎馬』，是這樣嗎？那時我一天到晚光著腳，牽著馬一走幾十里，腳破了，直流血，還要我照樣走路，照樣牽馬，揹包袱。我問你們，我什麼時候騎過馬？只有演出的時候我才騎馬，我是五歲那年當作『壓子』（壓子是句迷信話，自己生的小孩死了，收養一

個，壓住再生的不死」被你夏家班主夏群買進來的……

六歲練功演出，你以我的名義拿一股賬，那時連老演員夥計都只拿半分賬，我實際上一分錢也拿不到，都進了你的腰包。你剝削我，剝削演員們。我們練的都是高空節目，可有誰管你摔死不摔死？你們打人是明打暗打，打得我紫一塊、青一塊，抓住頭髮往地上碰！我不知挨了多少打！一家人的衣服叫我這個七歲的孩子洗。你的女兒生下來後，我洗片子、抱孩子、逗她玩。老板娘睡覺要我給她打扇，直到她睡著。我什麼事都要做，一不小心就要挨打挨揪。馬鞭、柴火、什麼東西都打到我頭上。有時我睡著了，你們把我從夢中打醒。你們悶著門打，我怎麼喊叫，你們都不住手，我的親爸爸聽到我哭叫，不敢做聲，只是暗地裡流淚。（自從）賣到你家，爸爸在跟前都不敢喊。我只能等在路邊，眼看著挑著沉重的道具的爸爸，暗裡喊一聲：『爸爸』！爸爸也是受壓迫的，他那時也挨你們的打。

武漢解放時，我已成了個木頭人。你們還不斷迫害我，嚇唬我。冬天脫了棉衣打，棍子都不知打斷了多少根。打了以後，不准吃飯。我當時已知道反抗，但還不敢鬥爭。以後黨不斷給我啟發和教育，吸收我到青工組學習。你們罵我野了，不聽話了，不准我去。

我多少年勞動的錢都給他們剝削去了，供他們吃喝玩樂。他們每天早上給我五分錢，我捨不得用，積攢起來，有十幾塊錢，你們都硬刮走了（說是『借』）。有一次我從梯子上摔下來，鎖骨摔斷了，人昏死過去，結果只用草藥敷了一下，傷還沒好，又要我繼續演出。你們老板的心狠不狠！可是有人卻替老板說話，說老板『有善心』。

只有黨對我好。是黨和毛主席把我從苦海裡救出來，要不是解放，我這條命早被老板打死了，還能活到今天！我沒有什麼報答黨，只有好好練功，狠狠練功。後來我演出的《頂碗》受歡迎了，到處演出，你們就收買我，想讓我做你們一輩子的搖錢樹，成為你們向黨討價還價的本錢，你們的算盤打錯了，你們用錢收買我，可是，黨啟發我的階級覺悟，使我漸漸知道這個『家庭』不能歛了。我不能聽你們的話，我要做社會主義的接班人，不做資本主義的接班人。我和你們這個『家庭』劃清了界線，一九五六年，我們斷絕了經濟關係，到一九五八年我才真正走出來。臨走時，你們還要我『莫忘了我們』，說『你的翅膀硬了要飛』，罵我是『忘恩負義』的『白眼狼』。你們越罵，我越要跟黨走。你們越罵，我越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她在發言結束的時候，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把雜技團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搞好，你們把水搞渾了，我們不怕。我們要抓住這場階級鬥爭，把一切冒充左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牛鬼蛇神打倒……沒有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一切！不解放哪有今天？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是同志們幫助的。你們要把我一棍子打死，這辦不到！』

在筆者和報社編輯部的人員讀完這篇《發言》後，認為，雖然夏菊花有的意見和用語顯得略為偏激，但總體上是很不錯的，感情真實，對黨和毛主席及無產階級感情深厚。於是在徵得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同意後，決定在報紙上發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在夏《發言》見

報時，編輯部加了按語，強調「每個領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工作人員要徹底地信任群眾，依靠群眾，要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再當群眾的先生；要堅定地依靠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放手地發動群眾。」

夏菊花的《發言》發表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廣播了三天，許多報紙和省市電台轉載轉播，社會上反映熱烈。其後，光明日報社內外沒有任何人提出過任何異議。一九六七年初，隨著紅學家李某「揭發」我的大字報的出籠，光明日報社的造反派很快就串通了武漢地區的造反派攻擊夏菊花的這個發言，他們口口聲聲叫嚷這是「大毒草」。在他們散發的傳單上印有：「穆欣夥同王任重，拋出了王任重精心炮製的夏菊花《發言》，冠以《站穩立場，辨明風向，頂住逆流，堅持鬥爭》的通欄大標題，加了《編者按》，極其突出地發表在第一版上，搶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十六條》公佈之先，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穆欣頑固地堅持把夏菊花的《發言》放在一版，以整版篇幅刊出，竟將全軍熱烈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誓把我軍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這條極其重要的新聞擠到了第二版。以這樣重要的地位發表個人的發言，在《光明日報》是空前的。」

就自己的辦報思想來說，十分反對形式主義和一窩蜂的做法，如同不想天天刊登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一樣。這裡，我同樣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即沒有意識到當時在社會上已沉浸在一種失常的狂熱的氣氛中，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正走向『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的頂峰。

造反派還撰文連篇累牘地散佈說：『王任重精心炮製的《夏菊花同志在幫助武漢市雜技團四清工作隊整風會議上的發言》，得到了大小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讚賞……王任重和穆欣親自為它修改審

定了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編者按。陶鑄親自批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播三天。……

造反派逼我說出刊登《發言》的『目的』和『動機』，還逼問交待和王任重的『黑關係』。我清楚，他們這樣做，無非是將我與已被打倒的王任重掛起鉤來，以便進一步對我羅織罪名，最終奪取報社的大權。僅就此事，他們對筆者連續圍攻數日。對於造反派們逼問，我始終不承認《發言》是毒草，也決不給他們提供再去攻擊王任重和中共湖北省委、武漢市委的『子彈』。

報社造反派見我仍無『悔改』之意，就從武漢邀請『外援』，通過他們一再脅迫筆者『在《光明日報》上點名批判王任重、湖北省委、武漢市委』。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於一九六六年八月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第十一條規定：『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王任重是候補中央委員，又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二書記。要在報上點他的名，一是本報社根本無此權力，二是還無這樣的先例。當時雖然有許多黨政領導被江青一夥『打倒』了，也在各派的小報上點名批判，卻都未在中央各大報上公開點名，現在何況是要對中共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兩級黨的組織點名，我堅決頂住，始終不肯點名。我知道，這是他們給我下的圈套，其目的無非是想『一箭三鵰』；讓筆者違反《十六條》，逼使報社犯嚴重錯誤，這樣，既可實現他們『搞臭』王任重和省、市委的目的，還可乘機奪權。

造反派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開始對我實行的『馬拉松』圍攻和批鬥已延續了近一個月之久。二月十三日，造反派要我寫書面檢查，我當場表示『同意』，我想藉此早點結束這場鬧劇。

我的檢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發表夏菊花的發言，是在我收到小組發給我的《文化革命動態》後送報社文藝部改編成文章，不是王任重推薦的。發表前曾把樣子送給王任重看過。發表這篇東西，主要是因為報刊上一向宣傳夏菊花是一個先進人物。當時對夏菊花和武漢雜技團的情況不了解。對湖北省委王任重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更不了解，只是相信了這個發言的內容，作為一篇不錯的發言介紹給讀者，沒有其他目的。

對於這樣一個不足二百字的『檢討』，造反派們自然是極不滿意的。

四天以後，即二月十七日凌晨，陳伯達『指示』：『從今天開始不要再揪鬥穆欣了。』報社造反派無可奈何，只好偃旗息鼓，而武漢來的造反派也只能打道回府。這場鬧劇也就收場了。

沒想到，時隔半年後的八月間，報社『造反總部』又串通武漢造反派捲土重來。不過，細細一想，這是必然的。林彪、江青一夥製造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全國陷入空前混亂的狀態，各地普遍出現打、砸、搶、抄、抓的歪風，林彪、江青挑起的武鬥達到駭人的規模。加上，筆者這時也因轉送有關揭發葉群反動歷史問題的材料，江青逼我回報社『接受群眾批評』。光明日報社『造反總部』窺測風向，認為混水摸魚的時機又一次到來，就再次向武漢造反派『戰友』求援：與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這個『造反總部』在其出版的造反小報《光明戰報》上公開表示：『在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向王任重、陳再道之流發動總攻擊的關鍵時刻』，『我們誓與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緊密地戰鬥在一起，在徹底粉碎王任重、陳再道之流的反革命復辟的偉大

戰役中，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同時，我們嚴正警告穆欣：必須正視你的問題，徹底向革命群眾檢查交代；革命群眾對你的等待和幫助已經長達一年了，已經仁至義盡了。如果你仍然頑固堅持錯誤，決不會有好結果！」九月三日，武漢文藝司雜技團造反派印傳單，質問我「一百多字的東西，叫做檢查交待嗎？」『你將《發言》介紹給讀者，想到什麼作用……』等等，把我在報社十年間的工作和《光明日報》說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不過，這次他們要『打倒』的，除了王任重以外，還加上了一個陳再道，以示『緊跟』形勢，『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林彪、江青。

光明日報社『造反總部』與武漢造反派相互勾結，在對我進行殘酷鬥爭的同時，還處心積慮地迫害夏菊花。他們散發大批傳單，捏造夏的『罪行』，甚至盜用別的造反派組織的名義發表低級、無恥，充滿謾罵的文章。譬如《看！王任重、穆欣吹捧的夏菊花是個什麼東西？》，他們採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造謠中傷等等卑劣手法，全面否定夏菊花。在這篇洋洋萬言的長文中，竟把夏菊花馳名中外的絕技《頂碗》、《柔術咬花》說成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煙』，是剝削階級用來填補心靈空虛的『麻醉劑』，是為中外資產階級服務的『文藝糟粕』。更有甚者，他們把夏菊花為國所爭得的榮譽顛倒黑白地說成是『無產階級敵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反動派對她的讚揚』。為了打倒一個人，他們已喪失了判斷是非的最起碼的能力！想當初，不正是報社『造反派總部』中的一些人在大力讚揚夏菊花『對毛主席和新社會無限熱愛』嗎？！

更加蠻橫無理的是：這班造反派用江青炮製的『樣板戲』的『標準』來檢驗夏菊花的雜技表演技法。胡說什麼：『當江青同志抓京劇改革展開以後，夏菊花還在舞台上表演已被京劇改革拋棄的程式

——蘭花手和走碎步，甚至在舞台上使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透明披紗』。可見，這夥造反派，在迫害無辜時也決不忽視任何一個效忠江青的機會。

令人欣慰的是，在八月掀起的這場批鬥中，出現了兩個聲音。一個聲音來自報社『造反總部』和他的戰友『人大三紅』，另一個來自報社的『革聯』和武漢的一部分造反派。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這兩個聲音截然相反，針鋒相對。如前者誣蔑筆者『勾結王任重吹捧夏菊花罪責難逃』，後者立即著文反駁，斥責他們是『離奇的邏輯，惡毒的陷害』，同時以擺事實、講道理駁斥說：『夏菊花的《發言》是去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發表的，王任重是在去年九月以後被揪出來的，夏菊花擔任『百萬雄師』的頭頭則是今年五月的事。『總部』怎麼能脫離當時的具體環境和條件，來指責穆欣同志是什麼『勾結王任重』、『吹捧百萬雄師壞頭頭夏菊花』呢？『總部』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某種目的，這樣形而上學地『解釋』問題，是反歷史的，因而必然自我矛盾。人們記得，去年八月夏菊花文章發表後，『總部』中不也有人『讚揚』它是『好文章』嗎？直到今年一、二月間，和『總部』並肩戰鬥的『人大三紅』《紅衛戰士》等散發的材料，不是還認為夏菊花『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社會無限熱愛』嗎？如果有人今天指責他們『吹捧百萬雄師壞頭頭夏菊花』，難道不是惡意的造謠中傷嗎？』反駁文章還指出『「總部」顛倒歷史的事實豈止這一樁。例如，他們最近散發的傳單造謠說：『穆欣吹捧百萬雄師壞頭頭夏菊花』，這也未免過於離奇。《光明日報》發表夏菊花文章是去年八月初，那時，武漢根本沒有一『百萬雄師』，夏菊花也不能預任這個組織的『頭頭』，那麼穆欣同志當時又怎麼能預先『吹捧百萬雄師頭頭夏菊花』呢？』

與此同時，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發表了一份《聲明》，揭露光明日報社『造反總部』夥同武漢造反派欺世盜名的卑劣行徑。《聲明》指出：

今年七月底，我們發現北京街頭廣為流傳的一張傳單——《王任重、穆欣吹捧『百萬雄師』壞頭頭夏菊花，居心何在！》這張傳單的策劃者，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極其卑劣的手段，對穆欣同志進行政治陷害，並盜用我武漢鋼二司所屬戰鬥團名義。對此我們聲明：

一、傳單的炮製者把武漢大學鋼二司《破私立公》戰鬥團作為傳單的署名者之一，這完全是造謠。我們查實，這張傳單的出籠，該戰鬥團全然不知，因此這張傳單絲毫不能代表武漢鋼二司及其所屬任何一個組織。

二、武漢『百萬雄師』是今年五月才出現的，而傳單賴以存在的『事實』，卻是去年八月三日的的事情，並且傳單的炮製者把穆欣同志的名字寫在王任重和『百萬雄師』的壞頭頭夏菊花中間，足見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險惡。

三、八月十六日，《光明日報》革命造反總部用《光明戰報》的報頭和《人大三紅》出了一個聯合版，再次發表了這張傳單，我們警告傳單的炮製者：你們這樣利令智昏，任意盜用我武漢鋼二司所屬組織的名義，決不會有好下場！

對此，我們保留繼續發表聲明的權利。

當時正值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不久，在林彪、江青操縱、煽動下，全國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浪潮，局勢達到幾乎失控的地步。報社「造反派總部」和其武漢的「戰友」們有點得意忘形，認為大局已定，他們取得了「徹底勝利」，竟然撰文狂言，說：「歷史是無情的，歷史已經作出了結論。一年多來的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一小撮走資派的失敗，宣告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夏菊花的新舊主子陶鑄、王任重、陳再道、穆欣，一個個都被揪出來了，倒台了！夏菊花這個修正主義文藝吹鼓手，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保皇派也暴露無遺了。」

這班狂妄的野心家，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點。與這夥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造反派的「預言」相反，歷史的走向並未聽從他們的指揮，他們，連同他們所依靠的後台林彪、江青一夥一起，終被歷史巨輪壓得粉碎。

五、《李慧娘》冤案始末

孟超曾以「二十年代「太陽社」的詩人和三十年代「左聯」作家」稱著於中國的文藝界。只因新編一齣昆曲《李慧娘》，就被康生、江青用『叛徒』、『大毒草』的大棍子整整『打』了十三年，最終，孟氏夫婦倆均含恨而死，全家遭到株連，落了個家破人亡。《李慧娘》一劇的導演和主要演員、撰文讚揚過此劇的評論家也無不遭到牽連。由於筆者和孟超來往較多，加之《光明日報》經常發表他

的文章，也多次刊登過讚揚《李慧娘》的劇評，所以造反派也不會放過我和《光明日報》。

筆者認識孟超始於六十年代初期。其時他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常在北京的一些報刊發表文章。自《光明日報》一九五八年初創刊《東風》副刊後，孟超就是熱心支持《東風》的眾多作家中的一個，他經常為之撰寫文稿，還曾在《東風》上開設《掃邊劇談》專欄，連續發表談論戲劇的文章。

五十年代後期，孟超曾應北方昆曲劇院的約請，將《紅梅記》改編為《李慧娘》。《紅梅記》是明代戲曲作家周朝俊所作的傳奇劇本。寫的是南宋時書生裴禹同盧昭容相愛、受權奸賈似道迫害、歷經磨難終於結合的故事。劇中有賈似道侍妾李慧娘，因在西湖邂逅顧盼裴生而被賈似道殺害，進而裴禹險遭不測。慧娘鬼魂與裴生相會，救裴脫難，並與賈似道面辯，突出地表現了慧娘的復仇精神和反抗性格。從一九五九年冬天開始，孟超根據玉茗堂本《紅梅記》，同時廣泛搜集和研究了秦腔、川劇、梆子、京劇等有關的劇種和劇目，在此基礎上去蕪取精，將原有三十四場的《紅梅記》提煉為六場昆曲《李慧娘》。前後埋首書案一年，於一九六〇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改定後，一九六一年在《劇本》雜誌上發表，一九六二年五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改編本《李慧娘》集中刻畫南宋末年太學生裴禹和奸相賈似道的寵妾李慧娘之間離奇、悲壯、純潔的生死戀，突出反映了賈似道荒淫誤國以及人民對他的鬥爭。全劇敘述賈似道偕眾侍妾遊西湖，被裴禹等太學生撞見，當面痛斥其誤國害民的罪行。賈似道對裴禹恨之入骨，侍妾李慧娘見他英俊倜儻，不禁脫口稱讚。不料被賈似道聽到。賈怒不可遏，回府後，將李慧娘殺死，埋在後園紅梅閣畔；又將

裴禹騙入相府，關在紅梅閣裡，準備翌日將他殺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來到了紅梅閣與裴禹幽會，並救裴脫難。其後李慧娘與賈似道當堂辯論，痛斥奸相。經過改編，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這個美麗動人、愛憎分明、勇於伸張正義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奸相的禍國殃民。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間，《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劇院在北京正式公演，受到了觀眾的歡迎，博得了戲劇界、評論界人士的熱烈讚賞。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發表廖沫沙以繁星筆名寫的《有鬼無害論》，熱情地為《李慧娘》『作護法』，稱讚『是難得看到的一齣改編戲』；九月一日的《光明日報》發表兩篇評論，還刊登了陳邇冬讚揚演出的成功兩首詩。然而，廖沫沙的這篇富於創見、立論新穎的好文章和《李慧娘》一起惹來了一場災禍。

這齣戲的改編和演出，也曾得到過康生的支持和讚揚。孟超與康生的關係原是非同一般。孟超原名孟憲榮，一九〇二年出生於山東省諸城縣，而康生原名張宗可，於一八九八年生於諸城。張、孟兩家與臧、王兩戶齊列名於諸城四大地主（夥同康生製造《李慧娘》這樁冤案的江青，本名李雲鶴，也是諸城縣人）。康生同孟超不單是同鄉，而且還是親戚。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釣魚台八號樓召集幾家中央報刊和中央、北京市委宣傳部門負責人討論學術批判問題的會議上，曾經談到孟超。他說：『孟超是我的老同學，我和他在明星社同台演過話劇。兩家還是親戚，我姑母是他嫂嫂。我們一同去上海大學讀書，他進中文系，我在社會系。』四、一二後，他在上海滬西區委當過我的宣傳部部長。其後，他們有一批人組織太陽社，蔣光赤為首，還有阿英、陳波兒等。』實際上，康生同孟超的關係還不止如此，當時康生故意隱藏了某些重要情節——孟超的岳父趙孝愚是山東省安邱縣名門

望族，清末曾在北京任九門提督。康生由山東去上海時，曾在濟南得到過趙孝愚的資助。孟超和凌俊琪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結婚，是由康生、曹軼歐夫婦牽的線搭的橋。一九五六年，康生從山東調到北京不久，聽說孟超有個女兒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便通過副部長王甫與孟超的三女兒陸沅（孟博）取得了聯繫。第二年秋天，康生還請孟超、陸沅父女兩人到他家裡去做客。對孟超的經歷，康生是完全清楚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無可置疑的。

從一九五九年著手改編《李慧娘》的時候起，孟超曾多次向昆曲愛好者康生「討教」過，康生始終表現熱心，看過原稿，提過不少修改的意見；一九六〇年彩排的時候，康生專門趕到劇場，並建議把李慧娘所戴的藍色鬼穗子改為紅色；他還為劇本改寫台詞，如將李慧娘見裴禹痛斥賈似道而生敬意發出的疊句「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改成了「壯哉少年！美哉少年！」其後在中南海紫光閣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又指令《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然他就不看；一九六一年八月，這齣戲正式在北京長安戲院公演時，康生親自到場觀看，觀後深表滿意；演出後，他和到場觀看的許多文化界知名人士登台祝賀，並與孟超及全體演員合影留念（此合影照片在『文革』一開始，就被康生收回，並將孟超壓在臥室、辦公桌玻璃下的一張也拿走了）。公演後不久，康生還曾寫信給孟超，『祝賀該劇演出成功』，他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編導、音樂和表演外，還讚不絕口地說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齣戲』，稱讚孟超『這回做了一件好事』，指令『北昆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什麼現代戲』。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康生把這齣戲推薦給周恩來總理和董老（必武）觀看。康生知道筆者和孟超熟識，那天，他專門讓我用車陪孟超和扮演李慧娘的演員李淑君去釣魚台參加他在八號樓所設的

小宴。席間康生興致很高，對這齣戲讚賞有加。他說：《李慧娘》先有王昆俞來信稱讚，再是聽齊燕銘講，詞寫得好，比一般昆曲通俗。我看過後，覺得很好，所以向總理推薦。當晚，此劇即在釣魚台國賓館十七號樓小禮堂演出。總理和董老對此劇都很讚賞，熱情地鼓掌，並於演出結束時上台與演員握手道賀、合影。康生這時又對孟超和劇院導演、作曲、主要演員及北昆領導人進行了長談，再次對這齣戲作了全面肯定，讚揚它『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五年來搞得最好的一齣戲』。

其時康生不單支持《李慧娘》這齣戲，還熱衷於點看已經停演的一些傳統劇目。當時正是中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央領導人都在一心一意帶領人民共渡難關，康生卻把許多禁演的、宣揚封建迷信、色情淫穢的劇目『挖掘』出來。其中如《紅梅閣》、《盜魂靈》、《大劈棺》、《大五花洞》等，都是地地道道的鬼戲。很多演員不肯演這些下流淫穢戲，他親自『動員』她們登台。他藉口『京劇中的花旦戲實在太少』，特意在北京點演了一齣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錯》，並親自跑到後台鼓勵主角說：『你放手演，過去怎麼演的，現在還怎麼演，演全本的，出了問題算我的。』康生酷愛這些禁戲，反對京劇演現代戲，他曾對人說：『誰要馬連良（中國著名京劇大師）演現代戲，我開除他的黨籍。』一九六二年春，他在杭州陪江青時，以『中央首長』名義，依仗權勢，又點看了不少早已禁演或演員罷演的戲，如《虹霓關》、《打鸞駕》、《斬黃袍》、《戰太平》等。受其影響，上行下效，一時間，舞台上出現了《紡棉花》、《馬寡婦開店》等不堪入目的下流淫蕩戲。舞台上出現的這種混亂現象，正是康生『把糟粕當作精華』、盲目提倡『發掘傳統劇目』的結果。

不料，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康生『翻臉不認賬』，竟然夥同江青把昆曲《李慧娘》打成『大毒

草』，將孟超迫害致死，造成文藝界一樁罕見的冤案。在這整個過程中，康生始終扮演了卑鄙可恥的角色。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後，康生看到政治風向變了，立即揚帆轉彎。他搖身一變成了戲劇改革的先導，輪起板斧，對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和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圍剿，將許多優秀的電影和文藝作品打成『毒草』。

一九六二年夏，他在北戴河遇見孟超的女兒陸沅時，突然對她說：『告訴你爸爸，別光寫《李慧娘》，還得寫別的東西。』及至十中全會開幕前夕，康生又給孟超送來一個字條，上面寫著：『請轉告劇協同志，今後不要再演鬼戲了。』這張字條的內容迅速在文藝界傳開，大家都為孟超捏一把汗。深知康生為人的孟超，馬上意識到此公要變臉了，要洗刷他同大演鬼戲的干系，尤要抹掉他支持《李慧娘》的痕跡。果然，不出預料，從一九六三年初開始，《李慧娘》被宣佈禁演，打入冷宮，面孟超等人被逼寫了檢討書。但是，在這年八月十一日的一次會上，當提到《李慧娘》時，康生說：『周揚告訴我孟超寫了檢討，其實不一定要寫檢討。』（孟超也曾告訴筆者，康生當面也是這樣『寬慰』他的。）從此，《李慧娘》被打成毒草，主要理由有兩條，一是有鬼魂形象，是『鬼戲』，宣揚封建迷信；二是改編者企圖通過突出裴禹、李慧娘兩人的抗爭精神達到借古諷今、影射現實、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點了《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一來為演出『鬼戲』辯護。』這樣，就給《李慧娘》判了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六、七日，上海《文匯報》發

表了江青通過上海市委組織的、長達近兩萬字的文章《『有鬼無害』論》，對《李慧娘》和廖沫沙所寫《有鬼無害論》嚴厲批評，指責劇本和評論作者影射共產黨。由此進一步展開對『鬼戲』的批判高潮。

許多戲劇界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對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一切鬼戲是不認可的。他們尤其同情作者孟超。有的學者對《光明日報》記者說：『從藝術欣賞的角度來看，『鬼戲』中確有極為精彩的東西。』；『孟超改編的《李慧娘》並沒有創造一個新鬼，還是《紅梅記》裡的那個舊鬼，這樣改編是可以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有位北京讀者因反對批判《李慧娘》，寄給本報一首請轉給孟超的詩。詩曰：『鬼影婆娑鬼更香，人情足可傲荒唐。為文輕薄憑他去，醉步狂影李慧娘。』來信沒有署名，只在詩末自註：『今之妄評昆曲《李慧娘》，余不服，口占一絕，寄孟超先生指正。』

一九六四年夏，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康生、江青對《李慧娘》大張撻伐。康生把《李慧娘》當作『壞戲』的典型，號召繼續圍剿，嚴厲批判。他既批孟超，又批廖沫沙，說他們是『用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在此會的閉幕式上，康生竟聳人聽聞地指責『十五年來沒有寫出一個好劇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謝瑶環》這樣的壞劇本。』當時，他還故作姿態地質問在座的北京劇協的負責人：『為什麼會出現了牛鬼蛇神，出現了《李慧娘》這樣的鬼戲？』責令各地對此情況一定要作出『徹底檢查』。康生還慷慨激昂地批判：『《李慧娘》是代表著死亡了的階級的，李慧娘這個鬼說要報仇，向誰報仇？就是向共產黨報仇。』經他這麼一煽動，報刊對《李慧娘》的批判急劇升級，不再局限於『封建迷信』之類的學術問題，而上升到指責孟超是借助這個劇本、配

合反動勢力『向黨報仇』的政治問題了。

隨著『文革』風暴在華夏大地的颳起，《李慧娘》的作者、導演、編輯等人員，對此戲寫過、登載過讚揚文章的作者、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廖沫沙以及孟超的三代親屬，都無一例外地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孟超夫婦冤屈死去；導演白雲生和劇作者無一幸存；廖沫沙，加上所謂『三家村』的冤案，被折磨得九死一生；就連約請廖沫沙寫《有鬼無害論》這篇文章的《北京晚報》記者候琪也飽受牽連的苦難。

對孟、廖的圍剿自然不會放過《光明日報》和當時主持這張報紙工作的穆欣——筆者。報社的『造反總部』夥同由江青、戚本禹親自派駐《光明日報》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等造反派組織（蒯大富一派），極力追查我和孟超的『黑關係』。他們將孟超在《光明日報·東風》版上發表的十八篇文章，按時序、內容羅列成表，作為《穆欣勾結孟超在〈光明日報〉放毒賬單》對筆者進行審訊批鬥，並無中生有地造謠說：『在《李慧娘》受到批判以後，穆欣到四川飯店大宴孟超，為其壯膽壓驚』。

打從『文革』開始，康生、江青就對孟超這個諸城縣『老鄉』揪住不放。他們不單在精神上備加摧殘，在生活上也不給出路。孟超夫人凌俊琪因長期體弱多病，早已退休在家，全家老少幾口主要靠孟超的收入度日。他們每月只給孟很少的生活費，還扣掉一百元強迫他『交黨費』（把別人都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還要逼人『交黨費』——把交黨費當作『懲治』手段，實在是對黨的褻瀆）。和上交改編《李慧娘》所得的全部稿費。他們豺狼成性，還抄走了孟超最心愛的藏書和史料。

為了解脫強加在自己頭上的莫須有罪名，孟超把兩封康生寫給他讚揚《李慧娘》的信交給了逼他

『認罪』的中央專案組。因為，掌管他專案的人就是康生本人，所以，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康生為了賴賬滅口，竟將孟超定為『叛徒』。江青也親筆誣陷他『是一個重要叛徒，反革命分子』。

孟超面對權傾天下的康生和江青的聯手迫害，控訴無門，奇冤難申。他決心以死抗爭。他曾經服了毒，生命垂危，經家屬發現後急送醫院搶救。醫務人員問專案組的人：『這個人你們還要不要？』回答卻是『這是一個大叛徒，可不能讓他死了！』人被搶救過來了，可是心靈上的巨大創傷再也無法癒合。嚴酷的現實摧毀了孟超那顆老驥壯心，無情的折磨使他痛苦不堪，他在悲憤、屈辱、淒絕、惶惶不安之中渡過了生命的最後歲月。

在此期間，孟超的家人，不論是成年的還是幼年的第三代，都未能躲過這場劫難。孟超的夫人凌俊琪是湖南人，早年由表哥余立亞（革命烈士）帶到上海參加互濟會工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後的血腥日子裡，余立亞被國民黨槍殺。凌俊琪白色恐怖冒著危險，挺身而出，將烈士安葬。『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折磨，患了重病。被家人送到醫院後，卻先盤問是『什麼成分』？經其女婿方崇德氣憤地說明她『是烈屬』時，醫院才將她收下。因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病情迅速惡化，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病逝。凌俊琪病重期間，曾多次呼喚三女兒『陸沅』的名字。當時陸沅在吉林省白城子幹校被『群眾監督勞動』。家裡在一天內連發三封電報給陸沅，那裡專案組都沒有交給她看，只是把第一封電報『病危』的內容演譯為『病重』對她說；第二封『病危』電報，根本沒告訴她；待收到第三封『臨危』電報時，他們卻以『完了，你回去也沒用了』加以阻撓。

孟超共有五個女兒。除二女兒早歿外，大女兒在青島工作，其他三人原均在北京工作。三女兒陸

沅是一九四八年從華北局黨校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先後曾做過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的秘書、研究室研究員。文革初，她被中央專案組定成『三條黑線』上的人，即孟超黑線、劉仁黑線、安子文黑線。在康生捏造的安子文的所謂『特務電台發報案』中，陸沅被誣陷為『安子文特務系統香港與青島特務密線重要成員』。她從一九六七年的四月起就被隔離審查，蒙受了長達十二年的嚴酷迫害，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她才得以解脫。其間她雖沒有坐牢，但經常被關進秦城監獄受審訊遭逼供，在各種批鬥會議上對她拳打腳踢，揪頭髮，捺脖子，彎腰『請罪』，百般折磨。她的左耳被打致聾，始終沒有治癒。陸沅的丈夫丁克原在北京市做教育工作，『文革』一開始他就被揪鬥，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了寫著『孟超的女婿』的牌子。四女兒孟健原是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教師，因父親問題，被放逐到地方工廠當工人；孟健的丈夫方崇德原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被誣陷為『重要叛徒』。原在北京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兒孟偉，因書寫『毛主席萬歲』標語時，筆跡不甚端正，被誣陷為『反對毛主席』，加上父親的冤案，備受批判鬥爭。飛來橫禍，猝不及防。她的身心受到極大刺激，以致後來無法正常工作。

由於受外祖父冤案的株連，幾個第三代的孩子都被迫失學，致使這個幾代『書香之家』的後代不能上學讀書。雖然以後她們都奮發圖強，自學成才，在事業上各有成就，但再沒有一個人習文繼承『祖業』。

身體本就十分羸弱的孟超，在長期的重創下更是骨瘦形銷。一九六九年林彪『一號命令』後，已屆六十七歲高齡的孟超，被押送到湖北省咸寧縣文化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因他屬『隔離

反省』，別人都不能同他接觸。他在那裡孤單獨處，勞動繁重，苦不堪言。一九七〇年，一度讓他回到北京參加『批陳整風』運動，叫他揭發陳伯達。當時他的夫人凌俊琪正患重病住院，竟不許他到醫院探視。後經四女兒孟健出主意，他才得以偷著同患難與共四十二年的妻子見上最後一面。

一九七五年六月，中央專案組硬將孟超定為『叛徒』，開除黨籍。他們強迫他在這個結論上簽字，孟超嚴詞拒絕。孟超據實申訴，他們置之不理，從此他抑鬱成疾。這年秋天，孟超才重回北京。這時已家破人亡，只得與小女兒孟偉同住。終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含恨逝世。

那時距離『四人幫』垮台只有五個月了，他卻在黎明之前含冤而歿。賊子未滅，沉冤未雪，使他死不瞑目，聞知者無不為之悲憤痛惜。

直到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在孟超子女多次要求、催促下，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作出了《為孟超同志平反昭雪的決定》。《決定》在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之後寫道：

孟超同志早年參加革命，從事進步的文化活動，長期以來，在黨的領導下為黨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文學事業方面有一定貢獻。文化大革命期間把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誣蔑為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將孟超同志定為所謂『叛徒』，純屬『四人幫』及其顧問對孟超同志的政治陷害。現經國家出版局黨委批准，報中央組織部備案，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一九七五年六月給孟超同志所做的錯誤結論，推倒強加給孟超同

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孟超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黨籍，恢復名譽，恢復原級別待遇，並補開追悼會。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了孟超同志的追悼會。《李慧娘》也在一九八〇年二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重印發行（並且收進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悲劇集》），同時重新搬上舞台演出。

歷史是公正的，正義終會戰勝邪惡。這個時候，被康生、江青一夥顛倒了的歷史又重新顛倒過來，孟超連續遭受殘酷迫害十幾年的冤案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而康生，江青一夥則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第十三章

禍亂相繼，在劫難逃

一、短暫的『發配』

一九六六年二月間，正當我被江青趕回報社接受造反派揪鬥的時候，十七日凌晨，電話傳來了陳伯達『從今天開始不要再揪鬥穆欣了』的『指示』，二十一日，經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戚本禹到光明日報社講話後，我暫時得到了解脫。二十三日，我和報社編輯小組五位成員一起前去參加由中央文革小組新成立的宣傳組召開的會議。會議內容，一是宣佈宣傳組已成立，由王力任組長；二是部署當前報刊宣傳報道工作。二十八日，宣傳組再次召開會議，按照通知，我一人前往。會議結束後，我便

重回釣魚台住了下來。

在我回到釣魚台的當天，王力找我談話：「唐平鑄（原為《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還沒有「解放」，決定派你到《人民日報》去管版面。」當天晚上，我就到《人民日報》上班。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實說明，與其說給了我一份新「任務」，還不如說「發配」更為貼切。因為我剛去了兩天，唐平鑄就被宣佈「解放」，並很快回社工作。還有，在我來之前，張春橋已經從上海調來了一個人在人民日報社當總編室主任（此人就是後來的那個把「墨西哥」讀成「黑西哥」、「釣魚島」讀成「鉤魚島」而出了不少洋相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

當時，全國形勢波譎雲詭，瞬息萬變，我根本無法「管」《人民日報》的版面，也無法對版面安排提出什麼「高見」。因為張春橋、姚文元早已按插了「熱線」聯繫。凡是江青有什麼旨意，都務必要經這條「熱線」的當事人、《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魯瑛。那時，討論版面安排的會都由總編室召開，通常都在晚上，因此，我從《光明日報》辦完事後還得匆匆趕到人民日報社參加討論。具體負責《光明日報》編輯業務的組長楊瑞也來參加，以便根據這裡討論的精神來安排本報的版面。那時的報紙常遭受內外夾攻，上下掣肘，當時堅持工作的編輯人員，大多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儘量不要讓江青一夥找到岔子」的心態，已經談不上什麼積極進取的獨創精神了。日常剩餘時間很多，每天都在那裡度過一個漫漫的長夜，除了讀書，就是抄錄毛澤東著作。由於造反派胡亂抄家、搶檔案，泄露了許多黨和國家的機密，其中包括毛澤東未曾發表的內部報告、文章、書信、電報以及歷年各種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各個系統許多單位的造反派編印了各種版本的「毛澤東文集」，有的鉛印，有的

打印。當時就將其中自己過去未收藏的加以抄錄，匯集了多冊，至今還擠在我的書架上。

一九六七年五月，正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江青貪天之功，把多年來戲劇改革的成績竊為己有，自詡『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旗手』。鑑貌辨色的陳伯達、臧本禹等人投其所好，旋即掀起一場大樹特樹『旗手』權威的高潮。隨之，對江青阿諛奉承、大吹特吹的文章滿天飛。

《光明日報》也收到了不少這類的稿件。

一天，我看到《東風》定稿樣上有一篇署名李華嵐的散文詩《獻給披荊斬棘的人》。雖然通篇沒提江青的名字，但從文章的三個小題《英勇的號手》、《開路的先鋒》、《流動的哨兵》和言過其實、諛詞連篇的內容，一看就知道在吹捧江青。我既討厭這種阿諛奉承，也不願浪費版面去討好這位『旗手』；何況她根本不值得頌揚，所以用江青在某些場合故作姿態的『謙虛』——『不要宣傳我』為理由將此稿取消了；後來又有人把它拿上去，我又作了同樣處理。

當時所以這樣處置，主要還是因為江青這個人太『難侍候』。這個女人喜怒無常，出爾反爾，筆者深有領教。就在一個月以前的四月初，北京市中學紅代會（紅衛兵代表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江青到會講了話。新華社在報道這條消息時說到了『江青在會議上作了重要指示』。這條消息是經王力、關鋒審查以後發佈的。當天夜裡，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通宵接見四川省群眾代表。接見完時已是第二天清晨，我就沒有去人民日報社，和小組人員直接回了釣魚台。《人民日報》按照新華社報道的口徑，在刊出的標題上寫了江青『作了重要指示』（《光明日報》按慣例，標題是『作了

重要講話』)。江青見後，大發脾氣，說這個標題錯了，逼我就此寫了『書面檢查』。實際上因為當天晚上我通宵都和江青等人一起在人民大會堂，我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第二天的報道都沒過問。可見，江青如此胡攪蠻纏完全是故意吹毛求疵、假禍於人。所以在『檢討』中我只承認當夜未去《人民日報》是『失職』。但是她仍不依不饒，又指令王力、關鋒今後每天都要審查《人民日報》的大樣。《人民日報》的這個標題明明是根據新華社報道的提法，又是經王力、關鋒審查定的，這些江青是知道的，她對我揪住不放，到底是因為什麼？真的是因為《人民日報》標了『重要指示』發火，還是因為《光明日報》標了『重要講話』使她老羞成怒？我都不得其解。所以，在處理《獻給披荊斬棘的人》這篇文章時，我索性採取『惹不起，躲得起』的『謹慎』態度。

正如宿命論者說的那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那種年月，誰也難以預測自己的命運。我如此處理這篇吹捧『旗手』的文章原為避災免禍，誰知卻又成了一樁『罪案』。當時就有人向江青告密，在我『辱罵江青是神經病』的『罪行』上又加上了一條『反對旗手』的罪名。事隔不久，在我被江青夥同林彪、葉群之流下令抓起來以後，報社《造反總部》和『蒯司令』的屬下又對我開展了新一輪的批判。他們對被我二度壓下的那篇吹捧文章大加讚賞，說『《獻給披荊斬棘的人》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詩，它以純樸而飽滿的熱情，由衷地歌頌了文化大革命的開路先鋒——江青同志，它表達了千千萬萬工農兵和革命小將對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的崇高敬意。』『但是，就是這樣一篇很好的散文詩，卻被光明日報社頭號走資派活活地扼殺了……』

使我感到高興的是，不管江青之流如何惱怒、嚎叫，在我被抓以前，《光明日報》始終沒有被這

類無恥吹捧的文章玷污。

自我二月回釣魚台後，江青不再讓我參與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工作，這樣，我既不參加小組會議，也沒有文件可看。在那個時候，這樣的處置通常標誌著一個人行將失去有關頭銜的前奏。不過，到我被關進監牢之前，仍還掛有這個小組『成員』的頭銜。每當小組對外活動，如接見紅衛兵、造反派及群眾組織代表，召開省、市負責人解決問題的會議，照例通知我與其他成員一起前往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和毛澤東《文藝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紀念大會等重要活動，也仍讓我和小組成員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及見報。江青一夥為什麼這樣安排，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在這期間，我還參加了一些外事活動。因為當時中國記者協會的領導人都已『靠邊站』，沒法露面，所以，五月中旬，我被臨時指定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任名義接待以小林雄一（日本記者同盟議長）為團長的日本記者同盟代表團，並率領中國記協代表團和他們進行了一次友好談判，雙方簽署了一項盛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共同聲明。

『文革』時期，由於林彪、江青一夥在對外關係上推行極『左』路線，造成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中國對外的交往，除了與阿爾巴尼亞等少數國家外，大都陷於停頓狀態；所以中央對這次來華訪問的日本記者代表團特別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了代表團的正副團長。

在這次陪同周總理接見日本記者代表團的時候，總理對我當時的艱難處境表示十分關切，他再次鼓勵我要辦好報，我銘感難忘。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月的這段時期，壓在我心頭的痛苦深沉萬分，但又不能隨便向人傾吐，包

括家人在內。思想上累積了許多無法理解的問題。我常自言自語地說：『眼前不止十萬個為什麼？卻沒有一個能回答！』

一天，唐平鑄在閒談時對我說：『有些同志在議論，最好讓我們兩個對調一下，你來《人民日報》，我去《光明日報》』。看他說話的神情，似乎還頗在意這些議論。我就笑著說：『都到了什麼時候啦，還管這些事情幹啥？』實際上：此時，不論我和他，『在劫難逃』的惡運已經迫在眉睫了。

二、兩次被綁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江青指派王力、關鋒通知我，要我離開釣魚台回報社去『參加運動』。在我通知我之前，聶元梓、蒯大富等已經奉旨去了光明日報社再次貼了我的大字報。我十分清楚，這是趕我回報社的前奏曲，這次離開釣魚台，必然是在劫難逃了！因考慮到自己手上有不少文件、信件和十多年來的百多本筆記本，如果把它們留在家裡，很可能被抄家流散出去，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我將這些東西拿到了釣魚台作了清理，留下的也作了較妥善的安排（如果沒有這些材料，這本回憶錄也就無從動筆了）。因此，我在釣魚台多留住了十天，直到江青再次催促，我於八月十六日離開了那裡。

這時正處在『幾乎失控的三個月』時期，中國的局勢已經陷入極度混亂狀態，中央只有緊急地採取斷然措施，才能扼制這種已經難以收拾的局面繼續惡化。

當時的形勢瞬息萬變。在我離開釣魚台不久的八月三十日夜間，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釣魚台宣佈了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

翌日，北京大學生造反派『五大領袖』在得知王、關事發後，就乘機大搞打、砸、搶、抓。八月三十一日黃昏，蒯大富、聶元梓從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調遣了大批紅衛兵衝擊光明日報社，搶走報社的人事檔案，綁架報社總編室幹部韓嗣儀，並和報社『造反總部』聯手宣佈『革聯』（報社的另一派組織）為『保守組織』。他們大打出手的野蠻行徑激起了報社許多職工的憤慨。在手無寸鐵的劣勢下，報社職工奮起抵制，開展了一場用消防設備進行搏鬥的水戰。紅衛兵『小將』人多勢眾，『敢拚敢打』，當即將報社的許多職工打成重傷，其中也有我妻子張卉中。

從前門衝進來的紅衛兵剛『勝利』撤走，後門又湧進了一批由大卡車送來的、頭戴安全帽、手持大木棒、口口聲聲『要把穆欣交出來』的一隊彪悍打手。在場的不少職工勸我『趕快轉移』。『轉移到哪裡去呵？躲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最後如何收場？』『我要是一旦躲起來，就會釀成一樁不大不小的事件，造反派必然傾巢出動追索，會給同情我的人惹上極大的麻煩……』想到這裡，我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我拿定主意後，就隨同一些人回到報社宿舍——四單元二樓東頭。還沒有等我進家門，一些回報社參加運動的駐外地記者把我擁到了他們的宿舍內——一間位於一樓東頭、正好在我家書房下面的房間。

這幫打手沒有找到我，就把持報社後門不走（與宿舍樓毗鄰）。他們看到從醫院治療回來的張卉中，就向她撲去，用木棒打她，她當場休克。

當天晚上，我就在一樓東頭靠邊的那個房間休息。院裡院外一直吵吵嚷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聾。我無法入睡，就同何熔、王文厚、蘇晨等幾位從外地回來的記者聊天，觀察動靜。住在一樓、二樓的另幾位記者，曉得我在這裡，也關切地跑來坐一會兒。從我停留的房間的東窗，可以看到那些近在咫尺的、報社造反派從體育學院招來的一夥大漢，人頂著人往上爬，鑽進我書房裡去砸、搶。我的許多珍貴藏書就這樣遭到損壞。

第二天中午，報社造反派中那個擅於附臆逐腥的老報人已偵查到我在这个地方。我回到二樓家裡，他們已從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紅旗文藝兵團』招來一批打手。這些人衝上二樓，連拉帶扯把我拖下樓去。報社辦公樓、宿舍樓和四周居民樓上，人們驚異地觀看這場白晝進行的綁架。我被拖上一輛汽車，前座坐的是他們造反派中以『戲劇評論家』自詡的小頭頭，他怕被別人認出，用大草帽遮著臉。汽車馳上三環路後，繞了很大的圈，才到達中央戲劇學院教職員宿舍區。我被拖進這位『戲劇評論家』宿舍後，他和妻子、老娘就動手翻我衣服上的所有口袋，我的手表、鈔票和一些糧票即被搜去。他們一家像慶功似的關住房門大吃大喝，把我鎖在廁所裡邊兩三個鐘頭。直等喝足吃飽之後，他們又把我拖進車子，並且蒙上眼睛，繞經幾處地方，最後在一個學校的大院裡停下來。我即被關進這所學校的一個空教室裡，門外有人看管。

我在這間教室裡熬至將近午夜，有個戴紅衛兵袖標的男造反派打開房門進來，引我去到旁邊樓上一間小房裡。雖在夜間，我的眼睛仍被黑布蒙著，進屋後才挪開黑布。當他回身關門時，我看到門後張貼的一張教學圖表上寫有『北京航空學院某教研室』字樣，才知到了北航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的大本

營。屋裡先已有個女造反派等候。他們兩個待我坐定，就開始向我問話。他們圍繞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向我提出一連串問題。看神情，他們已經知道釣魚台發生了事情（就是八月三十日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事），但又不知其詳，急於從我身上探聽『內幕』，反覆詢問知不知道八月三十日的『重大事件』？同時三番五次地追問所謂『同林傑是什麼關係』……等等。我當時心裡充滿憤怒，不願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只說『不清楚』，『不知道』，惹得那兩個審問者大動肝火。正當他們發火追逼的時刻，室內電話鈴突然響了，女的站起去接電話。聽不清電話裡說些什麼，傳出來的聲音比較急促，女的連聲回答『是！是！』臉上現出惶恐的神色。男的忙到電話機前側耳諦聽。不大工夫，女的放下電話，同男的低聲嘀咕了一聲什麼，就轉身對我說：『我們有事，你先回去等著。』男的重又給我蒙上眼睛，拖我回到原來停留的教室，急急地鎖上門走了。

我一人在他們私設的『單人囚室』又獄了好一會時間。突然，從樓道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接著是開門聲。有人進來了，其中一人把一頂用厚牛皮紙糊成的圓紙筒套在了我頭上蓋住了雙眼，接著就把我拖上停在外面的車輛上。除了司機，車上還有三個男造反派。車走了約摸半個多小時，就停了下來。坐在我右側的那個人將我拉出車門，說：『往前直走，不許回頭看！』他們大聲嚷著上了車，車一下子開走了。我原來腳上的那雙圓口布鞋早已在被綁架初時甩掉了，只穿著薄薄的尼龍絲襪。雙腳剛著地，我感到地面潮濕、冰涼，但較鬆軟，很像沙灘地。我擔心前面是河，就把頭上的紙筒取下來，一看，原來我在宣武門外一個公共汽車總站的大院裡，這裡滿院停著大客車。

東方的天空已開始魚肚泛白，早起的人們已經在街上活動。我幾乎是光著腳走在回報社的路上。

經過一家已開門營業的早點鋪，熱氣騰騰的油條、豆漿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香味。這時我才想起自己從昨天午飯後至今還未進過食，飢腸轆轆、雙腳發軟，往口袋裡一摸，已空空如也，我不但沒錢吃早點，也沒錢坐車回家。我便以步代車，沿著護城河邊的路往東走去，繞經琉璃廠才回到了報社。

我走進了報社大院，瞥見辦公樓夜班室的燈光還亮著。正巧，一位報社的造反派看見了我，他像見到鬼魂似地驚愕了一會，便急忙追了上來，從通向宿舍小院的後門口望著我走進報社宿舍四單元的樓門。

我一回到家裡，鄰居和家人及地方記者喜出望外地向我圍了過來，詢問我被綁架後的經過。這時我才得知我被釋放的原因。原來報社印廠工人王玉榮看我被綁架後，打聽到當晚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大專院校學生代表的消息，於是寫了一張關於我被綁架和報社被砸搶的字條，在晚上送交給了周總理。總理一看字條，就馬上當著江青的面嚴厲地說：『你們哪個學校抓的？馬上放穆欣回去辦報！』這樣，北航造反派頭頭才不得不打電話讓正在審訊我的打手放我。

我深深感激周總理的關切，感到應將自己被綁架情況告訴總理，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全信如下：

總理：

我昨天下午二時被中央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抓去，今晨五時半已回到報社。昨天下午轉了幾個地方，最後一個地方是北航。每次轉移途中及室內行動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不談話。午夜前後，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談話，他們提出的主要有這

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問我從小組回報社時誰同我談的話。

『你是五一六兵團的後台。』

『你曉得八月三十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麼？你從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一日到什麼地方開過會？見過什麼人？同什麼人打過電話？』

『你同紅旗雜誌什麼人聯繫？你同林傑是什麼關係？』

我講到二月間開鋒、本禹同志對光明日報有過評價時，他們說：『今年二月，林傑那時還是左派呢！去年六月劉少奇還是主席呢！』

『你同吳傳啟什麼關係？』

對這些問題，我作了簡單的回答，他們很不滿意，對我說了許多威脅的話，談了十幾分鐘，便把我送回關押的小屋。

今晨四時左右，他們蒙住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門外，急速把車開走。

因為昨天報社有人向您報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關注，特把經過簡報如上。感謝黨的關懷。

穆欣

九月二日

總理收到我的信後，當天就在信上批示：

即送伯達、康生、江青、富治、春橋、文元、本禹傳閱，請富治同志查明此事。對中央戲劇學院、北航等校在查明此事經過後，必須申明在六·六通告後，仍然發生這類綁架事件，絕不容許，應寫出公開認錯書。如拒不認錯，即將通報全國。

周恩來

九月二日

但是，周總理的批示並未能產生應有的效果。江青一夥一手遮天，他們處處和總理作對，根本不把他的指示放在眼裡。九月五日夜間，在再次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代表的會上，江青竟當著周總理的面點我的名，誣陷我是『特務』。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和康生等到處點名誣陷幹部。他們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實證據，隨心所欲，血口噴人。他們不論在什麼場合點了誰的名，誰就馬上陷入災難。一九六六年秋，江青在廣播事業局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丁萊夫不是好人！』該局黨委書記丁萊夫就立即被『打倒』；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有一次接見內蒙古代表時說：『我不認識王逸倫，但是在一次自治區黨委會議上，我一看就覺得這個人根本不是共產黨，他的一些表現，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態，總覺得這個人像個特務。』隨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逸倫就被投入監牢關押了六年。僅從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

九七〇年二月的部分講話中，直接點名誣陷的幹部就有一百七十二人，其中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二十八人（康生直接點名誣害的人就更多了）。

就在九月五日夜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當眾點了我的名之後，九月六日凌晨二時許，北京鐵道學院『紅旗』造反派的一些人來到光明日報社，又將我從辦公室綁架走。這是我第二次被綁架。七日上午，他們私設公堂對我逼供，說我是『五一六後台』，是挑起北京兩大派鬥爭的『黑手』，是參與整周恩來總理『黑材料』的幹將，是和蕭華、潘梓年勾結的『反黨集團』成員，是『特務』。他們同第一次綁架我的造反派一樣，急於要我說出有關中央文革小組的內情。對於他們提出的種種問題，我一律拒絕回答。我對他們說：『你們要我回答這些問題，須讓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親自給我打電話，同意對你們說才可以說。』他們一無所獲，暴跳如雷，但又無可奈何。

接著，他們將我拖上大卡車上街示眾（『文革』中稱遊街）和拉回報社批鬥，然後報社『造反總部』將我關押在辦公樓七層的一間房內，直至北京衛戍區來人將我押走。

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江青早已夥同謝富治下令：限於當晚七時將穆欣送往北京衛戍區。

二、『繡樓』囚室遐思

九月七日黃昏時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的一輛吉普車在光明日報社辦公樓前停下。從車上下來兩

個軍官，將我押上車後，他倆一左一右地挾著我坐在後座。很快車開到了衛戍區司令部大院。我先被帶進一間會議室，那裡已有兩個軍官等候，他們沒有講為何要把我弄到這個地方來，我自然也不必再問。在他們說了幾句閒話後，那位把我從報社押來的軍官將我引到了一個位於在稱作『繡樓』東北角底層的房間內。路上，此人作了自我介紹說，他叫『李作陪』，還逐字說明是哪兩個字。不論是真是假，此時此刻聽來，頗覺『意味深長』。大約已有不少像我這樣『在劫難逃』的人，都是由他『作陪』來到這裡『作客』的。現在，他『陪』我走進了這座大宅深院，意味著我將失去自由。

那時，衛戍區司令部用的大院是清朝的慶王府舊址，由很多小四合院構成。建國後雖然經過幾番『改造』，依舊保持著其古色古香的風貌。禁閉我的『繡樓』共有兩層，坐北朝南，西側還有幾間廂房。院裡住的人不多，還算清靜。我弄不清這裡是他們辦公的地方，還是招待所。派來監視我的哨兵並非堵在門口，而是站在比較遠的地方。看來，在這個小院裡面我算是被『優待』的，因為不論前去院外入廁，還在院中走走，都未有過干預。但因心情不好，我也不願多在院子裡走動。在這裡雖然住了三個來月，但『繡樓』和周圍的景色並未給我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

這時雖近中秋，暑氣尚未全消，晨晚比較涼爽。從學生時代起，我一直沒有午睡習慣，所以覺得這裡的日子越發顯得漫長。整天坐在四壁之中，心潮澎湃，思緒萬千，難以平靜下來。我從個人一貫對黨和毛澤東的信念、日常的工作想到現實的遭遇，從『文革』開始後眼皮底下所發生的種種怪現象到國家的命運、前途，我有著一連串無能自解的問號。

當時思想上對毛澤東是崇拜的，但也崇敬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我不贊成唯成分論，但也

主張用人需要考察他的出身、思想、經歷和表現。而在當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泛濫，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受到衝擊，『炮轟』、『火燒』，沒完沒了。康生曾傳達過：毛澤東在杭州提出，這次運動實行『層層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經過一年多的折騰，全國黨、政、軍領導幹部差不多都『剝』光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十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劉、鄧、陶，有過半數遭到衝擊；人民解放軍的十大元帥，除已逝世的羅榮桓，全都受到衝擊以至嚴酷的揪鬥，只剩那個被推崇為『副統帥』的『親密戰友』林彪『天馬行空』，獨步青雲。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十二名書記、三名候補書記。五月間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陸、羅、楊被撤銷了書記或候補書記職務；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周、朱、陳四位『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不再提及了，總書記鄧小平不管事了，五月二十三日新增補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被『打倒』；葉劍英、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和候補書記劉瀾濤、胡喬木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或者已被『打倒』，或者正遭『火燒』，或者實際上已經『靠邊』；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新補選的書記劉寧一，也只在接待外賓時有『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這樣，中央書記處的十五名書記，就只剩下康生、謝富治在台上。江青早就常說：『我們小組就是常委的秘書班子。』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令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致上海一些群眾組織的一封賀電上添加『中央文革小組』的署名，又在一次中央常委擴大會上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實際上，中央書記處早已名存實亡。而在『二月抗爭』被林彪、江青一夥誣為『二月逆流』以後，中央政治局也被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了。各大區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及地委、縣委書記，也幾乎全部被打倒、

遭揪鬥，各級黨的組織、政府機構陷於全面癱瘓，整個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這是叫人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假如我們的元帥、高級將領都是林彪、江青一夥誣蔑的『大軍閥』、『大土匪』、『裡通外國』者，黨的領導人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那麼革命戰爭怎能取得勝利？三座大山怎能推倒？江青一夥把中國共產黨糟蹋成這個樣子，還怎麼能稱得上『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這時，我就想起陳毅講過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在眾老師和副總理『大鬧懷仁堂』四小時後，陳毅在中南海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所作的長達七小時的講話中曾經憤慨激昂地指出：『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著別人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下來，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衝。』『劉少奇的一百條罪狀貼在王府井，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報告是政治局通過的嘛！怎麼叫他一個人負責？！』『朱總司令是軍閥，賀龍成了大土匪，這不是給我們黨抹黑嘛！人家會罵共產黨連八十歲的老人都不容，過河折橋……』『現在胡說八道的東西太多！我看到一張紅衛兵小報，大標題是：打倒大特務楊尚昆之「弟」楊尚奎。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個四川人，一個江西老表，怎麼是兄弟呢？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胡說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這番震撼人心的言詞始終在我心頭激蕩！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是乾淨的；承蒙寬大，加上我們五個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只有這十一個人是乾淨的？！如果只有十一個乾淨的，我不願當這個乾淨的……把我揪出來示眾好了！我不願當這個乾淨！』

陳老總這一番出自肺腑的、正氣凜然的話，是令人深思的。

他們把黨抹黑了，把好人一個一個打倒了，扶植起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在他們重用的造反派大大小小的頭頭中，有許多人是社會渣滓，有不少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和真正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林彪、江青一夥，為實現篡黨奪權的目的，不擇手段，到處招降納叛，不管是些什麼樣的人物，只要對他們有用，都是來者不拒的。他們利用造反派，沒有階級界限，只要甘當馴服工具，他們就無條件地重用。這種實用主義的做法，自己思想上是非常抵觸的。雖然無力糾正，但也不願執行。當時總是受到『跟不上』的指責，原因就在這裡。

當時想得比較多的，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事。『文化大革命』起始成立的這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實在是黨的歷史上出現的畸形怪胎。這個小組到處煽風點火，在全國造成空前的全面內戰，在它內部也是硝煙瀰漫，爭鬥不已。它的權力越來越大，它的成員卻又越來越少。江青一夥也在這個小組內部實行『層層剝筍』政策，排除異己。採取各種卑鄙手段（有時明火執杖，有時暗放冷箭），把他們不滿意的成員一個個『剝』掉。一九六六年八月，首先被『剝』掉的是小組成員尹達，那時距離中央正式公佈這個小組成員名單的時間還不到三個月。接著『剝』掉的是副組長王任重。這個時候，由各中央局稍遲一些時間推派的小組成員郭影秋（華北）、鄭季翹（東北）、楊植霖（西北）、劉文珍（西南），只在小組初成立時參加過一、兩次會議，很早就被各地造反派揪鬥（在江青眼裡，實際是不把他們看成正式成員的）。轉過年來，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他們又打倒了顧問陶鑄與副組長劉志堅。我和謝鏜忠也被『剝』去。到了最後，被他們層層『剝』剩下的『精華』就是如同陳毅一針

見血所說的這幾種人了。在被『剝』下來的這些成員中，有的正渡日如年，有的已淒然九泉，而我也被『請』進了這座『繡樓』。

在『繡樓』中，獨居一室的我思若泉湧。我不清楚，這場從一開始就將中國鬧了個底朝天的『革命』究竟還要搞多久？老人家最初說『三個月見眉目，五個月見成果』，後來又說搞半年。可是時間一再拖，他原先的『打算』全已成了泡影。不久前，及至我被抓前的那一陣，他又說要搞三年，即『一年開張，二年見眉目，三年收尾』，為了表示他決心要堅持搞下去，甚至說出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的，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一類的話。

這場運動到底要持續多久？何時才能了結呢……

思潮滾滾，思緒萬千，我經常徹夜難眠。

在『繡樓』的獨來獨往生活，使我覺得『清閒』了許多。在近二個月『閉門思過』的日子裡，我基本與世隔絕。在這裡規定我不准與外界接觸，包括與家人的書信往來；不准讀書看報，除了『毛選』和『文革』小冊子。不過，因為『繡樓』北窗外的後院是衛戍區政治部的所在地，所以經常能從外面人談論或讀傳單中捕捉到一鱗半爪的有關運動的消息。

初來『繡樓』時，我曾給陳伯達、康生寫過一封信，想對於造反派向我潑來的污水，說明事實真相，還我自由。此信發出後，毫無反響，如同石沉大海。漸漸地，我也變得理智起來，也就抱著順其自然的想法不再做無用之功。當時我似乎曾有過預感，覺得雖然江青、陳伯達等人野心雖大，但難成什麼氣候，何況我親耳聽到過毛澤東說『到後期再甄別』的話。所以儘管已成囚徒，我的心情倒反

而趨於平靜，不再有『惶惶不可終日』的那種沉重感。

四、原來又捅了毛家灣的馬蜂窩

自從住進衛戍區大院的『繡樓』，整整三個來月沒有人找我談過話，也沒宣佈過自己犯有什麼『罪』。我的『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這場官司如何打、如何了結？我心裡都沒有『數』。我只知道是江青一夥在迫害我，除此之外，我沒有往別的方面想自己是否還有什麼新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早晨八時，兩名衛戍區軍官來到我的住處，告知從當天起對我實行『監護』。為什麼要『監護』？『監護』是怎麼回事兒？宣佈這個命令之前，關在這裡的三個來月又算怎麼回事兒？他們沒講，我也不問，仍然是一筆糊塗賬。來的軍官傳達完『監護』的命令，就叫我準備立即『搬家』。『準備』是容易的，把幾本書一包，幾件雜物一收拾就完事了。當天上午，他們將我送往西郊公主墳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裡。這是吳法憲私設的一處秘密監獄，共有七八間平房。後來我才醒悟到，他們按照慣例，總是先把人關到這裡，作進監獄前的短暫『過渡』。這裡的監管辦法完全仿照其後被關的秦城監獄，監管人員也和秦城監獄一樣都是空軍官兵，包括囚室內的裝備也一樣：一張木板單人床和一副臥具。住進來後，晝夜都有一名士兵在室內監視（四個士兵交替輪換），士兵不帶武器，態度嚴肅，一臉鐵青，平時不與被看守的對象說一句話。每間房門上面有個『貓兒眼』，以便

從外面窺視室內動靜。廁所設在鄰室，進出都由士兵跟隨受『了一次淋浴，這是我失去自由一百天來的頭一次，也

初到這裡的頭兩周，仍然沒人過問我的事情。直到十堂』。在場的共有三人，一個是吳法憲的親信何汝珍，另一上來就正顏厲色地、如連珠炮似地問我『由杜保同經手是交給了蕭華？』『還送給了什麼人？』『當時我感到莫明其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使得他們這樣緊張害怕？我稍稍地回答同交來的材料都是分送毛澤東、周恩來和林彪以及中央文如何，我則難以記起。為免繼續糾纏，我乾脆統統回答『念念不忘』批判我為賀龍元帥、陳賡大將著書立傳的『罪行第二次，依然毫無結果，因為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他們如納悶，他們到底為什麼這樣逼我？杜保同曾經說過，他們況。既是這樣，這些『審判官』何急之有？以後才曉得，群反動政治歷史的那份『黑材料』的去向，他們最擔心的，周恩來的手裡了。

要講清楚這事的來龍去脈，還須從頭說起 一九六七年
業部設於內蒙呼和浩特市的一個研究院工作）交給了我《關於

況調查》報告。這是他所在的群眾組織『新紅聯』外調組剛從長沙回來整理而寫成的。我把這份材料帶回釣魚台，當即交收發室分送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及林彪等人。材料中涉及到在那個『青訓班』受過訓練、當時正在黨、政、軍領導機關任職的十多人的名單，其中一人叫『葉宜敬』（是葉群外面用的名字）。其實杜保同和所有參加調查的人員並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公事公辦，他們讓我轉上去，我就照轉了，這也是責無旁貸吧！事情過後，並未在我印象中留下什麼記憶。

沒想到，原在『青訓班』擔任教官的歐陽敏納，在向『新紅聯』外調組提供了上述材料之後，立即又向林彪通風報信，提醒林彪『注意』。葉群看了告密信後十分緊張，讓老公拿主意。林彪說：『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隨即親筆寫信給被人稱作『草包司令』、死心塌地效忠『林副統帥』的空軍司令吳法憲，要他迅速查清涉及此事的有關人員和『後台』。信的原文如錄：

吳法憲同志：

葉群同志的歷史情況，從延安整風起已多次查明，作過結論，無問題。現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對我。現在請你派人到長沙找寫信的，設法抓住這隻黑手，很可能從中發現重大的政治線索，也許可以破獲一系列的的重大問題。具體辦法，請酌定。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吳法憲一接到林彪這封信，就馬上把何汝珍等人召去說：現在我派一架專機，送你們到長沙去完成一項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政治任務。據可靠的報告，有人在長沙搜集葉群在『青訓班』的材料，凡是接觸過這個材料的人，都把他們抓回北京。

他們在追查中發現：筆者曾為杜保同轉送過這份材料，認為筆者是『黑手』。以後林彪就下令將我、杜保同、張卉中拘留審查。

十二月二日深夜，吳法憲盜用中央軍委名義，派出何汝珍等在北京紅星旅館將杜保同等綁架。其實，我在八月底和九月初兩次被綁架的情形，杜保同是知道的，但他缺乏經驗，繼續住在那裡。吳法憲遵照林彪的旨意，了解了他們調查葉群反動歷史的情況之後，就對杜保同和其他有關人員嚴密監視。吳法憲『放長線釣大魚』，故意讓他們繼續『活動』，以便搜集更多的『罪證』。杜保同被抓的第二天早晨，就對我的迫害升級，宣佈加以『監護』。

出獄後方才知道：原來我不單『得罪』了江青，還捅了毛家灣的馬蜂窩，惹惱了林彪和葉群。吳法憲在『調查』此案中，為了討好林彪，不惜製造偽證，給葉群塗脂抹粉，掩蓋她的反動歷史。一九六八年，吳法憲寫信給林彪，說：『為了徹底粉碎這幫壞蛋企圖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我派了四個同志，除了把長沙的幾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抓獲之外，也順便了解了葉群同志這段歷史情況。大量材料和事實證明，葉群同志的這段歷史，是清清楚楚的，是白璧無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學時，就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黨的教育較早，十六歲就入黨……』

葉群的歷史真的是『白璧無瑕』麼？那為什麼當時我弟弟託我轉送這份《關於蔣匪軍委第六部青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夥乘飛機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折戟沉沙。這是葉群的屍體

年戰地服務訓練班情況調查》、且裡面僅僅提到葉宜敬曾在這個訓練班裡受過訓，葉群如此驚恐不安，大動干戈？這足見她的心裡有鬼、歷史不乾淨；林彪如此下令嚴究，如此興師動眾，搞得受牽連的人家破人亡，這不更加說明葉群歷史上確有見不得人的東西亟須掩蓋！

這個夥同林彪、江青篡位奪權、罪行累累的葉群終於受到了黨紀國法的懲處，助紂虐的吳法憲也得到應有的報應。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已將『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特務、叛徒、賣國賊』和『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葉群永遠開除黨籍。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公訴人孫樹峰在《對被告人吳法憲所犯罪行》發言中揭露：『一九六七年十月，為了掩蓋葉群在國民黨青訓班的醜惡歷史，林彪親筆寫信指使

吳法憲組織假調查，製造偽證，美化葉群的歷史是「白璧無瑕」……

我在吳法憲私設的這座監獄裡被關了四十來天。在這裡，既不讓看報、聽廣播，也不讓看書寫字，自早到晚，我只能在森嚴的壁壘中一人默默地坐在床邊『納悶』。我被完全地封閉起來了。』

一九六八年初的一天，一個軍官對我說：『你怎麼還不寫信向江青同志請罪？』我聽了未作任何表示。我心想，都到這個地步了，還要我向江青請『罪』？我有什麼『罪』？有罪的是她！是她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於千百萬無辜的幹部和百姓！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沉冤八年

一、法西斯式的『審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早晨，兩個穿著空軍制服的軍人，將我從這個吳法憲私設的監獄後院『押』到前院，乘坐一輛吉普車上了路。車子駛進市區，穿越一些街道，開出德勝門後，一直往北急駛，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秦城監獄。從此我成為這裡的囚徒，開始在這裡渡過漫長的、受盡凌辱的八個春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央專案組允許子女第一次前來探望我的那天早晨，中央專案組的張宏

學對我說，我的妻子張卉中也在這座監獄裡。其後知道，她是在我進來三個半月後，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被關進這裡的。

在『文革』前已經遐邇聞名的秦城監獄，坐落在北京北郊。它西距昌平縣城約十五公里，南面是有名的小湯山溫泉，北面是高大的山嶺。這座高牆深院、電網密佈的監獄，是在六十年代修建起來的，原為專門關押大案要案的被告者。『文革』以來，林彪、江青一夥把它變成了殘酷迫害革命老幹部的人間地獄。

這座監獄原屬公安部領導，歸該部十三局主管。『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清華大學的一百多名紅衛兵，兩次衝進秦城監獄辦公區，聲稱要接管監獄。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又是北京市委書記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的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發表了『徹底砸爛公（安）、檢（察院）、法（院）』的講話，他聲稱：『從文化革命開始，一直到今年的一月風暴以前，大多數公、檢、法機關（按：即指各級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都是死保當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不把原來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論、組織方面的壞東西徹底砸爛，就永遠跟不上毛主席思想。』於是，在這年的十一月間，即對秦城監獄實行軍事接管，『一天之內就把原公安部十三局的幹部、民警全部轟走，換上了軍管會領導（一九七三年才結束軍管，監獄由軍隊交回公安部接管）。』這個時候，當年主持修建這座監獄的原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以及公、檢、法機關的負責人，早已都被非法關押在這裡受苦受難。

筆者曾見過一份揭露秦城監獄當局肆意破壞國家法制、蓄意以法西斯手段迫害老幹部情況的材料。材料中詳盡地記述了這裡曾採用的種種迫害「囚犯」的殘忍手段：拳打腳踢、「噴氣式」、扭胳膊、揪耳朵、撕頭髮、撞牆、棍棒打、罰站、脖子塞雪球、露天冷凍，等等，名目極其繁多。楊奇清因屢遭毒打，肺部嚴重受傷，以致過早逝世。我的妻子張卉中在獄中由於遭到各種殘酷的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出獄後不久就離開人世。對於「犯人」所受到的種種慘無人道的迫害，曾在這裡工作過的監管人員都有直言不諱的供認。

這份材料還揭露了秦城監獄所使用的種種非法刑具。它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中有明確規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險性行為的時候」，經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時候，應當立即消除。」在這裡，對並無上述情況的受審人員濫用戒具，有的幾年也不解除。康生還曾直接插手。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劉仁、崔月犁、馮基平、徐子榮等這夥反革命敵特分子，出賣黨、政、軍核心機密，叛黨、叛國，罪該萬死。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對待，要防止他們自殺，打擊敵人的頑固態度；將他們銬起來，進行嚴厲地、突擊地審問工作，使敵人徹底的繳械。對這些人應向他們宣佈逮捕，送進監獄。」根據已查到的材料，劉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獄即帶手銬，直到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才去掉，長達四年之久（馮基平、徐子榮同志去掉手銬的時間待查）。『尤為惡劣的是，在一九七二年七月發現，有四個在這裡受審查的人，不僅長期無人過問，而且根本不知屬於何單位審理。這四個人是測繪總局副局長陳外歐，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三機部副部長劉鼎，軍委聯絡部幹部曹成修，其中陳外歐被關押四年無人審理，

已經精神失常……」劉仁、崔月犁、馮基平、徐子榮的冤案，在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已徹底平反，推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康生、謝富治等強加給他們的一切罪名，將對他們的誣蔑不實之詞一律推翻，並恢復名譽。

筆者還見過另一份材料記述：從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秦城監獄收監關押受審查幹部五百零一人，其中有省、市、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副省長和中央副部長以上幹部六十九人，司局級幹部二百多人。這些人被長期關押，精神上受凌辱，生活上遭虐待；不讓吃飽飯，喝足水、睡好覺；長時間不放風，有病得不到醫治；打罵、罰站、罰跪，上手銬腳鐐；四年中被打傷致殘者二十多人，折磨導致精神病者六十多人，被迫害致死者三十四人（其中被整死在獄中者二十九人，被逼上吊、跳樓自殺身亡者五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我就是這樣一座充滿白色恐怖的牢籠中，經受了將近八年的煎熬，度過了二千六百七十二個孤寂而悲憤的日日夜夜（若從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進北京衛戍區私牢算起，共計二千八百零七天）。

二、秦城監獄六八一三號『犯人』

到秦城監獄一下車，我就被立刻帶進監獄的一間審訊室。屋裡坐著兩個面色冷酷的軍人。他倆先

對我只是履行公事地問了一遍姓名、籍貫、年齡等類的話，然後在一番侮辱性的檢查後，讓我換上黑色的『囚服』和一套臃腫不合身的棉衣。監管員在把我引向牢房的途中，冷冷地對我說：『這裡不用名字，你的代號是六八一三。』

走過漫長的監獄走廊，監管員把我引進走廊盡頭一間牢房，是這幢樓房裡囚室的第一號。囚室約三米多長、兩米多寬；它有兩層很厚的木板門（以後我移住的牢房，多是單層的鐵門，有的外頭加一層木門）；門頂端嵌著一個『貓兒眼』；靠近地面的門下方有一個六寸見方、可以打開的小門，專為傳遞食物、物品而設；囚室的牆壁足有一米厚，牆上裝有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內光線陰暗、陰冷憋悶；靠左牆放著一張高一尺許、寬三尺、長五尺的木板床，床上鋪著一張沾滿污漬的薄褥子和一條破舊的軍用棉被；窗下的鐵絲網罩下是暖氣片。當時正值隆冬，我伸手摸了摸，只有一點點微溫。右牆角落，設有一個簡陋的、半埋地下的鐵鑄蹲式便桶。

過了一會兒，送來了午飯：兩個窩頭（玉米麵製成），一小碗的煮白菜，一瓷缸的白開水。在這裡，常年吃不好、吃不飽；麵粉和大米是極難見到的稀物。在很長的時期內，每日三餐總共只給五個窩頭，隨飯給三次開水，早餐一個窩頭，一碗玉米粥、一點咸菜，午、晚餐的菜，不是『開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燉開水』，少油缺鹽，淡而無味。不久到了春節，『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飯給了四個皮厚餡少的包子，還不如平時兩個窩頭耐飢。據說，監管人員中流行一句話：『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對受審人員的蔑稱，『小黑』指的是豬。給『犯人』吃的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鍋。飲食衛生極差，經常發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尋味的是：獲釋後給我補發工資時，卻扣除了我在這裡

坐牢的一大筆『生活費』)。

監獄的氣氛，白天是靜謐的。牢房內，房頂用鐵絲罩著的大電燈泡通夜亮著。我到這裡坐牢的第一夜，心潮澎湃，無法入睡。我並不是怕什麼，一個人一旦被打入監牢，就什麼都不怕了，在恐懼與無畏的搏鬥中，我已變得無所畏懼。但是，留在家中的親人的命運讓我牽腸掛肚，切切在心。被嚴重打傷的妻子是否已脫離險境？孩子們如何生活？年已古稀的老父由誰照顧？弟弟、妹妹的遭遇又會怎樣？與孩子們相依為命的外婆又如何支撐殘破的家……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我被抓以後的五年中，我不能與家人往來，也不讓我通信。一家人音訊杳然，生死未卜，令我經常夜不能寐。

因為夜間我常常難以入眠，所以經常會聽到一些透過漆黑夜空傳來的令人心悸的聲響。在我住的這座樓房的頂層，有一個操廣東口音的姑娘，她日夜不停地大聲吼叫、說話，講些聽不懂或似懂非懂的話；相鄰的另一座樓上，有一個年輕的姑娘不分晝夜地唱著同一首歌……常識告訴我，她們是不堪這裡的侮辱和迫害而神經失常了。那時，監獄正處在軍管時期，來到秦城監獄的軍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對這裡的犯人嚴加管教，只要能把他們訓服，什麼手段都可以採用，打人、罵人，甚至上刑。按照他們『長官的意志』，這裡關押的都是『重犯人』，對這些人就是要實施無產階級的專政，要讓他們知道是你的『骨頭硬』還是我的拳腳狠。『首長』的謊言扭曲了這些軍人的靈魂，模糊了他們的是非觀念，使他們失去了立場，充當了反革命的幫兇。誠然，這也與他們本身的政治、文化素質有關。

這座監獄原來是專門為關押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建立的。我作為一個已有三十多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在經過漫長的革命生涯之後，忽然被當作敵人囚禁在共產黨的監獄裡，

思想上根本無法接受，心裡異常憤慨。但我不相信江青一夥能夠得逞。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的國家仍有希望，那末我個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麼呢？這樣一想，我的心情也就逐漸平靜下來。

在牢房裡，朝朝暮暮，盡是空閒時間。我思潮滾滾，常將自己引向往昔的回憶。想得最多的，是我青年時代投身革命的情景和在那炮聲隆隆的戰爭年代犧牲的戰友。面對突然襲來的災難，我要求自己已經得往考驗。為激勵自己，我特吟小詩一首：『君既來之則安之，在劫難逃應識時；私疑偏忍除未盡，毀貶誣陷總有辭。撞鬼怕鬼鬼益狂，見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馬福抑禍，笑問鐵窗儂可知？』這首詩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它激勵自己平靜而坦然地渡過了這段漫長而又嚴峻的歲月。

秦城監獄當局的監管人員幾乎個個心狠手毒。他們沒收了囚犯的腰帶、餐具，甚至必要的日用品，笑其名曰地說是為了防止『犯人』自殺或出別的意外，可是實際上，千方百計地用『啟發』、『暗示』、『刺激』等卑劣手段來誘導人自殺。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農曆除夕夜，我隔壁的『牢友』在夜間自殺身亡。監管員不是悄悄地把死者運走，而是故意大喊大叫、叮叮鑼鑼，把整幢樓已經熟睡的人全都鬧醒，故意『啟發』其他被押者的邪思，刺激被關押者的情緒。

四月二日，我被換住到一樓的二十七號牢房。一進門，映入我眼簾的是印在白牆上的幾個血手印。顯然，這裡先前的『房客』出了事。監獄當局本應及時消除牆上的血跡，但他們故意將它保留下來讓我『觀賞』。我住下後，又在床頭牆壁上發現有人在自殺前劃刻的『遺言』，大意是講自己冤屈和決心以一死向組織表示自己的清白。衛兵見我神態平靜，沒有任何沮喪或哀傷的表現，以為我未發現牆

上的『秘密』，就叫了一些人進來，但又不好明說，只好故意指著床頭責問我：『你在這裡亂寫些什麼？』我明白這班奴才的用意，冷冷地搖搖頭說：『我沒有在任何地方寫字，也不想知道那裡寫了什麼！』他們沒趣地走了。望著他們快快而去的背影，我在心裡狠狠地說：『老子為什麼要死？我要好好地活著，要比你們這些人間魔鬼活得長久，好看到你們的下場！』

在這裡關有不少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無辜的年輕人。他們中間有些原是被江青一夥利用過的、被她口口聲聲呼叫過的『紅衛兵小將』，利用完了，或許是為了滅口；或許還要繼續審查；也就被投進了監牢。四月下旬的一天，拘押進來一個男青年。放風時，我聽見他大喊『上了陳伯達的當，上了陳伯達的當……』並大聲說，陳伯達把他使用完了，就將他扔到這大牢裡來了。進來後，他整天大聲喊冤叫屈，即使衛兵干預，他也不理睬。監管員用盡一切手段，也沒有把他壓服。最後，他們想出了絕招，兩天後，在這乍暖還寒的早春，監管人員就收走了他的棉被，還用飢餓法消耗他的體力。當窗外高音喇叭傳來歡慶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閉幕的消息時，他晝夜不停地在室內大聲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餓呀，我冷呀！』這淒慘的情景與廣播傳來的喜訊形成了多麼強烈的反差呀！獄卒怕被別人聽見『影響不好』，就關上他的窗戶。但他那淒厲的喊叫聲，仍穿過牢房門窗的縫隙，衝破寒夜的寧靜，在漫長的走廊裡回蕩。

監獄雖設有醫療所，但醫療條件極差。加上這裡執行的是江青、謝富治指示的『醫療為政治服務』，許多病患『囚犯』不僅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反而備受迫害，病情迅速惡化，有的很快死亡。據後來的調查材料記述，曾被關押在這裡的受審人員有『三多』，即『要犯』多、年老的多、患病的多。

一九七二年底統計，患病者二百九十八人（還不包括當時已住院的十八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患冠心病、動脈硬化等心血管病者一百八十五人，患精神分裂症者十三人，患其他疾病者一百人。病情嚴重的一百三十四人，需要住院治療而未能住院者十七人，癱瘓和生活不能自理者六人。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的兩年中，病死者共十一人。

原國務院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暉，就是被關在這裡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被活活折磨而死的。他被捕入獄的原因頗為簡單，但受到的迫害卻是慘無人道的。

一九五〇年，毛澤東指示傅連暉組織專家對林彪會診，因為當時中央擬派林彪率軍赴朝抗美援朝，而林彪稱病拒不出任。葉群曾經暗示傅連暉給林彪開假證明，但遭拒絕。林彪本來沒有什麼大病，是在裝病。會診結束後，傅連暉如實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會診報告。從此林彪、葉群對傅連暉恨之人骨，欲伺機報復。『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林彪死黨立即向傅連暉報『一箭之仇』，說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病危時，不給藥吃，陷害林副統帥』。葉群還親自掛帥，組織人員編造出一份『揭發老爺衛生部黑幹將傅連暉在對林副主席病情處理上的滔天罪行』材料，蓄意加害之。在遭受到一系列嚴重迫害後面臨絕境的傅寫信向毛澤東求救。九月三日，毛澤東在傅連暉信上批示：『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保護。』林彪、葉群一夥對被他們口口聲聲高喊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毛澤東指示不僅加以封鎖，不予理會，而且更變本加厲地迫害傅連暉。他們指使幫兇邱會作等人組織不明真相的造反派鬥他、打他，打斷了他的雙腿，打斷了他的肋骨，打破了他的頭……對他無情的揪鬥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凌晨，當傅連暉奄奄一息地被投進秦城監獄為止。

七十五歲高齡的傅連璋被關進這座監獄時，除遍體鱗傷外，還身患胃潰瘍、慢性胃炎等多種疾病。獄方不僅不給他治病，每天還派打手對他拳打腳踢，並多次更改囚室，使他遭受非人的折磨，僅十五天就遭慘死。臨死前還帶著手銬，腕部表皮全被磨爛。他的遺體，被當作『無名死囚』火化。

據事後爆光的一本《看守日記》記述，傅在入獄後再三要求吃稀飯，獄方置之不理，竟然幸災樂禍地聲稱『叫他餓，時期就餓著，吃點苦頭。』當傅連璋因傷和病痛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在地上滾爬輾轉時，他們卻狠毒地給他戴上了手銬，致使他雙手血肉模糊。三月二十八日，儘管監管員們議論『看來該犯活不了幾天了』，但仍無一人予以關注。三月二十九日，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忠心耿耿戰鬥一生的功臣，在受盡人間的屈辱中逝去了……

在林彪、葉群自我空中爆炸後，傅連璋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上沉痛地批示：『傅連璋被迫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幸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可是在林彪、江青一夥強制推行的『醫療要為政治服務』的方針下，秦城監獄的醫務人員不僅不為人治病消災，反而傷天害理，給『無病者「種」病』，促有病者早亡。傅連璋的遭遇是最典型的一例，我本人在八年冤獄中也有切身的體驗。入秦城冤獄時，我還未滿四十八歲。以前身體一直較健康無病，極少同藥打交道，自從進了秦城監獄，竟被他們在飯菜、飲用水中暗用藥品『種』了許多病。

他們給我服得最多的是多種興奮劑。這些藥有的會使人變得暴躁不安，有的會讓人產生恐怖的幻覺，也有的會導致內分泌失調而引起久治不癒的皮膚病。

從進秦城監獄不久到林彪垮台的前後四年中，他們每個月都要強迫我連續服用十至十五天的興奮劑，讓我始終處於不眠不休的興奮狀態。很顯然，是為了摧毀我的大腦，退化我的記憶力，剝奪我申辯和寫作的權利。一九七二年底，在中央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不許對受審人員實行法西斯手段管制的命令後的一段時間內，『下藥毀人』暫作收斂，可是在我臨出獄時，他們又暗中下藥，企圖再次害我。因被『藥』連續毒害數年，我的頭腦受到了極大傷害。當我出獄回到報社，與職工們相見時，有許多人的名字，甚至曾與我朝夕相處過的編輯、記者的名字，我都難以喚出；而在看書寫字時，常會遇到一些想不起的字『坎』。我的這種病態狀況經中醫治療、調理一年多後，方始正常。

過去我胸骨從無異常感覺，一九六九年後，幾乎每天午飯後都覺得胸骨劍突部分疼痛，時輕時重，每次疼痛一陣自行消失。因還能挺得住，就沒有理會。一天午後，我覺得痛得特別厲害，有人將我帶到醫務所透視。透視完了，醫務人員故意低聲嘀咕，卻又讓你聽見『癌』一類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為每次疼痛發作都在飯後固定時間，我就懷疑是他們在飯菜裡作了手脚，有意害我。所以，有幾天，我將送來的午飯全部倒掉，屆時疼痛便未再現。知道疼痛的起因確由飯菜中來，『癌』的謊言也就不攻自破。如今出獄已二十年，其間胸骨從無異感。

入獄時，我的牙齒是齊全的，只有一顆牙修補過，已經穩定多年。入獄後不久，他們使用藥物傷害我的口腔，致使我左邊三顆白齒發生周期性地脹疼和開始鬆動。後來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囚犯』的飲食有所改進，如在供給飲水方面，從原來的三次增加到六次。可是每次給水，他們又搞名堂，即這次給喝的水會引起牙痛；下次給的或許有緩痛效應，也或許會疼痛加劇。折騰幾年之後，

我終於把三顆牙拔掉，但他們一直不給我鑲補，並以『病號』為名，強給我吃了好幾天名為『湯麵』，卻是有『湯』無『麵』的『病號飯』。

監獄當局為迫使『犯人』規規矩矩，服服貼貼，炮製了一系列監規：在牢房裡白天只能坐、站，不能躺臥；夜間通夜亮燈；牢房的窗戶半年打開（在天暖後開），半年關閉（天涼後關）；『犯人』只能『一側睡』；遇事必須喊『報告』；『紅寶書』、『語錄本』（毛澤東選集及其語錄）必須放置床頭；『不許大聲喧嘩』……

所謂『一側睡』，就是他們擅自規定的：所有『犯人』夜間只准面向牢門的『貓兒眼』睡覺，不准仰臥，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牢門坐、臥。這種折磨人的陋規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才被宣佈廢除。但又同時宣佈，馮基平等『十三名所謂「鬧監犯」除外』。足見他們擅自制定的這項監規是在故意要將『犯人』置於死地。從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開始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宣佈廢除這條『戒律』，我一直向右側睡了一千五百七十八天（初進監獄至四月一日是左側睡），致使我已養成了不易改掉的痼習，若加改變，就難以入睡。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多個年頭，依舊未能板過來。

在這些監規中，自己感到最不能忍受、最帶有侮辱性的，就是『犯人』遇事都先要卑躬曲膝地喊『報告』，否則就不予理睬，甚至嚴加『訓斥』。自己生性倔犟，不肯在橫逆面前低頭彎腰，一直抵制這種侮辱性的規定。在我被關押的七年多裡，我始終沒有喊過『報告』兩字。

為了達到讓我『報告』的目的，監管員們處處、事事刁難我。如有一次，在監管員發放日用品時，我見筐裡有牙刷，就想把自己那把『老掉牙』的牙刷遞出去換一把新的，於是對他說：『用太久了，

給換一把新的！」他望了望我手中的牙刷，說：『要換牙刷你得另外「報告」』，說完端起筐子就走了。後來我還曾要求過換牙刷，但他們每次逼我喊『報告』。我不願為一把牙刷『折腰』，就用這把已完全無毛的牙刷繼續『刷』牙，整整用了一千二百六十七天。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間，才換了一把新的。

『放風』，原是保證『囚犯』健康的措施之一，但在秦城監獄，『放風』卻被用作迫害人的手段之一。初進來的『犯人』長期得不到『放風』，就是已經久押的，也難得有一次。有的因受長期審訊，不讓『放風』的時間竟達一年半以上。即使讓『放風』，為了不使犯人相互見面『溝通』，他們也會按照準確計算出來的時間、逐個地放人出來。當第一個人在樓房轉彎處轉了彎，第二個才放出來；到第一個再轉彎時，第二個也正好轉彎。每次『放風』都是在衛兵監視下進行的。

只因我拒絕喊『報告』，監管員不給我換牙刷，不讓我借書，可是當我放風時，在我必經之路的走廊窗台和暖氣片上，擺放一些我曾十分想借的書籍。我知道，他們有意刺激我。冤獄後期初冬的一天，正當我放風結束往回走的時候，看到不遠的牆側立著一個體型、穿戴與張卉中幾乎一模一樣、是我十分熟悉的婦女身影，因她側身站著，我看不清面容。那時我已經知道我妻子也被關押在這裡，所以我馬上想到，這一定又是他們故意設置的圈套。他們這樣惡作劇，我想，一則是要給我一點刺激，再則是為了觀察我的反應，檢驗一下他們對我長期下藥的效果究竟如何？我的腦子的記憶和反應是否還『正常』？不論出於何等目的，他們這種惡作劇的手段都是極其卑鄙、無聊和殘忍的。

三、明日張膽的『逼、供、信』

在我被關進監牢的近八年期間，先後於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二年對我有過三次『審訊』。第一次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在『九大』召開期間，是由中央專案組的朱某、黃某、張某和光明日報社造反派的楊某、羅某、王某共六人前來『提審』我的。一見面，他們就對我說：『現在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你應該向毛主席請罪！』我說：『我有錯無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接著他們讓我寫一篇自傳，再寫一批有關各地需向我進行『外調』的五十多個人的情況材料。這次審訊時間不長，也沒有講那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類套話。

他們讓我寫的答覆外單位的『外調』材料，並沒有給我看有關單位的原信，只是交給我被調查人的名單。他們要求我按名單交待我與每個人的關係，寫清楚他們各人幹過什麼壞事，又有什麼歷史問題。我仔細地看了一下名單，大多數是普通幹部，只有少數是領導過我的高級幹部。而我只對其中部分人比較了解，許多人僅屬一般的工作接觸。我想這些人一定也都和我一樣，『在劫難逃』，我要寫的話，就必須對組織負責，也必須對他們每個人負責。經過認真的回憶，花費了數天的時間，如實地寫出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據我所知，名單當中的人並無一個『壞人』，也從未聽說過誰在政治上（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我的『自傳』也寫得很認真、很詳細。其實，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已寫過多次自傳。如今江青一夥和報社內外造反派對我誣陷，採取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卑劣手段，曾就我的歷史散播許多謊言，所以有關自己經歷中的重要情節，都翔實地寫出，以澄清被壞人攪混了的事

情的真相。

第二次審訊，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開始的，這是一次連續一百零六天的馬拉松式的『提審』。來人中主要是第一次來過的張宏學和楊、羅、王四人，還有駐光明日報社的三個軍宣隊人員。張宏學是前次『提審』時露面的專案組三個人中級別最低的一個，但他整人十分兇殘，從不手軟；楊、羅、王三個都是報社『響噹噹的造反派』，儘管我和他們相處多年，但在此時此刻，想給他們的人品下個恰當評語都不容易。若說他們『不學無術』，學問的確沒有或甚少；他們沒有才學，卻有權慾，卻有騙術。楊某是報社駐外地記者，生就是一張鐵嘴鋼牙，慣於強詞奪理，謊言狡辯，具有那種能把死人說成活的又使別人相信的騙才。其他兩人是專業攝影記者，在『提審』中多次拿給我看的、偽造得並不高明的偽證照片，全都出自他們之手。他們權迷心竅，所奉行的道德準則是損人利己、欺上瞞下，他們暴虐成性，唯利是圖。這種人『在政治上只有頭腦，沒有良心』，他們正是那個畸形時代的產兒。

這次受審的第一天，張宏學為主審員。他的左右邊分別坐著三個造反派，三個軍宣隊員。他們一來就讓我交待兩個問題，一是我在《光明日報》主持工作期間，在報紙上放過什麼毒；二是『交待』光明日報社『五·一六分子』的名單。

關於前者，我說前後在報社工作十年，其間報紙上發表的新聞、文章約計一億二千萬字，不記得都是什麼內容，也無法對每個字、每句話負責。

關於後者，我回答，我連『五·一六』為何物都不清楚，更說不上誰是誰不是。我只能按照報社人員名冊，自上而下，從副總編、編委、部主任起，照實述說了他們的簡況和優缺點。《光明日報》

的三個造反派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給幹部作鑒定！』既然這樣，我也無可奉告，不再開口說話。其中的那位王某拿起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給我唸了其中毛澤東加的有關「五·一六兵團」的一段話：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颺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

唸完了，他們又吹鬚瞪眼地要我交待「五·一六分子」的名單。對於這種無中生有、血口噴人的事，任憑他們怎樣拍桌子蹬腳，我都不會再說什麼。本來，在我被綁架前，我曾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見到過署名為「五·一六兵團」的『炮轟周恩來』大標語，我明白這是江青一夥炮製的陰謀。現在，他們竟又利用「五·一六」來誣陷、殘害幹部，消滅異己，實在可惡可卑之極！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謝富治在接見中學生代表時說：『「五·一六兵團」非常反動，又非常渺小，他們人數不超過五十人，其中相當多是受蒙蔽的年輕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點後台老板、走資派。』這以後，他們假借大抓「五·一六分子」為名，消滅異己，在全國範圍內興師動眾，成立了中央清查「五·一六」專案小組，大搞逼供信，使大批的幹部和群眾遭到批判、審查、鬥爭。他們竟然宣稱：『「五·一六」的黑後台「是劉、鄧留下來的，軍隊就是楊（成武）、蕭（華）、還有葉（劍英）、徐（向前）。』光明日報社的『造反總部』對主子的旨意心領神會，以雷厲風行的速度把報社上百名幹部和員工打成「五·一六分子」。這還不算，他們又跑到秦城監獄來，把我當作報社「五·一六分子」的

『黑後台』，強逼我交待、承認，這豈不是無稽之談的天大笑話！因為我的堅決拒絕『交待』，他們未能在這裡撈到任何一根稻草。——以後我看到了這個中央專案組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在我出獄的那天）向光明日報社領導小組下達的四條指示之一的記錄：『中央沒有給我們審查他（穆欣）是不是『五·一六』的任務。』既然如此，張宏學等人在監獄裡大搞逼供信，強令我承認是『五·一六』的『黑後台』，這不是插圈弄套、蓄意加害麼？

逼交『五·一六分子』名單的事卡了殼，他們又回到我在報紙上『放毒』的『罪行』上來。那時王力、關鋒早已因為鼓吹『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被抓了起來，陳伯達也開始挨批判，所以專案組將我的『問題』與王力、關鋒、陳伯達的『反軍』、『亂軍』罪行掛了鉤，逼我『揭發』這些人的反動言論，命令我『交待』我是如何在光明日報社執行他們的『指示』而發表了哪些『反軍、亂軍』的文章。

如前所述，『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原是林彪、江青一夥提出的。其後看到的一份材料，把這個口號出籠的情況說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和江青首先發起揪『軍內一小撮』。同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武漢『七·二〇事件』宣傳口徑時，康生和江青，陳伯達等人堅持要寫上『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華社送審《首都百萬軍民集會支持武漢革命派》的新聞稿時，由關鋒執筆，康生審定，加上了一『堅決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這條新聞和相應的社論後，到處發生揪『陳再道式人物』和衝擊軍事機關的嚴重事態，不少部隊內部兩派尖銳對立。這是林彪、江青和

康生一夥陰謀亂軍奪權的一個重要步驟。」

這些情況，作為中央專案組的張宏學以及報社的楊、羅、王三個是不會不知道的。既然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是由林彪和江青一手策劃的，就連向各新聞媒介推行這一『指示』的王力、關鋒也不應該承擔主要責任，怎麼能讓一家報社的業務負責人——筆者來擔當呢？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到了，自己作為報社的負責人，在執行王力、關鋒的『指示』中是有責任、有錯誤的，應當檢討。所以，在這次『提審』中，我對這個問題作了檢討，並實事求是地承擔了一定的責任：一方面我本人沒能及時覺察這口號的反動性，說明自己的政治思想辨別能力差，另一方面鑑於當時的局勢，即使有認識，也難予抵制。他們對我的檢查仍大表不滿，因為我沒有按照他們給我指定的口徑將自己的錯誤上升到『反軍』罪行高度來認識。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這樣做無非是為了將我打成『反林彪』分子，以便與轉遞杜保同揭發葉群『黑材料』之事聯在一起。結果，我的三次『檢查』均沒有被通過。新的一輪『頂牛』又開始了。

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專案組人員把我們這些『囚犯』視若虎口之羊，任意嘶咬、肆意吞噬。正如當時也被囚禁在秦城監獄裡的師哲回顧在這裡所受折磨時說：『有真理的卻無起碼的生存權利，無真理的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十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這樣是非顛倒的。

這次『提審』，就這樣扯來扯去，沒疵挑疵地延續了一百零六天，就是在九月上旬的最後一天審訊『退堂』時，他們還警告我要繼續『交待』『反軍』『亂軍』的罪行。可是，隔不幾天，他們極力捍衛的『林副統帥』叛國外逃，落了個折戟沉沙，屍橫遍野的下場！

又過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末，我被第三次提審。『審訊』我的是原班人馬。這次他們製造偽證，逼我『交待』兩個『歷史問題』：一說四十年代有個什麼人曾匯給我一筆數目大的款子；一說在一份什麼三十年代反動派的會議紀錄上，發現有個特務講話提到我的名字。為了證明他們對我的歷史問題已『一清二楚』，『證據確鑿』，竟在我面前晃動兩張破綻百出、明顯是偽造的照片。我當場揭穿了照片偽造者王、羅兩人的卑劣行徑。雖然他們矢口抵賴，但也拿不出原件。就這樣，對我的這次審訊，反覆糾纏不休，斷斷續續地又拖延了兩個多月，方才收場。

為了將我置於死地，這幫專案人員挖空心思羅織罪名。他們企圖以『叛徒』作為殺手鐮向我進行再一次的圍攻，把我打倒。可是，他們又一次打錯了算盤。曾幾何時，江青誣陷我是『叛徒』後，經王力調查，不是『叛徒』；後來江青又在人民大會堂當著周恩來的面罵我是『特務』，中央專案組經調查，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說：『通過審查，他不是特務』。

從後來的情況知道，我和張卉中、杜保同都是因為觸犯了葉群的檔案一事經林彪下令被捕的。隨著林彪、葉群外逃覆滅事件的發生，江青之流就改在歷史問題上對我進行陷害。直到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批准釋放大批受迫害的幹部，我才得以重見天日。由於受到『四人幫』的干預，在我即將出獄時又被臨時決定『提審』，使我的出獄日期從中央決定的四月七日延遲到了五月十四日，多受了整整三十七天的折磨。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光明日報社領導小組向全體職工傳達了中央決定於四月七日釋放穆欣和張卉中的通知，並對我們兩人出獄後的生活待遇、『矛盾性質』作了具體指示，即按人民內部矛盾安排

工作和生活。宣讀通知和參加傳達會的幾個頭頭曾振振有詞地表示『堅決按中央指示辦事』，並當場決定屆時由他們中的一人接我倆出獄。

可是過了一夜，突然變卦。在既未向公眾說明原因，也沒有說清是誰的決定的情況下，他們只將身患重病的張卉中從『監外就醫』的復興醫院接回報社，而我仍被留在監獄受到『原班人馬』的極其殘酷的折磨。他們一面突擊審訊，大搞逼供信。不過所問仍是老調重彈，只是態度更加蠻橫，『審判官』的臉色更加難看。放風的時候，監管員惡言惡語，厲聲恫嚇，或在圍牆外面鳴槍放炮，顯示威懾力量，製造恐怖氣氛。同時通過飯菜飲水，重又頻繁地給我服用各種藥品，折騰我的頭腦，有的藥服後產生幻覺，有的出現恐怖感，有的服後話特別多，自己無法抑制地長時間自言自語，說的都是以前所經歷過的事情。還有一種藥品，導致一切記憶中的事物性質完全顛倒。連續多日，都是人睡時藥力就開始發作，記憶中浮現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像有嚴重的政治問題；至起床前藥力消失，思維重歸正常，那些顛倒了的記憶又都顛倒過來。

他們所以這樣對我百般折磨，其目的顯然是想逼出他們預期的什麼口供，以便找到某些把柄，阻擋我從這裡出來。為此他們千方百計，煞費心思想出許多怪招。

獄中發給受審查人員看的一份《人民日報》，早已成為他們戲弄、折磨受審查人員的工具。人們被關進來，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給看報。監獄雖在北京市郊，北京出版的報紙總是較遲幾天交來，以便他們有時間研究報上哪些內容可以用來折磨『犯人』。他們想要封鎖某些消息，即將某天或幾天的報紙『扣發』；有時為了達到某種政治上的效應，故意多拖幾天再給你看。凡遇比較重要的新聞，留

心窺測『犯人』的反應，作為評價『犯人』政治表現的依據。

一九七二年初，接連曾有兩個重要人物病逝，一個是全黨和全國人民敬重的元帥、詩人陳毅，一月六日病逝；一個是靠篡黨奪權手段，踩着別人肩膀爬上高位，後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謝富治，死於二月二十六日。一月初旬看到陳毅追悼會的報道，不禁熱淚滾滾，強自壓抑才沒哭出聲音。沒隔多久，刊有謝富治死訊的報紙來了，我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床板上。謝富治這個被人稱作『猶大』的熱中權慾而摒棄了任何道德準則的人，死訊傳出只能讓人舒口氣。人們不止是『無動於衷』。自己對待陳、謝死訊上的這種鮮明的差異，勢必引起監管員的注視，作為難得的『罪證』上報。俗話說得好：『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一旦在迫害狂那裡掛了號，日後必然難得有好日子過。

這個時候，九七五年四月，報紙上又有類似情況的兩則新聞出現，而且隔得更近。四月二日，我國人民尊敬的董老——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在北京病逝；四月五日，蔣介石在台灣死了。監獄當局乘機又拿《人民日報》來做手腳。他們送來刊有董老逝世新聞的報紙之前，暗中給我吃上扣制流淚的藥品（女『犯人』在獄中會見前往探視的子女以前，許多人都給吃過這種藥），使人怎麼難受也流不出淚來。但到送登載蔣介石死訊的報紙之前，故意又給我吃了作用相反的藥。縱然如此，對蔣介石的死也不會有絲毫的『難受』，更不會流眼淚。他們觀察到這一點，又叫『獄卒』們把濃烈的刺激眼睛、容易流淚的硫酸液傾灑在囚室門口地上，還用扇子往屋裡扇，力圖逼出你的眼淚。以使上報你的『反革命感情』。結果，這一招也不靈驗。其實，即使採取這種手段逼出幾滴眼淚，不是也和

他們偽造的那些『證據』同樣毫無用處嘛！

機關算盡，終歸徒然。拖到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早晨忽見張宏學跑來，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這是要釋放我。因為這裡的『犯人』已有許多人出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獄。我在這裡早已成了實實在在的『無產者』，要帶走的不過是四卷《毛選》，一本《語錄》，和一件故意留作八年冤獄『紀念品』的破爛襯衣而已。所以，很快就離開了這個永遠令人詛咒的地方。

第十五章

株連三族，家破人亡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中崛起的江青，心胸狹窄，刁悍刻薄，慣將睚眦之怨化作千鈞之仇。她不允許別人對她有任何的觸犯，常給所忌恨的對手以滅絕人性的報復。在這一點上，另一個在這場動亂中崛起的妖姬葉群，心狠手毒，荒淫無恥，亦不遜於江青。『文化大革命』一開場，江青就私下對葉群說：『乘這次文化大革命，你有什麼仇人告訴我，我替你報仇』。葉群自然心領神會，『投桃報李』。從此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務將所有『仇人』置之死地而後快。她們興風作浪，大造假案、冤案、錯案，羅織罪名，殘酷迫害老一代領導人、廣大的知識分子，他們將大批無辜清白的文人學士和新聞工作者投入監牢，她們大搞株連，使數以萬計的家屬、親友同遭迫害。

筆者冤獄期間，我和我妻兩家中，先後共有十二人被關押過，四人致死（張卉中和她的母親均受折磨致死，我的父母因受驚嚇後病死）、二人被逼瘋、一人致殘。與此同時，光明日報社有一百來名

員工被打成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其中報社學術部編輯詹銘新，夜班編輯室美術編輯陸俊培，駐浙江省記者高正生等終因造反派的殘酷迫害含冤終世。更令人髮指的是，有不少因在『文革』前後，曾僅在《光明日報》這張報紙上發表過詩畫文章的作者，也受到了筆者的牽連，被誣陷為『穆欣的黑關係』而橫遭揪鬥。在這裡，雖然筆者記述的更多是親屬們在此期間遭受江青、葉群一夥以及追隨者們的迫害的情況，但我要揭露和控訴的是她們血債累累的罪行。因為在整個『文革』中，如同筆者家庭的遭遇：又何止百個、千個？是成千上萬，是不計其數！

一、張卉中含恨而逝

我的妻子張卉中原是《光明日報》文藝部編輯，因受我連累，長期受到殘酷迫害，直至含恨離開人間。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張卉中在報社被造反派毆打致傷，到友誼醫院治療，從此長達八年之久，在我從秦城監獄回家之前，她同我再不曾見面。當晚她再度被毆重傷後，於九月間離京返家鄉治療，歷盡風險和艱難困苦。她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期間寫的『交待』，較詳細地記述了她受盡折磨的經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深夜，我從友誼醫院治傷回來（十一點左右被學生踢傷），在報社後門口，從汽車上跳下來的一夥大漢，他們穿著黑色衣褲，安全帽遮戴到眉上，手中舉著碗口粗的大木棒。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行業的？他們見我就從後攔腰一棒，將我打傷。我昏死過去後，手錶、錢、物被搜走。後因『革聯』（即報社群眾組織『光明日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的同志將我送友誼醫院急救室。次日，照了片子發現肝腫大，肝外包著很多血；腎血模糊，尿血。還在打傷的當晚，我在急診室打了一夜點滴，是輪轉車間女工程桂香同志照顧我；我尿了很多血。第二天傍晚，我神志較清醒了，醫生來告訴我：按病情，本來應收你住院，但有的被打傷的病人，有從病房拖走的，也有從急診室拖走的，你最好找個親戚家住下來，帶些針、藥去，半月後再來復查……

我記得當時張慕勛正好來看我，我對他說，北京我沒有親戚。他說，去我朋友程飛飛家吧！她可以給你打針。後來有個人來程家看我。我想，有人知道我在這裡，不是同樣會來揪走？當時我還在尿血，『造反總部』某些人必置我於死地，會唆動不明真相的群眾來把我揪走的。鬥爭會我並不怕，只是現在自己疼痛，肝還腫大，腎還在出血，一會兒就尿一次血。程家不好住下去，我又必須較長期治療休養才行，還是去家鄉好，那裡親戚朋友多些，每家住一些時日，就可以多住些時候，把傷病治療、休養好了，再回來。你要鬥就鬥，要審查就審查，真金不怕火。在這種想法下，我就去武漢我舅母家，對鄰居說是從九江來武漢看肝炎病的。住了一個多月，怕時間長了被鄰居懷疑，我就去黃石市表舅家……

張卉中在黃石市住了近兩個月，輾轉住過三四家，有的只住三天，有的一周左右，其間『到汪仁鎮衛生院看了一次病，醫生檢查後說肝還腫大四指，腰上半尺多長、三寸寬的一道青紫痕仍未散，腰部也腫大。』一九六七年底，她又返武漢，其後轉往江西，再後又到南昌……就這樣，她東奔西跑，東藏西躲，先後在十七個地方避過難。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幹將于新野，在南昌附近的豐城縣太陽公社南河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任福國家裡找到張卉中，二十四日押解南昌，二十五日，押到九江。她被作為『要犯』，於二月二十六日由飛機押送回北京。

二月二十六日到北京後，張卉中先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二十九日被送往秦城監獄。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張卉中在獄中寫的材料說：『肝已正常，有時還有點隱隱發痛。腰還經常痛，不能坐。除散步外，基本上是靠著被子半躺著學習。只是腦子原來有過病，有時挺不管用。從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飛機起到同年五月，整天昏昏糊糊，像喝醉了似的，兩耳像發動了馬達，腦子像真空管那樣，連星星（大兒子）等的樣子都想不出來。每個白天像睡著了，每個晚上像是醒的，麻麻木木的日子倒挺管用的。這次受這樣大的刺激，沒有瘋，真是萬幸……但是，也要作最壞的準備，萬一再遇上個新的，更猛的，突然的刺激，忽然舊病大發作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趁現在腦子還能思考，趕著寫這封信給你們留這點手跡作紀念吧。』

這份材料，是張卉中寫的『請解放軍審判員轉交穆星星、陽陽、小妹我兒暨杜愛菊妹、張樂天姪』一封長達萬言的家書。她幻想他們會殘存一點人性，能夠轉交她以血淚寫成的這封家書。可是她的這個幻想不但落空，而且跟著來的是對她嚴酷無情的折磨、摧殘，使她無法承受，終至精神崩潰，沉痾

不起。

在獄中張卉中不單是受到重病折磨，得不到及時治療，還遭到監管員的痛打，『審判員』張宏學之流在『提審』時用偽證逼迫她、折磨她，還用下流語言辱罵她。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她向監管人員索取元旦的《人民日報》，因監管員出言不遜，發生爭吵，當即遭到監管人員毆打，左側鎖骨被打折，傷勢異常嚴重。獄方拖到一月二十日才把她送進北京復興醫院就醫，二月二十九日又從醫院送回秦城監獄。這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廢除法西斯審查方式』的指示，寫信給公安部、交通部和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要他們『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並要求將此事告訴每個受審查者，有違犯者受審查者可以控訴。但是專案組和獄方陽奉陰違，照樣殘暴地對待受審查者。如十二月二十日，張卉中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申訴信。他們不但拒絕轉送這封信（實際上，他們扣壓那裡受審查人員所寫的所有這類控訴信件），還把張卉中臭罵了一頓。張宏學公然違背他們自己傳達的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輕蔑地說：『哼！還想跟你把材料轉黨中央，我沒有這個責任。』又如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和二十七日，他們不僅威逼張卉中將她所寫的『控訴』當面撕毀，還要她筆錄他們當場口述的內容充當她的『控訴』。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審訊人員責令她按指定的題目書面交待自己在歷史上與國民黨曾有聯繫的材料。一個星期後，他們拿到的卻是一份厚達二十六頁、通篇充滿了憤怒揭露和控訴的書面『交待』。他們勃然大怒，當場對張卉中進行了百般的諷刺挖苦、惡語中傷和造謠攻擊。為了維護自身的尊嚴，也為了泄發鬱積在心頭的憤恨，張卉中不顧一切地與他們頂撞起來。她大聲喝斥『不許侮辱

我！』；她疾言厲色地痛斥這些無恥之徒是『吃裡扒外的壞蛋』，『是搞假證據，真迫害的軍國主義分子』……同時，她還對於《光明日報》的造反派置人於死地的做法大加揭露。眼看站在面前的這個『犯人』已經在以死相拚，張宏學等人只好趕快換另一副面孔說話。

不過，他們是『換臉不換心』，繼續逼迫張卉中寫出一份『交待』的材料，否則憑什麼向上和向下『證實』她就是『地地道道的國民黨反動分子』呢？他們拿來紙筆，要張卉中按他們的口述筆錄成『張卉中的交待材料』。為了擺脫他們無休止的糾纏，張卉中作了暫時的妥協。這就是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所謂交待材料，全文共三頁半。此後，他們勒令張卉中把那份三十六頁的『交待』當面撕毀，並將碎片取走。

為了澄清事實，還自己清白，不久，張卉中寫了一份《對九月二十七日材料的申訴》，逐條批駁『審判員』強制口授的那份『交待材料』，接著，她又寫了一份《對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材料的補充申訴》。

張宏學雖然收下了張卉中的申訴和補充申訴，卻沒有給她往上轉送。他和他的同夥繼續給她施加壓力，從心理、生理上予以摧殘，一定要她承認自己曾是南昌女師國民黨反動『應變會』的成員。這樁冤案直到張卉中被害致死三年多之後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才得以徹底平反，撤銷這個顛倒黑白的歷史結論。

張宏學一夥看到張卉中在這兩份申訴中，把他們強加給她的『罪名』統統據實駁倒，就又拿出一些偽證和國民黨反動分子寫的誣陷她的材料，企圖給張卉中扣上『特務』罪名。他們不知採用何種手

段偵得孩子們給張卉中的一封信中用過『暗號』，逼迫她交待：『在黃石市與人接觸時，曾使用暗語暗號、聯絡暗號（如「紀念章」、「醫院」、「病人」、「門診部」等），究竟是什麼意思，事前是怎麼和對方預約的？』

張卉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寫的材料如實回答說：『我又不是特務。光明日報一小撮壞人造謠說我家有電台，家抄了好幾遍都沒有電台。並以此為藉口，把孩子全趕出原來的住房。現在又造出來這個「暗語代號」、「聯絡暗號」。這又成了特務了。為什麼總要聳人聽聞才過癮呢？』

『我在黃石市與人接觸時，沒有使用什麼暗語代號、聯絡暗號。這些人都是一般幹部、工人，又不是特務。使用暗語代號、聯絡暗號幹什麼？』

『「紀念章」「醫院」等詞是用過的（但沒有用過「病人」「門診部」），那不是和別人用；是孩子們從北京給我來信時，用過這類詞。他們來信說：媽媽，我們幾個人去醫院看爸爸，出來接待我們是兩個小護士。他們說，你們的父親病很嚴重，是癌症。不能接見你們，你們不要再管了。你們回去好好學習、工作。媽媽，我們真難過。媽媽，你的病好些嗎？我們給你的紀念章，你要好好收藏起來，不要掛在外面衣服上，免得被人家搶去了。我們只剩你這個心愛的紀念章了。小妹好嗎？我們很想念她（按：當時小女兒也由姥姥帶往九江老家）。我們都很好，你要放心，很快養好病。現在你不要回來，等病好徹底了再回來。（大意。原信一字不差記不住了。）』

『信的內容大致如上。我一看就知道他們去了衛戍區看穆欣，接待他們的是兩個一般幹部。病很嚴重，是癌症。就是問題很嚴重，像癌一樣不好治。不准親人會見。紀念章是指我，這一看就明白，

叫我藏好，不要掛在外面衣服上，就是我不出去，免得被人發現，通知光明日報社來揪我。孩子們這樣寫信，就是怕信遺失，這樣寫，即使被人拆看了，也搞不清是我們家的事情，不會發現我是光明日報社的。免得傷未治好就被揪回來鬥。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張宏學和報社『造反總部』那些人，因有江青、葉群撐腰，肆無忌憚地造謠誣陷，欲將張卉中置於死地。她對自己的遭遇百思不解，以致絕望，精神崩潰。十一月十一日寫完這份材料，當天她就偷偷咬破手指，從襯衣上撕下一塊布，給兒女寫血書說：『今天，十一月十一日，又讓我寫交待在黃石搞了什麼活動，用了哪些暗語代號、聯絡暗號。這又是要把我搞成特務。故留此書，讓你們知道我們被政治陷害的概況。』

強烈的激情使她不能自持，竟以悲愴的筆觸在血書裡寫道：『拾此書的仁人君子，求您去第二聾啞學校找穆小玫，她是聾啞學生，不會說話，是我女兒，十六歲，是走讀生，有汽車月票。您想法證實她確係小玫後，給她一個字條說，要找她表姐張樂天（工人），告訴您的住址，她們就會按址去找您取此血書。我家世世代代感您大恩大德……』

秦城監獄戒備森嚴，是『插翅難飛』的。她這份血書，想在有機會進城治傷病途中投向路邊，讓『仁人君子』揀到。這是她絕望中仍懷著控訴冤情的一種表示。

此後，她的病情日益加重，血壓經常高到二百幾十。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她突然患腦血栓，生命垂危，即送醫院治療，病情有所緩解。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出獄時，她身患多種重病：高血壓，心肌梗死，嚴重的神經官能症，甲狀腺腫大，腎出血。她身上一文不名，吃飯、買藥都沒有錢，報社

當權派不給她錢，也不准她借。她叫在北京冶金建築安裝公司當工人的兒子穆陽陽請假留在家裡向報社借錢，天天碰壁。她在日記裡氣憤地接連寫道：「五月三日，向報社借錢不果。五月四日，向報社借錢不果。五月五日，向報社借錢不果。五月六日，領小妹生活費十七元維持生活。五月七日，上午送一辦信（按：一辦即指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下午錢、柳二人允借一百五十元。五月八日，陽陽上班。為借錢三四天未上工，難哉！」她心情極壞，病情繼續惡化。

出獄未到一年，張卉中就因心肌梗死、腦溢血突然發病，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含恨而去。

二、杜保同九死一生

我的弟弟杜保同原是國務院第七機械工業部所屬第四研究院的一般政治工作幹部。只因在參與本單位群眾組織外調工作中無意間撞擊了葉群的反動歷史，其後即被林彪下令和我、張卉中一起拘捕，遭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他曾兩度因受殘酷折磨而致精神失常，一家老小也因此遭到無妄之災。

杜保同因為轉送揭露葉群反動歷史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深夜，在北京天橋被林彪一夥抓捕。在北京東城西湯威胡同吳法憲私設的監獄裡，被林彪的『小艦隊』打手們連續折磨多日後，即被押解回內蒙古呼和浩特。從此連續數年對他實行法西斯的『群眾專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下旬，他在四院黨委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中，曾經詳細控訴了林彪一夥對他進行的迫害。

杜保同講到吳法憲將他押回呼和浩特的情況：「吳法憲的追隨者們經過對我的多次毒打、體罰、審問之後，他們認為想從我嘴裡得到整葉群的材料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因為他們軟的硬的都用過了，幾個幹將也都出場了，再也使不出別的辦法了。但是，他們還是不死心。因此，何汝珍等和四院的人經過研究，決定把我押回呼和浩特市對我長期專政，繼續審問，進一步追查整葉群的「黑材料」。他們向四院去的人傳達了吳法憲的黑指示說：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險人物，押回去後要長期關押，要管好，不許跑掉，不許打死，留著這個人有用。在押送我去北京站那天晚上，真是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在押送我走的前一個多小時，何汝珍等都去為我「送別」。為首的那個姓宋的向我說：你這個傢伙太不老實了，我們想「挽救你」，你就是不回頭。決定把你送回呼和浩特市，回去後要好好的老實考慮問題，徹底交待問題，回去交待還不晚。路上要嚴格聽從四院這幾個人的管理，不准隨便亂動，有事先請示，得到他們的准許後才能辦。路上我們派人跟著，你要是不老實，他們有辦法對付你。當著我的面，他又向四院去的四個人非常嚴厲的說：你們路上要把杜保同看管好，不許出問題。押回去後，要嚴格管理，必須讓杜保同交待出他們整「中央首長」（指葉群）「黑材料」的全部罪行，不許跑掉，不許打死，有什麼問題要及時向我們匯報。」

「他們向四院來的人交待完後，就把我押出來推上一輛專車開走了，他們四人乘坐另一輛專車跟著監視。押我的「專車」到達北京站，我下車一看，那個姓宋的早已派人站好了崗，這些站崗的都是穿的空軍制服，他們負責押送我下汽車、上火車。上火車後，錢基銀讓我坐裡邊，他坐我的外邊，本來座號不在一起，錢基銀就和人家商量，把五個號都換在了一起，這樣便於看押我，開車前

錢基銀就告訴我，不准我打開車窗，一路上看押我的四個人誰也沒有敢睡覺。我去廁所都要跟著，怕我跑了……』

『到了呼市下車後，四院革委會派有「專車」來接，並派了不少人到車站去「歡迎」我。路過呼市大街時，我看到街上貼滿了大標語，標語上寫著：「北京專政機關依法逮捕現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幹分子、新紅聯壞頭頭杜保同，經內蒙專政機關押送我公司（四院的代號「河西公司」）交革命群眾批鬥」。東門大院裡和南地也貼滿了同樣的大標語。四院革委會並把這一內容作為特大新聞每天廣播三次，連續廣播三天。』

回到呼和浩特後，杜保同說：『我被關押在一進四部門口裡邊崗樓的後邊那三間大房子裡，裡邊沒有住人，沒有生火。看押我的人找來一個火爐子。可是，就只門外一堆碎煤，也沒有木材，我實在沒有本事生著火。就靠著給我的皮大衣、皮褥子和一床被子坐坐、躺躺，躺躺、坐坐。我就是這樣熬過了一個夜晚，又一個夜晚。每天黑夜我總盼著天明，夜間屋裡冷冰冰的，全靠自己的熱量溫暖著身子，夜實在是難熬呀！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熬過了一個多月。把我關押到那裡的第一天晚上，給我規定了紀律，去廁所必須先大聲報告，得到站崗的許可後，方可去；夜間不准出門，如果不聽命令，崗哨有權開槍。因此，晚上解手只好在屋裡。由於長時間挨凍，我被凍病了，也不准我找醫生治療。腳被凍壞了，腿凍成了關節炎。現在一到冬天腳就凍，關節炎也一直治不好。』

『有一天，把我押送到東門，先在大食堂「示眾」，而後拉到三樓會議室交群眾批鬥，逼我交代整「中央首長」（指葉群）的「黑材料」，逼我交待邢鑒的罪行，逼我交待穆欣指揮「新紅聯」整葉

群的材料，逼我交待在北京和哪些人有聯繫。一句話，逼我交待問題，逼我交待何汝珍等人審問過的全部問題。因為這是吳法憲的指示，所以四院革委會是很重視的，當作大問題搞的，那天不少革委會主要成員都在場，並由一名常委親自主持會議。」

『把我押送回來的前後，吳法憲又令宋、宋、張等親自來呼市。他們到呼市後，先向原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負責人傳達了吳法憲的黑指示，並把四院革委會的幾個負責人請到新城賓館去，向他們匯報了我和邢鑒等幾個同志的情況，又把我們十幾個同志的檔案要去給他們審查。他們聽完匯報，看完檔案後，進一步策劃、佈置了對我們進行迫害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杜保同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寫給四院黨委並轉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七機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的申訴信中說，這次吳法憲派他幾個親信來呼市後『不久就發生了抄查整葉群「黑材料」的「一二·二〇」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鑒等五位同志毒打後，都送進了監獄；打傷了許多同志，有的打傷致殘；又抄了一百五十多個同志的家。以後又繼續對邢鑒同志專政十一個月，抄了五次家。』又據杜保同回憶：黨的『九大』以後，有一次逼他交待把葉群的『黑材料』送給了誰的時候，竟然誘供說：『他們現在還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給他，你講了也不要緊嘛！』他們公然將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

接著，就是更加殘酷的迫害：『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日，把邢鑒等同志抓進監獄，抄查了整葉群的「黑材料」。從第二天開始，對我的迫害就特別的嚴重。那種情景我就不說了。那天審問我的人首先聲明：他不是代表群眾組織，也不是代表革委會，而是受「軍委」的委託來審問我的。然後就說：我告訴你杜保同，邢鑒已經抓進監獄了，你要放明白點，要趕快老實交待「五·一六」罪行，

要和邢鑒劃清界限，徹底揭發邢鑒他們整「中央首長」（指葉群）「黑材料」，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行……你如果繼續頑抗，死保邢鑒，不揭發問題，那你的下場和邢鑒一樣，也要送你進監獄。你要知道，關押你，抓邢鑒他們進監獄，都是軍委的指示。」

『就在整我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我父親病危，家裡來了電報，電報被壓了十多天後才給我看。看後我心裡很著急，因家裡沒有人照顧，也沒有錢治療。我就提出兩條要求，第一要求回去處理；第二，因我知道是不會讓我回去的，就又提出借一百元錢寄回去讓老人治病。提出後，一條也不答覆，我就進行絕食鬥爭，表示抗議。一直絕食到第四天下午，去了幾個人把我拉起來，說要送我到呼市監獄去。我說：「一去就去！」跟著他們就走。到了外邊，把我狠狠的整了一頓。因我已經四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頂不住打了，我就昏了過去。到了很晚的時候，我清醒過來，看到錢基銀在那裡。他看到我醒來了，就答應借給我一百元錢寄回去，並讓我下掛麵吃。當我恢復吃飯以後，他們又變了卦，一分錢也沒有借給。』

『回呼市後，過了嚴寒的冬天，迎來了溫暖的春天，又進入了酷熱的夏天。在六個月漫長的日子裡，不准我洗澡，不准我換洗衣服，不准我理髮。我滿身都是蟲子，癢得實在難受。後來我經過多次請求，不知說了多少好話，革委會才准我到東門來拿換洗衣服和上街理髮。那天我在呼市大街上走時，臉很瘦，頭髮很長，後邊跟了不少大人和小孩追著看，以為我是個瘋子。在理髮之前，利用看押我的人一時不在，我就跑到照像館照了一張長頭髮照片。後來託人取出後，我就寫信並附上像片寄給中央首長，控告他們對我的迫害，同時也給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去信，揭穿吳法憲一夥的罪行。可是給

中央首長的多次去信都被林彪、葉群、吳法憲全部扣留了，只有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接到了我的信。並回信說：「逮捕你，我們不知道，望你來信把詳情告訴我們，我們好追查處理。」不幾天，這封信被抄走了。長頭髮照片和底片全被抄走，並由四院革委會將這封蓋有北京公安局軍管會的信與我的長頭髮照片轉給了吳法憲。吳法憲一看大怒，認為我太不老實了。因此，吳法憲就來電話和信指示要對我嚴懲，叫狠狠的整我。結果有半個來月的時間（這時我在東門十四單元三樓五號關押），每天晚上十點以後把我拉到辦公樓，推到一個小房間裡，摘去我的眼鏡，先是審問，然後就是七八個人上來拳打腳踢，一打就是兩三個小時。有時打的我滿臉是血（走時還逼我去廁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壞了，直到現在還經常腰痛。頭被打的腦震蕩，搞得我頭痛腦脹，精神時常錯亂。當時搞得我實在受不了啦，曾想到過自殺。但在關押我這個房子裡我找不到機會，因薛偉民、梁貴全同志每天都在屋裡不出去。外屋還有看押我們的人。有一次讓我替薛偉民去打掃大樓，打掃大樓的用具都放在辦公樓一樓西頭梯樓底下那間小屋裡。我進去以後，看到這個小屋很背，沒有人來，多少天產生的自殺念頭又來了。仔細看了一遍，就決定電死，我就把燈打開，把燈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觸電時，思想上複雜極了，鬥爭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這樣死了，不就是叛黨，成了反革命嗎？我家裡還有一個多病年邁的老父親，還有四個孩子，我這樣死了，他們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屬了嗎？同時我想到我又沒有幹什麼壞事，有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健在，問題再大也會搞清楚的，死了反而複雜了。我還想一個共產黨員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輕如鴻毛。我這樣自殺不是比鴻毛還輕嗎？結果我在那哭了一個來小時，下定決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挺過去。」

『對我的迫害並不到此結束。工宣隊進來後，原內蒙革委會負責人向他們傳達了吳法憲的黑指示：四院革委會又向他們介紹了我這個「反革命」的情況。因此他們繼續對我進行專政、迫害，多次審問我，多次毒打我、罵我、體罰我，直到他們撤走也沒有把我放出來，還在繼續關押。』

軍管後，吳法憲指示四院軍管會繼續迫害杜保同。『直到一九、一三』後，還在調查我。九月二十日，還派人到北京找吳法憲調查我和邢鑒等同志，去後，吳法憲已經抓起來了，空軍不接待，沒有辦法才回來。回來後還繼續迫害我，直到傳達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時，我這個深受林彪反黨集團迫害四年之久的受害者，政治權利還在被剝奪，不讓我聽傳達，還在政治上迫害我。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元月份才恢復了我的組織生活。在恢復我的組織生活前幾天，五、七幹校軍管蔣某到二十五單元二號我住的房間找我談話。他說：『準備恢復你的組織生活，你準備一下，再作一次鬥私批修。我一聽就火了，我說：你讓我鬥什麼，你們為什麼要把我的問題「掛起來」。你們想恢復就恢復，不願恢復就算，我沒有什麼再鬥的了。吵了一架他走了……』

強加給杜保同的『莫須有』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解除了對他的『群眾專政』。對杜保同的迫害，本是林彪一夥製造的冤案。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即應予以徹底平反。經他多次向黨組織提出申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七機部四院黨委會落實政策辦公室整理了一份《關於杜保同同志平反材料》。其中列舉充分的事實與證據後說：『因此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解除群眾專政，並決定給予平反。』但在當時並未正式作出決定給他平反。其後雖經杜保同多次申訴繼續要求徹底平反，都無結果。

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七機局黨組才正式作出《關於杜保同同志平反的決定》。這個決定寫明了杜保同被迫害的經過和對此冤案徹底平反的結論：

杜保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為群眾組織通過其兄穆欣向黨中央遞送過在調查四院一位領導幹部的問題時，無意中發現了林彪死黨葉群在國民黨『戰地青訓班』受特務訓練的情況的材料，竟被林彪及其死黨吳法憲以及『四人幫』在內蒙古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吳某等人給扣上『反革命壞頭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五·一六分子』等罪名，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夜，由林彪小艦隊何汝珍等人，盜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在北京抓捕了杜保同同志，並押送回河西公司繼續審查。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才解除了對杜保同同志的隔離措施。杜保同同志在被林彪死黨吳法憲、葉群和『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關押（二年）審查（四年）六年當中，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身體上受到嚴重摧殘。家屬子女及親友也受到了株連。

根據黨中央有關平反冤、錯、假案的指示精神，經局黨組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強加給杜保同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和莫須有的罪名，統統推倒，在政治上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並做好善後處理工作。在被審查期間本人所寫的材料和組織上整理的材料，全部銷毀，查無下落的材料一律作廢。

三、子女的劫難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謝富治下令把我抓起來的時候，我的兒子星星和陽陽及小女兒小玫（小妹）三人年齡分別為十四歲、十三歲、十歲，他們均由自幼把他們帶大的姥姥李師儀照看（當時已年過花甲）；家裡還有正在北京機械學院上學的妹妹杜愛菊（應屆畢業學生，那年二十五歲）和在第七機械工業部上技校的十八歲內姪女張樂天。後因我妻於九月中旬離京往江西老家避難治療，我岳母隨後帶著我們十歲的小女兒（幼年因病導致聾啞）也前往老家，以便照料我病重的妻子。

光明日報社造反派見張卉中突然『失蹤』，便勾結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夥四處偵緝，並多次派人追逼我的兒子、妹妹和姪女說出我妻子的去處。他們把我妹妹和姪女關在報社辦公樓頂樓的一間沒有窗戶、沒有床鋪和任何傢具的小房間裡審問，威脅說：『這是關穆欣的地方，你不坦白交代，就不會放你出去！』並要她們『坦白』穆欣的『五·一六』罪行。就這樣把她們關了七天七夜。數月後，于新野在南昌找到了張卉中，於是母女、祖孫三代人一起被押送到了九江市。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張卉中先被飛機押送北京，而老人和孩子卻被關押在九江。半個多月後，報社『造反總部』派人將她們帶回北京，下了火車卻不許她們回家，而是徑直送到報社七樓審問（這時，張卉中已被關進秦城監獄）。他們逼問老人張卉中帶走的『兩箱』『黑材料』（指整葉群的材料）藏在什麼地方。因為純粹是無中生有的誣陷，自然無法找到『黑材料』下落。因為無法向他們的『首長』交賬，這些人狗急跳牆，竟連老人和殘疾的孩子都不放過，把祖孫兩人關了好幾天才放出來回家。

接著，我的全家人都被『掃地出門』，到報社臨時招待所裡住。從一九六七年十月份起，我的工資被停發，此後整整四個月，家裡經濟來源完全斷絕。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妹妹向同學借錢維持。在家人再三的交易下，報社才開始每月給我的三個子女每人十五元的生活費，老人只給十元，其他人分文不給。

我的家人被掃地出門後，原來的五室套房先被查封、接著就被姚文元新派到報社的那個頭頭佔用了。而我的岳母、妹妹、姪女及孩子們，全家老少六口人被趕進了報社臨時招待所的二間房內（相連的套間）。這裡不單住得擁擠，也沒有煤氣（怕我家給不起錢，故意給關死的），他們一直過著受餓挨凍、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尤其我的三個孩子，在我被抓後的近八年中，在生活上，他們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煎熬；在精神上，遭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其間，他們用煤球爐做飯，因中煤氣差一點送命；他們曾多次被關押受逼供和被人跟蹤、盯梢；他們曾被辱罵為『小特務』、『反革命家屬』；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一年，我的兩個男孩先後被趕到農村插隊勞動。其後，回京探親時，經常受到無理盤問和非難。造反派不准他們探望被關押在監牢裡的父母親……他們吃的苦、受的難，一言難盡。

一九六八年秋，我妹妹愛菊因受我的牽連，被發配到青海省西寧某家工廠勞動。在離京以前，她多次受到我報社造反派的圍攻和審問，並受到本校造反派的誣蔑『穆欣是大特務，杜愛菊是小特務』。這些政治迫害造成了她心理上的嚴重創傷。

原本可以多照顧些家裡和孩子們的妹妹走了，使孩子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依靠。孩子們天天縮在小屋裡，不敢外出。他們小心翼翼，整天過著惶恐不安的生活。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發出有關加緊備戰、疏散人口和修建防空洞的「號命令」後，報社『造反總部』一面逼迫我那年邁體弱的岳母每天參加防空洞施工的繁重勞動，一面又無理停發她每月僅有的十元生活費，使原來已十分艱難的生活變得更加貧困。我那年幼的第二個兒子陽陽（大兒子已去了農村）只好同老人商量，是否將小妹妹帶走。起前往九江老家。喪盡天良的『造反總部』頑頭借機逼老人將戶口遷走。在我岳母離京後不久，姪女張樂天因被誣為『特務』，在七機部受群眾『專政』。年輕輕的她，在備受迫害後，於一九七一年被送到河南農村勞動。我們的三個兒女的名字依次叫星星、陽陽、小妹（奶奶一度給她取名『小月』，沒有叫開，以後改稱『小玫』），我姪女樂天自幼在我家裡長大。七機部的造反派們別有用心地把『星』、『陽』、『月』和『天』合在一起，拿到大會、小會上作為批判我和張卉中的子彈，誣陷我們『是大野心家，想要霸佔整個宇宙！』這夥人的品格何等低賤，手段又何其卑鄙！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小妹離開姥姥，獨自從九江回到北京，因為她想上學。不久，在北京第六十二中學就讀的陽陽被迫到京郊大興縣插隊勞動。這樣一來，在短短的幾年內，我們一家原來的八個成員被驅散到了七個不同的地方受苦（我和張卉中同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也不能相見互不知情）。我們和兒女相互不通音信，直到隔絕五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他們才第一次被允許到秦城監獄，在監管員的嚴密監視下，分別與我們作短暫的見面。

我的大兒子星星是家中最早被迫離京、也是最遲回京的人。一九六八年，他被發配到了東北邊陲哲里木盟扎魯特旗香山公社廣新堡大隊。從學生一下子變成農民，很不適應，但他默默、頑強地承受

著。這年初冬，他十分惦念幼小的弟妹和其他親人，回到了北京。可是，他剛進北京，就被一幫兇煞惡神抓關起來整整審查了八天，接著被趕回了東北。一九七〇年冬，星星趁回京探親的機會，先到河南老家看望爺爺，隨後去江西九江，探望在舅父家避難的姥姥和小妹。誰知，在九江，大舅父正被造反派揪鬥；後來，他到達德安，五舅舅也正被抄家、揪鬥。他便懷著無比的憤慨回到了內蒙。

星星在大隊裡勤奮勞動，表現良好，一九七三年，他被當地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可是回到北京辦理入學手續時，卻被謝富治手下某個紅人以「反革命家屬」為名「刷」了下來，不准入學。雖然孩子在農村插隊勞動了很長時間，而且身體有病，但是就是不能被批准回城，儘管當時國家允許有病的知青回城。那時，有些家長為了孩子回城，只好受「知青辦」（知識青年辦公室）的人員敲榨勒索，將這些看在眼裡的星星寧願留在農村，也不願向那些貪得無厭的傢伙行賄。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在鄉下一幹就是十個年頭，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才把戶口遷回北京。

陽陽被下放到大興縣禮賢公社龍頭大隊插隊勞動。當時在他們學校同年級同學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被分配在北京的各工廠勞動，而家裡「有問題」的他則被趕到農村。在那裡他勞動了六年。他雖年歲較幼，身體瘦弱，但表現較好，貧下中農曾多次推薦他回城當工人，但遭到了上面的否定。一九七四年四月，他總算回到了北京。為了承擔家庭的負擔，他到冶金建築安裝公司當了工人。雖然這裡幹的是粗活，勞動強度很大，但畢竟是回到了「家」裡，可以就近照看孤身留在北京聾啞學校讀書的小妹妹。

一九七一年，我的小女兒小妹在她二哥哥陽陽到農村插隊以後不久，又開始上學了。這時全家八口

只剩她這個十四歲的聾啞姑娘孤零零地留在已經破碎的『家』裡。她被造反派趕到了樓下的一個小房間裡住下。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屋內床下搜看一遍才敢鎖門睡覺。一九七二年底，她從聾啞學校畢業。在分配工作時，她不僅受到了因父母牽連的壓力，還受到了社會的歧視。別的同学大都分到工廠工作，卻要她，一個身帶殘疾的女孩子，到京郊山區果樹隊幹苦力。後來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和哥哥、表姐的支持下，她先後到青海、內蒙和天津、武漢、上海等地學習繪畫藝技。

八年的劫難對子女們是異常嚴峻的考驗。他們經常蒙受飢寒交迫的煎熬，紛至沓來的侮慢歧視給予精神上的折磨則更加難以忍受。正如星星所記述的：『生活絕不僅使我們精神上單一的受害，物質上的困苦隨之而來。使我們不能全意地觀望，而要在不習慣的經濟拮据中，在飽餓相間中，守著同樣空空的精神肚皮。』

突然降臨的橫逆給孩子們帶來了不幸，但也使他們在災難性的遭遇中受到了錘煉。他們的意識迅速地覺醒，他們的思想比身體成長得更快，成熟得更早。連年歲最幼、患有殘疾的小妹，從親身經歷的磨難中，深刻體會到世態的炎涼，看透了那些害人蟲的醜惡，學會了憎恨。她在所寫的《自述》中回憶了一九七一年自己決心獨自從江西回北京復學的經歷：『小妹在這年齡開始有思想，不過仍處於幼稚、不穩定的狀態。小妹第一次開始獨立思想和獨立行動，離開了可敬、善良的姥姥和佩服的舅媽以及活潑可愛的一群小弟弟……姥姥為難以挽留小妹而難過。這時的小妹內心十分痛苦，因為只有分離才能使姥姥得到安靜，於是小妹堅決地走了。從農村到九江，九江到武漢有表姐送，停腳不多，到武漢便開始單獨上路了。』對於一個還不足十四歲的聾啞姑娘來說，能下這樣的決心並且單身從武漢

乘火車回到北京，也真難為她了。

年長一點的男孩子，對於這段夢魘般經歷的感受更加深邃，思想上的啟迪要更深透得多。突然襲來災難給他們帶來難以想像的不幸，但也逼使他們在第一輪的沉重打擊下開始思索，幼小脆弱的心靈迅速變得堅強起來。兄妹中居長的星星在回憶這段不幸時說：『一九六七年八月最後一天的夜晚至九月第一天的凌晨，我了解到了恐懼是什麼：是人類本性中最殘忍的、幾乎不可抑制的情緒與行為。革命的恐怖，只是再加上某些人有目的的強硬意志。這些在那幾小時裡形象化同時概念化了、房屋裡的一切東西的破壞，媽媽的重傷，爸爸幾天後被綁架……很說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很快，這一夜預示的命運出現並規定下來了。我將在「革命的對象」的道路上去作長期的旅行。我不相信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但社會接受了，所有與此有關的人承認了，並一日復一日地強迫我也接受、承認它。當人們的臉變成兇相：我們被「掃地出門」，學校（當時是軍宣隊）反覆作與家庭劃清界線——幾乎強迫的工作。我開始與那些疏遠，似乎真有過錯似的獨來獨往，無聲無息的活著。幸而我有一批與我「新」身份相同的夥伴，我們一起承擔社會對我們的不公、歧視、冷眼和壓迫，一同懷著沉重的心思，不解地觀望著，當然還是有所期待地觀望著。』

他還說道：『當革命革到我的家庭以後，直至今天，我所看到、聽到和親歷的所有事情，是我所受的可憐的教育不曾講到的；是我所看到的書籍中不曾記載的；是革命傳統說教裡一點沒有提及的，更是在我這孩子的頭腦裡，夢幻裡不曾、也不完全不可能想到的。但我們須一點一滴地全部接受它，一點一滴地全部經歷它。於是，我慢慢的拋開了以往的一切，開始一點一滴的全部的考慮，認識它。』

開始自己獨立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思想，都是發生在這段時間裡。現在（而絕不是當時）我甚至要為此而感到慶幸，慶幸我所失去的和我所得到的。雖然付出了極高的代價，損傷了全部的感情，被毀壞了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得到了，並成為了我自己。它決定我個人（對於個人），這全是重要的。它決定了我的性格、作風、感情、思想。我相信：這決定了我的未來。」

在漫長的歲月裡，他們困難重重，需要一再鼓起勇氣拚搏。『社會、環境時常提醒我們的身份、處境。每次填寫簡歷，或其他五花八門的表格時，「出身」一項總是令我們無措的。每到這時我們總要討論一下，當然儘量輕鬆地討論。最後我們乾脆空著，或胡亂地填寫。「出身」，出身這玩意是誰的發明呢？他給統治者真幫了大忙。為這一項，便有許多人被壓在社會最底層了（那時有篇文章，提到我們這樣的人是「一落千丈」，所以我們也自視是在最底層生活）。這也好，它時常提醒我們。隨之，不管在心理上，還是現實生活裡，我們都相對保持我們最底層的獨立性。我們嚴加防範有人闖入我們的領地。我們更不把心底的一絲一毫示人。讓應該高高在上的人們，盛氣凌人地去忙他們的偉大事業吧，我們在最底層，在偏僻的農村，在小角落裡，得到了喘息，得到了恢復。之後我們就要前進了，雖然是在「地底潛行」（這是我們喜愛的普希金贈給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的詩歌中的詞句）。』

好在他並沒有失去這種拚搏的勇氣，而且一起插隊的同學中，不乏同病相憐的小夥伴，有『同舟共濟的朋友。路途是遙遠的，然而並非我一人獨行。也許是命運，我和我的朋友走到一起，共同生活。』他們毫不屈服地面對兇猛撲來的災難，他們『在一間屋裡，在一條炕上，共病相憐，同命相依地開始自己的生活』，相互激勵，同心協力地向這種天外飛來的不幸命運挑戰，排除不斷襲來的悲觀，

無望、消沉的情緒。他們在極端困苦中不曾絕望，在泰山壓頂的沉重壓力下依稀看到未來，看到希望：『青春的生命力是強盛的，在每個人受了傷害的心裡，又滋長了希望，她強勁的力量勝過了沉重的擔負，在還流著血的傷口下面，新肉在暗暗的癒合。我們都看到了希望，都知道自己沒有失敗、垮掉。』

自然，到達這樣的境界，需要剛毅的意志和堅強的勇氣，需要戰勝許多迎面撲來的挑戰，還須克服自身的許多弱點：『那不是簡單的，容易的，我們是怎樣從那一天開始的啊！我們又是怎樣地走過那一步一步。我們的身體、境況幾乎完全一樣，自然易於相處；但年齡、性情各不相同，又有著不等的距離。初起，在我腦子裡寥寥無幾的時候，大同學們更被那遭遇壓得厲害。他們的沉默，只說明他們的感受無以吐露；他們不安，腦子裡有無數的念頭在翻騰。時常在我們的小屋裡，氣氛是那樣的沉悶，令人容易經常的沉默。昏暗的油燈似在預兆著什麼，每人的眼光都在暗中凝神。但大家總是不對心中的痛處談論什麼，那是瘟疫，釋放出來雖然只有片刻的輕鬆，彼此以為安慰，卻更嚴重的毀害自己。逐漸我了解大家的沉默，許多事上只靠心心相印，不靠語言。自己忍受一切，自己戰勝自己的弱點，決不讓瘟疫泛濫，也不再讓魔鬼找到機會。那是在農村的第一課，卻是自己教會自己的。』

及至八年冤獄終了——一九七五年五月間，我回到了家裡，子女們都已長大成。小女兒一見到我，高興地在紙上寫道：『我今年十八歲，要「獨立」了。』他們經受住了這場浩劫的考驗，學會了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做人。儘管各自還都留有這場災難『賜予』的各種病患，一家五口總算經過九死一生的大劫難後重新團聚，內心的喜悅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

他們沒有辜負家人和親友的期望。打倒『四人幫』後，他們堅持刻苦學習，勤奮的工作，儘力找

補『十年浩劫』耽誤了的時間。此刻，老大從事文物工作；老二在建築方面發展；苦命的小女兒，也如願以償地讀完了長春大學特教學院美術系的全部課程，並繼續回到北京榮寶齋習畫。他們正在各自的事業中不懈地耕耘著。

四、父母驚恐、悲憂而歿

『十年浩劫』期間，光明日報社的造反派不僅喪心病狂地摧殘我們年幼的子女，也不放過我們年邁的父母。

『文革』初起時，同在一八九五年出生的我的父母均已年逾古稀。我家世代代務農。父親幼年進過兩年私塾，粗通文字，終身務農。他因勞累過度，得下多種疾病；母親畢生操勞家務，老來也常有病痛，已喪失勞動能力。家中生活，一向靠我和弟弟以工資接濟，勉能維持。

早年，我因在學校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勒令退學』後，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遠離家鄉投奔革命。為防家庭受害，我離家後改名換姓，很少給家裡寫信。結果還是很快被國民黨特務偵知。河南反動當局即對我們一起潛走的九個人下令『通緝』。父親曾因我參加了革命部隊，兩次被國民黨政府抓去坐牢，飽受酷刑；母親為長期思念我而幾乎哭壞了雙眼。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我被造反派揪鬥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河南，家鄉的造反派也乘機鼓噪。

家裡人怕我老母受不了打擊，就想法瞞著她。二月下旬的一天，正當家人談論起我的事時，不慎被她聽到。她頓生悲憂，驚恐交加，坐臥不寧。從此，她就不吃不喝，病情迅速惡化。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母親終於在驚恐不安和極度悲憂中去世。

母親去世不久，我和張卉中、杜保同因遭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而相繼被拘捕。吳法憲的幫兇夥同杜保同所在單位及光明日報社的造反派，連續不斷地派人前去我河南家鄉『調查』、抄家，迫害我老家的親人。他們盜用中央軍委名義，向公社、大隊和小隊社員宣佈我們是『現行反革命』，用高壓手段把我老家的親屬打成『反革命家屬』，還逼索杜保同送回家裡的『整葉群的黑材料』。老家老小六口（四個孩子是杜保同的子女），沒勞動力，而我們夫婦和杜保同都被關押，停發工資，音信皆無。他們只好向親戚借糧和挖野菜維持生活。父親早已患病，遭此打擊，病情驟然加重，卻無錢醫治。那些前去『調查』的人，抄家、逼供，更使他深受驚嚇，以致病情逐日加重。一九七二年，我弟弟杜保同在獲得『自由』、趕回老家時，父親已經奄奄一息，神志昏迷，不久，悲憂而歿。

我弟弟杜保同在控訴林彪、吳法憲一夥對他迫害的罪行同時，也揭露了他們指使家鄉造反派迫害河南親人的事實。當時，我弟弟杜保同的家安在老家河南。我父母與他的妻子和四個兒女住在一起。在我母親去世後，家裡剩下的是一老四小一弱女。自從造反派用老家一些壞蛋提供的假證據、假材料把我家的成分從中農改為富農和宣佈我弟媳和姪兒女們為反革命家屬後，全家陷入絕境。他們不許孩子升學、入團，逼他們參加『可教育子女』的學習班；他們不准家人給我弟弟寫信，也不准我弟弟寫信、寄錢給家裡，全家老少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貧困日子。

我弟弟在控訴時說：『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兩個春節，別人家歡歡喜喜過團圓節，我家呢？什麼也沒有買，連一斤肉也沒有買。哪有錢買肉呢？糧食還是親戚們送去的，不然飯都吃不上。春節那天早上，家家戶戶又是放炮，又是歡歡喜喜的穿著新衣拜年，我們家全家大小在屋裡痛哭。因我的不懂事的小女兒，一起床就問她爺爺、媽媽：『爸爸為什麼不回家過年？』這一問更使我的父親、妻子和大孩子難過，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我這個「反革命」的兒子、丈夫和爸爸是否還活在人間。一九六八年的春節，我父親哭得昏了過去。這兩個春節，我全家是在眼淚中度過的。』

『我的父親當時快八十歲了，因以前勞動過度，得了好幾種病。過去由於他心情愉快，治療及時，病情一直沒有發展。在這以後，家裡的一貧如洗，特別是政治上的壓力，使他憂心如焚。他擔憂，如兒子不在了，孫子、孫女由誰來管呢？結果病情一天天加重。等我趕回家看他老人家時，雖然他見到我了，但是已經不認識我了。結果，我只伴了他幾天，他就去世了。』

縱觀中國歷史，曾有無數暴君實行專制主義的文化政策，採取殘酷手段控制人民의思想和行動，大興文字獄，受到殘酷處罰者比比皆是。『十年浩劫』期間，林彪、江青窮兇極惡，大張文網，大興文字獄，傾陷異己，禁錮人們的言論，以排除其篡黨奪權的障礙，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造成許多亙古未見的人間慘劇。筆者也因林彪、江青一夥強加的莫須有罪名而身遭八年冤獄的災禍，使三代人遭受株連，遠在家鄉的父母也遭株連含恨謝世。每當想起這場浩劫，大有『犬子積禍，累及考妣，橫被凌轢，遂至顛滅，辱沒祖宗，不忠不孝』之慨，雖然是『在劫難逃』，自身無力抗拒，罪魁禍首乃是林彪、江青。但是每逢念及父母的不幸厄運，總感到深沉的歉疚和不盡的悲愴。

第十六章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我被抓關押期間，光明日報社的造反派夥同中央專案組的一些成員，不但對關在監獄裡的我和我妻張卉中大搞『逼、供、信』，還在監獄外面通過『外調』手段，羅織罪名，對我們夫婦、所有親屬以及報社內外受株連的同事進行陷害。姚文元派到光明日報社的那個頭頭還在報社動員職工開展所謂『批林、批孔、批穆』運動，對我大張撻伐。

一、偽證製造者的自供——一個造反派小嘍囉的筆記本

張卉中在獄中寫的申訴信中，曾經揭發光明日報社造反派外調『不是為了弄清問題，不是對組織

和人負責：而是先有結論，再去找假證。」從我在無意間得到的報社造反派『外調員』金某的一本記事本所記載的內容來看，完全可以證實這一結論。

這個金某原是一個不學無術、不求上進，曾被黨組織清理出來的人。這樣的一個人卻得到了造反派的重用，竟然擔任起辦案的調查任務，可悲呵！在金某的這個筆記本裡，詳細記錄了張宏學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對派出調查我和我妻的金某和另一些人的一番『訓話』。張宏學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外調重點是特務問題』，要『力求符合要求取回物證和旁證』。

金某的『外調』正是按照這個『指示』進行的。在這一本專門記載迫害我們全家事項的筆記本上，寫有三百三十一個他們需要外調人的名字（不包括那些有姓無名，或有職務而無姓名的幾十個人）。在一些他們不知下落或不明生死或不知身份的人名下標有記號，並註上了『尋找下落以擴大特（務）證（據）的線索』的字句。這些將被『外調』的對象很大一部分是社會渣滓，如『原日偽政務警長』、『原偽警察局長』、『原日本憲兵隊突擊隊情報員』、曾在日本憲兵隊作過密探的『勞改釋放犯』、『原天津勞改犯』，原國民黨政府『高二分院首席檢察官』、『原江西省黨部書記長』、『黨證特字一八三六二號』國民黨特務，以及『日偽縣長』、『偽保長』、『甲長』，甚至還有罪大惡極、人民政府『已鎮壓』、『已槍斃』的朱某、曾某……等等。

金某等人從他們那裡究竟搜羅到了一些怎樣的、可以用來致我們於死地的『罪證』呢？不妨舉例子一看。金某在九江看守所裡找到了做過『軍統少尉譯電員』的國民黨特務黃子如，筆記本裡如獲至寶似地錄下這個人的口供：木（穆）張兩人運了一部電台到九江。他們有個女兒，文化大革命期間發

了幾次報。電台先在東門外，後轉廬山。欣紅梅，在北京一無線電學校。」

前文講過，我們有個女兒叫穆小玫，幼患聾啞。一九六七年我被江青關起來的時候，她才剛滿十歲，在北京第二聾啞學校讀書。這些情況，筆記本的主人自然全都知道，卻還要拿這種被他逼出來的『口供』羅織罪名。哄騙共產黨，豈非蓄意誣陷？

張卉中原是南昌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歷史清白，思想進步。在南昌解放的第七天，她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南昌解放前夕，張卉中曾與進步同學一起，與反動校長張矯作過鬥爭，引起了她對張卉中的仇恨，並始終懷恨在心。『文革』中張卉中被捕後，張矯一口咬定她是國民黨反動『應變會』分子。張矯是什麼人？金某在筆記本上是這樣寫的：『曾任南昌女師校長、國民黨員、國民黨江西省書記長』。張卉中根本沒有參加過張矯遵照偽教育廳指示組織的這個反動『應變會』，可是專案組以張矯的所謂『證詞』誣陷她。張卉中曾提供了五個人可以為她作證，有的就在北京。但姓金的一個也不找，偏偏跑到南昌去找這個曾受過進步學生鬥爭的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張矯捏造偽證。專案組的張宏學就根本不問青紅皂白，將金某『外調』來的偽證作為被審查者張卉中的歷史污點寫進了『結論』。

當時有個九江市甘棠公社製鞋廠的蘭萬福，冒名寫了一封『湖北武穴人徐長生的坦白檢舉信』。信中他揭發張卉中和她弟弟張震東是日本特務。在姓金的這個筆記本中，對蘭、徐兩人情況也有記載。其中記述『蘭萬福的主要問題』：『蘭做過偽保長、偽軍官，參加過青紅幫，陷害過廚工是土共（新四軍），一九五九年因紅幫、因貪污，受處分，是『抗日戰爭時期武穴大漢奸阮忠才（已鎮壓）的太保』

（徐長生則曾『在日本憲兵隊當翻譯』），可是，金某去九江追索張卉中的時候，卻從這樣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手中接過了所謂的證詞。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九江市革命委員會機關黨總支部在《關於張震東同志政治歷史問題復查結論》中指出：『張震東與徐長生（已拘留審查）兩人素不相識，「坦白檢舉信」並非徐長生所寫，而是蘭萬福冒徐長生之名，發泄個人私憤進行誣告。現在冒名人供認不諱……檢舉材料本身沒有一點事實依據，而是搞了一些假象來欺騙組織。』

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張卉中出獄。很快，她把這份對張震東的『復查結論』的抄件親手交給中央專案組的張宏學，要求他們按此文件予以平反。結果，這年六月二十六日，張宏學這個中央專案組還是根據金某從誣告犯蘭萬福那裡搞來的、『沒有一點事實依據』的偽證硬塞進張卉中的『結論』。直到張卉中含恨死後三年零九個月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才給她作出徹底平反結論，否定了對她的一切不實之詞和撤銷了『原中央專案組辦公室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對她所作的結論。』

這個姓金的『外調員』對待那些真正的特務、民族的敗類是如此地堅信不移，可是，對待實事求是說真話、拒偽證的好人卻懷著無比仇恨，給予無情打擊和迫害，包括無恥的性騷擾。凡同我們有點關連的人，金某都要千方百計地逼迫他們按已定的口徑提供『證明材料』，甚至經常與地方造反派組織公開勾結，將『不聽話』的人置於死地。在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垮台以後，許多受過金某一夥『外調』而深受迫害的人寫信，揭露他們殘害無辜的罪行。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家住江西九江市的、張卉中的一位當教師的蔡姓女同學給她來信說：『當

時金某來九江不知搞什麼鬼，致使我單位的某些人，由於你的問題，對我大做文章。說你是「五、一六分子」，帶了大批「黑材料」潛逃了。他們逼我「檢舉揭發」你的「罪行」，否則就要被打倒，就罪該萬死，等等。並且從那時起（一九六八年九月份）勒令我帶病上班（因為我是長期病號，已被編外），在家交待了我與你的同學關係，並說了以前你在學校的表現。他們說我為你塗脂抹粉，威脅說你的問題很嚴重，定要我坦白交待。我沒有什麼可談，他們就對我開批鬥會，採取強逼推拉、低頭彎腰、呼口號等手段對付我。當時血壓到二百七十至一百五十六，將近死亡邊緣。他還不准我的兒子參加紅衛兵和上學……」

「一天清晨，金某突然闖進我房門。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早找我？他支支唔唔，說還有問題要問我……」這封信活生生地勾畫出這個造反明星的一副醜態，一個流氓的無恥嘴臉和一個強盜的黑心。蔡女士與張卉中僅僅是同學，已有十多年沒有來往，『文革』中更無任何接觸，竟被如此迫害，令人憤慨。

對於張卉中當時為避難養傷時寄居過的人家，姓金的及其同夥在『外調』中對待他們更是殘暴之極。張卉中曾在湖北省黃石市稅務局張振鋒同學家裡住了十天，張家夫婦就被『外調』的金某等勾結當地造反派殘酷地整了多年。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張振鋒寫信給張卉中說：『自你走後，於一九六八年五月間，外調人員來黃石。我單位立即對我進行監護，勒令反省交待，開除群眾組織，不准外出，不許回家，並對我家中抄查，懷疑你帶有什麼材料，給我的罪名是「窩藏特務，窩藏五、一六分子」。當時有人說你是「蘇修特務」，有人說你是「美蔣特務」，還有人說你「在黃石到處神出鬼沒的活

動」。從此周圍的人都把我看成是犯了大罪的人，甚至視為敵人，誰也不敢理睬我們夫婦，自己感到壓力很大，抬不起頭來。隨著運動的發展，經受了群眾多次批鬥，寫過無數次的反省交待。我們這裡的造反派把你來黃石這件事列為黃石「十大事件」之一，幾次在全市大會點名，點我單位和你接觸過的有關人的單位的名，據說有時還點到個人。在掀起深挖猛揭的高潮中在一次大會上指出「穆欣的老婆來到了黃石」「黃石市是五·一六的試驗場，後勤部，避風港」。當時還散發了鉛印的市首長在大會講話紀錄。」信中又說，他妻子李女士也受到牽連，被停工作，長期遭受殘酷「審查」、批鬥。

當我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從秦城監獄出來的那天，中央專案組（張宏學所在的組）曾向光明日報社領導小組說過：『中央沒有給我們審查他（穆欣）是不是一五、一六』的任務』。可是張宏學等人背後勾結報社造反派，向金某等人面授機

宜，加緊對筆者的逼迫、迫害。而這個姓金的及其所代表的『造反總部』，從報社內部跑到秦城監獄，從北京跑到湖北、江西，到處誣陷我和張卉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黑後台』。這個姓金的筆記本中白紙黑字記載著，張宏學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對他們『訓話』時，反覆地說什麼『要突出政治，高舉主席思想紅旗』，『用主席思想指導我們行動』，『毛澤東的書天天讀一小時不能少，每周一個學習日雷打不動』……可是，從上述的種種事實看來，他的言行，連同下面的金某等人，完全是按他們所效忠的『林副統帥』的那套『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手法，堪稱『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典型。

二、何來『批林、批孔、批穆』——看報社頭頭編造的『姚文元語錄』

一九七三年八月，江青、張春橋一夥的輿論總管姚文元給光明日報社派來了一個新頭頭。此人與早就進駐報社的軍宣隊政委和報社原來的一個副總編輯，組成光明日報社的『三人領導小組』。從這年下半年起，這個領導小組，根據姚文元的『指示』，多次在報社全體職工中發動『批林、批孔、批穆』運動。批判的基調是：『穆欣是「五·一六黑後台」』；是『報社搞復辟陰謀最大的人物』，『批

穆和批林、批孔是一致的，他們都是要復辟、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

我自監獄出來後，經常聽到人們對這位新來頭頭的議論，特別對他多次煽動『批穆』看法較多。一九七六年底，在『四人幫』垮台後，我偶然看到一本關於姚文元同這個『心腹』五次談話的紀錄。扉頁上印有《按語》：『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為了嚴密控制《光明日報》，三年來，他多次召見其嘍羅談話，從宣傳報道到機關內部工作都有具體「指示」。姚文元在談話中施展種種陰謀詭計，××則心領神會，每次談話後，××回報社即要大事宣揚一番，並編成一本「姚文元語錄」材料，強令報社同志學習。這裡把一九七三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的五次談話整理出來，供同志們批判用……』也在這段時間，報社的一位職工給我送來一份紀錄，裡面記錄著這個頭頭歷次傳達姚文元『指示』及其據以動員『批林、批孔、批穆』的講話。將兩者相互對照後，我發現這個頭頭的『傳達』不僅忠於原著，而且在關鍵處大都作了頗為精彩的發揮。

只要稍加仔細地讀一下這兩本紀錄，不僅能夠從中了解，在我被關進監牢這段日子裡，『四人幫』是如何對我這樣一個無辜者肆意誹謗，進行陷害的；還可看到姚文元不打自招地供述為『四人幫』控制《光明日報》以適應其篡黨奪權需要的『經驗』；同時根據姚文元與這個頭頭的自白，也可看到他們是怎樣好話說盡、壞事幹絕、『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派手法。

姚文元對這個由自己派到光明日報社的新領導人始終關心備至，面授機宜。八月間，當他剛走馬上任時，姚文元給他打氣說『今後一個月找你談一次話』，『有什麼事，可以來找我』。

姚文元第一次找這個頭頭談話是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大講一通《光明日報》這個陣

地的重要性後，故意危言聳聽地說：『「敵人」是不會放過《光明日報》的』，『要注意背後有人』，聽了姚文元的這番訓教，這個新頭頭似乎茅塞頓開，立即批判起胡喬木在《光明日報》創刊不久曾說的一句話，即『《光明日報》是為民主人士提供「自由論壇」，做到「野無遺賢」的』（早已受報社造反派多次批判）。其實，這個頭頭曾較長時期在胡喬木領導下工作，他知道江青一夥同胡喬木勢不兩立。他在這時故意拾人唾餘，無非是要討好江青一夥。

這時，姚文元同他講了一段反對周恩來的黑話：『你們要認真學習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要牢記「四個存在」。編報的時候總要想一想這個問題。前幾天你們發生圖片折版的問題，我就打電話告訴你們。這本來是件小事，由於不注意，把人家的頭部折了（指周總理照片），我是有意識告訴你們的。』頭次談話，姚文元就以輕蔑諷譏的語氣把周恩來稱作『人家』的時候，無疑是把這個頭頭當作『自家』人進一步和他套近乎的。姚文元的眼力不錯，這個頭頭的確不曾辜負他的重託，對他發出的『指示』忠誠執行，從不含糊，總是主動加碼，『超額完成』，並在有些地方有所發明，有所創造。這個頭頭不單長期對筆者進行無中生有地誣陷，同時採取殘酷手段鎮壓所有敢於反對者，把這張報紙牢牢套在『四人幫』的戰車上，甘當江青一夥的馬前卒。

在這次密談中，姚文元還將自己如何接管、控制《紅旗》雜誌的『經驗』一一地傳授給他。他要這個頭頭『花兩年、三年時間把《光明日報》辦好』，『要親自挑選調進幹部，單靠組織部不行』，『主要是青年人，三四十歲的……』

這年的十二月九日，他倆進行了第二次單獨談話。姚文元對他大談特談的還是幹部問題，但比起

前一次，談得更深入了些，因為他點出了幹部問題的本質，『主要是領導權問題。領導權是不是在無產階級手裡，各部門負責的編輯工作人員，從事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人員，都應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學術不要靠專家，要打破迷信，培養青年。他們犯點錯誤不要怕』，『……專家是團結的對象，領導靠主席思想』。

這個頭頭雖然帶了八個人來接管了《光明日報》，但仍感到勢單力薄，信心不足，他再次表示希望姚文元幫他調一些人。對於他的要求，姚文元告誡他在這個問題上要格外『小心』，『還是像我上次給你說的，要調你了解的，一個一個地調。調新的，要持謹慎態度，政治工作你自己要抓。要調一個做政治工作而又不當官的，不容易。調個地委書記，或者從部隊裡調，不一定合適。這方面教訓很多……』這些都稱得上是肝膽相照的肺腑之言，姚文元把他們用人時也要『懷疑一切』的老底都透露給他了。

姚文元在與這個頭頭的五次談話中，自然每次忘不了對我造謠誣蔑和要求這個下級大張旗鼓地『批判穆欣』。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姚文元向他『指示』說：『「五·一六」後台就是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和穆欣』，『「五·一六」是要清查的，穆欣是個大壞蛋』，並要他回到報社辦學習班『學習班結合批林、批穆欣，發動兩派一齊批，批一兩次，但不要動另一派。』

為了集中力量批判和清查『五·一六』分子，打擊我這個『五·一六』後台，姚文元對他千叮嚀萬囑咐，怕他『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繃不緊，『要注意真正的「壞人」』。他還給這個頭頭出主意，讓他回報社設法『安撫』慘遭逼供信迫害的『那一派』群眾：『要對受整的那一邊講，你們不要把運

動中的問題，受到一些衝擊，同逼供信混為一談，就是有逼供信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們經過運動，受到鍛鍊，何況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衝一下有什麼壞處，無非把錯誤去掉嘛！像搞逼供信的，也取得了教訓。要想主席路線，不要老想自己，這樣才有利於團結大多數。對於真正的壞人、『五·一六』還是要清查的。要對他們說，不要想到個人得失，要想到怎樣把路線貫徹好。不從提高路線覺悟著手，問題也解決不好。在運動中受到批判，在報社的具體情況下，有個穆欣，也的確有那麼些問題，運動過程中，受到些批判，何必糾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姚文元在第二次與這個頭頭談話時，對他在前一段的所作所為大為誇獎。他說：『這幾年，先是穆欣搞了壞事，林彪一夥又插了手，現在才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辦報了。』這個頭頭受寵若驚，把姚文元對他作的『批林批穆』指示迫不及待地散發到報社職工之中，並講成『經請示中央得到批准』，一會兒說成『中央負責同志指示』，過會兒又說『姚文元同志又做了新的指示』。對這樣的人，除了說他『嘩眾取寵』、『招搖撞騙』之外，還能說什麼呢？可惜戲法變得並不高明，一眼就能讓人識破。——這種故弄玄虛『拉大旗作虎皮』唬人的手法，也是姚文元手把手傳授給報社頭頭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第一次談話時，姚文元『指示』給他這個蒙騙群眾的『策略』：報社的『文件不要寫『文元指示』，不要寫我，寫中央的，多引用主席的指示。』這個頭頭心領神會，回到報社就用『主席』、『中央』的名義販賣姚文元的私貨，欺騙群眾。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這次談話，姚文元也泄露了一點天機：所謂『林彪一夥又插了手』，自然指的是：因為揭露了葉群的反動歷史，林彪通過吳法憲調查後下令逮捕我和張卉中、杜保同；『聯合

艦隊』的幹將于新野多次來報社對街的勞動保護館，召集報社『造反總部』幾個男男女女密謀，策劃對我們一家的迫害，並向子女逼索葉群的『黑材料』；中央專案組張宏學帶領報社楊、羅、王到秦城監獄，以『反軍亂軍』作幌子，逼供『反林彪』、『反葉群』的材料。可是，『九·一三事件』後，姚文元卻又連續向這個報社頭頭『指示』：『結合批林批孔批穆』、『先批林、後批穆』，又把我這個因『反林彪』入獄的人與林彪搞成了『一夥』，胡說『批穆批林批孔是一致的』。這不是肆意誣陷、愚弄群眾嗎？

在第二天召開的報社全體職工大會上，這個頭頭親自傳達了姚文元關於『批林批穆』的『指示』。緊接著，在姚文元的親自領導控制下，在社內舉辦了領導小組成員在內共計二十個人的『批林整風學習班』。在這個學習班的基礎上，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一日，召開了要在全社範圍內開展『批林整風』的動員大會。這個報社頭頭在會上說：『文元同志指示，認真學習基本路線，要求學習班緊緊把握這個總綱，分析調查一切；要求我們頭腦中要有敵情，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特別是在報社要提高警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九五七年，儲安平專了我們的政，文化大革命中又挖出了穆欣這個壞蛋。聯繫歷史和反動潮流，在上層建築領域，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一月二十五日，報社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二月十五日，又開了『編輯部評報兼動員下一步運動深入』的大會。在會上，這個頭頭激昂地說：『三人領導小組對以後運動提出以下意見：狠狠抓住孔老二、林彪『克己復禮』這個反動綱領批。在批判過程中，要聯繫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實際，揭開矛盾，解決矛盾。首先要展開對敵鬥爭，批『克己復禮』的代表人物。在我們報社搞復辟陰謀最大的人物就是

壞蛋穆欣，他是和林彪、陳伯達、王關戚搞到一條線上的，他們都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搞資本主義復辟。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的黨、國家就要改變性質，成為他們的宣傳工具。我們當前首先要聯繫這個實際。經請示中央（按：指的姚文元也）得到批准。中央負責同志（按：仍指姚文元也）指示：在辦小學習班時，申請如何批穆，指示：結合批林、批穆，批一兩次，要發動兩派一起批，不要觸動另一派。到一定階段去做。根據這個指示，我們做了請示報告，姚文元同志又做了新的批示：把雙方的思想做通了，學習學得深一些，統一思想，先批林，然後批穆，注意不要以派劃線，讓另一派先批。」

「批穆和批林、批孔是一致的。他們都是要搞復辟，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今天我們就要把這個反面教員搞出來批，繼續革命。還有新聞路線，要在批判劉少奇、林彪、穆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同時批他的新聞路線。」

姚文元曾在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次講話中透露說，「『文革』前，毛主席主要就是看《光明日報》……」而十年間，筆者一直主持著這張報紙的工作。這位頭頭不提姚文元對他說的這句話，現在卻把我說成是報社搞復辟陰謀的最大人物和大壞蛋。難道毛澤東看了十年《光明日報》，竟然沒有看出這張報紙在「搞復辟陰謀」？

姚文元和他的這位忠實的追隨者，僅僅為了他們進行政治欺騙的需要，竟然如此小題大作，把我這樣一個新聞戰線上的普通一兵，和劉少奇、林彪，還有兩千多年前的孔聖人這些大人物扯在一起『批』，豈非荒唐！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這個頭頭又在報社『批林批孔進一步動員大會』上講：『從「一·一五」以後的三個月來，報社裡寫大字報，開批判會批判了「克己復禮」，聯繫實際批判了報社的「一五·一六」黑後台穆欣，看清了他們的極右實質，提高了三個覺悟，推動了報社工作的開展。但是，距中央的要求還差得很遠。發動群眾不深不廣，對群眾可能的顧慮置之不理，對穆欣的揭露不深不透。』他在講過前段運動的基本情況以後，又作了下段運動的安排。他說，要『繼續以批林批孔為中心，聯繫批判穆欣，揭發批判林賊死黨的復辟罪行，揭發批判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和影響。』

五月二十三日這天，是我從監獄出來回到報社的第十天。據知，在我於五月十四日出獄那天，張宏學所在的那個中央專案組在向報社領導小組談關於我出獄的事時，已經說過『中央沒有給我們審查他是不是「一五·一六」的任務。』這個頭頭當時在場，他應該是清楚的。可是他仍然當著報社全體員工誣陷我是『「一五·一六」黑後台』，指責群眾在前一段『批林、批孔、批穆』運動中，『對穆欣的揭露不深不透』，要他們『聯繫批判穆欣』繼續『批林批孔』。可見這個比姚文元年長十五歲，資歷也不一定稍遜於姚文元的報社頭頭，對於這個實乃『小老弟』的頂頭上司關於『批穆』的指示，是何等的忠貞不二，不折不扣！

這位頭頭走馬上任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八個年頭。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罪行早已在全國人民面前充分暴露，引起公眾的憤懣和譴責。人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怒火正在燃燒起來，已使『四人幫』忐忑不安。姚文元在這五次談話中，就有三次提到：『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風，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個時候，參加革命工作久一些的幹部，還願死心塌地追隨『四人幫』

的人物已經不多（有些誤上賊船的人則在設法脫鉤），在新聞界尤其少見。這個頭頭依然如此『鞠躬盡瘁』，『勇往直前』，把事情做得那樣絕，不留餘地，也可算得一個典型人物。

此人和他的頂頭上司一樣，整起人來，心狠手辣。雖然筆者和此人也算有過一面之緣，當我八年冤獄結束後回到社裡的時候，此人對我一直不予理睬，當然更難指望他能遵照黨的指示，像別單位一樣『落實政策』，退還霸佔我家原先的住房。被他霸佔的住房就在同一單元的二樓東側，這時我們一家被擠到一樓西側的兩個房間。彼此近在咫尺，他每天進出無數次經過我家住房門口。但從我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回歸這裡，直到『四人幫』就擒，此人隨之下台的這段時間裡，只曾有過一次『光顧』：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張卉中被迫害致死之後的一天，姚文元的這個心腹和另外那一位報社領導突然大搖大擺地光臨寒舍，神氣活現地向我通報他們兩人決定的一項禁令：『不准為張卉中開追悼會。』張卉中正是因受這兩個報社頭頭所支持的造反派直接迫害而死的，如今他們居然作出如此無理的決定，無非是要堅決奉行『四人幫』的旨意，繼續對筆者施加高壓。

在此期間，公開的『批穆』仍在繼續進行。這個頭頭還暗中做手腳，將我每天的言行寫成簡報送呈給姚文元，設置筆者徹底平反冤情、恢復工作的障礙。此外，他們在政治上處處刁難我。毛澤東逝世的時候，光明日報社所有職工都去人民大會堂瞻仰遺容，我雖多次要求前往，始終沒有得到這個頭頭恩准。難以理解，他為什麼如此冷酷地對待一個冤獄已經結束、冤情基本平反、中央專案組都已宣佈恢復組織生活的共產黨員？

究竟是為了什麼，姚文元要親自出馬，在光明日報社大張旗鼓地發動『批林、批孔、批穆』運動？

全面地控制新聞媒介的導向，為『四人幫』的最後奪取黨和國家的至高權利而大造輿論，這就是『四人幫』搶班奪權的重要戰略步驟。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舉行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再次選進政治局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剛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王洪文已結成一幫，在中央政治局內形成一股力量。姚文元親自選派和調教《光明日報》的頭頭正是邁向『我們今後要管』《光明日報》的關鍵性一步。其時他們正要控制所有新聞媒介，為實現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進行輿論準備。從當時的大氣候來說，他們批林批孔，實際上也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批林批孔』『批周公』才是他們的『醉翁之意』。這年年底，江青、張春橋一夥，利令智昏。他們以為時機成熟，揚言『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一次路線鬥爭』，發動針對周恩來的反『右傾回潮』運動，江青揚言反對周恩來是『又一次路線鬥爭』，『批判當代的大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一夥又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對周恩來大搞突然襲擊。就在這個時期，在輿論總管姚文元指揮下，全國各大報刊發表了許多指桑罵槐、冷嘲熱諷、影射周恩來的文章。

正是這樣，這個報社頭頭對『批林、批孔、批穆欣』運動所作出的『貢獻』，絕非只在迫害我個人和全家這一點『區區小事』上，而是表現在利用《光明日報》這個輿論工具，在黨和國家命運悠關的『大事』上適應了姚文元一夥的需要。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四人幫』的氣數已到奄奄一息，行將烏乎哀哉的時刻，姚文元們狗急跳牆，猶作最後掙扎，在《光明日報》上放出《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篇大毒草，明目張膽地捏造了毛澤東的所謂『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這篇

文章發出了『四人幫』最後的一聲狂吠：『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他們沒有料到，這篇毒文引起黨和人民的警惕，實際上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鐘。兩天以後——決定中國命運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被徹底粉碎。其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向全黨發出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通知中說：

十月四日，他們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用『梁效』名義寫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肆意攻擊黨中央。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梁效』是江青直接控制的寫作班子。這篇文章原是江青親自抓『梁效』寫出，送交《人民日報》準備立即發表的。《光明日報》這個頭頭聞訊，為了搶先轉載，馬上派人取回這篇文章的清樣。只因十月二日華國鋒審閱外交部送去的《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時候，刪掉了『四人幫』偽造的這個『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並且明確批示：在今後的報刊文件中不得再使用此語。這就打亂了『四人幫』的輿論佈置，姚文元即令當時《人民日報》的頭頭撤下這篇文章，而十月四日《光明日報》卻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這篇文章。《光明日報》的這個頭頭如此賣力氣『緊跟』姚文元，本來是想從中撈取好處的，不料卻翻了車，隨『四人幫』一起墜入了覆滅的深淵。

對於這張報紙來說，這當然是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當時我還在光明日報社，親眼看到報社多數

職工心情沉重，對此表示了無比憤慨。我與他們呼吸相通，在思想上是共鳴的。

回頭再看這本姚文元同報社頭頭的談話紀錄，這個報社的頭頭經常向下屬宣揚的『姚文元語錄』，對照客觀的實際，究竟誰是真正的『壞蛋』，誰是『搞復辟陰謀最大的人物』，誰個應受批判，不是一目了然的麼？

第十七章

屋漏更遭連夜雨， 行船又撞打頭風

一、指鹿為馬的『專案組』

『專案』的本意，是指需要專門處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革』中，它被作為審查、打倒幹部的一種常用方式。林彪、江青一夥，則把專案作為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通過設立和操縱專案機構，橫行於黨紀之外，凌駕於國法之上，砸爛公檢法機關，大搞逼、供、信，製造偽證，羅織罪名，將一大批功勳卓著的老一輩領導人和高級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

從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中共中央陸續建立一些針對審查對象的專案組。一九六七年夏，成立了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簡稱中央專案組）。它的下面設立三個辦公室，即第一、第二、第三辦公室，簡稱一辦、二辦、三辦。『一辦』負責中央機關和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人的專案，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牽頭；『二辦』負責軍隊系統高級將領的專案，由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以後他也被林彪、江青打倒，也給他立了專案）；『三辦』負責公檢法系統的專案，由公安部長謝富治統管。每個辦公室的下面，又設有若干專案組，如像『二辦』下面即轄有九個專案組，這些專案組下面又有分案組（賀龍專案組下面就有十六個分組）。

有的時候，在專案組正式機構之外還建立了若干個『外圍組』，擔負一些次要工作。在這些機構工作的專案人員，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反覆審查過的『優秀幹部』。其中也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調離，有的甚至被關押坐牢。其後，各地、各部門，各單位也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種專案組，動輒對幹部、群眾隔離審查，刑訊逼供，成為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的機構。筆者就在遭受中央專案組迫害之外，還受光明日報社造反派拼湊起來的那個專案組殘酷的迫害。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立時，黨的體制已被『文革』的洪流衝垮，中央政治局名存實亡。毛澤東決定用『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形式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權力。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就由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組成，直接對毛澤東負責。實際上，中央專案組的工作一直處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之下，前台的直接負責人主要是謝富治。——江青操縱著中央文革碰頭會，康生一直控制著中央專案組。

林彪、江青這夥常高呼『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強令別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政治騙子，自己卻對毛澤東的指示陽奉陰違，反其道而行之。無論在延安整風審幹中，在建

國後的鎮反工作中，或在『文革』的審幹工作中，毛澤東始終嚴禁搞逼、供、信。可是，林彪、江青一夥緊緊把持中央專案工作的大權，把所有立案審查的幹部都當成敵人，在全國範圍內大搞逼、供、信。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富治曾在中央專案組會議上危言聳聽地說：『所有列入專案的，都是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要同這些敵人作堅決地、不可調和的鬥爭，絕不能施仁政。』林彪死黨吳法憲也前呼後應地補充說：『對這些專案對象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他們不能有任何同情，不能有絲毫猶豫，專案工作一定要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在康生一夥推行『有罪推定』辦事方針下，凡是被專案組立了專案的人，都是先定罪名再找『證據』。他們進行所謂專案調查，就是為已經確定的罪名千方百計搜羅罪證。沒有證據就採取『逼、供、信』手段製造偽證。他們手下的辦案人員，普遍採取逼供、誘供、欺騙、推拉、辱罵、罰站、毆打、餓飯等等手段，逼迫受審查者和被株連的有關人員，按照他們定性的『犯罪情節』交待問題，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首先，江青本人就是一個大搞逼、供、信的迫害狂。她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接見中國京劇團、中央樂團等單位代表的時候，起初還冠冕堂皇地說：『一定要遵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要認真地調查研究，對一個人的政治生命要負責，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們第一要證據，而不重口供，不搞逼供信；第二我們要旁證，這是多種多樣的，都是相同的旁證；第三才是口供。』接著，話鋒急轉，說『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

務！」

她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旁證』，是完全以喪失人性的殘暴手段大搞逼、供、信偽造出來的。可以舉一個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教授張重一，與劉少奇、王光美既不認識也無來往。僅因他認識與王光美熟悉的楊承祚教授夫婦（夫人袁紹英），竟被江青一夥武斷為是『證明』劉少奇、王光美是『特務』的關鍵人物，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就被拘禁起來。這時張重一教授已六十七歲，且身患肝癌末期，危在旦夕。為搶時間，江青親筆批准專案組對張進行突擊審訊的報告，即一面想法延長其生命，一面對他輪番突擊審訊。有多少次，是專案組人員死死按住因病痛折磨而掙扎的張教授而搞突擊審訊的，又有多少次，是在為他打點滴進行搶救時進行口錄的？這在專案組的報告中都有明確的記述。

對張教授十月二十七日突擊審訊的『口供筆錄』是這樣的，問：『你認識楊承祚的老婆嗎？』『認識，她叫袁振新』（按：原名為袁紹英）。『這人是男的，是女的？』『是男的……』『你怎麼知道王光美是特務？』『我是從那封信知道的。』『誰的信？』『還不是信，就是從咱們政府的公報上我知道的。』就這樣，二十七天突審二十一次，最後一次審訊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進行的，從上午九時一直審問到二十四時零分，整整十五小時。兩小時以後的十一月一日凌晨二時，張重一慘死在病床上。江青於十一月九日圈閱的專案組的報告，再現了突擊審訊張教授這一駭人聽聞的全過程：『因張犯患肝硬化癌變、腹水，為爭取時間獲取口供，經領導批准，請解放軍總醫院在監內採取了醫療監護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張犯病情急劇惡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軍總醫院，經大力搶救，給我們

創造了多審七天的條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張犯是個十足的帶著花崗岩腦袋進棺材的傢伙……對於這樣一個死頑固，我們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審訊小組，持續地發動政治攻勢，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審了二十一次，窮追緊逼，終於迫使他斷斷續續地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幾個情況。『江青的口是心非，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的殘暴狠毒在這個事例中就可見一斑了！』

在逼問張重一的同時，專案組成員又向另一個垂危病人楊承祚逼供。江青一夥就憑兩位老人在昏迷狀態中被逼問出來的『口供』，給王光美下了『美國特務』的結論。他們為了製造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的偽證，又用同樣『突擊審訊』的殘酷手段，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逼死了身患肺癌末期的重病的老共產黨員王世英。王世英的被逼致死也是江青親自導演的結果。一九六八年三月間，江青『在八個專案組會上講話』（紀錄稿）大發雷霆，說：『有個案子，我很不滿意，王世英他半身不遂，還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沒有死。你們右傾。』『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鬥，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地鬥。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請他吃燒酒！』這些話更徹底暴露了江青為儘早實現其狼子野心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殘忍面目。

二、人從獄中來，『官司』還未了

經過八年冤獄，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我終於獲釋。但是，人從獄中出來了，『案子』遠沒有

了結。江青那張垂天大網仍然罩在我頭上。我的一言一行，繼續處在報社頭頭和『造反總部』那班人的監視下。他們每晚都要將我一天的舉止言談寫一份『簡報』送交給姚文元。——先是報社一位女打字員透出這個秘密，其後筆者又從讀過這種簡報的人那裡得知其中的某些內容。

照理說，我經過八年大牢回到家裡，有親友前來看望，這本是正常的事。再說，當時『四人幫』當道：社會上密告成風，『偶語棄市』，不少親友還沒有膽量與我來往。但在送到『上面』的『簡報』中，竟說我家的門前『車水馬龍』。同時，某些『消息靈通人士』也給我透露了江青一夥已有將我『發配』到四川的打算。這些信息使我預感到，想要取得實事求是的結論、了結這場官司，我還須再作一番艱難的拼搏。

在我出獄那天，報社一個姓張的領導成員將我直接送回到光明日報社後，馬上交給我一本『光明日報社造反聯合總部』出版的第一期至二十四期《光明戰報》合訂本，說：『你要好好看看！』但他沒有料到，這個合訂本倒給我幫了大忙，讓我了解到這八年裡他們究竟對我搞了一些什麼名堂。我拿回家裡一看，真是『滿紙荒唐言』，從頭至尾純屬胡編亂造的謊言，空話連篇的咒語和王婆罵雞式的污言穢語。與此同時，報社一位好心人給我送來一大本『造反總部』編印的第一期至十二期《大字報》合訂本，以及在此期間印發的一些有關我的傳單。這些差不多就是報社『造反總部』對我進行誣蔑陷害的全部『文獻』。從這些白紙黑字編造的『文獻』中可以看到，自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紅學家李某奉旨來報社貼大字報、定下『穆欣反對江青』的調子以後，報社『造反總部』就一直沿著這個『大方向』對我以及我的全家進行迫害。他們始終把賭注押在江青身上：『凡是江青反對的我們也反對！』

前後七八年，他們把『穆欣反對江青』當咒語唸了不知多少遍，貫穿了『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他們死抱江青的粗腿，賣力地為葉群效忠，以是否『反對江青』來劃分『革命』與『反革命』。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間，他們還串通中央專案組，把李某那張大字報誣陷我的論調寫進對我的審查結論中。當時給我看的幾個結論稿裡，仍誣陷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攻擊《智取威虎山》的大毒草，扼殺京劇革命』，犯了『嚴重路線錯誤』。七月三十日，我把反駁江青和李某誣陷的申明，交給前來逼我在結論上簽字的中央專案組。張宏學接過去連看都不看，就蠻橫地扔到地上。直到中央下令撤銷中央專案組的前夕，他們仍堅持拒絕接受我的申辯，繼續用他們強加給我的結論來壓制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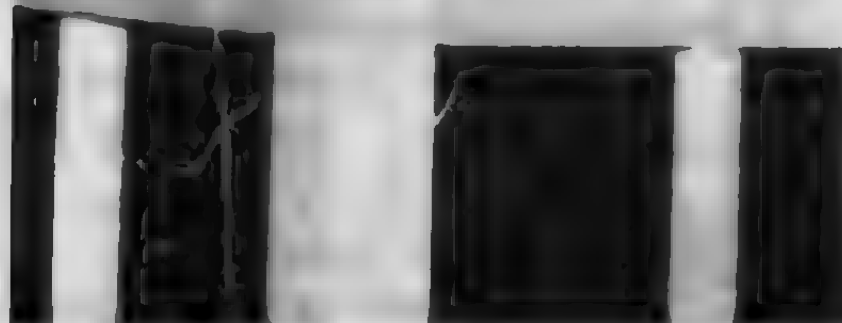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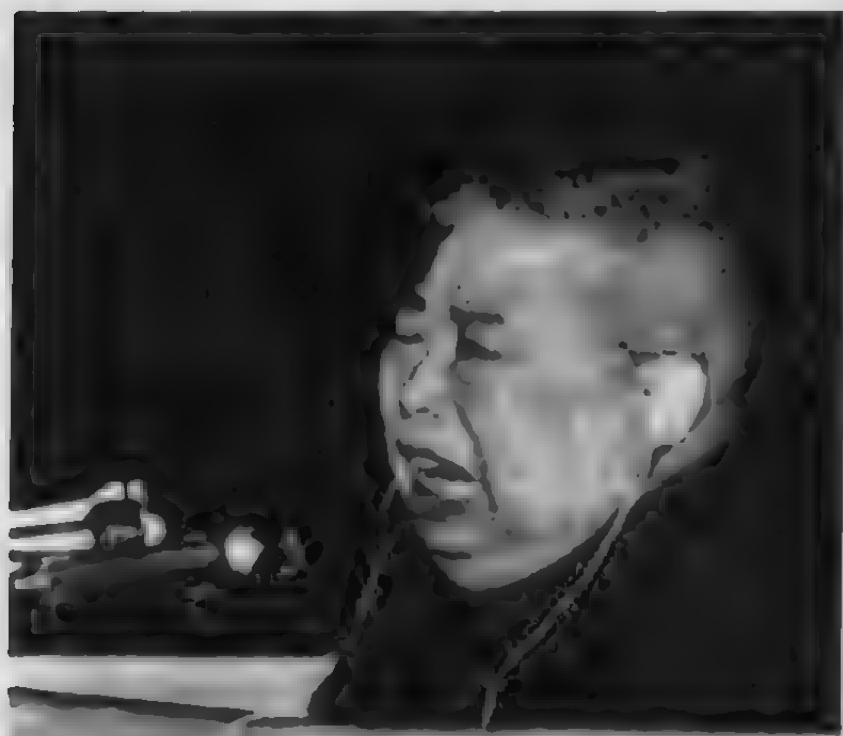
報社『造反總部』的大小頭頭和被稱作『高參』的一夥軍師，做夢也沒有料到，被他們奉若神靈，當作堅強靠山的江青、林彪之流也會倒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一垮台，這個『造反總部』好像遭到了十二級台風的襲擊。可是，具有極強的應變能力，看風駛舵是報社這夥造反派他們最擅長的一手。社會上不論有什麼人被打倒或者受批判了，他們馬上與我的名字掛鉤，在他們出版的《光明戰報》上再公佈一個新增添的『穆欣黑關係』。他們的這一舉在『文革』初期就有精彩的表演。開始時，他們把鄧拓、吳晗、胡喬木、華君武、胡癡、唐平鐸等人列入到我的『黑關係』名單中；接著，又將劉少奇、彭真、陸定一、陶鑄、宋任窮、賀龍、林楓、張際春作為我『黑關係』中的要員；後來，把高崗、彭德懷也拉入我的『黑關係』網。最無稽之談的是，他們竟把對我的批判與『批林、批孔』相提並論！不過，使我感到不幸中的大幸是，因為他們跟著江青走得太遠，做得太絕，再也無法栽贓我與這個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妖婆有什麼『黑關係』了。『四人幫』的覆滅之日，也是這個『造反總部』

的壽終正寢之時 他們無可奈何地給他們那個「敬愛的江青同志」作了陪葬

552



江青被押上刑場



“尊何門子”吳法憲在被法席上

三、『專案』追到醫院，新的一輪折磨

出獄回到家後，經過孩子們奔走，得到北京市委譚莊的幫助，我於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住進友誼醫院檢查、治療在獄中所染的疾病。原想可以安靜幾天，不料剛進醫院五天，張宏學等人就找到醫院逼令我在他們誣陷我的結論上簽字。我拒絕了。

從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八日，他們先後又給我看了一份內容互異，但結論千篇一律的修改稿（加上九月五日田報社張某給人看後，又作了修改打印出來的結論稿，共有五份）。

雖然每個結論稿都說什麼『人民內部矛盾』（同時寫著『恢復組織關係，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他們卻仍一直拿我當敵人看待。他們不改在監獄中採用過的法西斯逼供手段，繼續施行高壓，逼迫我在這些誣陷我的結論上簽字。我絕不能同意這些結論。從第一稿起，我就作了逐條批駁，要求他們去掉所有無中生有的捏造。他們始終蠻橫無理，拒絕考慮。有時表面接受，只是在詞句上換個說法，玩弄文字遊戲。但我據理申辯，要他們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還我以清白。

儘管在這新一輪的折磨中，他們有時高聲威逼：『今天你不簽字，我們不走！』或者仗勢恫嚇，抬出江青的口諭『中央決定，再不簽字，就以拒絕簽字論！』但我始終沒有被壓服、被嚇倒。因為我要的是遵照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作出一個符合我本人實際的徹底平反的結論。

四、『四人幫』垮了，幽靈仍在作祟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我在睡夢中被大兒子星星叫醒。他從外面跑回來激動地告訴我：『江青他們四個全被抓起來了！』一聽，我就高興得跳起來。在人的一生經歷中，都會有一些永遠無法忘記的瞬間，『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時節。對我來說，此時就是我最為激動的一刻，『銘刻在心』的瞬間！就連先前得知行將出獄我也不曾這樣高興過，只有當年乍聞日本投降的消息的那一時刻心情堪與比擬。從以後事情的發展看來，這時的狂歡似乎早了點。我和許多人一樣，在那一刻沒有料到歷史的發展忽又出現了短暫的曲折。但是不管怎樣，七日凌晨傳來的信息對中國的命運都是特大的喜訊，體現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心願。陰謀篡位奪權的『四人幫』最終成為階下囚、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中華民族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可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狂歡並沒有持續多久。人們還沒有緩過勁來，嚴峻的現實又把他們拖進惶恐困惑的境界；剛剛敞開的心扉就又緊緊地收縮起來。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四人幫』垮台四十來天後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指責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時是『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此後不久，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又出現在最高權力機構。十一月三十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德，在人大常委會上講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說『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

央』。『要把「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這個時候，撥亂反正的工作遭受挫折，平反冤假錯案遇到阻力，對『四人幫』的批判也無生氣。鄧小平不能復出，『天安門事件』仍然背負著罪名。轉眼到了周恩來的忌辰。當《人民日報》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問題請示汪東興時，他規定只准發四、五篇紀念文章，不准老一輩領導人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不准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准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准《人民日報》發社論。他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的精神，因為悼詞是經毛澤東審定的。他還質問《人民日報》寫紀念社論的人，『是不是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在這種形勢下，我的冤案難以徹底平反，繼續經受了三年多充滿痛楚的熬煎。

原先一直迫害我們的那個專案組隨著江青、康生一夥的垮台已不復存在了，但是它的某些大頭目仍踞高位。辦理專案的人雖然換了，但『換湯不換藥』，辦案的指導思想與『四人幫』的老『規矩』一脈相承。其間，為了爭取儘快還我清白，我曾多次向上級領導和各有關方面呼籲，也向主管專案工作的汪東興寫信，但都毫無回音。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我才被通知說，有新換班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派人來與我見面。來的人中，一個姓李的人拿出一個註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結論稿當場要我簽字。我拿起一看，覺得這個新寫的結論稿，和張宏學們炮製的那幾個結論稿相比，只是文字簡短一些，語氣和緩一些，實質還是一樣：『有錯誤』，『本人作過檢查』，『穆欣同志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還把早在四十年代已經調查清楚、沒有問題並且作過結論的我的某一個社會關係不顧事實地寫成『未做書面結論』。

當時我提出：我受江青和林彪一夥的迫害，冤獄八年，應當實事求是地給我做一個徹底平反，恢

復名譽的結論。他們卻說：『不是迫害』，『「四人幫」沒有插手』，『查不出「四人幫」批示的筆跡，再往上無法查……』

『什麼叫迫害？我和張卉中都是國家幹部，遭受林彪和江青的誣陷，冤獄八年，張卉中被迫害致死，家屬廣受株連。兩個家庭的十幾口人中，有十二人被關，四人死亡，二人致瘋，一人致殘，最後查明沒有一個人有政治問題，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這叫不叫迫害？是不是冤假錯案？該不該給我們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我們全家遭受林彪、江青迫害，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你們卻說，我們的冤案『四人幫』沒有插手，沒有發現江青的筆跡，就不能說是江青迫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都垮台了，為什麼還要替他們遮掩？』

我不能忍受，在『四人幫』已經被打倒近兩年的今天，竟然還有人如此為他們開脫罪責，居心何在？當場疾聲厲色地予以了反駁。出於氣憤，我將吳法憲一夥在『審訊』杜保同時將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及原先的中央專案組就此事向我和杜保同逼供的情形端了出來。雖然來的幾個人，對我的嚴正反駁無詞答對，但截住了我的話，要我對結論稿的具體內容提出意見。當我堅持要求搞清案情重寫結論時，李某竟當面說謊，他說：『我們在檔案中找不到杜保同的材料。』這時我將所寫揭露林彪、江青一夥迫害我和張卉中、杜保同的材料和要求徹底平反的申訴交給他們，他們居然拒收。接著，我又把張卉中生前所寫的要求中央專案組為她平反的申訴交給他們，他們同樣拒收。他們既然立了我們的專案、要為我們作結論，卻又拒絕接受我們的申訴，豈非悖謬？他們只是急於要我對『結論稿』的具體內容表態。本來，大前提沒辨明，具體問題是難澄清的。但我還是提了一個問題：結論稿中說我『在光明

日報社和中央文革工作期間的「錯誤」，本人作了檢討」，指的是什麼性質的錯誤？他們說：『是工作錯誤。』『既是工作錯誤，為什麼寫進歷史審查結論？』他們講不出道理。我十分清楚，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留尾巴』：以便在這個『作了檢查』詞句下，把過去他們對我搞『逼供信』時所寫的材料全部作為結論的附件保留下來：讓我永遠揹著『有錯誤』的包袱。這樣一來，其嚴重的後果比我曾多次提出要推翻的、原先張宏學等人炮製那個結論還要貽害無窮。

儘管為了讓我在『結論』上簽字劃押，引出了一番爭辯，使我看清了眼前的這班辦案人身上附有四人幫的幽靈。他們很想把江青一夥沒辦完的案子接過來後繼續辦成。這個李某正是不打自招地承認了這個現象。他說：你的結論要送汪東興同志批准，你在這邊簽字後，送給他一批就定案了。上面催的緊，我們也著急，希望現在你就簽字，我們帶回去馬上送給汪東興批……

當然，對於這樣的結論，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簽字的。因為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家庭的徹底平反，而是涉及到對『文革』以前《光明日報》工作的全面評價，影響到廣大報社員工的政治和職業前途，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如何評價和認識『四人幫』殘酷迫害無辜的罪行。

臨走時，李某對我說：『你再想想，我們還會再來找你的。』

五、拼搏四年半，終獲徹底平反

雖然中央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三令五

申，嚴令各級黨委、各個單位立即平反冤假錯案，但我和我妻的平反結論仍一拖再拖，遲遲不予落實。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光明日報社的頭頭在開會時聽到的中央指示：『如對本單位的冤假錯案頂著不辦，不予平反，將要追究該單位領導的責任』，才匆匆忙忙從會場裡打電話回來，吩咐專案組迅速給我倆作出結論，這才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為我們作出了徹底平反的結論，儘管在這個結論中，只提到了『四人幫』對我的迫害而沒有點江青的『名諱』。

其實，只要真正按照黨的政策辦事，給一個飽受迫害的人作出正確結論，本是輕而易舉的事。尤其在折騰了十多年時間，『內查外調』以後，所有問題應當早已查清。如能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只須推倒報社金某和楊羅王之流胡編亂造的那些誣蔑我的不實之詞，扔掉他們製造的一切偽證，還當事人以本來面目就行了。可是，從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對張卉中的結論開始對話更早），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對我的結論竟然拖延了四年半之久。辦結論的專案組前後換了三茬，所有辦案的人員都不敢正視蒙冤受害者所遭到的劫難和痛苦，不敢正視四人幫流毒對他們的影響。

筆者曾經多次上書希望儘快作出結論，有關單位多次打算給我分配工作，但其時身居高位、兼掌專案工作大權、掌管宣傳輿論工具的那位負責人毫不改口地回答說：『他還沒作結論！』結果全都告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終於得到一個徹底平反的結論。縱然許多地方未能盡如人意，但是，冤案總算得到平反，涮掉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水，還了我清白，也還了我辛勤耕耘十載的《光明日報》清白。這是值得慶賀的。這份題作《關於穆欣同志的復查結論》中，推倒江青對我的誣陷，『撤消中央專案小組辦公室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結論』；『穆欣同志的歷史是清楚的。』同時寫明了林彪對我

進行迫害的情形：『一九六七年七月間，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過穆欣同志轉送過七機部四院一派組織「新紅聯」外調組「關於蔣匪軍委第六部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情況調查」材料。十月份，青訓班教官歐陽敏納給林彪寫信，說有人調查葉群在青訓班的歷史，林彪要吳法憲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發現杜保同同志轉送過材料，懷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將杜保同、穆欣、張卉中同志拘留審查，進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關押期間，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體上受到殘酷摧殘，家屬、子女及親友也受到株連。』結論指出：『所謂整葉群「黑材料」等，均係林彪、「四人幫」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對林彪、「四人幫」強加給穆欣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和莫須有的罪名統統推倒，予以徹底平反，恢復政治名譽；對因穆欣同志問題而受株連的家屬、親友和幹部，應予平反，恢復政治名譽。有關材料，按中央規定處理。』

同樣在十二月十五日，對張卉中也作出了徹底平反的結論：『歷史清楚，所謂特嫌問題純屬誣陷。因此，對林彪、「四人幫」強加給張卉中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結論應予撤銷。有關材料按中央規定處理，對因張卉中同志受迫害而受株連的家屬、親友，應予平反，恢復名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間，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我重新安排了工作；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社為張卉中舉行了追悼會。

憶起蒙難八年，家族株連，仿佛又墜入蠻煙瘴雨之鄉，受駭浪驚濤之險。然而，寒心冰骨的嚴冬畢竟已成過去，我又重新站了出來，投身於祖國新的歷史時期，為人民從事新的工作。





穆欣（中）與華君武、宋琦夫婦在劫後重逢（1996年夏，北京）

跋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導致這場史無前例的內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恐怕應該說是黨內「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並居統治地位的結果。而這場歷時十年的內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所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它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

已故的周恩來總理說得好：『歷史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像記憶對於個人一樣，一個人喪失了記憶，就會成為白癡，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歷史，就會成為一個愚昧的民族。而一個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

十年內亂伊始，由於陰差陽錯，我被捲入鬥爭的漩渦；不及旋踵，遂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被投入秦城監獄。清初吳任臣在《寧古塔志·弁言》中說：『從死地走一回，勝學道三十年。』我在十年內亂中『從死地走一回』，對於『死地』盤根錯節的矛盾、驚心動魄的鬥爭，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三種人』的醜惡表演，看得真切，本著『總括前蹤，貽誨來世』的精神，秉筆直書，寫了這本《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目的在於：一、以確鑿的事實，從某些側面，記述十年動亂曲折複雜的歷程，為研究者提供可信的研究資料；二、通過往事的回憶，把已消失的人物和社會現象再現出來，發掘潛藏在歷史表象背後的因果關係，以利人們總結、記取十年動亂那段歷史的沉痛教訓。

事實，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客觀基礎；對於往事的記述，貴在真實、客觀、準確。十年動亂肇端，迄今已三十年；十年動亂結束，也已有二十個年頭了，許多親歷那場動亂的人還在。應當承認，絕大多數的親歷者對那段往事的記述是客觀的、真實的，但也不能否認，極少數親歷者出於某種目的，置客觀事實於不顧，極盡顛倒是非、歪曲真相之能事。更有甚者，個別以營利為目的所謂『作家』，在金錢的驅動之下，胡編亂造。他們的那些以『文革』為題材的所謂『紀實文學』，連篇累牘，名為『紀實文學』，實則欺世盜名。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或者移花接木，或者張冠李戴，或者指鹿為馬，或者向壁虛構，以致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令讀者無所適從。這都是不能不警惕的。如是，人們要科學地認識往事，就必須對各色人等記述的『往事』，下一番鑒別、篩選的工夫。否則，真偽莫辨，就得出錯誤的結論，貽害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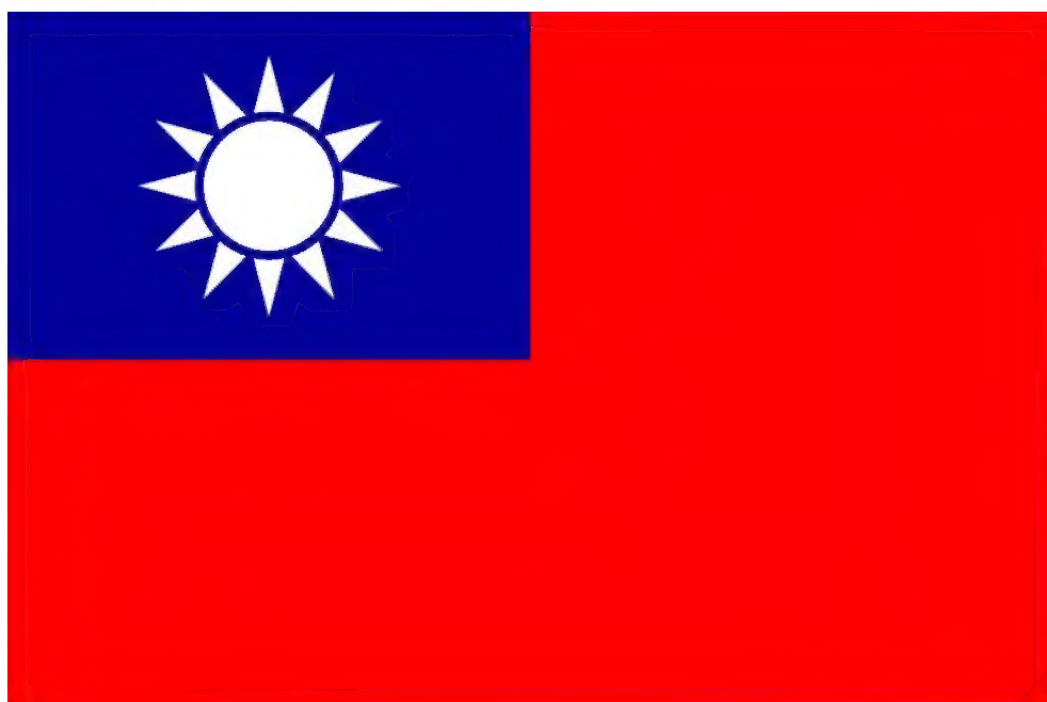
述往事，不是為了引導人們向後看，而是要通過對往事的科學認識：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引導人們向前看。即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說：『述往以為來者師也』。十年動亂所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

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二百九十三頁）只有積極穩妥地推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才能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發生。

鑒往可以知來，通過對往事的追述，清理和總結，從往事的經驗中汲取智慧，用於認識現實，理解現實，在挑戰與機遇面前，科學地把握前進的方向，是獲得未來事業成功的必由之路。十年動亂曾把我們的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發展潮流中的落伍者；而清算十年動亂老賬，又成為振興我們民族的契機。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重視從往日的失敗中汲取智慧，得到啟示，引為鑒戒，是提高我們民族素質，激勵我們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克服盲目性，少走彎路或不走彎路的有效途徑。

——這就是我撰寫本書的動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於北京車公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修改。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